

# 序

张汉清

世界社会党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诞生为肇始，至今已近120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与发展。在1914年前，世界社会党作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曾经有过45年的光荣革命历史。后来，由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侵蚀，第二国际各主要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叛变，导致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分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党与共产党长期对立和对抗的历史。其中有许多是非曲直和经验教训值得重新探讨，深入研究。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世界革命力量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世界社会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51年6月，由欧洲各国社会党发起并重建了社会党国际。该国际从70年代以来又大力向亚非拉地区发展，到1986年，其成员党已达70个，遍布世界各大洲，共有二千万党员，拥有一亿二千万选民。欧洲有20个社会党先后执过政或正在执政，在各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党团势力最大，约占总议席的1/4强（111/410）。可见世界社会党已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而世界社会党纲领政策的改良主义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世界上颇有影响的重要政治思潮之一，引人注目。

基于上述历史、理论与现状的情况，社会党问题已成为世界

各国学术界、理论界和政治界人士广泛重视，争相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国过去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各国社会党缺乏全面的认识，更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学术界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认识、评价社会党的性质、作用及其重要性，纠正了过去全盘否定的片面性，逐步开展了对各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的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及其后成立的北京大学世界社会党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个新发展的科研领域里辛勤耕耘的一个园丁。该系为了开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经与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签订科研合作协议，派该研究中心主任曹长盛教授赴联邦德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在曹长盛教授主持下的这一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年，是世界矛盾激化、政治动荡、战火频仍、形势幻变的年代。其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尖锐冲突的中心，大规模战争激烈残酷进行的场所，集中在欧洲，而德国又首当其冲，扮演了祸首的不光彩角色。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德国历史的起伏沉浮，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争、革命、执政、在野、受迫害、转入地下、流亡国外、被迫反抗、分离聚合、顽强求存等多方面的实践，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因此，总结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败兴亡的历史经验及其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历史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战后德国政局的演变和当今世界范围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在广泛收集、深入研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演变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分化聚合时期、入阁参政时期、挫折与转变时期、流亡与反抗时期；并初步探索了这三十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改良主义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些论述都是作者独立研究的创见，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精华所在。书后所附德国社会民主党各个时期的纲领宣言，绝大多数均系第一次由德文译出，有助于国内学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党的研究。本书作者的上述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当然，在我国对世界社会党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资料掌握远不充分，研究尚待深入的情况下，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论点自然还可进一步探讨。希望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把我国对世界社会党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尽快接近世界水平。

1987年9月4日于北京大学

## 前 言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近年在国外学术界颇受重视。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苏联和英、法等国相继推出一批专著问世。目前处于西方新保守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势力夹击中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与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处境有某些相似之处。人们企望从总结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中寻救在解决现实问题和展望前途方面得到某些启示——尽管东西方学者的立场、观点、结论差异很大。在我们中国，鉴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传统的改良主义影响较小，致使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甚少。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在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可以肯定，了解和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成败兴亡及其社会改良主义的形成发展，对于认识今日世界范围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14年至1945年是欧洲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方面的全面危机和剧烈冲突的灾难中饱经忧患。就德国来说，这30年内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全国范围的人民革命。政治形势风云起伏、瞬息万变。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政都先后出现在德国土地上。第一次大战战败、1918年革命夭折、魏玛共和国垮台、希特勒法西斯

全面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政治事变中，形形色色各阶级代表人物戏剧性地粉墨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激流中，各种理论、学说、方案、计划应运而生，此起彼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受到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1918年革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时而入阁、时而下野；法西斯上台后被宣布为非法，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或者流亡国外，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期间，党内经历了多次分化改组、分离聚合。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变化同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是息息相关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曲折经历，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欧洲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的缩影。1914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14年至1922年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分化聚合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各国社会民主党相继分裂。左派脱离改良主义队伍，创建共产党，中派与右派进一步合流。这种分化过程致使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两军对垒的格局。在德国，工人队伍分裂成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左中右三派鼎立的阵势。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分化，左派参加共产党，右派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中派党组织上的消失宣告了这一分化过程暂告一段落。

1923年至1928年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西欧社会民主党获得不同程度的参政机会，先后在11个国家内进入资产阶级内阁政府。在与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基础上，社会改良主义理论获得系统性的发展，形成工人运动内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益加深。德

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的制定和鲁道夫·希法亭的“有组织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整个国际改良主义思想发展影响很大。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新的转折。面临垄断资本与法西斯主义的进攻，社会民主党被迫投入斗争。在改良主义路线破产的教训下，在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人改弦更张，与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统一战线，扼制了法西斯主义。在另一些国家，包括德国，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形成。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德国人民被推入血泊之中，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起被取缔。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是欧洲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艰苦斗争的血与火的岁月。各国社会民主党都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流亡与反抗的年代。广大社会民主党党员与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恐怖下并肩战斗，而流亡国外的右翼领导人依旧坚持反对统一战线的方针。

简而言之，两次大战之间，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西方社会改良主义政党走过了一条由盛而衰，不断遭受挫折，在困境中挣扎奋斗的道路。从这段历史中确实能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改良主义，是大战前改良主义思潮发展的结果，又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但它又有别于大战前的改良主义，也与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所不同。

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改良主义有着明显的特点。它的特点之一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从一次大战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少数反对派发展成为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与之相对立的一个独立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范围。

表面上，这个时期的改良主义并不象一次大战前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那样赤裸裸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相反，它们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中大量引述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词句，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不过是更多地采取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手法而已。

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表现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时代、任务、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了与列宁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否认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反对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斥为“极权主义”而与希特勒法西斯独裁专政相提并论。他们攻击苏联的外交政策，甚至要求苏联与希特勒德国一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责任。他们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采取拒不合作的方针。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尤为顽固，亦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始终未能在德国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还把德国的解放寄托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身上，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防备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我们不否认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在内政外交包括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等方面有过许多失误以至严重错误。对这些过失及影响应作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是，我们反对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及其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一笔抹杀。当然，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是历史上多种因素造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失误在西方工人运动中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对西欧社会

民主党人的敌视态度更加深了这种对立，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无论如何，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原则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方针则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在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内部也不断有人反对右翼领袖的这一错误方针。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及中间反对派，在德国先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流亡年代的《新开端》小组不同程度上对布尔什维主义采取了较为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一些人甚至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先锋榜样作用，为苏联的外交政策辩护，积极要求与德国共产党合作。在1933年法西斯上台，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方针破产，广大党员干部急剧左倾的历史转折时刻，他们的情绪一度在党内居于上风，这表现在193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宣言》措辞激烈的自我批评中。但是，这一激进情绪很快被流亡执委会右翼方针所压倒，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这一短暂“接近马克思主义”时期被迅速结束了。西欧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冰炭不相容的对峙局面始终未能消失。

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改良主义的另一特点是理论上的系统化。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次大战前伯恩施坦树起修正主义旗帜，向马克思主义发动全面进攻，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开辟出一条社会改良主义道路，但是，伯恩施坦当时还没有作出系统、完整的改良主义理论建树。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改良主义继承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而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政党民主制度为改良主义提供了合法的实践基地。于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形成了社会改良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外，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起了重大作用。他提出的“有组织资本主义”的理论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异曲



同工，成为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希法亭宣布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有组织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自觉机制和对经济的领导正在加强、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与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竞争正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得到克服。希法亭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毫无阻碍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稳定性将会被缩小，危机将得到缓和，工人状况将渐趋安定，失业的威胁由于社会保险的发展而日益减小。至于非组织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将通过把专制性的有组织经济改造成民主性的有组织经济来解决，使集中的资本逐渐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与战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更多地采取了合作态度。社会民主党全部改良主义战略是：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要通过扩大和完善政治民主、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成为改良主义的两大政策。而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与1925年海德堡纲领则集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纲领要求。这样，社会改良主义终于有理论、有纲领、有政策、有目标地被全面武装起来。

当然，改良主义的系统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体系是科学的、严密的。相反，它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结论往往是形而上学、孤立片面的，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希法亭的“有组织资本主义理论”问世不到五年，就被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灾变证明其虚妄。历史表明，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内及国际间垄断资产阶级联系加强，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和组织化；另一种趋势表现为生产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这两种趋势同时发生作用，时而前者较为明显，时而后两者较为突出，甚至一种趋势掩盖

另一种趋势。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垄断化趋势的加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改良主义理论的错误不仅表现为判断形势的失误，而且表现在所提出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脱节，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所以说，改良主义理论的系统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加剧了其理论体系内部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社会民主党从理论到实践都顽强地表现出其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受到相当多工人群众、城乡小资产者以至中间等级的支持，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改良要求和实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捍卫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反对大垄断资本、封建军国主义复辟势力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表明他们不失为一支进步力量。许多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但是，由于理论上的固有缺陷、斗争手段的软弱无力，往往使他们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采取容忍政策，对布尔什维主义、各国共产党人采取敌对立场，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分裂，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严重损害。这是他们很大的消极方面。当然，这种两面性在不同条件下各有侧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在各派之间，各派领袖与群众之间，立场、观点差异很大，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看到社会民主党采取“联盟政策”、“容忍政策”，就抹杀他们与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的对立，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后来有的研究者，只是强调社会民主党与布尔什维主义对立的一面，给它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视其为反动力量，这也是一种片面

性。

如何准确地把握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的两面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派别中的具体表现，历史地、全面地评价整个运动，是一个相当繁重的科研任务，我们在这本书中只是作了一点尝试，限于水平、资料、时间等各种条件，未必尽如人意，缺点、错误必不可免。我们热切希望得到专家、同行、读者的批评意见，以期共同讨论，对问题有一个更深入、准确、扎实的研究。

本书由曹长盛主持集体编写，参加编写的有曹长盛（第一章）、陈玉国（第二章第一、二、四节）、杨玉生（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昌竞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李晓军（第五章）、张世鹏（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全书最后由曹长盛统修定稿。

书后所附1914—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事年表由曹长盛、张世鹏整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由陈玉国译、殷叙彝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海德堡纲领和1934年索巴德布拉格宣言均系张世鹏译、殷叙彝校。上述宣言、纲领，除格尔利茨纲领有过翻译外，其它均系在我国第一次译出。

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李兴耕等同志的大力协助，谨致谢忱。

# 目 录

|                             |     |        |
|-----------------------------|-----|--------|
| 序                           | 张汉清 | ( 1 )  |
| 前言                          |     | ( 1 )  |
| <b>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 |     |        |
| <b>( 1914—1918 )</b>        |     | ( 1 )  |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       |     | ( 2 )  |
| 一 大战爆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           |     | ( 2 )  |
| 二 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公开背叛            |     | ( 6 )  |
| 三 大战初期左派的反战活动               |     | ( 9 )  |
| 第二节 斯巴达克派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     | ( 16 ) |
| 一 斯巴达克派的形成及其反战斗争            |     | ( 16 ) |
| 二 斯巴达克派反战斗争的方针政策            |     | ( 23 ) |
| 三 斯巴达克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斗争        |     | ( 28 ) |
| 第三节 党的分裂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     | ( 31 ) |
| 一 党内左中右三派的矛盾斗争              |     | ( 31 ) |
| 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     | ( 37 ) |
| 三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     | ( 41 ) |
| <b>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  |     |        |
| <b>( 1919—1923 )</b>        |     | ( 44 ) |
| 第一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十一月革命           |     | ( 45 ) |
| 一 革命的爆发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策            |     | ( 45 ) |
| 二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和苏维埃运动的挫折         |     | ( 49 ) |
| 三 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对革命派的镇压          |     | ( 58 ) |

|            |   |         |
|------------|---|---------|
| 第二节        |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                        | ( 65 )  |
| 一          | 国民议会的召开和社会民主党执政·····                        | ( 65 )  |
| 二          | 党的魏玛代表大会确定改良主义政策·····                       | ( 67 )  |
| 三          | 魏玛宪法及其实质·····                               | ( 71 )  |
| 第三节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                         | ( 74 )  |
| 一          | 1920年国会选举与社会民主党下野·····                      | ( 74 )  |
| 二          | 修改纲领问题的提出和关于纲领草案的辩论·····                    | ( 77 )  |
| 三          | 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与新党纲·····                           | ( 82 )  |
| 第四节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和<br>分裂消失·····                | ( 90 )  |
| 一          | 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制定·····                           | ( 90 )  |
| 二          |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壮大·····                      | ( 94 )  |
| 三          | 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国际”问题的争论·····                     | ( 99 )  |
| 四          |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消失·····                          | ( 107 ) |
| <b>第三章</b> | <b>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br>( 1924—1928 )····· | ( 120 ) |
| 第一节        |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和<br>组织概况·····              | ( 121 ) |
| 一          | 1924年的柏林组织章程·····                           | ( 121 ) |
| 二          |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                       | ( 128 ) |
| 第二节        | 社会民主党的海德堡纲领·····                            | ( 132 ) |
| 一          | 海德堡纲领的制定过程·····                             | ( 132 ) |
| 二          | 海德堡纲领的通过及其主要内容·····                         | ( 135 ) |
| 第三节        | 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和改良主义<br>体系的形成·····              | ( 144 ) |
| 一          | 基尔农业纲领·····                                 | ( 144 ) |
| 二          |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                      | ( 147 ) |
| 三          | “经济民主”思想·····                               | ( 155 ) |

|            |                                |       |
|------------|--------------------------------|-------|
| 第四节        |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政策               | （159） |
| 一          | “联盟政策”与1925年总统选举               | （159） |
| 二          | 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                     | （163） |
| 三          | 社会民主党与剥夺诸侯运动                   | （167） |
| 四          | 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                     | （171） |
| <b>第四章</b> | <b>法西第危险增长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       |       |
|            | <b>（1929—1933）</b>             | （175） |
| 第一节        | 面临危机和灾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 （176） |
| 一          |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德国的困境                | （176） |
| 二          | 社会民主党对危机的立场                    | （179） |
| 三          | 党的分裂—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                | （183） |
| 第二节        | 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 （188） |
| 一          | 1929年以前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br>关系 | （188） |
| 二          | 社会民主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              | （193） |
| 第三节        | 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上台                    | （201） |
| 一          | 法西斯危险的增长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政策            | （201） |
| 二          | 巴本政变和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政策               | （206） |
| 三          | 1933年1月30日                     | （211） |
| 第四节        |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 （212） |
| 一          |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的地位           | （212） |
| 二          |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挽救德国危机的努力              | （217） |
| 三          |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关于德国法西斯问题的辩论           | （219） |
| <b>第五章</b> | <b>法西斯执政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          |       |
|            | <b>（1933—1938）</b>             | （225） |
| 第一节        | 社会民主党由合法的党变为非法的党               | （226） |
| 一          | 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政府的错误认识               | （226） |
| 二          | 希特勒政府镇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 （230） |
| 三          | 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态度及其被取缔                | （233） |

|            |                            |               |
|------------|----------------------------|---------------|
| 第二节        | 1934年布拉格宣言的发表              | .....         |
| 一          | 布拉格宣言产生的过程                 | .....         |
| 二          | 布拉格宣言的主要内容                 | .....         |
| 三          | 布拉格宣言的作用及其影响               | .....         |
| 第三节        | 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斗争                 | ..... ( 252 ) |
| 一          |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抵抗斗争及其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 | ..... ( 252 ) |
| 二          | 国内社会民主党人与反法西斯统一行动          | ..... ( 259 ) |
| 三          | 其他社会主义改党组织的抵抗斗争            | ..... ( 263 ) |
| 四          | 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历史评价             | ..... ( 268 ) |
| <b>第六章</b> | <b>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b>    |               |
|            | <b>( 1939—1945 )</b>       | ..... ( 271 ) |
| 第一节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斗争               | ..... ( 271 ) |
| 一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反战方针   | ..... ( 271 ) |
| 二          | 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战斗争                | ..... ( 279 ) |
| 第二节        | 社会民主党流亡国外的组织状况             | ..... ( 284 ) |
| 一          |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解散              | ..... ( 284 ) |
| 二          | 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与斗争        | ..... ( 286 ) |
| 第三节        | 战争流亡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探索           | ..... ( 291 ) |
| 一          |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民主社会主义者宣言》        | ..... ( 291 ) |
| 二          |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雏型                | ..... ( 294 ) |
| <b>附录</b>  |                            | ..... ( 305 )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事年表 ( 1914—1945年 ) | ..... ( 305 ) |
|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 ( 1919年 )    | ..... ( 319 ) |
|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 ( 1919年 )    | ..... ( 322 )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 ( 1921年 )        | ..... ( 326 ) |

|                        |         |
|------------------------|---------|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925年） ..... | （ 332 ） |
| 1934年索巴德布拉格宣言 .....    | （ 341 ） |



# 第一章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大厮杀。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战争爆发后，对待这场战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严峻考验。

作为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一再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同第二国际各国党一起拟定和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和决议。可是，大战爆发后，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德国党的领导明显地表现为支持、反对和模棱两可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左、中、右三派。

处于多数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公开倒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支持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8月4日，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挟持和控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拨款法案。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也向政府表示，保证不提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问题。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全德工会则宣布“国内和平”，要求工人“实现劳资合作”，禁止工人罢工，并煽动工会会员开赴前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这样，德国党的右派领导完全背弃了人民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使德国党由革命的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但是，德国党内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sup>①</sup>为代表的左派，不怕孤立，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坚持开展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他们制定和实行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独立的政治派别——斯巴达克派。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反战斗争活动，赢得了很大胜利，拯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声誉。

1917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哈阿兹、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与右派分裂，同左派一起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2月，由于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斯巴达克派与中派决裂，正式成立了德国共产党。所以在大战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三个工人政党。后来，在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又重新并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 德国社会民主党

### 一 大战爆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

---

<sup>①</sup>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由于受其父影响，早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1912年当选为德国议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被反动派杀害。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1月被反动派杀害。

别了，由于世界领土已分割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得到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除了通过战争夺取，别无它途。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疯狂地扩军备战，并且形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同德、奥、意“三国同盟”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长期酝酿的世界大战，终于在1914年8月爆发。战争的导火线是奥国皇太子被塞尔维亚人刺杀的事件。7月28日，奥国以此为借口对塞宣战。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宣布支持奥国；而英国、法国、俄国则宣布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3日又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接着又在13日对奥国宣战。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了。后来卷入战争的还有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五大洲的36个国家。

帝国主义各国投入这次战争主要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国际市场和世界霸权。后起的德帝国主义想夺取英国在近东、法国在北非等处的大量殖民地和比利时的刚果，还想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英国则力图击败自己的竞争者德国，还蓄意夺取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想收回早先被德国占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夺取德国富产煤铁的萨尔。俄国则力图击败德国，独霸巴尔干和土耳其，谋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沙皇俄国，还想利用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绞杀国内的革命运动。所以，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正义的战争。

战争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起来

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党。它继承了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传统，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创建于19世纪60年代。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纲领和策略，并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同反动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袭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经受了错误和挫折的锻炼，取得了积极成果，积累了从事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丰富的经验，对欧洲各国建立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起了表率作用。它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纽带作用，担当了第二国际创建的重任并在第二国际成立后成为第二国际的核心，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排除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它曾积极开展反对党内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898—1903年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围绕着伯恩斯坦问题展开了辩论，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反修斗争揭开了序幕。它还曾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它的领导人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发言或作报告，分析了军国主义形成的根源，揭示了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联系，指出了无产阶级对待军国主义应持的正确态度。

在战争危机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积极地参与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1907)、哥本哈根大会(1910)和巴塞尔大会(1912)着重讨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这些大会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或宣言。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强调指出，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必须在青年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应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必须“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

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sup>①</sup>哥本哈根大会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决议的主要论点，并着重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障”。<sup>②</sup>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巴塞尔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制造战争危机的罪行，指明了即将爆发的战争的非正义性，确立了各有关国家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具体任务，呼吁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联合起来，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帝国主义政府胆敢发动战争，那么整个欧洲无产阶级就要根据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大会业已确定的原则，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德国党的领导人曾积极地赞同上述决议和宣言，也曾在国内组织领导反战工人运动。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其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贯坚持了革命方向，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未能深刻认识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新形势以致不清楚党所面临的新任务；由于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不很得力、不很彻底，以致伯恩斯坦主义在党内蔓延滋长；由于迷恋于议会斗争的胜利，致使合法主义的影响在党内不断增长，因而造成党的革命性逐渐削弱。在战争危机年代，党内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左、中、右三派。1913年8月，党的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倍倍尔逝世后，党的领导权落到了右派谢德曼等人的手中。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蜕变，由革命的党蜕变成了改良主义的党。

---

①《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38—139页。

②同上，第168页。

## 二 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公开背叛

大战全面爆发前夕，即1914年7月25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还曾发表一项《反对战争挑拨者的罪恶行动的激烈抗议书》，号召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立即举行群众性的反战示威，其中写道：“德国士兵决不为奥地利当权者的贪权欲和帝国主义者的利润而牺牲一滴血……统治阶级在和平时压榨你们，蔑视你们，战时会利用你们去当炮灰。必须到处对当权者大声叫喊：我们不要战争！打倒战争！各民族兄弟般的国际团结万岁！”<sup>①</sup>7月28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还写道：“目前最严重的战争危险不是沙皇制度，而是想作坏事的德国”。<sup>②</sup>在7月26日—30日，为响应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号召，德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可是，当德国对俄、法宣战，大战全面爆发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脑们即纷纷倒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公然背弃了自己曾同意的宣言、决议和诺言，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其实，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在向工人讲述关于反对战争的漂亮言辞的同时，就与政府进行了秘密的勾结。7月29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阿·休特古姆在同政府的一次秘密会谈时告知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将不采取任何阶级斗争行动，并将在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登载使政府满意的报道。这一许诺是休特古姆同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巴泰尔斯、布劳恩、艾伯特、米勒以及国会议员费舍会谈后决定的。<sup>③</sup>接着，德国首相霍尔韦克于1914年7月30日的普鲁士政府

---

①②《前进报》（德文版）1914年7月25日、28日。

③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323页。

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情况下是会奉公守法的。随之，7月30日《前进报》上公然吹捧德皇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同一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塔姆普费尔发表文章《生死存亡的斗争》，明确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7月31日，海·米勒作为党的执委会代表在巴黎同法国社会党人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也声称，威廉二世皇帝和霍尔韦克首相“是真心实意力求维护和平的”。

德国对俄宣战后的第二天，即8月2日，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控制的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会议作出决定：支持帝国政府在总动员期间采取的措施；为进行战争立即停止所有争取工资的运动；不再开展新的争取工资的斗争；停止对罢工者的资助；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sup>①</sup>公开背叛工人利益。

8月3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召开会议，讨论对国会进行军事拨款表决的态度问题。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左中右三派鲜明地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大多数右派首脑列举种种“理由”，建议同意批准军事拨款，认为应无保留地公开表示跟政府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起，声称如果拒不同意批准军事拨款，党的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和消灭，而说一声“赞成”就会大大增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位，战争之后，定将出现一个强大的民主浪潮。以卡·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德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为此不仅要反对军事拨款，而且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则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认为已爆发的战争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也不是纯粹的民族战争，既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主张在军事拨款问题上既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最好是弃权，或者

---

<sup>①</sup>参看《德国工会运动的二十五年（1890—1915）》，1917年柏林版，第141页。

要求政府保证没有侵略意图，如果政府作出保证就投票同意，如果拒绝作出保证就投票反对。最后表决时，78名议员赞成同意军事拨款，李卜克内西等14名议员表示反对。这就决定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次日议会中表决军事拨款案时的态度。

8月4日的帝国议会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对党团内部的少数派用党团纪律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公然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党的主席胡·哈阿兹在会上宣读了赞成军事拨款的声明。声明中说：“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必要的款项问题……我们要证实我们一再强调过的话：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决不置祖国于不顾。”<sup>①</sup>这就完全背弃了1907年斯图加特、1910年哥本哈根、1912年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声明，也是对工人阶级、对民族、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罗莎·卢森堡曾尖锐地揭露说：哈阿兹宣读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只不过是国王演说词和首相演说词的回声和余音罢了”。<sup>②</sup>

李卜克内西囿于遵守“纪律”，违心地也投了赞成票，他曾内疚地说明：“基于种种理由，诸如党内的分裂现象还没有明显暴露，事态只象是一时误入迷途，加以党团纪律在我的心目中还有很高地位，因此没有首先同时在国会上进行斗争。”<sup>③</sup>同年12月，帝国议会第二次讨论增加军事拨款问题时，他用实际行动作了改正。

---

<sup>①</sup>《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9—430页。

<sup>②</sup>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23年莫斯科版，第14页。

<sup>③</sup>转引自库钦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1957年德文版，第202页。



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在投票支持政府的军事拨款法案的同时，还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在战争期间放弃一切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宣布实行“国内和平”政策，以便“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战争中保卫祖国”。1914年8月6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他们控制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再次号召党员和工会会员支持战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充塞了沙文主义的叫嚷。如《哥姆尼兹人民之声报》写道：“争取世界和平的工作目前停止了……现在我们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胜利吗？我们回答道，是的！”《汉堡回声报》写道：“现在是铁决定一切！现在是权力决定一切！德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社会民主党的滑稽报《真实的雅可比》以国王威廉的口吻写道：“孩子们往前冲呀！现在只有痛打一顿才有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的公开背叛，宣告了德国党在政治上、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德国党是第二国际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党，它的背叛对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起了“领头羊”的作用。在德国党的带动下，欧洲各国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相继背叛，也都纷纷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申辩。第二国际在政治上也宣告破产。

### 三 大战初期左派的反战活动

当着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滑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时，德国左派立即起来持反对态度。1914年8月4日晚，刚刚得到有关社会民主党背叛性投票的消息，柏林的海·敦克尔、胡·埃贝莱因、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弗·梅林、恩·迈耶尔、威·皮克等左派在卢森堡的寓所聚会，讨论由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已赞同军事拨款而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任务。会上有人提出以退党来抗议国会党团的背叛行为。这项建议

未获通过。与会者决定同国内其它地区的左派党员取得联系并邀请他们一起举行会议。罗莎·卢森堡在会上愤怒地斥责了国会党团的叛卖行径，认为要最激烈地反对他们，放手大胆地“向工人呼吁”。她探索了发动群众的方法，提出一方面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有组织地进行发动；另一方面以个人名义通过报刊、杂志和小册子等手段进行发动。她认为，既要通过报刊的宣传鼓动以发动群众反对战争，又要利用一切机会揭露那些“保卫祖国”的鼓吹者。会议决定开展地下工作，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反工人政策的斗争。第二天，卢森堡向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活动家们分别拍发了近三百份电报，号召他们参加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代表会议。<sup>①</sup>

革命左派妇女运动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坚决响应发动群众的要求。她于8月5日在她主编的妇女杂志《平等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妇女们，准备起来》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和危害，号召全世界妇女同世界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紧密团结在一起，“在战争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来反对战争”，呼吁妇女们和工人群众，“让我们从工厂和作坊中走出来，从草棚和阁楼中走出来，参加群众性的抗议运动！我们要让统治者和财主们毫不含糊地看到我们的坚定的决心，为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以至战斗到呼吸停止。”<sup>②</sup>她在《平等报》上还发表了其它许多文章，宣传德国左派的反战立场。

为了广泛地进行反战的宣传鼓动，1914年9月，卢森堡和李

---

<sup>①</sup>参看《威·匹克言论和论文集》第1卷，第475页，1951年柏林版。

<sup>②</sup>转引自库钦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1957年柏林版，第205页。

卜克内西到德国西部和南部旅行，在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纽伦堡、哥达和其它城市的反兼并保和平的抗议大会上作了演讲，揭露了右派首脑所谓党内意见一致的谎言，谴责了右派首脑的错误政策，要求党实行改组。9月10日，他们同蔡特金、梅林一起署名向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社会民主党右派议员阿·休特古姆和理·费舍在瑞典、瑞士及意大利等国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舆论支持和赞助德国的活动，并表示不能赞同他们关于战争的原因、性质和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说明。声明再次断然驳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把党说成在争取“国内和平”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论调，揭露了所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战争的政策“符合于全党的思想和愿望”的骗人的鬼话。

9月下旬，因为李卜克内西揭露了右派首脑们的欺骗行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竟然召开会议，追究李卜克内西“破坏党的统一”的责任。会后，李卜克内西针锋相对地给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并要求执行委员会把此信作为李卜克内西的声明载入会议记录。他在信中强调指出，必须按照革命的原则重建国际，并重申德国党必须实行彻底改组。他说，这场斗争将会相当艰巨，因为它不仅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而且要反对党的某些官僚机构，反对今天使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半官方政府工具的种种思潮（沙文主义、吞并问题、掩盖阶级斗争等等）。①

1914年11月，李卜克内西为了给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少数派在12月2日召开的帝国议会上第二次讨论军事拨款问题时发表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打下基础，起草了关于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的提纲。提纲分析了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指出战争的

---

① 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

帝国主义性质和德国帝国主义应负的特殊战争罪责；揭露了统治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发动战争时对群众进行的蛊惑宣传，控诉了在德意志帝国仅有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遭到了践踏；并且抗议兼并外国领土和压迫外国人民。提纲最后强调：“我们号召德国人民和其它交战国的人民起来反对那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也就是反对为了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而洒尽自己的无比宝贵的鲜血。我们以被剥削者和丧失权利者的名义要求停止进行民族之间的屠杀。我们希望，无产者在战场上宣布停火的这个日子，会很快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将在血流成渠的战场上握手言欢，并举起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盘石，把杀人不见血的军国主义势力压得粉碎。”<sup>①</sup>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竭尽全力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来联合那些准备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人，以防止12月2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重演8月4日事件。李卜克内西在德国许多城市首先同那些曾在8月3日表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路线的议员进行了磋商。他和卢森堡试图在蔡特金的协助下说服那些动摇的人。1914年11月末，卢森堡特地发表文章，强调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能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然而当时还未能能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内组成反对派。

12月2日，国会第二次讨论增加军事拨款法案时，哈阿兹再次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声明赞成军事拨款法案。700多名议员中唯有李卜克内西一人投票反对。他在投反对票时庄严声明：“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贩子和战争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兼并计划，反对战争中的不人道的行为、反对军

---

<sup>①</sup>转引自库钦斯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1957年德文版，第221—222页。

事独裁、反对统治阶级的象目前所表现的那种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反对所提出的军事拨款”。<sup>①</sup>他的反对票，“像闪电一样打破了建立在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统一的幻景”，<sup>②</sup>也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机会主义决裂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sup>③</sup>他的英勇行动，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前进道路。也正因为这样，它使得军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十分惊恐。他们千方百计阻止李卜克内西关于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的传播。帝国议会议长，下令禁止将他的发言载入官方的速记记录中。然而，李卜克内西的声明作为非法小册子却在工人群众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并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短短几天内，李卜克内西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封书信和电报，对他的正义的勇敢的行动表示支持。许多工人、士兵纷纷邀请他到集会上演讲。柏林警察总监的报告也承认：“李卜克内西的行动给人以激进和鼓动的印象，在工人中得到了好评；这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得到了工人越来越多的赞成”。<sup>④</sup>德国以外的许多革命社会党人也都对李卜克内西的行动表示赞扬。法国安纳省社会主义同盟书记尼科表示，李卜克内西“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鲜明姿态将在德国以及全欧洲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所以李卜克内西公开举起反战旗帜，有力地促进了反战运动。

为了进一步阐发李卜克内西声明中的立场和态度，1914年12·

---

①参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8页。

②威廉·皮克：《卡尔·李卜克内西》，1958年三联书店版，第18页。

③《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9页。

④转引自海茵莎·沃尔格穆特：《德国共产党的诞生》，1978年柏林版，第78页。

月底，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给英国《工人领袖报》发了好几封信，再次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背叛行为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在此原则基础上重建被机会主义者破坏了的国际的必要性。李卜克内西写道：每一个社会党都有自己的敌人，国际无产阶级的敌人就在本国。卢森堡强调指出：必须把国际和它所属的德国支部业已破产的可悲真象告诉国际工人阶级。<sup>①</sup>虽然他们只是提出了重建国际的问题，但他们认为，重建后的国际应当具有与旧的国际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

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带动下，从1914年秋季起，德国各城市先后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左派小组。这些小组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竭力把工人运动拉回到革命的立场上来。

1914年底至1915年初，左派加强了宣传工作，开始发行第一批秘密的反战传单和小册子，举行辩论会，在辩论过程中痛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战争政策，同时也讨论了各反对派之间进一步的团结和有计划地出版定期刊物的问题。左派的力量不断地得到了发展。慑于左派力量的发展，德国执政者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加紧了对左派的迫害，力图把左派领导人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把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1915年2月初，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讨论所谓“李卜克内西事件”，攻击李卜克内西“破坏党纪”，会上社会沙文主义者卡·列金竟然要求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但未获通过。德国政府则于2月7日把李卜克内西征召入伍，企图用严格的军营约束来限制他的革命反战活动，禁止他参加议会以外的政治活动，只有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众议院

---

<sup>①</sup>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和资料》第1卷，德文版，第77—84页。

开会期间才允许他休假，但仍不准离开柏林。卢森堡也于2月18日被捕，以执行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尽管左派领导人不断遭到迫害，但仍顽强地坚持斗争。

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创刊号出版，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撰写的文章。卢森堡写的《国际的重建》一文，深刻揭露了右派领袖拥护帝国主义的背叛立场，谴责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无原则的政策。她强调指出，正是战争期间才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并呼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为结束战争和争取和平而行动起来。梅林在《我们已故的大师和党领导机关的政策》中强调指出：“国内和平政策”意味着同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他要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工人阶级在任何战争中必须提出自己的阶级政策。《国际》杂志的出版，引起了党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恐慌和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向全党发出通告，说这是破坏“党内统一”的行为。德国反动当局则说它破坏了“国内和平”，下令查禁，因此《国际》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扼杀。但它对于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左派会议决定出版《国际》杂志，之后，左派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潮开始发展成为有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 第二节 斯巴达克派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 一 斯巴达克派的形成及其反战斗争

1914—1915年的冬天，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德国速胜的幻想已被打破，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困难日益增大，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渐趋高涨。德帝国主义为了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一方面利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进一步煽起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另一方面加强对革命左派的迫害。社会民主党右派首脑们与德国政府相配合，加紧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并在议会中第三次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同时，竭力排挤打击左派，阻止左派反战斗争的发展。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革命左派坚定不移地继续开展反战斗争，并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反战斗争的一部分。左派认为，最要紧的是唤醒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对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有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把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争取到反战的旗帜下来，“首先是澄清，然后是多数”，再“通过有组织的群众起来造反自下而上地把党夺回来”。<sup>①</sup>

为了唤起民众，反对反动当局的战争政策，左派以多种形式进行斗争。首先利用议会讲坛，或提出质询，或力陈己见，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实质，提出左派反战的立场观点，教育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例如，李卜克内西充分利用国会

---

<sup>①</sup>转引自《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议员的身份，在帝国议会上多次提出质询，揭露了德国政府反对和平的本质，谴责了帝国主义秘密外交的反人民性；号召“不论在战壕里还是在国内，工人们应掉转枪口，对准夺走他们光明和空气的共同敌人”。正如卢森堡所说的那样，这些质询和陈述“可以变成一条真正的牛皮鞭子，用它来不停地挥打在帝国主义狗党们的脊背上”。<sup>①</sup>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是左派进行斗争的另一主要方式。“国际派”自大战爆发以来，共散发大约一百万份反对战争和反对党的社会沙文主义领导政策的秘密传单和小册子。<sup>②</sup>1915年5月27日，“国际派”散发的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主要敌人是在国内！》更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召唤作用。传单鲜明地提出：“任何一国人民的主要敌人都是在自己国内！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德国、德国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派、德国的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打倒的是在国内的敌人！”<sup>③</sup>它指出了工人阶级进行反战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维护了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利益。这一传单和“国际派”的斗争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在欧洲的许多大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一贯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散发秘密革命传单，譬如《主要敌人是在本国》的传单。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sup>④</sup>

---

①转引自瓦尔特·巴特尔：《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58年柏林版，第299页。

②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③同上，第1卷，第338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693页。

反战斗争的发展促使德国左派进一步团结起来。1916年1月1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内形势尤其是关于“国际派”同中派的关系的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提纲谴责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执行的叛卖性政策，强调了开展反帝和平斗争的必要性。提纲指出，由于第二国际已经因其机会主义领袖的背叛而破产，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国际来领导各国的革命斗争，新的国际必须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在各国国内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持反帝和反战，实行民主集中制，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sup>①</sup>会议还讨论了宣传鼓动、罢工和游行示威等问题，决定出版定期刊物《政治书信》，这个刊物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书信》。从此，便产生了“斯巴达克派”的名称。它是“国际派”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左派的联合和推动了反战斗争。“斯巴达克派”成为全国性的左派派别，客观上向建立独立革命政党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为了进一步讨论唤醒群众和组织群众行动的策略和措施，斯巴达克派于1916年3月19日在柏林再次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们根据卢森堡关于对国际的态度和对即将举行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态度报告通过两项相应决议；根据李卜克内西关于德国反对派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工人、妇女和青年中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以便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战运动，并使已出现的群众运动向自觉反对战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向发展，决议还要求同任何机会主义政策严格划清界限。三月会议为斯巴达克派组织和领导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

---

<sup>①</sup>参看《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德文版，第4卷，第45—46页。

在斯巴达克派的支持下，1916年4月，在耶拿召开了大战爆发后首次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的秘密代表会议，李卜克内西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国内和平政策”和反对中派分子动摇立场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并成立了青年工人反对派的临时中央。会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青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利用战争环境，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同时要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无情地和完全地在组织上摆脱依附于党和工会当局的青年组织，保持独立性，对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sup>①</sup> 这次会议为反战斗争动员了有生力量。

斯巴达克派在妇女中的工作也是积极而有成效的，1916年3月、5月和11月，蔡特金、敦克尔等多次发动妇女参加示威游行。

斯巴达克派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国内各地区组织了五百人秘密地散发《斯巴达克通信》等材料，挑选出了斯巴达克派与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之间建立秘密联系的负责人，逐渐地在斯巴达克派周围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拥护者的组织。

1916年春，斯巴达克派组织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运动。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就是1916年的“五一”游行。斯巴达克派在德累斯顿、耶拿、汉诺威和柏林等城市组织了一系列的“五一”反战示威游行。事先，李卜克内西起草了号召群众参加“五一”游行的传单《起来庆祝五一》。传单中写道：“清除谋杀人民的万恶罪行！打倒包藏祸心、蛊惑人民、乘机发财的人！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德国资本家和经管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sup>②</sup> 卢森堡二月中旬刑满释放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的“五一”柏林示威游行是当时规

<sup>①</sup>《卡·李卜克内西演讲论文集》1966年柏林版，第8卷，第610页。

<sup>②</sup>《卡·李卜克内西演讲论文集》1966年柏林版，第8卷，第618页。

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尽管当局加强了步兵警察和骑兵警察的警戒，还是有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李卜克内西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打倒战争！”“打倒政府！”顿即遭到警察的袭击和逮捕。卢森堡也险遭逮捕。游行者强烈抗议警察的这一暴行，示威行动在“打倒战争！”“和平万岁！”“国际万岁！”“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声中持续了几个小时。

李卜克内西被捕后遭到了审讯迫害，并被判处四年苦役徒刑。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作了义正词严的申辩并且驳斥了法庭指责他叛国的说法：“叛国从来就是统治阶级、诸侯和贵族阶级的一种特权，叛国是他们的最高贵的历史传统。真正的叛国贼今天还没有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坐在重工业、军备企业和大银行的写字间里，坐在容克地主的骑士田庄里……真正的叛国贼是那些把人类推到野蛮暴力的混乱中的人们，是那些把欧洲变成瓦砾和废墟，把欧洲包藏在谎言和虚伪的气氛中，使真理失明窒息的人们，是那些愿意而且将继续这种凶残行径、直至流血的、受奴役的各国人民群众都向他们投降为止的人们。”<sup>①</sup>李卜克内西在申辩结尾时大声喊道：“苦役徒刑！荣誉的公民权的丧失！好吧！你们的荣誉不是我的荣誉！但是我对你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将军穿着制服会象我将要穿着苦役牢的短衫时有那么多的荣誉。我在这里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辩护自己！我的口号不是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打倒战争！打倒政府！”<sup>②</sup>李卜克内西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立即被印成斯巴达克派的传单秘密地广为散发。

李卜克内西的革命行动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为抗议逮捕和迫害李卜克内西，6月27日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了有两万五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次日，柏林最重要的军备工厂五万五千多工

---

①②《卡·李卜克内西演讲论文集》第8卷，第671—672页。

人参加罢工。接着在不伦瑞克、不来梅和其它城市也举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是大战以来德国发生的第一批政治性群众罢工。这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的反战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五一”示威游行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反战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前线的士兵、极度劳苦的工人、饥饿的妇女和战争的一切受害者认识到，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不调和的反战斗争。斯巴达克派用行动证明它是德国反战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卜克内西以自己的英勇行为促使反战斗争从议会里扩展到大街上，使少数左派的反战宣传发展为广大群众的革命反战行动。

面对高涨的群众性的反战运动，德国反动统治者加紧了对斯巴达克派的迫害，企图以监禁斯巴达克派领导成员的手段来扑灭反战运动。继李卜克内西被捕之后，卢森堡于1916年7月8日遭无理逮捕，开始了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的“预防性监禁”。斯巴达克派的其他领导成员梅林、蔡特金、迈耶尔、皮克等也相继遭到逮捕、关押或被送往前线，敦克尔被禁止发表演说。但是，逮捕和监禁封不住革命者的声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虽然身陷囹圄，但仍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反战斗争。他们利用一切机会，通过秘密途径与斯巴达克派战友保持着密切联系，向同志们表明对重要问题的看法，提出反战行动的建议和起草反战传单。《斯巴达克书信》刊登了卢森堡在狱中写的传单。她在传单中满腔热情地号召群众起来斗争：“不应当在国会，而应当在工厂、车间，在街头，解决战争与和平、‘国际’的命运和群众饥饿的问题”，只有开展积极的群众运动，才能把党从艾伯特——谢德曼之流的手中拯救出来，才能保障和平和自由。<sup>①</sup>她还向群众揭穿了对李卜克内西卑鄙地起诉的目的：“这是对

---

①《斯巴达克书信》德文版，第216页。

他在国会和地方自治代表会上的整个行为的报复，因为他是唯一向全世界揭露那场国内和平的血腥把戏的真相的人；这是对他的报复，因为他身在牢房和法庭，戴着手铐和脚镣，却仍然蔑视刽子手，坚贞不屈地捍卫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sup>①</sup>李卜克内西在狱中不仅关心着德国的工人运动和反战斗争，而且关注着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许多传单向工人和士兵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号召他们全力支援俄国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他建议斯巴达克派加强在士兵中的工作。他在狱中还写下了《纵然把我粉碎，我也决不低头！》、《暴风雨，我的伙伴！》等壮丽诗篇，鲜明地表现出他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渴望搏击暴风雨的斗争精神。

斯巴达克派按照李卜克内西的建议，加强了在士兵中，尤其是水兵中的工作。1917年底，斯巴达克派在威廉港水兵成立的士兵管理委员会中的积极工作，对“路易波尔摄政王号”舰水兵起义产生了积极影响。1918年夏天，斯巴达克派在东方战线广泛地散发传单，号召士兵们不要充当“自由的刽子手”反对工农共和国，而要以俄国兄弟为榜样，以革命方式结束战争，为“自由平等的德意志社会共和国”而斗争。这些传单在士兵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斯巴达克派在极其恶劣的处境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的反战反军国主义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拯救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动员和教育了人民群众，也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列宁所说：“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一切忠实的真正革命的人，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人，一切义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决心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

---

<sup>①</sup>《斯巴达克书信》德文版，第217页。

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sup>①</sup>

## 二 斯巴达克派反战斗争的方针政策

斯巴达克派是一个旨在动员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中的一切反战力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斗争的宣传性组织，它没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还是其中的一派，它不是独立的政党组织，但它是德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反战斗争中有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 1. 反战斗争与革命的阶级斗争相结合

当着帝国主义大战的狂潮席卷欧洲、民族沙文主义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斯巴达克派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批判社会沙文主义，首先要阐明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明确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把反战斗争同革命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起来。

斯巴达克派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时一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一场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我们历来反对的政策所导致的，德国的统治阶级对它负有很大罪责。总的说来，这场战争是由我们与之坚决斗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sup>②</sup>并且揭示了引起战争的经济根源，这就是“在对于垄断利用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可靠的投资场所的追逐中，不同大国的资本家集团进入了逐鹿场”。<sup>③</sup>斯巴达克派还揭露和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妄图抹杀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用进攻和防御来区别战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0页。

<sup>②</sup>卡·李卜克内西：《1914年9月26日致一位外国同志的信》，转引自《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1963年柏林德文版，第211页。

<sup>③</sup>凯·敦克尔：《关于战争经济根源提纲》，转引自《19世纪末到1917年的德国工人运动》德文版，第283页。

争性质的谬论，强调说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所谓“进攻防御”观点，“决不能在战争中为工人群众确定方向，而只能在他们肩负长枪时，造成头脑中的混乱。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只能用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利益来确定。”<sup>①</sup>

针对反动统治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鼓吹“国内和平”、“民族一致共赴外敌”以抹杀和取消国内阶级斗争的企图，斯巴达克派严正指出：“人们所鼓吹的那种极端片面的国内和平，只不过是戒严状态和莫谈政治这些字眼在修辞上经过加工而已”。“所谓‘国内和平’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无产阶级设置的一种圈套，其目的在于把无产阶级变为推行其政策的积极的工具”。<sup>②</sup>所以谁接受了国内和平，“便在整个战争期间放弃了阶级斗争。然而它因此也放弃了本身存在和固有政策的基础”。<sup>③</sup>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内和平”的本质和机会主义者的叛卖实质。

斯巴达克派反复阐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任务不是实行阶级和谐与国内和平，而是要进行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德国，德国帝国主义，德国战争派，德国秘密外交。德国人民需要同国内敌人进行斗争，进行政治斗争，同其它国家的无产者联合斗争，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sup>④</sup>如果工人阶级不反对本国统治阶级，而去反对所谓国外敌人，那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成为本国政府的奴仆和工具。

机会主义者强烈反对“主要敌人是在国内”的观点，认为“想把世界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是发疯。”<sup>⑤</sup>斯巴达克派严

---

①梅林：《战争与政策》，转引自《19世纪末到1917年的德国工人运动》，第89页。

②③李卜克内西：《为制订一个左派纲领而草拟的提纲》，《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449页。

④李卜克内西：《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德文版，第264页。

⑤大卫：《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世界大战》1915年柏林版，第172页。



厉谴责这种为德国帝国主义效劳的看法，鲜明地提出“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的战斗口号，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摆脱战争恶魔，必须在国内发动革命，“大战不会结束，除非通过群众起义，除非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行动”。<sup>①</sup>

由于斯巴达克派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战争应使之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国内敌人的战争；无产阶级应该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发动国内战争，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确定了正确的反战斗争的方向。

## 2. 反战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相结合

斯巴达克派主张，德国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应与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战争或社会主义与和平”，二者必居其一，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摆脱战争威胁，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持久和平，即使在战场上一方打败另一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由于这种协定必然带有兼并性质，这种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所谓和平只不过是埋下新的掠夺战争的种子，要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精神的和平结束战争。为此，一方面，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相联系，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1916年3月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明确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既然未能阻止这场战争，那么，在战争期间利用战争及其造成的条件，唤醒民众，从而实现和平并加速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职责。”<sup>②</sup>

<sup>①</sup>《卡尔·李卜克内西演讲论文集》，1971年柏林版第9卷，第330页。

<sup>②</sup>《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453页。

斯巴达克派还认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为此，“国际无产阶级要把反对帝国主义提到首位，并把使用全部力量和最大的牺牲勇气为准则的‘用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实际政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sup>①</sup>国际无产阶级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进行反对假民族假爱国的阶级和谐的国际阶级斗争，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革命”。<sup>②</sup>所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斯巴达克派即号召各国工人全力支持苏维埃俄国，不要让帝国主义扼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失败。同时还号召德国工人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发动革命起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 3. 反战斗争与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

斯巴达克派在反战斗争中，不断地加深了对机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本质联系的认识，认为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都依存于垄断资本，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也证明，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为了共同目的而相互勾结。大战爆发后，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使党和工会丧失了革命战斗作用，成为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效劳的工具。德国反动统治者也认识到机会主义对于他们维护统治地位和推行战争政策的重要性，千方百计地收买拉拢机会主义者。德国首相巴登亲王曾坦率地对德皇说：“我们没有社会党人，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如果抹杀他们，我们将陷入一种军事专政之下，无论用何种手段，我们必须拿住他们”。<sup>③</sup>所以，斯巴达克派确定，反战斗争必须与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

①《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德文版第293页。

②《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卷，1958年柏林版，第233页。

③转引自《德意志革命史》1929年春潮书局出版第7—8页。

斯巴达克派在反战斗争过程中，同机会主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认为机会主义者已经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原则，背弃了第二国际反战决议，所以只有同机会主义者斗争才能真正捍卫党的纪律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批判了机会主义者的所谓“保卫祖国”的虚伪透顶的口号，阐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他们强调：“我们同那些站在保卫祖国立场上的人，是不可能合作的。”<sup>①</sup>他们还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借口“反对沙俄专制制度”而支持帝国主义大战的实质，指出在大战中不反对本国专制政府和本国军国主义，却去“反对沙俄专制制度”，实际上是为本国政府效劳，是支持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和兼并意图。

斯巴达克派还同支持德国进行“防御战争”并对右派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中派立场进行了斗争，指出中派无原则地强调统一，采取同右派联合的政策，实际上成为革命反战斗争的重大障碍。斯巴达克派强调说明，首先要澄清原则，然后才谈得上统一。

正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坚持了反战斗争同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军国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得斯巴达克派成为反战群众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同时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危机加深，发生了中派同右派的分裂，斯巴达克派本身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而日臻成熟，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直接的准备。

然而，斯巴达克派毕竟还是一个宣传性组织，还不是独立的政党组织，因之，它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没有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没有能完全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秘密

---

<sup>①</sup>《要国内战争，不要国内和平》，德文版第296页。

密组织来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sup>①</sup>

### 三 斯巴达克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斗争

在群众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1915年9月5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38名代表，斯巴达克派派遣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中大多是倾向中派方面摇摆的社会党人，但有八名包括列宁在内的左派代表在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了左派集团，其中有德国的左派代表。左派集团向大会提出了决议草案。决议草案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实质，进一步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的背叛行为，也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方针，号召群众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推翻资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虽然左派提出的决议草案未被通过，但左派在会上的发言和活动产生了影响。大会通过的宣言《致欧洲无产者》，包含了左派提出的若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宣言指明了当时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在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并且指出没有革命斗争的和平是一句虚伪的空话；避免战争惨剧的唯一道路，要到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去寻求。但宣言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诸如没有揭露第二国际领导人背叛的原因，没有提到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评价和同社会沙文主义斗争的方法，等等。尽管如此，列宁说：“这个宣言在同机会主义作实际的斗争中，在同机会主义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sup>②</sup>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同情战争的牺牲者和被压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48页。

②《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页。

迫者的决议”。决议赞扬了斯巴达克派的反战斗争精神，对斯巴达克派被迫害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决议写道：“对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军国主义逮捕入狱的李卜克内西、莫纳特、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同志，以及所有为反对战争而遭迫害和被逮捕的同志表示深切的兄弟般的同情”。<sup>①</sup>李卜克内西从前线特地给代表会议发去了贺词，贺词中强调了要坚持国内战争，反对国内和平，坚持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阶级斗争。

这次会议促进了各国左派间的团结，会上形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会后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并出版了机关刊物“先驱”杂志。这次会议所开始的活动，称为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斯巴达克派十分拥护齐美尔瓦尔得运动。1916年1月1日斯巴达克派在柏林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提出的提纲，提纲表示希望在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工人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新中心，因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及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的思想准备”是获得普遍和平的唯一手段。<sup>②</sup>同年3月，再次召开的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向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提出的决议。决议再次希望重建新的国际，认为“国际的存在和活动不是个组织问题，不是一小批人作为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达成协议的问题；它是各国正在恢复社会主义原则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问题”。而“新的国际为了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须扎根于无产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的士气、行动能

---

<sup>①</sup>《社会民主党人报》1915年10月11日，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75页。

<sup>②</sup>转引自上书第679页。

力和日常实践之中”。新国际“斗争的主要口号应当是为实现和平而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行动，只有从这种行动中才能产生新的、有活力的和积极主动的国际”。<sup>①</sup>

1916年4月，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共有43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派在内的左派代表12名，其余均为考茨基派。

昆塔尔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因为，在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年战争，使广大群众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面目日益原形毕露，左派的影响大为增长，考茨基派便大力鼓吹社会和平主义。所以，在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内部给社会和平主义以揭露批判，成为当务之急。

斯巴达克派为出席昆塔尔会议作了充分准备，拟定了向昆塔尔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派遣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在德国反对社会沙文主义领导的情况，说明了愈来愈多的德国工人摆脱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影响。

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列宁在会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会议期间，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斯巴达克派代表积极支持草案的立场。但是，由于考茨基派在会上占多数，左派的决议草案未被通过。但由于左派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决议，比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它申斥了社会和平主义，谴责了第二国际执行局的机会主义立场，提出了停止战争的要求，并且重申了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的观点。

---

<sup>①</sup>《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第450页。

两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都促进了左派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并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的派别。斯巴达克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斗争，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者左派的联系，而且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为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考茨基派日益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结成联盟，致使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不可能担当起建立新国际的使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于1918年1月召开了欧美各国社会党革命派代表会议，筹建第三国际。斯巴达克派积极地支持和参加了第三国际的筹建工作。第三国际成立时，在斯巴达克派基础上建立的德国共产党，成为第三国际的主要成员，为第三国际活动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第三节 党的分裂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 一 党内左中右三派的矛盾斗争

大战以来，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分为三派。以谢德曼、艾伯特<sup>①</sup>为代表的右派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主张“保卫祖国”；

---

<sup>①</sup>菲利浦·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一，曾当过印刷工人、记者、编辑。1903年后曾任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团委员、国会副议长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曾一度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后任卡容市市长，国会议员。1939年死于丹麦。

弗里得利希·艾伯特（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之一。190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1913年开始，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起，为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直至1925年去世。

以斯巴达克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反对“保卫祖国”，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国内”；以考茨基、哈阿兹为代表的中派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调和，主张二者实行统一，他们主要为右派的叛变进行辩护，但有时也向左派靠拢。中派在原则上同右派并无根本分歧，但在策略上则同右派存在着某些分歧，有时候甚至同右派发生激烈的冲突。

由于斯巴达克派有力地开展了同帝国政府、党的右派领导和议会党团多数派的斗争，在群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其它劳动人民深受战争灾难的痛苦而渴望和平，对党和工会领导人的幻想开始破灭，甚至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公开起来反对党执委会的政策。这时，中派领导人也积极地表示要争取和平，开始反对支持本国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1915年3月15日，中派首领哈阿兹写信给艾伯特，说明他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赞成军事拨款是违背党的决议的，也是同倍倍尔生前的观点和艾伯特本人战前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不一致的，表示将投票反对军事拨款。3月20日，帝国国会第三次表决军事拨款法案时，以哈阿兹为首的28名中派议员一致弃权而离开会议大厅。6月，哈阿兹发表了《论国会党团对战争的态度》一文，指出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就是“承认我们认为是危险的、导致毁灭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战争”。<sup>①</sup>他呼吁社会民主党人为结束战争作出努力。

哈阿兹·胡果（1863—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非常法”时期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97—1907年和1912—1918年，为国会议员。1911—1916年，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918年德

---

<sup>①</sup>参看《胡果·哈阿兹的生平事业》，柏林版第219—223页。



国十一月革命时期，他同艾伯特一起出任临时联合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主席。他作为德国中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大战进行将近一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对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长。为了维持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缓和群众同党的领袖之间的矛盾，中派领袖哈阿兹、伯恩施坦、考茨基三人于6月19日联名发表了呼吁书《当务之急》，指责兼并政策，要求“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呼吁党为此采取断然措施。<sup>①</sup>然而呼吁书并没有揭露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卖行为。

可是，中派这种态度竟为党的领导机关所不容，党的右翼领导对之甚为不满。他们谴责哈阿兹等的行为同他们的身份不相称，“危害了党的统一”。党的仲裁委员会对哈阿兹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然而哈阿兹等仍然表示他们是维护党的统一的，继续留在党内，等待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裁决。不过，他们继续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提出的公开的、进一步的兼并要求，称这种要求是“资产阶级的”，谴责用暴力侵犯民族自主和独立的政策，并提议国会党团发表一项反对任何兼并要求的声明。<sup>②</sup>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后，他们感到党团少数派在国会里已不能说话，必须在外寻找出路。

1915年底，当帝国政府再次提出军事拨款法案时，中派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再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将必然脱离工人群众并为广大党员所唾弃，于是决定采取新策略。哈阿兹、伯恩施

---

<sup>①</sup>《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第240页。

<sup>②</sup>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914至1918年）》，1966年德文版第59—69页。

坦、迪特曼、累德堡等18名中派议员于12月21日一起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并发表公开声明。同时哈阿兹辞去党团主席的职务。他们在《十八人声明》中论证反对拨款的理由时只是说，他们认为德国的边界是安全的，现在德国应当向和平迈出第一步，而没有批判他们的“护国主义”立场，更没有提出反战的革命行动。

1916年，德国各阶层人民由于饱受战争灾难的痛苦而掀起了更高的反战浪潮，甚至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由于反对政府的兼并政策也在组织上联合起来了。斯巴达克派同政府、同社会沙文主义展开了更英勇的斗争。人民群众的反战活动，各界人士的压力以及革命派的斗争促使中派对党的领导机关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策略。18名中派议员在3月24日坚决拒绝政府的紧急预算案并发表了公开声明。声明认为，战争的结局恐怕是“既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而只有被打败了的、从千百万个伤口中流着鲜血的各国人民”，<sup>①</sup>所以继续进行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但社会民主党右派议员海涅等则起来反对，并对哈阿兹等进行攻击。接着，社会民主党的党团执委会竟把这18名议员从党团中开除出去。哈阿兹被迫辞掉了党的主席的职务。被开除的这些中派议员以哈阿兹、迪特曼、累德堡为首组成了单独的党团，称为“社会民主劳动派”。他们在成立通告中声称，他们自1914年8月4日以来在军事拨款等重大问题上同多数派就有分歧，现在他们由于被取消党团成员资格而联合成立党团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劳动派”，以便完成选民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他们仍是党的组织部分。他们谴责党的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把广大无产阶级引入歧途，同时又表示希望全体社会民主党议员战后能够重新合作。”

“社会民主劳动派”成立后，哈阿兹作为它的代表多次在国

---

<sup>①</sup>转引自普拉格：《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1921年德文版第95页。

会中发表演说，一方面抨击帝国内政的弊端，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潜艇战，要求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进一步以“超帝国主义论”为根据希望国际资本家战后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相互和平共处，达成限制军备的协议，拒绝参加斯巴达克派为这一年5月1日举行反战活动的准备工作。

1916年9月21—23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右派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来批准他们的背弃政策。他们事先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玩弄花招，造成了有利于右派的多数。在会上中派和斯巴达克派同右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右派极力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战争政策辩护，警告工人不要罢工，不要采取其它反对战争的阶级斗争行动。中派首领累德堡受一百多名代表的委托宣告，这次会议没有权利作出任何决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斯巴达克派就认为，按照党章，这次代表会议根本就不能成立。在这次会议上，敦克尔代表斯巴达克派宣布，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已经向民族主义思想投降，她强调，没有原则的统一，也就没有党的统一，这种原则就是承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承认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她还向中派说明，虽不同意中派的政策，“但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打击共同的敌人，面前提条件自然在于劳动派要成为一个有行动力量的真正反对派，要实行有原则的政策，不仅是说，而且要做”。<sup>①</sup>为了对右派表示抗议，斯巴达克派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代表都拒绝参加表决右派提出的关于党的政策的决议。

1917年1月7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提议下，党内的反对派召开了一次联合代表会议。斯巴达克派对召开这次会议是赞成的。在会议的前一天，斯巴达克派曾举行一次准备会议，拟定了

---

<sup>①</sup>转引自巴特尔：《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1958年德文版第384页。

出席反对派代表会的方针。由斯巴达克派代表恩斯特·迈耶尔提交联合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说明了他们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草案中说：“只要反对派的独立的政治活动不受压制和阻碍，反对派即可保留它从属于目前的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反对派之所以留在党内，只是为了处处对多数派的政策进行讨伐和斗争，使群众不致为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欺骗，并且利用党作为无产阶级反帝阶级斗争的招兵站”。<sup>①</sup>这就说明，当时斯巴达克派还不主张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只是在党内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对派组织。

斯巴达克派参加这次联合代表会议的主要意图是想争取劳动派的工人群众。正如约吉希斯（斯巴达克派领导成员）所说的，“他们在思想上是属于我们的，而只是由于同我们很少接触，或者由于不了解反对派内部的实际关系和其它一些偶然性的原因，才跟随了劳动派。”<sup>②</sup>出席这次会议的有157名反对派代表，其中有斯巴达克派的代表34人。考茨基为会议草拟了一个宣言，要求实现“既无战胜者，也无战败者”的和平。但这个宣言由于斯巴达克派的反对未获一致通过。

反对派的这次会议引起了党的执委会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反对派的代表会议实际上已经建立一个单独的组织，因而便已自行脱党。1917年1月18日党的仲裁委员会竟然决定把“社会民主劳动派”和左派开除出党。1月20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又向全党发出号召书，以维护团结为名，责成一切党组织必须对反对派“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谁支持反对派，谁就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实际是号召把一切反对派开除出党。这样，被机会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1958年柏林德文版第2部第1卷，第528页。

②转引自《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第405页。

主义长期在思想上分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也公开分裂了。

## 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

事变的进程迫使中派同右派分裂并联合左派于1917年4月6—8日在哥达城召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

会前（即4月5日），斯巴达克派特地在哥达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卢森堡在狱中未能参加会议。会上经过讨论决定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在党内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保持斯巴达克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的议程是：党的状况、组织问题、我们的任务三项。出席大会的有143名代表，其中124人代表91个选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15人是帝国国会议员。哈阿兹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自称左派，激烈地谴责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工会，称他们为“政府社会党人”、“工会官僚”，谴责他们“追随政府”、“屈从帝国主义国家”、指出旧的党团支持政府延长战争，党执行委员会独断专行。为此，他再次呼吁全体反对派团结一致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他还在报告中对俄国的二月革命表示祝贺，称颂二月革命是“使俄国和世界走向自由之路的一个巨大进步”。

迪特曼就第二项议程作了报告。他主要阐述了新党的组织章程，强调说明了所有反对派应该联合起来。大会通过的章程基本上符合社会民主党的旧章程。大会讨论了组织问题委员会提出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组织原则”的提案。围绕组织名称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以下几种名称：德国国际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

最后以77票对42票通过了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作为党的名称。

累德堡就第三项议程即党的任务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的作用，把议会活动看作是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他从1900—1918年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1920—1924年又一直任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首脑。

斯巴达克派代表吕克和黑克尔特分别就前述议程作了补充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议会政治以及群众行动等问题阐述了与中派不同的立场。他们批评了中派的社会和平主义理论，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动员国内和国际的全体无产阶级举行群众罢工，用战争反对战争！同时表示斯巴达克派愿与中派合作，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自主地执行自己制定的政策。

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宣言。宣言认为，早在战前党内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努力捍卫党的国际主义传统，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则企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思想，用民族自由主义策略来反对毫不妥协的反对派策略。战争加深了这两部分人的矛盾，并使第二部分人掌握了党的领导机构。宣言表示，反对派联合起来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宣言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与政府合作并没有改变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没有缩短战争期限。宣言要求大赦政治犯，取消书报检查令，要求自由结社集会权，要求废除农业工人、国家工人和雇工的非常法，要求劳动保护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及普遍的、平等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但宣言没有号召工人采用群众性行动达到这些要求，只是要求在议会里提出。宣言还要求工人在战后作好进行反涨价和反失业斗争的准备，然而在战争期间不号召采取群众行动。在对外政策方面，宣言提出了要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恢复国际的活动，希望在一

致同意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但没有提出应向俄国革命学习并从中得到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的结论。

最后,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由迪特曼、哈阿兹、累德堡等七人组成。迪特曼和哈阿兹任党的主席。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赞成军事拨款的强烈不满的表示。它的成员较为复杂,政治态度各异,有社会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激进分子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决定政策的是中派首领哈阿兹、迪特曼、考茨基等人,他们是站在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战争,反战态度并不十分坚决,也不准备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来结束战争。所以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是以中派分子为主的工人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斯巴达克派为什么要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呢?对此,斯巴达克派领导人曾作了多次说明。长期以来,斯巴达克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对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但他们感到党内右派和中派的力量相当强大,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如果不在党内进行争取群众的斗争,斯巴达克派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在组织问题上一定要采取审慎态度,不能轻率地实行分裂。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卢森堡写了《哥达代表会议的回顾》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关于斯巴达克派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她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遭到了巨大的世界历史性危机。1914年8月4日事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偶然现象,而是来源于大战前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因此,只有同社会民主党的过去进行斗争,才能创立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卢森堡认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完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哈阿兹的报告丝毫没有对过去进行分析,累德堡和

迪特曼的报告丝毫没有阐明应当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章程指明方向的方针和路线”。<sup>①</sup>卢森堡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旧党的合法继承”。但是，尽管如此，卢森堡说明斯巴达克派应当参加这个党，她说：斯巴达克派的方针一如既往，“它参加这个新党不是出于某种机会主义的考虑，不是心安理得地同劳动派进行兄弟般的和解，同他们混成一锅粥，成为毫无骨气的‘反对派’。它参加这个新党是在深信普遍社会状况日益尖锐和有意识地对党进行工作的情况下来推动这个新党，唤醒它的良知，并且表达了处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冲突中的整个工人运动的进一步要求，以承担起党的真正领导。”<sup>②</sup>她在批评不来梅左派要求同中派在组织上彻底决裂的主张时说，不来梅左派忘记了重要的事情，即归根到底忘记了对群众的行动方式正在和将要起作用的客观历史状况。他们忘记了，同中派进行斗争每走一步同时也是同过去进行斗争，同工人运动中的错误进行斗争，而且这本身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果说，劳动派本来是属于导致8月4日破产的党的过去的活生生的一部分，那么，新的运动恰恰必须通过同他们进行经常不断的批判性斗争才能开辟道路。少数人口袋里装着现成的最好的药方并且早就知道人们应当如何引导群众，这是不够的。群众必须在精神上同过去五十年的传统决裂，从这种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这只能在对整个运动进行经常的、最尖锐的内部自我批评的伟大过程中才能实现。这正是斯巴达克派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所要担负的天职。<sup>③</sup>

---

①《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235—236页。

②《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273页。

③同上，第274页。



所以，斯巴达克派是为了争取教育群众并从党内来改变这个党的路线而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

### 三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年初，德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斯巴达克派坚决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却犹豫动摇，为此，斯巴达克派于1918年10月7日举行全国会议，确定了革命的战斗任务，指出了革命的明确目标，提出一系列革命要求，主要是：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取消戒严状态，立即取消后援法令；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和冶金工业；大大缩短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废除各邦以及各王朝。会议通过了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成立苏维埃和坚决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革命斗争纲领。这样，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划清了界线。

1918年11月11日，在柏林召开了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决定将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尽管斯巴达克同盟仍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内，然而它的成立客观上在创建德国革命政党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具有一个独立组织的某些新特点：设有中央局和各部门书记处，虽不交纳党费，但颁发党证。它把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的纲领性宣言《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规定为同盟的纲领。

作为斯巴达克同盟纲领的《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全面地阐明了同盟当前的任务和最终目标以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纲领的第一章分析了1918年11月9日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提条件。第二章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任务，指出这个任务要求在群众自身的斗争过程中彻底改造国家和彻底变革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反对资本的激烈斗争中，每个企业的工人都可以通

过建立常设的代表机构，负起监督生产的责任并最终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

纲领的第三章分析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纲领否定了与无产阶级革命目的和任务背道而驰的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杀；同时针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强调指出相信资本家会自愿服从国会的、国民大会的社会主义裁决，相信会心平气和地放弃财产、利润、剥削特权，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资本家宁可国家变成一片冒烟的废墟，也不会自动放弃雇佣奴隶制。纲领要求“用铁拳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去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强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用整个政权的力量把团结一致的劳动人民大众武装起来，解决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那时才有真正的民主，不欺骗人民的民主。

纲领就当时面临的任务，提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

纲领还有一章专门阐述国际主义的任务。纲领提出要立即和各国兄弟党建立联系，以保证在兄弟般的国际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革命。

纲领最后阐明，斯巴达克同盟只是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部分。它每前进一步都要向整个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指明他们的历史任务，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要捍卫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一切民族问题上都要捍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总之，斯巴达克同盟的胜利不是在革命的开端，而是在革命的终点，它的胜利就是千百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的胜利。<sup>①</sup>

这样，纲领全面地规定了斯巴达克同盟的行动指针。

---

<sup>①</sup>参看《1917—1919年德国历史文献集》1975年柏林版，第100—104页。

在十一月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艾伯特临时政府以“社会主义者”为名，猖狂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关键时刻，斯巴达克派日益认识到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召开全国会议，有来自46个地区的83名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并于30日至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建党代表大会。大会由威廉·皮克主持，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和建立德国共产党的必要性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斯巴达克同盟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组织关系，成立独立的政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卢森堡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的报告，肯定德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指出作为德国革命范例的俄国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大会还通过了《致反对被压迫各国的共同敌人的俄国战友》的贺电。大会对《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稍加修改后即以此作为党的纲领。大会规定，党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和其它旧政权机关，并将其职能转归工兵苏维埃，根据普选权在全国举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废除一切等级特权等。大会选举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皮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结果。从此，德国工人运动中有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使德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列宁说：“‘斯巴达克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sup>①</sup>

---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8页。

## 第二章

# 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

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德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这次革命推翻了半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热衷于合法斗争、改良渐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一月革命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使革命没能取得更大成果。

十一月革命失败后，社会民主党第一次成为执政的党，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制定了魏玛宪法。宪法规定废除君主政体，确定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改变社会民主党早已背弃的革命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同改良主义实践的脱节，1921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纲领，从而使改良主义在党内合法化。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工人政党。十一月革命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中派主义领导与社会民主党既有合作，又有分歧和斗争。1919年初至1920年夏，愈来愈多的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感到大失所望，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党内左派势力也有所增强。然而，由于在对待共产国际和其它内外政策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导致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分道扬镳。左派与共产党统一，右派则加入社会民主党。

## 第一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十一月革命

### 一 革命的爆发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策

1918年8月，持续四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终于决出分晓。同盟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开始崩溃。奥匈帝国在谋求谈判媾和，保加利亚军队已不堪一击。9月底，德军的顽抗已毫无意义，只得承认最后失败，向美国求和。而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军事投降，德军最高统帅部拒不接受这个条件，声称要战斗到底。但德军内部早已斗志涣散，四分五裂，广大士兵极为厌战。

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德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灾难，迫使他们不断反抗政府的内外政策。1918年夏开始，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浪潮席卷全国。上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煤矿的矿工、鲁尔区的五金工人、巴伐利亚的纺织工人和五金工人纷纷罢工，提出一系列经济和政治要求。8月，鲁尔区10万矿工举行罢工，要求和平、民主和改善生活条件。1918年罢工人数达到250万，同时，德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许多农民也参加了革命斗争。

军事失败、政治危机和群众运动使德国旧内阁已无法再支撑局面，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1918年10月4日，天主教的中央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国会制政府”。以“自由派”闻名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出任首相。社会民主党领袖谢德曼在内阁中任不管部长，鲍威尔任劳工部长。新内阁力图实行

一些改良措施，缓和政治危机，安抚群众，甚至幻想使气息奄奄的君主立宪制起死回生。对外，新政府表示愿意按照威尔逊的“14点”和平建议结束战争。对内，新政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实行内阁对国会负责制，限制皇帝特权，改革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等措施。但这种“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已经阻挡不住从下面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了。

10月下旬，德国已处于革命的边缘，一个撞击必定会引起剧烈的连锁反应。10月底，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海军指挥部仍顽固坚持战争政策，下令远洋舰队出征与英国海军决战，即所谓的“光荣的沉没”。广大水兵绝不愿作帝国主义战争的殉葬品，拒绝服从这一命令。他们熄灭锅炉，割断电线，拒不起锚。虽然海军指挥部逮捕了1000多名水兵，但始终没有一条军舰出海。11月1日和2日，水兵们在基尔连日集会，要求释放被捕水兵，并组成了士兵苏维埃。3日，基尔水兵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打倒皇帝”等口号。4日，基尔水兵武装起义成功。次日，基尔的工人群众举行起义支持水兵。起义者们成立了士兵苏维埃和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宣布：“政权第一次掌握在士兵手中了。”<sup>①</sup>之后，革命浪潮迅速遍及全国。到11月6日北德各主要城市都爆发了革命。11月7日，慕尼黑工人宣告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1月8日，普鲁士战争部向马克斯亲王报告说：上午9时：马格德堡严重骚乱。中午1时：第七军所辖地区的骚乱一触即发。下午5时：哈勒和莱比锡已经赤化。晚上：杜塞尔多夫、奥斯纳布吕克、吕内堡已经赤化；马格德堡、斯图加特、~~多~~奥尔登堡、不伦瑞克及科隆也赤化了。7时10分：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东柏林1957年德文版第281页。

第18军司令部被推翻。①革命的迅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1月9日，革命冲击到德国反动统治的中心柏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的组织和号召下，几十万工人和其他群众发动起义，社会民主党迫于形势也参加了这次行动。顷刻之间旧政府土崩瓦解，起义者控制了整个柏林。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阳台上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②

社会民主党领导从没打算发动革命，他们一直千方百计阻止革命，企图通过改良压制革命。早在10月17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就号召“通过和平变革的方式把国家体制引向民主化，把经济生活引向社会主义”，这样就不会造成“布尔什维克式的混乱”，就不会“爆发内战”。而一切盲动主义的方式都只能“为反革命服务”。③从革命一开始，社会民主党领导就视革命为洪水猛兽，唯恐自己驾驭不住形势。柏林11月9日起义前，社会民主党对革命的政策是：窒息革命，严防其蔓延。基尔水兵刚一发难，政府立即派社会民主党的“铁血人物”诺斯克到那里去平息起义。诺斯克深知自己的任务就是“压倒革命红旗”。④他到基尔后答应了水兵提出的部分要求，许诺对参加起义者实行大赦，从而得到了水兵们的信赖，被选为水兵苏维埃主席。这样，诺斯克就控制了基尔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发出呼吁书《切勿急躁》，其中许诺，社会民主党正要实行一系列改变，并强调现在不是全体工人行动的时刻。呼吁书要求工人们不要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少数人的号召。⑤在革命的狂澜就要掀翻

---

① 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西柏林1984年德文版，第36页。

② 《插图德国11月革命史》，东柏林1978年德文版，第146页。

③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253页。

④ 鲁格：《11月革命》，东柏林1983年德文版，第37页。

⑤ 耶尔格·贝尔格编：《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科隆1979年德文版，第161页。

君主王位之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却仍在维护君主制。11月6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大卫和休特古姆向总参谋长格勒纳保证，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接受君主立宪制。艾伯特也说，他和谢德曼虽然都是共和派，但问题在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问题暂时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们在实践中完全愿意接受君主立宪制。艾伯特请格勒纳抓住最后时机拯救君主制。<sup>①</sup>但革命潮流犹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柏林工人正在酝酿起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只靠空口许诺已不能平息革命了。因此，他们企图劝服威廉二世退位来缓解革命危机，并以此来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争夺工人群众。11月7日，艾伯特对马克斯亲王说：“如果皇帝不退位，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但我决不想要革命，我对它深恶痛绝。”<sup>②</sup>谢德曼强调，艾伯特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俄国和亚细亚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主义不过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野蛮的亚细亚式的歪曲”。<sup>③</sup>谢德曼在内阁保证：“如果皇帝退位，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保证事情向有利方向发展。”<sup>④</sup>7日晚，谢德曼在内阁提出最后通牒：如果皇帝在次日中午前不退位，社会民主党将退出政府。<sup>⑤</sup>但威廉二世仍拒不退位。11月8日晚，社会民主党领导得知柏林工人不准备再拖延起义日期，他们感到再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只能导致众叛亲离。因此，党的执委会成员威尔斯宣布于次日上午8时举行总罢工，号召工人们进行决战。同时，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决定与工兵苏维埃合作，夺取政权。11月9日

<sup>①</sup>转引自《从革命到稳定》，第38页。

<sup>②</sup>哈夫纳：《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慕尼黑1979年德文版，第70—71页。

<sup>③</sup>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至1921年)》，纽约1970年英文版，第201页。

<sup>④</sup>伯迪克和卢茨编：《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机构》，斯坦福大学1966年英文版，第37页。

<sup>⑤</sup>《从革命到稳定》，第41页。



上午，皇帝被迫退位，马克斯亲王把首相职务移交给了艾伯特。在社会民主党看来，革命到此已经结束。

## 二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和苏维埃运动的挫折

11月9日下午，社会民主党领导开始筹备组阁。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党邀请它的领导人共同组成新政府。艾伯特甚至说：我们欢迎李卜克内西参加新政府。<sup>①</sup>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开会围绕是否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组阁，展开了激烈争论。累德堡、道伊米希和理·米勒不同意参加政府。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毫无信用，软弱妥协，不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感到，社会民主党是想借通过联合的方式把革命窒息在方兴未艾之时。<sup>②</sup>但党内温和派的观点占上风。大多数党的领导认为，工人苏维埃不是永久性机构。他们赞成组织革命内阁来改造旧国家机器。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力量较弱，不能单独组阁。<sup>③</sup>最后，会议以21对19票决定参加政府。李卜克内西拟定了几项要求，作为合作条件交给社会民主党。其主要内容是：1. 德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2. 一切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交给全体工人和士兵选出的人民代表；3. 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从内阁中开除出去；4. 独立社会民主党临时进行3天合作，以便组成一个能够实现停战的政府；5. 各部部长仅作为内阁的技术助手，内阁掌握决定权；6. 内阁两名首脑权力平等。<sup>④</sup>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坚决拒绝第2条和第3条要求，对第

---

①《从革命到稳定》，第51页。

②摩根：《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康耐尔大学1975年英文版，第124页。

③同上，第124—125页。

④《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31—332页。

1、4、两条也作了重要保留。他们声称反对“一个阶级的一部分人的专政”，坚持所谓“民主原则”，拒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拒绝开除内阁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主张，是否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由人民通过国民议会来决定。<sup>①</sup>翌日，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的入阁条件，对社会民主党作了重大让步。该条件放弃了清除资产阶级分子出阁的要求，对苏维埃的权限规定得模糊不清，并且同意把国民议会问题留待革命成果巩固后再去商讨。<sup>②</sup>这样，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达成了组成临时联合政府的协议，这个政府称之为“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由6人组成，其中3名社会民主党人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兰兹堡，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是哈阿兹、迪特曼及巴尔特。艾伯特和哈阿兹并列为主席。

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在其中有较大影响。1918年11月9日晚，各工兵苏维埃在国会大厅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布什马戏场召开代表会议，以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计划利用该执委会对政府实行监督，因此要求执委会只由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派代表组成。斯巴达克派在一份传单中呼吁“一票也不应投给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已经背叛了革命4年之久，而且今后还将如此。”<sup>③</sup>

11月10日，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与会代表3,000人，其中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士兵占大多数。艾伯特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其中心思想是所谓“全体社会主义者的统一”。他的发言得到众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31—332页。

②《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208页。

③《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47页。

多士兵代表的支持。李卜克内西在会上指出：“在艾伯特和谢德曼纲领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就是对革命的背叛。”他警告说：“反革命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就在这里，在我们当中。”<sup>①</sup>但许多士兵代表常常打断他的发言，高喊“统一”、“均等”，甚至冲上讲坛阻止他发言。大会主席巴尔特虽然也希望选举一个不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执委会，但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士兵势力强大，大会最后选出了由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14名士兵代表组成的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大会承认人民代表委员会为临时政府。

至此，社会民主党控制住了两个权力机构，这为它推行镇压革命的路线提供了决定性条件。11月10日，威尔斯被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从而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对革命中心柏林的控制。

11月9日柏林起义后，国内各种矛盾剧烈激化，各地形势动荡不已，群众起义方兴未艾，许多革命工人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斯巴达克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坚信革命刚刚开始，革命任务远未完成，因而继续积极宣传和鼓动革命。斯巴达克派报纸《红旗报》11月10日写道：“这次革命不仅必须扫清封建主义的一切渣滓和废墟，不仅必须击破容克阶级的一切城堡，口号不仅是要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至今还是处在艰难道路的开端。现在还不是急于为获得的胜利而欢乐的时候。”<sup>②</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于11月13日以“世界革命”为题发表社论，要求德国工人阶级把革命的烈火引向法国和英国。<sup>③</sup>而社会民主党则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以后

<sup>①</sup>《插图卷四11月革命史》第151页。

<sup>②</sup>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78页。

<sup>③</sup>参见惠勒：《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法兰克福（美茵河畔）1975年德文版，第51页。

的任务就是保持安定秩序，巩固民主共和国。艾伯特上台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群众，中止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行动。他宣布：“新政府将是人民政府”。它将努力使德国人民尽快得到和平与自由。他强调：“政治变革决不应该干扰居民供给”。他要求人们“离开大街”，“保持安定和秩序”。<sup>①</sup>此后，“安定和秩序”成为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欺骗群众的口头禅和扼杀革命的借口。基于上述情况，社会民主党领导感到危险来自左边。党的执委会成员海·米勒曾说，11月9日后，我再也不怕反革命了。<sup>②</sup>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两手方式来达到压制革命的目的。一方面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另一方面与反动军事势力勾结，准备依靠暴力镇压革命。

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的《告德国人民书》宣布了施政纲领。其中说：“由革命产生的政府的政治领导人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以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己任。”纲领宣布：解除戒严状态；取消对集会、结社的限制；废除检查制度；人民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大赦政治犯；恢复劳动保护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所有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参加的平等、秘密、普遍和直接的选举制度和比例代表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准备召开国民议会。<sup>③</sup>

社会民主党把“安定和秩序”视为万事之首，而自己又难以对付“极左派的威胁”，只得求助于反动的旧军队势力。军国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并不完全志同道合。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曾说，即使看到绞死谢德曼和艾伯特，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sup>④</sup>尽管如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33页。

②《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第113页。

③《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65—366页。

④《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第112页。

此，由于军国主义者声名狼藉，不可能稳定局势，因而两支反对革命的力量勾结了起来。11月10日，陆军司令兴登堡在给各集团军的命令中说，最高统帅部将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阻止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在德国蔓延。<sup>①</sup>11月10日晚，艾伯特与总参谋长格勒纳达成协议，调集10个师开进柏林，以便清除工人士兵苏维埃。格勒纳后来证实：“11月10日晚我们结成联盟的目的是，全力以赴地与革命进行斗争，恢复有秩序的政府权力，利用军队力量支持这种政府权力，并尽快召开国民议会。”<sup>②</sup>为了凑集更多的军队反对革命，人民委员会于11月12日电告最高统帅部，确认了旧军官在军队的指挥权，规定士兵苏维埃只在给养和休假问题上有咨询权。随后，政府下令所有工人必须交出武器，违者处以监禁。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纵容和支持下，反动军队几次企图把革命置于血泊之中。12月初，反动军队阴谋在柏林挑起武装冲突，然后借机镇压革命的工人、士兵，逮捕柏林苏维埃执委会成员。12月6日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了普鲁士议会厅，以政府名义宣布逮捕了正在此开会的苏维埃执委会成员。直到哈阿兹和巴尔特证明说，政府并没有颁布这种命令时，士兵们才开始散去。12月20日，格勒纳气势汹汹地前往政府，要求艾伯特对旨在剥夺军队权力的“汉堡七条”表态，否则军队将不支持政府。艾伯特不得不表示，“汉堡七条”不适用于尚未复员的军队。<sup>③</sup>与此同时，艾伯特政府把矛头指向支持革命的人民海军师。这支部队由基尔水兵组成，政府原希望他们站在自己一边，但他们却深受革命影响，因此政府扣发了他们的军饷。12月23日，人民海军师与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二部第二册，第358页。

②《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274页。

③《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232页。

政府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水兵们冲进卫戍司令部，扣押了卫戍司令威尔斯。艾伯特要求军队前来解救威尔斯，并把人民海军师赶走。24日，政府军赶到，向海军师炮击。然而，在柏林广大工人的支持下，政府军被迫停战，与海军师举行谈判。旧军队企图一举镇压革命的打算没有得逞。

“苏维埃还是国民议会”这个问题一直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焦点。列宁论述11月革命时写道：“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打着各种招牌（象“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之类）的资产阶级议会。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sup>①</sup>在革命初期，许多地方的苏维埃已经掌握了实权，取缔了反动官僚和旧国家机关，解除了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占领了企业，有的苏维埃还开始指挥、组织生产。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这种苏维埃组织形式可逐渐发展为政权形式。而不顾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强调尽早召开国民议会，只能使刚刚垮台的旧势力得以喘息，从而重新聚集力量向革命反扑。因此，苏维埃还是国民议会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合法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苏维埃制度不合法，只有通过全体公民选举的国民议会的授权，政府机构才名正言顺。在谢德曼、艾伯特和诺斯克看来，苏维埃是他们并不情愿发生的革命的产物。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反对苏维埃，无论它是执行革命政策的还是执行保守政策的，是属于左翼力量的还是社会民主党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刚一成立，施政纲领就强调要召开国民议会。11月14日，艾伯特向资产阶级报刊保证尽快召开国民议会。25日，各邦政府代表会议作出了尽快召开国民议会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的海·米勒、莫尔肯布尔和科恩及许多中下层干

---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页。

部并不反对在国民议会召开前实行苏维埃制度，而且赞成在国民议会后，苏维埃仍作为实行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工具。他们反对提前取缔苏维埃或严格限制它们的活动。<sup>①</sup>

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在苏维埃问题上与社会民主党后一派的观点相差无几。他们也赞成尽快召开国民议会，而不同意苏维埃掌握权力。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斯巴达克派则坚决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他们始终是少数派。

11月29日，在临时内阁会议上，6名成员就国民议会问题展开争论。兰兹堡警告独立社会民主党阁员：如果明天以前不确定国民议会选举日期，社会民主党将退出政府。<sup>②</sup>最后临时政府以5票同意，1票弃权决定于次年2月16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并拟将此决定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11月30日，政府颁布了关于选举国民议会的决定，即帝国选举法。由于选举国民议会的决定要经过工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批准方具备法律效力，因此社会民主党从两方面加紧准备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动用军队强制取缔许多地方的工兵苏维埃，鼓动军队要求尽快举行国民议会。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积极活动，在选举大会代表的过程占据了优势。在出席全德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489名代表中，有290名社会民主党党员，90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样，会议尚未开始，结果就可以预料到。《前进报》确信，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肯定要在大会占上风。<sup>③</sup>

大会于12月16日至20日在柏林召开。艾伯特在大会上说：

---

<sup>①</sup>参见尼曼：《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东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44页。

<sup>②</sup>《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机构》，第76页。

<sup>③</sup>转引自《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7页。

“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建立任何阶级统治。它战胜了旧的阶级统治，将建立全民的平等。……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民主和国民议会，最后消灭专制统治，永远保证政府属于人民。”<sup>①</sup>另一位社会民主党代表科恩说，德国必须尽快结束无政府状态，恢复生产力，保证供给。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只能是全体德国人民选出的国民议会。他认为，如果德国实行苏维埃制度，协约国就要干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sup>②</sup>但科恩也认为，“不应该把工人苏维埃从公共生活中完全排除出去。”<sup>③</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理·米勒在发言中批驳了资产阶级报刊对苏维埃制度的攻击，他强调：“人们千万不能忘记，如果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倒台，革命将荡然无存。那些反对工兵苏维埃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希望恢复以前的状况。”<sup>④</sup>正当米勒发言之际，会场外25万示威群众选派的代表进入会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中包括：“全部权力归工兵苏维埃”，“废除艾伯特的人民委员会”。<sup>⑤</sup>但社会民主党代表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及少数左派代表的主张。大会以344票对98票否决了把苏维埃制度作为宪法基础的提案。大会通过的吕德曼等人的提案要求，在召开国民议会前，把立法和行政权都交给人民委员会，并决定于次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sup>⑥</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道伊米希对大会的决定深感气愤和忧虑。他警告说：“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必然感到，兴高彩烈地赞成国民议会无异于宣

---

①《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机构》，第214—215页。

②《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329、331页。

③德恩：《苏维埃民主模式》，迈森海姆1975年德文版，第243页。

④《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机构》，第216页。

⑤同上。

⑥同上，第221页。



判苏维埃制度的死刑。”<sup>①</sup>

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大会代表们要求解除兴登堡的职务，解散军官学校，并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七点要求（即汉堡七点要求），其中包括取消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由人民委员会统帅军队，取消军阶制，士兵选举长官，建立人民军以取代常备军等。<sup>②</sup>但由于大会已决定把行政权交给人民委员会，因而使艾伯特等人得以违背这个决议，与反动军队妥协。

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参加，因而社会民主党单独组成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是德国苏维埃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许多地方的苏维埃组织并不准备接受大会的决议，而且继续为苏维埃的权力而斗争。12月23日，莱比锡工兵苏维埃宣布，尽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吕德曼提案，但它仍将继续执掌政权。<sup>③</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许多报刊纷纷抗议召开国民议会，如科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基尔的《共和国》等报刊。

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在如何对待旧军队的问题上也有较大分歧。镇压人民海军师的事件激化了这一分歧。12月28日，临时政府就这一事件激烈争论。社会民主党坚持认为政府面临着左翼的暴力威胁。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坚决反对借助旧军队镇压斯巴达克派及其它左翼力量。哈阿兹说：“现存政府软弱无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屈服于兴登堡和格勒纳。”<sup>④</sup>迪特曼认为，对革命成果的最大威胁是军国主义势力。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派主义领袖并不赞成左派的革命主张，他们打算通过解决某些重

<sup>①</sup>《1918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331页。

<sup>②</sup>同上，第229页。

<sup>③</sup>转引自《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9页。

<sup>④</sup>《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机构》，第150页。

大问题，使斯巴达克派自己消失。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要求解散旧军队，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内阁争论一直持续到29日凌晨，由于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和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拒绝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哈阿兹、迪特曼、巴尔特宣布退出临时政府，结束了两党为时七个星期的合作。

### 三 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对革命派的镇压

德国共产党成立后，它进行的革命鼓动和提出的革命要求，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唯恐革命的工人群众大批转向共产党，因此企图把共产党扼杀于尚未成熟之际。特尔上校在1918年底时说：艾伯特和谢德曼现在甚至害怕得两腿发抖，怕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吃了他们，因此向格勒纳求救，要他镇压左派力量。<sup>①</sup>此外，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已退出临时政府，这使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可以更为随心所欲地推行镇压革命的路线。为了尽早清除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采取了进攻性行动。1919年1月4日，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长下令解除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的职务。这一挑衅行为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1月4日晚，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党组织的执委会和共产党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号召工人们于第二天举行抗议游行，并携带武器准备战斗。1月5日，大规模游行开始。1月6日，柏林50万工人继续游行，许多武装工人占领了火车站、《前进报》社大楼、警察局等地。但终因起义时机尚不成熟，领导不够坚决果断，加之反动势力强大，工人们的斗争被诺斯克指挥的反革命部队血腥镇压了下去。在这次事件中，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对革命和动乱的不满，恐惧及仇恨得到了充分发泄。示威刚

---

<sup>①</sup>《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286页。

一开始诺斯克就声称要充当“噬血狗”。他一直认为社会民主党其他领袖对左派优柔寡断、姑息迁就。1月8日，艾伯特等人宣布“总清算的时刻到来了”。接着，反革命大肆屠戮革命工人，一百多名起义者被杀害，许多群众受伤。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事件中达到了在国民议会选举前把革命工人镇压下去的目的。党的执委会成员恩斯特在1月16日对外国记者说：“斯巴达克派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作好充分准备，并迫使他们提前行动。”<sup>①</sup>1月15日，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反动军队残杀。《前进报》居心不良地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是他们自己呼唤出来的血腥残杀的牺牲品。<sup>②</sup>社会民主党政府把杀害这两名革命领袖的凶手交给了他们所在部队的军事法庭，结果凶手只是象征性地得到轻微处罚。列宁义愤填膺地写道：“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sup>③</sup>

1919年上半年，德国各地工人阶级为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不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与反动军队公开联盟，对革命运动发起反攻，野蛮镇压了各地的罢工和起义浪潮。

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社会化问题成为工人运动的注意中心。许多工人把社会化与社会主义视为同一问题，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必须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为前提。因此，斗争只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在社会化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一贯持

---

① 《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36页。

② 《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2页。

消极态度。早在1918年11月18日，临时政府就成立了“社会化委员会”。委员会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希法亭、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库诺和奥托·许等人组成。这个机构坚决反对立即实行社会化措施，而主张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实行社会化。12月5日，社会化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一天的《前进报》明确表示，该委员会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维持安定，避免不理智的情况出现，使任何人不致因此而受到损害。该报强调，社会化必须以立宪国家为前提，而现在并不具备这个条件。<sup>①</sup>12月11日，社会化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提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有组织的工作，其第一个前提就是恢复生产。为了恢复出口工业和对外贸易，现存的经济组织必须保留。<sup>②</sup>奥托·许说，马克思认为公有制只有在产品充分涌流时才能设想。现在全世界都未达到这一阶段。如果我们现在实现社会化，就会成为破产的管理者。<sup>③</sup>希法亭认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会失去其权利，债务不可能被社会化。他宣称，不能把社会化理解为工人直接接管企业。<sup>④</sup>总之，改良主义者拒绝立即剥夺剥夺者，其重要原因被工会领袖之一鲍威尔一语道破：“必须马上停止关于立即实行社会化的夸夸其谈，否则我们这里也会出现俄国的状况。”<sup>⑤</sup>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还把社会化作为平息革命的妥协手段。1918年12月，鲁尔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宣布实行社会化措施。于是，希法亭在社会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矿产收归国有。他强调，作这个声明对安抚现在要求

---

①参见《从革命到稳定》，第82页。

②《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资料集》，第255—256页。

③同上，第257页。

④参见《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59页。

⑤转引自《从革命到稳定》，第32页。

社会化的工人来说是必要的。考茨基对此深表赞赏，他说，委员会现在的任务就是“安抚希望不再作资本主义剥削对象的工人们”。<sup>①</sup>

1919年1月8日，鲁尔地区再次爆发罢工运动，要求立即实行社会化，反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埃森的工兵苏维埃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准备实行矿山社会化，该委员会由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出三名代表组成，故又称“九人委员会”。

鲁尔地区的罢工领导人宣布立即开始对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矿实行社会化。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并非情愿。社会民主党议员科尼希曾说：“只是为了不让斯巴达克派单独操纵运动，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才愿意参加委员会的。”<sup>②</sup>社会民主党领袖设法阻止罢工的广泛展开，他们利用该党严密的组织系统推行自己的政策。

1月13日至16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兵苏维埃在埃森召开会议，决定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建立工厂苏维埃制度。工厂苏维埃自视为社会化的机构，试图限制垄断资本的权力，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社会民主党政府坚决反对工人们的要求，因为它向来都把社会化措施当作迫不得已的手段。2月6日，在鲁尔地区第三次工兵苏维埃会议上，代表们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至迟在2月15日前承认9人委员会，否则将举行总罢工。政府谈判代表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而且宣称“不给任何一方以监督权，只有政府才能行使这一权力”。<sup>③</sup>在此期间，政府全力调集大批

---

①参见《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59页。

②转引自《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60页。

③同上，第61页。

军队以镇压鲁尔工人，另一方面，也对罢工工人作出了微小让步。2月15日，军队开进鲁尔地区，并枪杀了一些共产党人。这一事件激起广大工人的愤怒，2月16日，鲁尔罢工领导决定举行总罢工，但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2月18日，开始罢工，从19日至22日大约有8万矿工参加了总罢工。罢工工人与反动军队之间出现了武装冲突。最后，由于社会民主党人退出罢工领导机构，罢工队伍四分五裂，罢工只得于2月21日宣告结束。反动军队开进了鲁尔地区的许多城市。工人们1月13日提出的社会化和工厂苏维埃的设想再也无人理睬。

几天后，中德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要求承认工厂苏维埃和实行社会化。政府派军队野蛮地镇压了中德地区的群众罢工。3月1日梅克尔率领军队开进哈勒。第二天哈勒出现大量传单，其中说，“诺斯克军队正在哈勒实行独裁！”“鲜血正在流淌，哈勒居民已被枪杀”。“我们在全城抗议，要求撤出政府军”。传单要求工人们不要被军队挑衅行为激怒，而采取暴力措施。①反动军队的镇压没能阻止罢工的扩展，最后，于3月5日，罢工领导与政府代表谈判，政府被迫承认工厂苏维埃的合法地位，罢工宣告中止。实际上，工厂苏维埃的权利只限于同资本家一起调整工资和劳动条件，丝毫不触动垄断资本的根基。

1919年3月1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提交给国民议会的提案中要求：在矿山和能源生产部门尽快实行公共管理（社会化），同时工人和职员选派代表（工厂苏维埃）参加监督和管理。②在这次会上，政府提出了一个社会化草案，并在国民议会尚未通过该草案时，到处进行宣传。柏林许多地方张贴了巨幅标语：“社

---

①参见《插图德国11月革命史》，第352页。

②《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63页。

会化就在这里”，“社会化在前进”。有的宣传说，这个社会化法案将用公共经济代替以前无限制的私人经济。政府关于社会化和工厂苏维埃的承诺，使工人运动暂时有所缓和。3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了社会化法案。

鲁尔地区的9人委员会不准备接受这一法令。它准备3月30日在埃森召开代表会议，并为此发出呼吁，号召工人群众把社会化看作是剥夺资本，生产资料和矿山归公共所有及矿工管理矿山。3月30日的会议决定4月1日举行罢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实行6小时工作日；提高25%工资；承认苏维埃制度；实行汉堡7点要求；释放政治犯；解散志愿军等等。<sup>①</sup>会议还决定成立“矿工总工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导无法阻止罢工。罢工高潮时，达到33万人之多。政府几乎倾其全部军事力量镇压革命运动，宣布了紧急状态，逮捕了社会化委员会成员和罢工领导，并对他们处以重刑。另一方面，政府答应实行7小时工作制，增加粮食配给。在社会民主党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的进攻下，加之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破坏，罢工工人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罢工遂于4月下旬结束。

柏林工人阶级在三月初再次发起了英勇的斗争。3月3日柏林工兵苏维埃召开全体大会，大多数人同意举行总罢工，提出承认工兵苏维埃，解除反革命的武装等一系列要求。罢工于3月3日开始，使柏林的生产和交通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第一天，政府已调集军队开进柏林，准备镇压起义。柏林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号召党员尽力抵制工兵苏维埃的“恐怖主义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与反动军队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由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东柏林1966年德文版，第58页。

破坏及军队的镇压，总罢工于3月8日结束。但反动军队继续残杀工人群众。3月9日，诺斯克命令军队：“凡手持武器反对政府军者，一经抓获，立即枪杀。”<sup>①</sup>反动军官宣布竭尽全力镇压一切罢工者。军队使用各种轻重武器对起义工人大施淫威，大约有1200名革命者被杀害，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约吉希斯也被枪杀。3月16日，柏林罢工以失败告终。

当1919年1月至3月德国中部及其它地区的斗争已经转入低潮时，巴伐利亚地区的工人阶级掀起了德国11月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建立了巴伐利亚共和国。4月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布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月13日，慕尼黑驻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工人举行总罢工，打败了反动军队，于4月13日晚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力图领导工人阶级保卫革命成果，剥夺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它武装了工人，建立了红军，实行了一系列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此恨之入骨，决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实行镇压。5月1日，政府军队开进慕尼黑。经过几天的殊死搏斗，红军和革命工人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几百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至此，伟大而壮烈的11月革命全部结束。

---

<sup>①</sup>转引自《插图德国11月革命史》，第364页。



## 第二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 成为执政党

### 一 国民议会的召开和社会民主党执政

艾伯特急于使临时联合政府过渡到“合法”政府。

1919年1月19日，在反动军事势力的维持下，举行了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获11,509,048票，占总票数的37.9%，在421个议员中占165席，独立社会民主党获2,317,290票，占7.6%，拥有22个议席。①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政党获得了多数票，这些党共得54.5%的席位。议员中100名是帝国议会的议员并且赞助过帝国主义战争。这表明，国民议会的召开使革命半途而废，旧统治阶级堂而皇之地占据了立法机构的多数。

2月6日，社会民主党询问独立社会民主党是否准备在承认议会民主并抛弃暴动策略的基础上参加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条件，并指出，社会民主党领袖服从的是资产阶级的命令，企图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党政府依靠的仅仅是暴力，它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镇压工人阶级。所谓“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它自己呼唤出来的军国主义的俘虏。独立社会民主党还严厉谴责社会民主党纵容谋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暴行。②

---

①奥斯特罗特：《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大事记》第二卷，西柏林1975年德文版，第32页。

②《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0—11页。

2月11日，国民议会选举艾伯特为联邦总统。之后，艾伯特任命谢德曼为总理。艾伯特在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成果，临时政府将把革命授予它的权力交给国民议会。他强调，德国人民在革命中起义反对腐朽的暴力统治。一旦人民的自决权得到保证，就应回到法律的轨道。<sup>①</sup>艾伯特在当选为总统后的致词中更为露骨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说：我愿意并且将会作为全体德国人民的代表而行动，而不是作为某一政党的领袖。但我承认，我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在社会主义的思想环境中长大成人，我不讳言我的出身和信仰。任何暴力统治，不管是谁的，我都同它坚决斗争到底。<sup>②</sup>艾伯特声称：“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是组织、秩序和团结，而不是任意胡为、利己主义和破坏。”<sup>③</sup>在艾伯特侈谈法律、秩序、团结，和反对暴力的同时，诺斯克正在伙同反动军队扼杀罢工运动。显然，艾伯特强调法律、秩序，在当时无非是要继续镇压革命运动，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暴力。艾伯特这种政治主张的实质被国民议会主席大卫一语点破：艾伯特在德国人民的危机关头担任总统，使德国革命不会仿效俄国的榜样，发生流血和动乱，以至完全摆脱法律和秩序。德国没有象俄国那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出现可怕的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艾伯特。<sup>④</sup>

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后者只得谋求同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党和天主教徒的中央党组成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三项条件：（1）无保留地承认共和制政体；（2）实行扶植财产的财政政策；（3）在适宜的企业深

---

①转引自《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75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大事记》第二卷，第25页。

③转引自《从革命到稳定》，第146页。

④转引自《1917年至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75—76页。

入实行社会化的政策。这样，每一个愿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某些改良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民主党和中央党接受了联合组阁条件。2月13日，魏玛联合政府组成。该政府中有7名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党和民主党各3人，由谢德曼担任总理。

## 二 党的魏玛代表大会确定改良主义政策

1919年6月10日至15日，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它已从战争和革命的冲击中恢复了元气。战前，社会民主党有1,085,905名党员，1913年3月时仅有约25万名，而到魏玛大会前，党员人数回升到1,012,299。党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社会构成的变化也表现在党员的地区分布上。农业地区党员人数上升，而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如柏林、鲁尔地区，社会民主党的人数下降。1919年3月底柏林仅有约5万名党员，而在1914年这一数字高达121,689人。<sup>①</sup>1919年6月，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主要领袖的全德工会联盟成立，人数将近600万，而在一年前，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仅有160万会员。社会民主党的恢复还表现在，党的报刊发行量增加。《前进报》不仅订户增加，而且每天零售数量达到40多万份。1918年11月15日开始，《前进报》开始出版晨刊和晚刊。

出席魏玛代表大会的代表共434人，其中各地代表370人，国民议会议员48名及党报的16名代表。大会有如下几个日程：党执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人威尔斯）；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科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6月在魏玛召开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3年德文版，第54页。

尼希)；党在共和国的任务(报告人谢德曼和伯恩施坦)；苏维埃制度与宪法(报告人辛茨海默和科恩)。

威尔斯在报告中宣称，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在11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铺平了实现社会主义之路。国民议会的选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他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指责德国工人阶级为苏维埃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威尔斯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来对抗苏俄式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德国革命工人实行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他说：专政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一才能使我们前进。我们必须力图通过启发争取到大多数人民，这样，我们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否则，<sup>①</sup>我们只是立足于流沙之上。无论是什么专政，都不会创造任何稳定的东西，巴伐利亚共和国和俄国都证明了这一点。威尔斯声称：我们的道路既不向右，也不向左，我们一直沿着民主道路走到社会主义，它保障一切人的福利、自由和幸福。<sup>①</sup>

谢德曼坚决支持威尔斯的观点，他说，谁想用政治苏维埃的统治代替全体人民的统治，谁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sup>②</sup>

大会多数代表同意党的领导的改良主义政策和理论。反对派的力量微弱。反对派在发言时经常被打断。甚至伯恩施坦在论述社会民主党对战争应负的责任时，也遭到猛烈攻击。

法兰克福代表格罗格尔指出，最终将要实现国家机器民主化的信念已经消失。人们感到，全部民主化不过是表面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同志们没有任何作用。<sup>③</sup>其他一些代表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始终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反对派。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8月魏玛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60、161页。

②同上，第234页。

③同上，第184页。

哥廷根党组织的提案提出了革命的要求。提案说，提高生产力只有通过实行大规模社会化才有可能。经济社会化只能由社会主义政府来实行。只有全体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政府。提案要求把诺斯克、谢德曼等人开除出政府，组成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sup>①</sup>有的代表要求把诺斯克开除出党。但反对派的观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

大会最后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关于苏维埃和宪法的提案指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通过普遍的工作责任制和劳动者参与经济管理，实现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个目标不是通过突然行动，更不是通过任意胡为，而只能通过由合法权力推进的经济和精神发展的道路才能达到。达此目标之路在于通过教育和组织群众来扩大和实现民主化，而不在于建立一个使全体人都遭受贫困威胁的新的少数人的暴力统治。<sup>②</sup>这显然是在反对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德国革命工人的要求，宣扬渐进改良的“纯粹民主”方式。而后者只能导致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专政的复辟。

社会民主党关于志愿军的决议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滥用军事权力，通过使军官团彻底民主化和党员参加国家武装来达到这一目的。决议还要求在军队中建立党的机构，以进行宣传教育。决议规定，在有必要由军队维持秩序的地方，必须派党员辅助指挥官，这些党员有参与决策权。<sup>③</sup>实际上，这种改良方法根本不可能铲除旧军事势力。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利用军队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又害怕军队威胁自己的存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产生了这种异想天开的对策。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92—93页。

②《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97页。

③《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00页。

社会化决议要求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社会化，在没有条件的地方，用符合人民公共利益的，有计划的，由社会监督的公共经济代替纯粹的私有经济。决议规定，在经济上，工人必须享有与雇主同等的参与权。为此目的，必须建立工厂工人委员会，地区经济委员会及全国工人委员会。<sup>①</sup>社会民主党并不热心剥夺剥夺者，它主张的是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工人参与管理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雇佣地位。

社会民主党为了扩充实力，仍希望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统一，它提出的条件是：拒绝依靠恐怖主义手段建立少数人统治的尝试，无保留地承认民主的原则；放弃同共产党的合作；然后在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谈判统一的问题。<sup>②</sup>

魏玛代表大会的核心仍然是用抽象的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人自认为政权已经在握，社会变革可渐次进行，而来自左边的动乱是主要危险。殊不知，魏玛政府是建立在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它触动旧基础的要害，就会把自己掀翻在地。许多军国主义者在国家机构中身居要津，军火大王仍保持着煤铁工业的霸权，从而控制着德国经济命脉。一位高级军官毫不掩饰地说：“帝国政府就是‘我们’，即军事强权。……文官政府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sup>③</sup>对此，社会民主党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维塞尔就在魏玛大会上深刻指出：实质上，我们是按照我们国家生活的旧形式进行统治。……德国文化的内在实质、社会生活似乎都没什么变化。……在军国主义、官僚统治的位置上，只是少数几个人被换成了另外几个人。政府的原则与旧政府没有区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02页。

②同上，第99页。

③转引自卢卡斯：《1920年3月革命》第一卷，1974年德文版，第71页。

别，……我相信历史将对国民议会及我们的统治作出严厉判决。<sup>①</sup>

### 三 魏玛宪法及其实质

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共和国宪法。1月20日，宪法草案公布，后经过多次修改。7月31日，国民议会以262票赞成，75票反对通过了宪法。8月11日，宪法由总统艾伯特签署，8月14日正式生效。

魏玛宪法全文共181条，分三个部分。宪法第一部分规定了德国的政体和国家组成形式。宪法开宗明义规定：“国权出自人民”。<sup>②</sup>这一点继承了早期资产阶级宪法中“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从法律上确定了11月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成果。

宪法规定德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立法机关由两院组成，即国会和参议院。国会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按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的方式选出的议员组成。参议员由各邦代表组成，拥有对法案的否决权。德国国会的权力比革命前扩大了，成为最高立法机关。一切立法由国会产生，国会有权任命内阁、宣战和媾和。总理及各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

宪法给予总统广泛权力。宪法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总理，经总理推荐任命各部部长及任命联邦其他文武官员的权力，有解散国会、搁置取消法案、统率军队、对外代表德国等权力。特别是第48条规定，当德国“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采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并且可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基本

---

<sup>①</sup>转引自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史》1977年德文版，第39页。

<sup>②</sup>《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0页。以下所引《魏玛宪法》条文均出自本书，故不一一注明出处。

权利全部或一部停止之”。

宪法采用了瑞士的国民公决和国民请愿制度，例如当国会和参议院对法案意见不一致时，总统必须将法案交付全体人民表决（第74条）。

魏玛宪法第二部分是关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规定“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等级特权全部废止（第109条）；一切德国人都有迁徙自由（第111条）；除法律允许外，不得侵犯人身自由，不得侵犯住宅和通信自由（第115、117条）；人民“不必报告官署及特别许可，有和平及无武器集会之权”（第123条）；人民有组织社团的权利（第124条）；选举自由及选举秘密应受保障（第125条）；人民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权利（第146条）。

魏玛宪法增加了不被历来宪法重视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组织应与人类生存的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保障每个人的经济自由（第151条）。宪法宣布，经济关系应依法规定，为契约自由的原则所支配，所有权受宪法的保障（第152、153条）。宪法规定对劳动者予以充分重视，劳动力受国家特别保护（第157条）。为此，宪法规定，职工有“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结社之自由”（第159条），职工和雇主在工资、劳动条件及发展生产方面有“平等地位”和“共同决定权”（第165条）。为了保证工人的这些利益和地位，宪法肯定了苏维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165条规定：工人可组织企业工人委员会，<sup>①</sup>区工人委员会及全国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与雇主及有关代表组成地方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完成一般经济任务及进行合作以实施社会化法令”。宪法还确定将遭

---

<sup>①</sup>“委员会”与“苏维埃”为同一德文词。



于社会化的企业收归公有（第156条）。

魏玛宪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十一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成果。该宪法的制定无疑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它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宣布实行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废除了落后的三级选举制，建立了比例代表制；废除了全国兵役制；对于工人的权益予以特别注意；保障工人组织的合法存在，提出建立一套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等。

魏玛宪法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一个典范，它对其它国家的宪法产生过很大影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芬兰、捷克、波兰等国宪法都受到魏玛宪法的较大影响。

“从宪法的字面看，社会民主党实现了一些他们在战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目标”。<sup>①</sup>因此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甚至认为：宪法是按照爱尔福特纲领所要求的那样制定的，德意志共和国从此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一个国家。<sup>②</sup>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究其实质，魏玛宪法是一部旨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首先，该宪法强调的是保护私有制，而不是大规模实行社会化。这就从根本上保护和巩固了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在国家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其次，宪法虽然特别提到工人的利益和权力，但在不触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权益最终也不能越出受剥削压迫的范围。况且，政府只允许官方批准的工人委员会活动，这就严重限制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魏玛宪法的要旨在于调和劳资矛盾，而并不是

---

<sup>①</sup>苏珊·米勒和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年）》，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sup>②</sup>同上。

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前提而暂时作出某些让步。第三，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废除旧军队，打破司法、行政等旧国家机器。政府录用了大批旧官员、旧警察、旧法官，而这些人朝思暮想旧政权的复辟。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魏玛宪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也许社会民主党人企图通过渐进的方法过渡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报》总编辑施坦普费尔曾说：“当工人们了解了宪法之后，他们就不会反对它，而是运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为达到最终的目的而奋斗”。“那时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将再度成为一体”。<sup>①</sup>但以后的事件发展证明，即使这种设想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当时德国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它在实践上也是绝对行不通的。社会民主党曾标榜德国已在宪法统治之下，而诽谤苏俄如同沙皇时期一样是专制统治，并声称要充当“全体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者”。<sup>②</sup>然而，社会民主党鼓吹的权利、自由和秩序在实际上为反动势力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权利和自由”成了极右组织暗杀行刺的保护伞，“秩序”成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同义语和遮羞布。冠冕堂皇的魏玛宪法掩盖不住共和国初期鲜血淋淋的事实。

### 第三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格尔利茨纲领

#### 一 1920年国会选举与社会民主党下野

1920年3月，德国工人阶级总罢工挫败了卡普—吕特维茨

<sup>①</sup>《从革命到稳定》，第242页。

<sup>②</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25、126页。

叛乱集团复辟君主制的企图，挽救了共和国，捍卫了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共和国的坚实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才能推行社会改革，巩固民主共和国。卡普暴动失败后，形势对工人阶级非常有利，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由工人政党组成的政府，以实行“行政机关民主化”和“矿山、动力工业的国有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鲍尔首相同意就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去征求联合政府中其它党派的意见，并要求工会立即结束总罢工。事实上，鲍尔十分担心德国出现“布尔什维克化”，他对建立工人政府毫无兴趣。总罢工结束后，鲍尔就以联合政府中其他政党反对为由，使建立工人政府的希望成了泡影。1920年3月27日，以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为首相的联合政府成立。在联合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继续推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政策，而把从反对卡普暴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视为“眼中钉”。米勒政府对参加卡普暴动的反动分子异常宽容，却用武力去镇压为抗击卡普暴动而出现的红色鲁尔军和鲁尔地区工人运动。

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使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这一点在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竞选口号中强调了反对“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斗争的重要意义，但还是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同1919年国民议会选举相比，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比从37.9%下降到21.6%，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却从7.6%上升到18.6%，第一次参加国会选举的德国共产党得到1.7%的选票。<sup>①</sup>这说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联盟政策”使工人阶级大失所望，工人群众出

---

<sup>①</sup>托马斯·迈尔：《德国工人运动学习与研究手册》，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388页。

现了向左转的趋势。1920年的国会选举还表明，拥护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势力受到削弱。所谓“魏玛联盟”政党，即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在国会466个席位中只获得225个席位，从而失去了国会多数。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仍然保持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7月份，总统艾伯特正式委托社会民主党人组阁。希望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的邀请遭到拒绝后，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组阁的机会。此后，中央党人费伦巴赫组成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费伦巴赫内阁。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领袖此时对组阁已毫无兴趣，因为在内政外交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地位会使社会民主党的处境更加艰难。1920年7月18日，米勒在国会党团和党的委员会会议上解释说，社会民主党不参加政府是因为预计在几个月内德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另外，即将在斯巴进行的赔款问题谈判也不会产生有利于德国的结果。这次会议通过了不继续维持迄今为止的联合政府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利用在野党有利地位推行其改良主义政策，重新恢复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192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卡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议，确认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不参加联合政府问题的决定。决议指出：“当特别要求行政当局民主化、国防军共和化、成熟工业部门社会化以及和平主义对外政策的无产阶级利益迫切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时”，<sup>①</sup>社会民主党人才会重新参加政府。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1921年5月，赔款问题造成了内阁危机，为了帮助资产阶级政党稳定局势，社会民主党再次参加了中央党维尔特联合政府。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319页。

## 二 修改纲领问题的提出和关于纲领草案的辩论

1891年，社会民主党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直到192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的理论观点仍然在表面上被奉为党的正统指导思想。但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蜕化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党。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纲领与党的改良主义实践一直处于彼此脱节的状态。在战争期间，为了避免在党内引起混乱，社会民主党领袖不愿触动党的基本理论问题。他们力图通过制定一个具体明确的改良主义行动纲领，以“架空”爱尔福特纲领。因此，1917年10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维尔茨堡代表大会委托一个纲领委员会，制定一个战后过渡时期的行动纲领。社会民主党人声称，制定这个行动纲领目的是为了补充，而不是修改爱尔福特纲领。1918年5月，行动纲领草案在“前进报”上发表。这个纲领草案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它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仅看作是“保证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过渡”。<sup>①</sup>由于战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个纲领草案未在党内进行讨论，就被搁置起来了。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被内政外交事务所缠扰，一直未能把修改党的理论纲领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20年7月，社会民主党成为在野党，这使社会民主党领袖可以集中精力，去考虑党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个月后，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威尔斯在党的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修改党

---

<sup>①</sup>霍尔斯特·海曼、托马斯·迈尔：《改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400页。

纲领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急于制定新的纲领，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30年前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特别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间等级和小生产必然破产而无产阶级化等论断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所否定。此外，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治要求——民主共和国已经实现。新的斗争条件要求社会民主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社会民主党人总结两年来的改良主义实践，认为在魏玛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必须实行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联盟政策”；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应该去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胃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爱尔福特纲领不仅不能适应新的斗争策略的需要，而且还成了妨碍社会民主党争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支持的“理论包袱”。正如莫尔肯布在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纲领，“因为我们在鼓动中需要知识和技能，并且我们必须去争取那些同我们的运动疏远的人的支持”。<sup>①</sup>总之，基本理论观点的变化以及斗争策略的转变都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尽快制定新的党纲，结束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与改良主义实践的严重脱节，使改良主义理论在党内合法化。

1920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卡塞尔召开党代表大会。修改党纲问题被列为主要议程之一。代表大会对修改党纲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发言的代表对未来的新党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对修改党纲的必要性没有任何分歧。卡塞尔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纲领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设11个分委员会。曾参加过哥达纲领草案制定工作的老党员海尔曼·莫尔肯布尔任纲领委员会

---

<sup>①</sup>海利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阶级运动还是人民党？》，德文版第17页。

主席，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阿道夫·布劳恩任纲领委员会常务主持人。纲领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爱德华·伯恩施坦、海利希·库诺、格奥尔格·格拉特璜尔、威廉·凯尔、赫尔曼·米勒和安东尼·普菲夫等。在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选入纲领委员会，但未能成功。伯恩施坦不仅参加“基本原则部分”分委员会，并且负责主持“对外政策”分委员会的工作。参加纲领委员会工作的共有6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纲领委员会的构成已经预示了新纲领的性质。

卡塞尔代表大会以后，为了指导新纲领的制定，社会民主党前进出版社发行了一本宣传小册子，题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对制定新党纲提出的建议》，这本小册子收集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文。在该书的前言中，阿道夫·布劳恩指出：新纲领起草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不明朗。这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此，书中几乎所有论文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尔·弗尔兰德的文章探讨了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源问题。在文章中，弗尔兰德虽然主张保留马克思的经济历史理论，但同时也主张用康德的伦理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sup>①</sup>这种观点在格尔利茨纲领中得到了体现。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21年7月17日，“前进报”发表了第一个纲领草案。草案的“基本原则部分”是由被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奥古斯特·温克勒尔称为“新修正主义者”的海利希·库诺修订的。因此，纲领草案基本上反映了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理论观点。纲领草案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

---

<sup>①</sup>霍尔斯特·海曼、托马斯·迈尔：《改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404页。

一个劳动人民的党，它力图通过建立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公共经济，同时普遍地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文化，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sup>①</sup>纲领草案完全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整个草案中没有使用“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此外，由于时间仓促，发表前党的执行委员会未对纲领草案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结果，草案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统一性，一些提法相互矛盾。如“基本原则部分”只要求对垄断化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卫生事业”一节却提出，在消灭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条件下，把全部疗养和卫生事业转归公共经营。

纲领草案的发表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社会民主党的各基层组织对纲领草案的看法分歧很大，褒贬不一。在提交给格尔利茨代表大会的38个关于纲领草案的提案中，有16个提案完全拒绝这个纲领草案，4个提案要求对草案进行重大的修改，4个提案要求党的代表大会推迟制定新纲领的工作，其余10个提案只希望对纲领草案进行补充和文字上的修订。<sup>②</sup>总的来说，党内大多数对这个纲领草案持否定态度。

同时，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对这个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7月22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报”上发表《一个不成功的纲领草案》一文，文章指出，这个纲领草案使社会民主党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爱尔福特纲领不同，社会主义不再是历史必然性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必然性的自觉承担者和执行者”；纲领草案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用语，并用“劳动的人们”代替了工人阶级这个概念。<sup>③</sup>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记录（1921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358页。

②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439页。

③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439页。



对纲领草案的批评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党内关于纲领争论的焦点。的确，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纲领问题的争论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在争论中，“一种观点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另一种观点把它说成是一个一般伦理问题。根据前一种观点，社会主义是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类事业，而根据后一种观点，它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是彼此尖锐对立的，并且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真正的兴趣”。<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内还有人从策略角度考虑不赞成这个纲领草案，他们认为，这样明确地彻底地同马克思主义传统决裂将阻碍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现合并，并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更多的工人选民。

在党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领袖决定对纲领草案进行修改。1921年8月25日，《前进报》发表了修改后的纲领草案，它调和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为了安抚党内舆论，第二个纲领草案使用了“阶级斗争”这个用语，并强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纲领草案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劳动人民的党。它把工人阶级以及意识到同工人阶级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阶层为自身的经济解放和文化素养的提高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看做是自己活动的基础。……社会民主党要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项任务，社会民主党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重大责任”。<sup>②</sup>这是第二个纲领草案最主要的改动。但这段话，在格尔利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文本中又消失了。正式通过的格尔

---

<sup>①</sup>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03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柏林一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366页。

利茨纲领关于“阶级斗争”的表述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道德的要求”。<sup>①</sup>

### 三 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与新党纲

1921年9月18日—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召开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新的党纲是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重新任命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纲领委员会对纲领草案进行最后的修改和审定。纲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伯恩施坦、阿道夫·布劳恩、奥托·布劳恩、海利希·库诺、凯尔、爱德华·大卫、马利·龙卡茨、保尔·吕贝、莫尔肯布尔、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威廉·佐尔曼、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亨利希·施特吕贝和鲁道夫·维泽尔等。在这个纲领委员会中，“修正主义者”仍占优势。在纲领委员会对纲领草案的“基本原则”部分进行表决时，有24人赞同，2人反对，2人弃权。在对整个草案表决时，有26人赞同，2人反对。最终，格尔利茨代表大会在只有5人投反对票的情况下，正式通过了纲领草案。

纲领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原则”，阐述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理论观点；第二部分则提出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要求。

格尔利茨纲领同30年前的爱尔福特纲领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性质。爱尔福特纲领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它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强调社会民主党在这种对立中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爱尔福特纲领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3页。

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必然地是政治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成为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标志”，“使工人阶级这种斗争成为自觉的统一的斗争，并给它指出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sup>①</sup>毫无疑问，爱尔福特纲领确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大会前发表的第二个纲领草案也出现了与爱尔福特纲领相类似的表述，但格尔利茨纲领删去了这段文字，只保留了纲领草案中“人民党”的提法，并用“劳动群众”的概念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概念。格尔利茨纲领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的任务就是“使劳动群众的必不可免的斗争形成为一种自觉的统一的斗争”。<sup>②</sup>

社会民主党对党的性质的新表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看法的变化。社会民主党认为：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加速了社会的分化过程，“军火供应商人和投机倒把分子通过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上升为新的资产阶级。而中小所有者、工商业主、大批脑力劳动者、公务员、职员、艺术家、作家、教师，各种自由职业者降低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sup>③</sup>因此，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日益激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生活富裕的极少数同贫穷困苦的广大阶层相对立”。<sup>④</sup>从这种认识出发，社会民主党

---

<sup>①</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一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189页。

<sup>②</sup>同上，第208、209页。

<sup>③</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一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8页。

<sup>④</sup>同上。

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党内甚至有人反对把“阶级斗争”写入党纲，理由是“阶级斗争”常被人理解为“暴力斗争”。<sup>①</sup>因此，第一个纲领草案根本没有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正式通过的纲领中显然加进了“阶级斗争”这个用语，但其含义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格尔利茨纲领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手段，而注入新康德主义的伦理内容，成为一种“道德的要求”。

此外，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变，也是为适应社会民主党党员成分的变化和改良主义斗争策略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例迅速提高。阿道夫·布劳恩在卡塞尔代表大会上谈到制定新党纲的问题时指出：“今天，我们的党已成为一个包括遍布在工业、商业、农业、航海等行业的职员和公务员在内的党，我们是各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党。在这个大厅里，我们看到从大学教授到非技术性工人这样一些劳动者。我们必须使我们未来的纲领同这种成分构成相适应”。<sup>②</sup>另外，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的局面也要求社会民主党淡化自己的阶级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魏玛联盟”中的同盟者。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爱尔福特纲领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客观规律的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柏林一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316页。

<sup>②</sup>同上，第192页。

必然结果。对此，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苏姗·米勒指出：

“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即基本原则部分，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照抄了《资本论》第20章（第7节）的原文。这一部分……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所作的简短分析。”<sup>①</sup>

但是，在格尔利茨纲领中这种分析却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论断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是矛盾的。然而，格尔利茨纲领仍然把“社会主义”奉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奋斗目标，它指出：社会民主党“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sup>②</sup>由于整个纲领缺少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因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是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象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格尔利茨纲领中，“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奋斗目标而并提的。魏玛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民主党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议会民主的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它优越于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伯恩施坦在解释格尔利茨纲领时极力强调两条道路之间的对立，他指出：“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仅仅在外表上是比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条破坏的道路，与此相反，只有建设的道路才稳定地通往社会主义。在一个有着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强大工人阶级的国家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sup>②</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8页。

中，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这条道路取得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积50年以上的经验，深信拉萨尔的断言是正确的”。<sup>①</sup>

第三，对民主共和国的态度。1891年，社会民主党制定爱尔福特纲领时，德国仍处于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直接的奋斗目标。但是，在最初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没有强调实现德国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造的要求。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具体修改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见，将“在帝国各邦、各省和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的要求写进了党纲。恩格斯提出的“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实际是民主共和国的隐晦的表述。社会民主党人基本上接受了恩格斯的意见，但出于策略需要，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明确社会民主党对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十一月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无疑是历史的进步。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君主复辟势力始终十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格尔利茨纲领明确了社会民主党人对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它指出：“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保卫已经获得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sup>②</sup>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口号是“保卫共和国”。面对君主复辟势力的威胁，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纲中明确指出“保卫共和国”的口

---

<sup>①</sup>《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1978年版第218—219页。

<sup>②</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9页。

号，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民主共和国对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但也从不抹杀民主共和国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并未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进行斗争的地盘。”<sup>①</sup>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忽视了魏玛共和国的阶级性质，而把它视为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社会民主党认为，它可以通过议会民主程序来操纵和掌握魏玛共和国，以实现社会主义。格尔利茨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要为争取在自由的人民国家内建立组织起来的人民意志对经济的统治、为按照社会主义集体思想的精神革新社会而斗争”。<sup>②</sup>可见，只有把社会民主党对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同它的改良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正确评价其意义。

对魏玛共和国性质的改良主义认识使社会民主党同现存国家的关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爱尔福特纲领时期，社会民主党是现存国家的反对者，它的活动是以推翻现存国家为目标的；而格尔利茨纲领指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成了现存国家的拥护者和捍卫者。社会民主党《前进报》主编弗·施坦普费尔，把社会民主党同魏玛国家的关系看作是评价格尔利茨纲领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党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不脚踏实地地站在国家的基地上，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国家权力和影响而斗争的话，我们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哲学上的宗派，但绝不会成为一个战斗性的政党。”<sup>③</sup>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0页。

②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一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9页。

③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柏林一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445页。

以上几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基本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变化。格尔利茨的具体政策部分，除了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以及提出保卫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外，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它只是将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要求具体化了。特别是，格尔利茨纲领的“经济政策”一节只字未提“社会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大企业实行“社会化”是十一月革命中德国工人阶级最基本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一一直赞成实行“社会化”，1919年社会民主党提出参加联合政府的三个条件就包括“社会化”的要求。后来，魏玛宪法将这种要求法律化，第156款规定，国家可以通过法令将私人经济企业转归公有，实现社会化。但格尔利茨纲领却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其基本原则部分同爱尔福特纲领一样，只是一般性地提出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原则，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把大规模的集中的经济企业转为公有经济，并由此进一步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提高生产量、使人类向更高级形式的经济与道德共同体上升的一个必要手段”。<sup>①</sup>格尔利茨纲领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具体要求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首先是对利益集团即卡特尔和托拉斯实行监督。在民主管理和避免官僚化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家的、邦的、以及公共团体的企业。鼓励其目标不在于赢利的合作社。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政策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sup>②</sup>这些要求构成了后来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所倡导的“经济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

---

<sup>①</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9页。

<sup>②</sup>约翰内斯·劳：《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10页。



通过对这个纲领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格尔利茨纲领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如果说爱尔福特纲领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那么格尔利茨纲领便是一个渗透着改良主义精神的纲领。

用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民主党制定新党纲的本意，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仍然很大，所以纲领的制定者不得不在纲领中保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社会民主党领袖还一再表示，社会民主党要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施坦普费尔在格尔利茨大会宣称：“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如果代表大会同意我们的文件）向爱尔福特，向我们的青年时代告别的时候，我们要宣誓说，我们坚持忠于我们青年时代原来的理想，忠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忠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sup>①</sup>事实上这种表白不过是为了掩饰格尔利茨纲领的改良主义实质。

格尔利茨纲领是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1922年9月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纽伦堡合并代表大会以后格尔利茨纲领实际上就失去了党纲的意义。但对于考查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历史发展来说，格尔利茨纲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纲领。通过格尔利茨纲领，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思想在党内合法化了。这是格尔利茨纲领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因此，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评论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开辟了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sup>②</sup>

格尔利茨纲领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还是很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围绕着纲领建设进行的思想斗争》，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78页。

<sup>②</sup>转引自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06页。

不完善的。格尔利茨纲领确认和描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治进化的道路，但社会民主党人放弃“社会化”的目标后，将通过怎样的经济变革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格尔利茨纲领并未对此作出回答。此外，格尔利茨纲领只是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它没有用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马克思对此作出的结论。

## 第四节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 发展壮大和分裂消失

### 一 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制定

十一月革命开始后，工人阶级各党派不断分化组合。1918年12月2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表明自己反对社会民主党镇压革命水兵和工人的立场。12月31日，斯巴达克团从独立社会民主党分离出去，成立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2月6日，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把后者视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鸿沟，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也有不少重大的策略分歧。工人阶级各党派的分化反映了工人群众政治态度和情绪的变化。工人群众本来对革命的期望很高，但社会民主党既没有摧毁旧官僚和军事机器，也没有恢复经济，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大批工人离开社会民主党，纷纷转向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这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尚无一个明确的纲领，因而急需明确目标，制定基本战略和策略，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

1919年3月2日至6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了特别代表

大会，着重讨论了党的纲领问题。

虽然斯巴达克派已分裂出去，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仍存在着不同派别。在讨论纲领问题时，哈阿兹和道伊米希各自提出一个议案。哈阿兹的议案表面上看来对革命充满了期望和决心，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什么新策略。该议案提出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这集中反映了中派主义的理论倾向。道伊米希的提案与哈阿兹的观点迥然相异。该提案指出：无产阶级在十一月革命中赶走了帝国主义当权者，但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并企图继续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剥削他们。提案强调，无产阶级认识到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手段根本得不到完全的政治自由，只有依靠自己的战斗组织，即工兵苏维埃，才能得到解放。提案宣布：独立社会民主党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用无产阶级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通过工人苏维埃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sup>①</sup>

代表们分为两派围绕纲领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位代表是这样评估这场争论的：哈阿兹和道伊米希的观点“如同水火”一样互不相容，前者赞赏国民议会并希望苏维埃制度与之合并，而后者则要求无产阶级专政。道伊米希强调：“苏维埃制度的含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完全一样。”<sup>②</sup>两派斗争相持不下，为了维持党的统一，大会提出了一个折衷的《纲领宣言》。该宣言承认世界革命、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要求。其中包括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解散全部旧军队；建立工人组成的人民武装；立即开始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36—37页。

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5年影印德文版，第95—96页。

会化；审判战犯；加强社会保险等等。该宣言基本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大多数党员的革命情绪和要求。但它也含有模棱两可和中派主义的提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1）宣言接受了哈阿兹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的要求。列宁认为这是“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sup>①</sup>（2）纲领宣言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后面加上了说明：“即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sup>②</sup>这显然是暗示这种专政与苏俄专政有原则区别。实际上，纲领没有消除分歧，只是用调和的方式暂时掩盖了分歧。会后，两派都按自己的倾向解释纲领宣言。

大会关于工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要求工会作为毫无保留地支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斗者。决议谴责了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反对革命的行径。决议号召工会会员反对工会官僚的现行政策，要求独立党党员在工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使工会转到革命立场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sup>③</sup>

大会认为五一节应该采取总停工的方式来庆祝，并对全体正在罢工的工人表示同情。大会宣布政治性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抗议假社会主义政府反革命行径的最佳斗争手段。大会还强烈谴责了谋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残暴罪行。<sup>④</sup>

在选举党领导时，左右两派的分歧也充分显露出来。大会原准备推举哈阿兹和道伊米希为主席候选人，但哈阿兹拒绝与道伊米希合作。经过争论，大会选择了哈阿兹，然后又推选克里斯平为候选人。最后，这两个人当选为主席。

柏林大会后，随着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独立社会民主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7—358页。

<sup>②</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38页。

<sup>③</sup>同上，第40页。

<sup>④</sup>《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事记》第二卷，第28—29页。

党左派的力量不断增长。左派对《纲领宣言》中的中派主义提法和观点非常反感，因而全力以赴宣传革命的策略和主张，并争取到了多数党员的拥护和赞同。在这种条件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在莱比锡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党纲时没有发生多少争论，并通过了一个非常革命和激进的纲领。党纲宣布：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能获得解放。党纲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制度上，认为工兵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创造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有不同的职能和作用。在夺取政权之前，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组织”，它的作用是把全体工人团结在这个组织中，并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苏维埃制度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全面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另一个是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执行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sup>①</sup> 纲领中关于苏维埃的理论已与俄共的理论相差无几。该纲领取消了柏林大会纲领宣言中“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的要求。纲领明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手段”，<sup>②</sup> 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后面原有的附加说明：“即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这两个改动无疑是左派的胜利。考茨基曾说，他对“通过行动纲领感到震惊，而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纲领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就被通过”。<sup>③</sup> 考茨基的惊叹不无道理，因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策略分歧。然而纲领的一致通过绝不表明差异的消除，而只意味着人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57页。

②同上。

③转引自切尔涅佐夫斯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莫斯科1983年俄文版，第171页。

们乐于按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纲领。如，右派虽然在理论上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竭力贬斥苏俄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指责这种政策是恐怖主义。希法亭宣称：我不能接受莫斯科宣布的恐怖主义。<sup>①</sup>左派施特克尔则谴责了反动势力的恐怖手段，指出苏俄的专政措施是完全必要的。<sup>②</sup>

莱比锡大会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会结果表明左派在党内开始占据优势。大会通过的党纲与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大致相同。共产国际认为，莱比锡大会的纲领是“一年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反对机会主义领袖的斗争成果。这个决议应该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对机会主义者，对党内右翼领袖的胜利而受到欢迎”。<sup>③</sup>反动势力也嗅到了这一点，马格德堡军事当局认为，莱比锡大会证实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在实际政策上不存在根本差别。两者都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奋斗，两者都积极鼓动和准备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因此两党的联合将在预料之中。<sup>④</sup>

## 二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壮大

1919年春季以后，德国的革命斗争渐趋低落，工人运动的重点也从政治方面转向经济方面，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在大部分地区消失，而以经济为主要目的的苏维埃则仍然存在。这样，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柏林苏维埃执委会渐渐放弃了它的直接政治要

---

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召开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5年德文影印版，第317页。

②同上，第334页。

③转引自克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革命派与德共的统一》，载《统一》（德文）杂志1980年第12期。

④同上。

求，转而成为柏林工厂苏维埃系统的地方领导。1919年夏季，苏维埃运动再度出现高潮。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制定了一个苏维埃组织的模式，并准备把它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但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践。

独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各地的苏维埃消除相互之间的分歧，联合起来，赢得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它们就可以成为推进革命的巨大力量。在此思想指导下，召开了一系列苏维埃组织的全国会议。8月22日至23日在哈勒召开的全国会议上，许多行业组织的工人代表决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德国工厂苏维埃中央，以协调各组织的活动。该中央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克南、道伊米希和库·盖耶尔负责。中央号召广大工人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苏维埃的选举。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组织中已自成体系。柏林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理·米勒说，独立社会民主党一旦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就不再理睬社会民主党。在柏林苏维埃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实行反政府的政策，而根本不顾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苏维埃的反对。结果，后者只得单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夏季时就预料到，政府正在起草的工厂委员会法案不会给工人以实际权力，因而该党更为坚定地建立自己的“革命苏维埃制度”。政府千方百计遏制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8月23日，诺斯克封闭了柏林执委会办公机构，禁止它举行工厂苏维埃的选举。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更进一步强调苏维埃的革命作用。

改良主义工会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巨大障碍。因此独立党决心在工会内部活动，争取广大工会会员站到自己一边。它期望在工会中达到四个目标：（1）控制领导地位；

( 2 ) 取消工会和雇主的合作机构；( 3 ) 确立苏维埃与工会的平行地位；( 4 ) 把行业工会组成跨行业职工工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与工会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在柏林，该党取得了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权。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独立社会民主党争取到了三分之一代表的支持。最大的工会五金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手中，成为与工会总委员会抗衡的巨大力量。

柏林大会后的几个月内，独立社会民主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党员人数从30万增加到75万，并在各邦都建立了党组织。党在各地的选票也有所增加。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报》的发行量超过20万份。1919年底，该党共有55种报刊。

1919年底，部分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开始高涨。鲁尔矿工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汉堡工人甚至又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上西里西亚也出现罢工运动。独立社会民主党力图借助罢工运动再次掀起苏维埃运动，该党左派甚至希望在机会成熟时夺取政权。盖耶尔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准备夺取政权，这就是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

政府定于1月13日表决新制定的工厂委员会法，<sup>①</sup>该法案只给工厂一级的工人委员会很有限的权力，而且只允许政府控制的委员会存在，取缔其它的工人委员会。这一法案激起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极大义愤。这两个党与德国工厂苏维埃中央于1月12日号召工人阶级举行群众性罢工，反对通过工厂委员会法，为革命的苏维埃制度而斗争。

柏林的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月13日中午，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在主持者讲话之后，部分

---

<sup>①</sup>工厂委员会也可译为工厂苏维埃或企业苏维埃，此处从通译。



工人向大厦拥去，军警的机枪疯狂向人群扫射，几分钟内打死42人，打伤105人，酿成十一月革命以来的最大流血事件。几小时后，北德地区实行戒严，诺斯克开始大规模镇压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后的一个多月内，该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半非法状态。至少有35种独立社会民主党报刊被查封，大批党员被捕，左派领袖道伊米希也一度身陷缧绁。政府软硬兼施，很快平息了各地的罢工运动。

示威和罢工的失败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受到严重打击。暴力镇压和工厂委员会法有效地扼杀了革命的苏维埃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只得退却，努力在合法的工厂委员会中施加影响，以使它们能起到一些革命作用。

这时党内右翼势力有所抬头。在1月28日召开的高级干部和党报编辑会议上，右派指责左派企图立即发起革命。克里斯平说，党必须克服一夜之间打碎旧制度的希望，必须克服跟随共产党策略的倾向。<sup>①</sup>右派普遍认为，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避免同政府直接冲突。

1920年3月13日，反动军事势力发动暴乱，赶走了魏玛政府，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临时政府，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即“卡普暴动”。当天，独立社会民主党立即号召总罢工，号召工人们“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军事独裁！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复辟帝制！”而起来斗争。<sup>②</sup>接着，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行动问题。前者提出的主要条件是：（1）罢工不是为了支持艾伯特政府；（2）必须武装工人；（3）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sup>③</sup>社会民主党表示无法接

<sup>①</sup>《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第318页。

<sup>②</sup>同上，第321页。

<sup>③</sup>同上，第323页。

受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合作没有实现，独立社会民主党自己成立了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两天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发表声明宣布：我们的斗争目的只能是永远结束反动资产阶级和容克的统治。工人阶级必须战斗到它夺取政权为止！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sup>①</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卡普暴动的罢工中虽然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和目标，但在具体领导和行动时往往争论不休，优柔寡断，没有成为罢工的得力领导。

3月17日，卡普暴动破产。自由工会领袖列金提出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里斯平、道伊米希坚决反对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这使魏玛政府得以苟延残喘。3月21日，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三项复工条件：（1）解散一切反革命军队，建立革命自卫军；（2）结束紧急状态，审判暴乱分子；（3）立即开始实行社会化。<sup>②</sup>之后，该党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谈判，并共同宣布罢工结束。而独立党左派则与共产党联合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力图坚持罢工，但未获成功。

在反卡普暴动的斗争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派积极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领导了许多地区的工人运动。独立党在鲁尔地区及哈勒、莱比锡等地的斗争中有较大作用。

1920年上半年，独立社会民主党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许多原来跟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继续向独立党靠拢，把它当作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党。1920年6月举行的国会大选充分显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实力。早在4月20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就发表了竞选呼吁书。其中宣布：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就是把劳动人民从被剥削压迫的境遇中解放出来，战胜

---

<sup>①</sup>《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第325页。

<sup>②</sup>同上，第328页。

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呼吁书明确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这一目的。<sup>①</sup>呼吁书还提出了一系列达到这一目的所应采取的措施和要求。最后呼吁书指出：“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只靠议会工作就可实现，议会本身就对反革命暴动负有很大责任。我们的权力和力量首先在于群众行动。……选举斗争必然导致同反革命、假民主派、假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敌人进行总清算。它必将检阅社会主义的力量。”<sup>②</sup>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在竞选中尤其强调，进入议会的目的是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思想，参加议会只能与大街上的行动相联系才能成功。

1920年6月6日大选揭晓。独立社会民主党获得4,896,095票，比1919年国民议会选举时多近260万票，占总票数的18.8%。该党的议席从22个增加到81个。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巨大胜利相比，社会民主党则大伤元气，它丧失了约600万张选票和50个议席。社会民主党原来的许多选民大批涌向独立社会民主党阵营，从而使后者日益成为与社会民主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

### 三 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国际”问题的争论

观点分歧、派别林立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先天不足。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动荡则进一步催化了党内分歧。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借助于各种有利条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党内隐伏着的各种矛盾也在日益公开。较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可以通过调和的方式得到缓解，而“国际”问题必然与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因而很难达成双方满意的妥协方案。这样，“国际”问题使显赫一时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走上了分裂之路。

---

<sup>①②</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262—263页。

柏林代表大会上，人们已经就“国际”问题展开了争论。与会代表大致分为三派。作为伯尔尼国际会议的参加者，考茨基向大会汇报了伯尔尼会议的情况。他声称在伯尔尼会议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精神，而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他说参加伯尔尼会议是正确的，并竭力维护该会议攻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sup>①</sup>

哈阿兹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主张，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上重建一个强大的国际。他还斥责了攻击苏维埃俄国的右派分子，但他对伯尔尼国际仍恋恋不舍。

一些地区的左派代表在提交给大会的议案中坚决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伯尔尼会议，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谴责考茨基在伯尔尼会议上的表现，要求与德国共产党联系和统一行动。<sup>②</sup>当时仍留在独立党内的蔡特金在发言中揭露了伯尔尼会议的反动本质，严厉批评了党领导在“国际”问题上的动摇性。她主张在齐美尔瓦尔德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行动的国际。道伊米希批评党领导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这样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派到伯尔尼去开会。其他许多代表也批评了党的“国际”政策，赞扬瑞士和意大利社会党抵制伯尔尼会议的决定。大会最后通过的纲领宣言要求“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sup>③</sup>这种提法包含着与第二国际势不两立之意。柏林大会期间，人们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成立的消息。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远未明确创建什么样的国际。

从柏林大会后到11月底召开的莱比锡大会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围绕“国际”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3月15日，《莱比锡

---

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的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5—126页。

②③《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34—36页。

人民报》就写道：使德国免遭协约国帝国主义劫掠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建一个充满革命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国际。<sup>①</sup>右派领袖则不再用《纲领宣言》中以齐美尔瓦尔德精神建立国际的提法，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原则政策”这一含混不清的术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哈阿兹参加了伯尔尼国际的阿姆斯特丹会议。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联系的扩大，共产国际影响的扩大，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国际”问题的争论日益加深。7月下旬，党内围绕是否参加伯尔尼国际的琉森会议展开了大争论。希法亭在一系列文章中表明了如下观点：（1）加入共产国际就是完全服从莫斯科的观点，因此必须反对加入该国际；（2）加入共产国际必然使独立社会民主党与西欧无产阶级分离，而没有后者，革命就不能成功；（3）应该根据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重建第二国际，因此应该参加琉森会议，为第二国际的革命化而活动。<sup>②</sup>

希法亭的观点对独立党领导有较大影响。党领导决定参加琉森会议，并以“我们为什么去琉森”为题发出通告，系统阐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通告宣布，参加琉森会议的目的是争取世界革命的决定因素——西方无产阶级，同时揭露批判右派社会主义。通告阐述了未来的国际应遵循的原则：（1）必须是真正有实权的，能够行动的国际，参加国际的各党必须执行和服从国际的决议；（2）国际的目的是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3）国际必须开除右派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up>③</sup>

---

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第81页。

②同上，第101页。

③参见同上，第104—105页。

在琉森会议上，克里斯平要求伯尔尼国际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苏维埃制度。希法亭要求开除右派党，使国际革命化。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会上一直处于少数，他们的主张均被拒绝。

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强烈反对参加琉森会议，主张加入共产国际。《汉堡人民报》要求独立社会民主党与旧国际彻底决裂，加入以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原则的共产国际。<sup>①</sup>许多地方党组织强烈要求断绝同伯尔尼的关系，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加入共产国际问题。

琉森会议引起的争论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国际”问题更广泛、更激烈的大争论的前奏曲。从独立党9月全国代表会议前后到11月底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前这段时间，独立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就“国际”问题展开了全国性的争论和斗争。

在此期间，党的书记施特克尔和《莱比锡人民报》原主编库·盖耶尔是左派的主要代言人。为了使党员群众理解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进而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作思想准备，施特克尔在8月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共产国际，文章大段摘引了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施特克尔和盖耶尔坚持主张与旧国际彻底决裂，加入共产国际。施特克尔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崭新基础上的国际，一个在决战的形势下可以依靠的国际，一个可以成为世界革命强大推进力的国际。”共产国际就是这样的国际。<sup>②</sup>施特克尔和盖耶尔一再强调，共产国际的方针在本质上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纲领是一

---

<sup>①</sup>参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第108页。

<sup>②</sup>《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9月9日—10日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1975年德文版，第35页。

致的，国际的原则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所遵循的观点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使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分离。<sup>①</sup>左派在“国际”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以其理论的向左发展为基础的。这时左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及苏维埃等问题上的观点已非常接近共产国际。

右派不遗余力地反对加入共产国际，并企图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伯尔尼国际。希法亭说，加入共产国际就是把德国独立党这条小船依附在俄国这条正在沉没的船上，以至同归于尽。<sup>②</sup>但右派的支持者为数寥寥。以克里斯平和累德堡为代表的中间派观点还有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反对旧国际，另一方面指责俄共和共产国际企图分裂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反对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各国革命派，包括布尔什维克，联合召开国际大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sup>③</sup>

通过三个月的大争论，独立党广大党员对共产国际有了基本了解，越来越多的党组织和党员支持左派领袖的立场观点。许多地方党组织召开党员集会或干部会议，通过了与旧国际决裂，立即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在莱比锡大会上，围绕“国际”问题的争论达到了新的高潮。关于“国际”问题，大会先后提出了四个议案。

施特克尔代表左派提出的草案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已经临近，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国际的任务迫在眉睫，共产国际就是革命国际的核心。独立社会民主党完全赞成共产国际原则，因此它必须同伯尔尼国际彻底决裂，立即加入共产国

---

①《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9月9日—10日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第45、67、69页。

②同上，第19页。

③参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第137页。

际，并引导其他国家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也加入共产国际。<sup>①</sup>

希法亭的提案代表了右派的观点。该提案指责共产国际有“宗派的特征”，不可能把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该提案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右派党在内的国际。<sup>②</sup>希法亭唯恐多数代表跟随左派，因而危言耸听地说，加入共产国际将导致德国独立党和其它许多外国党的分裂、毁灭，将削弱国际工人运动。<sup>③</sup>希法亭提案的主旨就是坚决阻止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而要建立一个以中派党为骨干的兼容并包的大杂烩国际。

累德堡的提案反映了中间派的犹疑徘徊。该提案同右派提案的区别在于，它要求与伯尔尼国际决裂；它同左派的差异是，反对立即加入共产国际，主张召开一次“一切承认苏维埃组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尤其要包括共产国际）”的会议，以便组成一个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新国际。

支持右派提案的人寥寥无几，左派与中间派的争论成为主线。由于争论相持不下，克里斯平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折衷议案。该提案与累德堡提案大同小异，但在左派的要求下，提案规定：“如果其它国家的党不愿同我们加入莫斯科国际，那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将单独加入。”<sup>④</sup>为了避免分裂，许多原来支持施特克尔提案的左派转而赞成这一提案，最后，大会以227票对54票通过了克里斯平提案。这个提案是调和矛盾的产物，难免有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之处，但该决议的通过仍为左派以后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莱比锡大会表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在“国际”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分裂的危机。

---

①《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54—155页。

②同上，第153—154页。

③参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第166页。

④《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160页。



莱比锡大会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按照自己的立场解释和宣传大会关于“国际”的决议，并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国际。道伊米希在柏林的一次集会上断言：加入莫斯科国际的基本思想在莱比锡大会上取得了胜利。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左派纷纷召开党员和党干部会议，要求坚持莱比锡大会精神，立即与共产国际联系，并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头三个月，科隆、埃森、麦克兰堡、中莱茵等地区都举行了这样的会议。

中派主义者不承认莱比锡决议确定了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1919年12月15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和18个外国社会主义政党，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建立新国际问题。中派主义者力图借此机会发起一个“重建”国际的运动，组成一支与共产国际相抗衡的力量，以增加与后者谈判的筹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克里斯平对外国党代表说，只有当莫斯科平等对待其它党，并尊重运动和策略自由时，独立社会民主党才准备加入共产国际，否则，则不加入。

中派主义者的立场使共产国际更加痛恨和警惕德国独立党的“国际”政策及其行动。在此条件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0年2月5日答复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上年12月15日的来信。复信的基本立场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他们的右翼领袖在思想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出发，复信谴责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大战和十一月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并批判了中派主义领袖关于革命、专政和民主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复信指责中派主义领导不坚决与旧国际决裂并企图建立第四国际。<sup>①</sup>

共产国际的复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

---

<sup>①</sup>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95—100页。

的不满，甚至使一些左派也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则促使左派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施特克尔起草了一份自我批评式的复信，但被大多数领导否决。左派仍坚持与中派主义斗争。5月2日，施特克尔和克南严厉批评中派主义的喉舌《自由报》违背莱比锡大会的革命精神，拒不宣传第三国际。5、6月间，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左派表示了对中派主义领袖阻挠加入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迫切愿望。汉堡和哥达的党组织要求立即结束党领导在“国际”问题上的“秘密外交”，派代表去莫斯科。有的地方党报率先发表了共产国际的复信。共产国际在5月27日和6月21日两度催促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左派强调，“再也不能有一分钟的犹豫了”。<sup>①</sup>汉堡党组织负责人台尔曼建议汉堡独自选举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以抗议党中央委员会的消极态度。

在共产国际的敦促和左派领袖及广大党员的压力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终于决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代表团由左派施特克尔和道伊米希，中派主义者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组成。左派去莫斯科的目的是为立即加入共产国际铺平道路；中派则打算为召开一次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的国际会议而争取第三国际。因此，两派在大会上必将分道扬镳。

共产国际二大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大会普遍认为，共产国际正面临着被中派主义侵蚀和败坏的危险，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拒绝中派分子加入国际。大会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展开了猛烈批判。季诺维也夫说，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推行的是“考茨基政策的翻版”，共产国际“宁愿完全孤立”，

---

<sup>①</sup> 瑙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载《史学杂志》（德文）1971年第8期。

也决不同他们联合。①国际领导人和许多代表强烈要求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右派决裂，并批评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拉狄克对左派说：清扫你们的房间，不是用扫帚，而是用烧红的烙铁。②为了阻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及其它政党中的中派分子加入共产国际，列宁主持制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对中派主义者关闭了共产国际的大门。

施特克尔和道伊米希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阐明了左派的立场。他们强调，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保证按第三国际精神行动，清除机会主义分子。③左派开始时并不愿自己的党走向分裂，对接受“二十一条”有所顾虑。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说服下，同意了“二十一条”。

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拒绝共产国际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和指责，坚决反对“二十一条”。他们表示，共产国际不放弃“二十一条”，德国独立党就难以加入共产国际。

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理论到实际政策彻底转向了共产国际，并准备与党内中派主义者一刀两断。

#### 四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消失

共产国际二大后，独立社会民主党上下围绕是否加入第三国际再次展开大争论，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对抗程度。争论以党的大分裂而告结束。

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9月1日至3日召开全国干部会议，专

---

①《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上卷，1977年英文版，第205页。

③同上，第289—297页。

门讨论“国际”问题。左派在会上立场坚定，不愿作丝毫的妥协让步。左派认定，加入共产国际是目前革命形势的要求。施特克尔说：“我们也许就在决战前夕，因此，我们需要同第三国际联合，同一切推进革命的党联合。”<sup>①</sup>道伊米希认为，加入共产国际将推进世界革命和德国革命。<sup>②</sup>左派坚决主张接受“二十一条”。施特克尔指出：“第三国际在接受新党的条件方面持谨慎立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从第二国际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sup>③</sup>道伊米希表示：“如果我们的党要作一个坚定的党，那么，无论条件多么严格，也必须加入莫斯科（国际）。”<sup>④</sup>

中派主义者在大会上断然拒绝“二十一条”，指责它的目的是使外国党成为俄国的驯服工具，它将导致国际工人运动的毁灭。中派分子宣称，不要精神上的奴役，要自由，要民主，要自己制定策略。<sup>⑤</sup>

同以往的争论一样，“国际”问题与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密不可分。左派再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施特克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直接的斗争目的，必须号召群众用暴力打败资产阶级。<sup>⑥</sup>左派特别批判了右派在暴力问题上对苏俄的攻击，强调俄国现在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以镇压敌人。

右派认为，俄国实行的是恐怖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攻击俄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sup>⑦</sup>

---

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9月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5年德文影印版，第71页。

②同上，第193页。

③同上，第67页。

④同上，第52页。

⑤同上，第34、36页。

⑥同上，第69页。

⑦同上，第54页。

两派的观点如冰炭难容，会议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矛盾在共产国际外力的挤压下，即在“二十一条”的强制下，无法再象以前那样得到缓和。全国会议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关于“国际”问题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各地党报几乎没有一天不争论“国际”问题。这时，双方的斗争，其主要意义已不在于争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是与非，而在于全力以赴争取更多的党员支持自己。从全国会议结束到哈勒大会召开前，全国各地召开了几百次党员大会。各地左派一致表示拥护“二十一条”，要求开除机会主义分子，加入共产国际。奥格斯堡的左派要求：抛弃对反对派的测隐之心，加入共产国际。<sup>①</sup>有的报刊指出：如果冷静地、不带感情地判断，“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sup>②</sup>科隆党员大会宣布：只有承认共产国际基本原则和“二十一条”的人，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成员。<sup>③</sup>符腾堡党员大会指出，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要求主张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党必须立即联合起来，因此独立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入唯一革命的国际——第三国际。<sup>④</sup>为了确保在党代表大会上占居多数，9月20日，左派领导向全党发出号召：现在必须选举那些坚定地站在加入第三国际立场的代表！不要再多愁善感、顾虑重重，这是关系到革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的问题。<sup>⑤</sup>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左派在大

---

① 略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共的统一》，载《史学杂志》（德文），1971年第12期。

②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国际》，第236页。

③ 同①。

④ 同①。

⑤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298—299页。

多数地区获得优势。左派决心在即将召开的哈勒代表大会上不作任何妥协，一定要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这样，分裂势在必行，哈勒大会不过是分裂的仪式。

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0月12日至17日在哈勒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共产国际和“二十一条”。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报告，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报告无疑激励了左派。希法亭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但没有引起大多数代表的注意。大会就“二十一条”提出了两个议案。左派提案宣布：“党代表大会认为第三国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组织，并决定立即加入这个国际，因为党代表大会承认这个国际的原则和理论就是自己的原则和理论。”提案认为，为了加强第三国际的团结和战斗力，每个成员党都必须放弃部分自主权，因此提案要求接受“二十一条”。<sup>①</sup>该提案以236对156票被通过。这样，反对“二十一条”的右派提案无须表决。左派提案通过后，右派领导克里斯平却宣称左翼多数派已经把自己开除出党，大会不再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反对派另行召开代表大会。至此，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部分。

左派在哈勒大会通过的《告德国工人书》中指出：“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分子之间的兄弟纷争已经过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联合在德国的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群众政党之中的任务直接摆在面前。”<sup>②</sup>这就提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在哈勒大会后的首要任务——与德国共产党统一。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独立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共同呼吁革命的工人组成强大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一册，第328页。

<sup>②</sup>同上，第333页。

的统一共产党。他们组成临时中央，共商合并的基本问题。经过充分准备，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共产党于1920年12月4日至7日召开了统一代表大会，德国统一共产党正式成立。大约37万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加入了统一共产党，从此，德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

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退出哈勒代表大会后，于10月17日单独举行了代表大会。希法亭认为这次大会的意义在于，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强权政治的制度，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sup>①</sup>然而，希法亭的观点并不代表多数。克里斯平强调，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努力。<sup>②</sup>大会的基本倾向是，力图保持公允、中间的立场，既反对“盲动主义”又反对“改良主义”。大会通过的《宣言》充分体现了这种立场。《宣言》表示：独立社会民主党永远坚定不移地、不畏牺牲地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基本革命原则而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妥协联合的政策，也反对共产党奴隶般地模仿俄国方式制造革命的政策。《宣言》强调，如果接受“二十一条”，独立社会民主党就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而且牺牲了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未来。《宣言》重申要坚持莱比锡纲领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与该纲领基本相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和要求。<sup>③</sup>

大会选举克里斯平和累德堡为党的主席。虽然这次大会的宣言看起来非常理直气壮，反对了两种倾向，不偏不倚，但这种折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大事记》第二卷，第76页。

②同上，第76页。

③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大事记》第二卷，第76—78页。

衷的理论似乎吸引力并不很大。独立社会民主党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雄风，而是逐渐衰弱下去，直到最后难以立足，不得不同社会民主党合并。

独立社会民主党仍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1920年10月29日，该党中央向欧洲各中派党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成立新国际问题。几个中派大党也有这个意图。经过准备，1921年2月22日至27日，10个国家的中派政党和组织在维也纳召开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二半国际）成立大会。大会的基本立场是：无产阶级不应仅限于“运用民主的方法，象第二国际现在做的那样，也不应要求机械地摹仿俄国工农革命的方法，如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样”。<sup>①</sup>这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毫无二致。会上累德堡发出了较为激进的声音，他号召“各国社会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进行斗争”，阻止干涉苏俄的一切军事行动。<sup>②</sup>他还宣布：“只有全力投入同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的人，才能加入我们的队伍。”<sup>③</sup>

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党内仍存在着分歧，只是暂时尚不显著。累德堡和罗森菲尔德成为左翼的代表。他们相信革命仍在前进，而且非常同情德共。他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仍是一个以直接和激进方式进行革命的政党。累德堡认为，独立党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唯一堡垒，在机会主义异教和冒险主义之间，它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左翼在感情上倾向共产党，而仇视社会民主党。罗森菲尔德一直到最后还力图找到加入共产国际的妥协方案。累德堡相信，德共从1918年以来一直是革命同志，他们只是暂时误入

---

<sup>①</sup>布拉斯拉夫斯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78页。

<sup>②</sup>《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95页。

<sup>③</sup>莫吉列夫斯基：《第二国际的复活》，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



歧途。<sup>①</sup>

然而，1921年至1922年间，由于革命逐渐走向低潮，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力量日渐式微，党一步步向右转。开始时，考茨基企图使党接受他的立场观点，但并未成功。这时，他和希法亭、布赖特沙伊德是右倾势力的主要代表。党的《自由报》、《莱比锡人民报》及理论刊物《社会主义者》是右派的阵地。希法亭经常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对党有较大影响。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分歧主要表现在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方面。1921年7月，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党员在议会斗争中与社会民主党合作，以加强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党领导只想增加合作，而并不愿意合并。8月26日，“康祖尔组织”<sup>②</sup>暗杀了财政部长埃茨贝格。这激起了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对反动势力的仇恨。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工人群众，要求镇压反动集团，社会民主党对此要求表示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8月31日，工会、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在全德掀起了抗议右翼反动势力的运动。这本来有可能导致两个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9月份召开的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该纲领对爱尔福特纲领作了改良主义的修正。大会还暗示愿意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民党合作。独立社会民主党对此表示不能接受。甚至力主两党联合的右派也不得不对社会民主党作一些批评。考茨基在《自由报》写道，统一几乎不能在一派劝服另一派同意不同观点的时候实行，只能在这些问题失去了实际意义的情况下达到。对独立社会民主

---

①《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第393页。

②“康祖尔组织”是1920年底建立的极右派秘密组织，其目的在于反对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及犹太人。

党和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时刻到来了，以前导致分裂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只有在加入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两党还有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两党也在接近，因为独立党正在形成加入联合政府的趋向。他批评格尔利茨纲领如果不是彻底毁灭了正在开始的统一，也是使它暂时中止了很长时间。<sup>①</sup>布赖特沙伊德也说，任何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同意，甚至不会容忍社会主义者同重工业家的政党合作。<sup>②</sup>左派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倾向。罗森菲尔德指出，社会民主党宁愿与人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也不愿要无产阶级的统一。<sup>③</sup>这一观点代表了多数党员的看法。

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采取了较强硬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对它的策略变得较为灵活。10月初，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表示支持政府的共和民主政策。社会民主党马上作出欢迎的姿态，《前进报》写道：独立社会民主党在组成政府问题上的决定是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这一决定并未说准备加入联合政府，但它意味着放弃在原则上拒绝政府。<sup>④</sup>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再次活跃。12月3日，考茨基撰文号召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创造与社会民主党统一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厄运在于充满了毫无结果的派别斗争。<sup>⑤</sup>12月4日，《自由报》发表题为《前进！》的文章，要求减少同社会民主党的争论。左派领袖累德堡和罗森菲尔德坚决反驳了这种观点。而且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等党领导当时也不愿放弃

---

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第235页。

②《社会主义左派与德国革命》，第407页。

③同上。

④参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第206页。

⑤同上，第206—207页。

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同时也不愿看到党再次发生分裂。相比之下，右派势力还比较弱小。这样在1922年1月召开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仍然坚持了以往的理论路线。

迪特曼在大会报告中主要批判了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他说，格尔利茨纲领破坏了刚开始形成的统一战线。同时，他也指责了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苏俄政府的政策，认为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sup>①</sup>罗森菲尔德警告不能很快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宣言》。《宣言》指出：由于社会民主党缺乏自信和革命意志，并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因而造成反动军国主义的兴起，使革命成果丧失，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瘫痪，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导致了反革命势力的加强。第三国际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组织分裂开来的政策和盲动政策也带来了同样的恶果。《宣言》认为，格尔利茨纲领表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策的基础进一步向右转。《宣言》再次阐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贯的中派观点：独立党与社会改良主义者不同，因为改良本身就是后者的目的，而独立党认为改良的价值在于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加强工人阶级。与盲动主义不同，独立党认为斗争方式必须符合不同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独立党既不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不会认为没有日常斗争也可以达到目的。<sup>②</sup>然而，这个《宣言》显然比以前更加注意渐进的日常斗争，而没有强调利用一切手段。大会最后选举克里斯平、迪特曼和累德堡为主席。

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对这次代表大会非常失望。会后，希法

---

<sup>①</sup>《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2年1月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75年德文影印版，第76页。

<sup>②</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资料集》第七卷，第二册，第6—8页。

亨和布赖特沙伊德立即开始抛弃大会的路线。按照希法亨的观点，党应该转向“清醒的理论”，这意味着放弃1919年的莱比锡纲领，拒绝将来使用革命的斗争方式。累德堡和罗森菲尔德则相信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时仍倾向左翼，他们不断重复革命口号，拒绝同资产阶级合作。1月1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发表《告党员书》，号召党员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扩大党的影响。1月底，国会在讨论税收问题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独立社会民主党向全体劳动人民呼吁：你们的生活利益正在受到巨大威胁。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协助下正力图把预算重负压在你们身上。呼吁书批判了政府不实行社会化，不解决生产问题。<sup>①</sup>2月10日，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通过决议反对政府。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在国会发言说，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五金工人罢工和税收问题上不信任政府。

党内右翼对反对政府的立场很不以为然。他们竭力从理论上论证联合政府的必要性。考茨基在2月25日《自由报》上发表了题为《联合政策》的文章。该文认为，在完全由资产阶级与完全由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国家之间的这段时期，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过渡时期的政策与此相适应，此时期的政府将以联合政府的形式组成。他宣称，联合政策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②</sup>希法亨、布赖特沙伊德、普拉格等人支持考茨基。但大多数党领导和党员此时并不赞同右派的观点。

3月份，右派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的矛盾开始尖锐，接纳“共产主义协会”是其主要起因。1921年3月暴动失败后，

---

<sup>①</sup>《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第211页。

<sup>②</sup>参见同上，第213页。

德国共产党中央把反对暴动的党领导和党员都开除出党。这些人有许多原来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如道伊米希、盖耶尔等人。他们于1921年11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协会”，一直试图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作。独立党左派也积极主张接纳他们，因为这可以表明独立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统一的核心。1922年2月22日，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同意接纳“共产主义协会”。3月24日，党中央发表《呼吁书》，宣布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主义协会即将统一。呼吁书说，这证明了共产党的策略是错误的，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则是正确的。呼吁书声明仍坚持以往的政治路线并坚信能够把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吸引到独立党内。<sup>①</sup>这一呼吁书使右派极为不满。3月28日，考茨基在《前进报》发表《致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的公开信》，抗议接收共产主义协会，声明与中央断绝关系。<sup>②</sup>克里斯平写文章批评考茨基的观点自相矛盾。有的报刊指出考茨基早已成了社会民主党右派。

2月初，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而政府借口公职人员不得罢工，使罢工没能扩大。议会就此展开激烈辩论。最后，总理维尔特要求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独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决定投不信任票。而在投票时，有13名独立党议员没有到会，破坏了党的纪律。党内左派对此非常愤怒，谴责他们企图“分裂党团”。

上述两件事使党内矛盾趋向激化。3月下旬，累德堡和克里斯平激烈抨击《自由报》赞成政府的立场，破坏党的独立立场。原总编希法亭等人辞职，由迪特曼接任。之后，《社会主义者》成了右派的主要喉舌。4月22日，普拉格在该刊物上写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应沿着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走，党应该不考虑组

---

<sup>①</sup>《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第214页。

<sup>②</sup>《从革命到稳定》，第485页。

领的分歧，争取同社会民主党统一。<sup>①</sup>考茨基仍然不遗余力地宣传和鼓动两党合并。有的右派说：工人运动分为积极和消极两部分，我们面临着对两者的抉择。社会民主党是积极的，而共产党是消极的，因此应放弃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寻求与它合作。<sup>②</sup>

1922年4月至6月间，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及多数领导人一直反对右派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企图，批判考茨基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然而，6月24日外交部长拉特瑙的被暗杀使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立场和策略发生了迅速转变。拉特瑙在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举行的热亚那经济会议期间曾与苏联签署了建立两国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拉巴洛条约，从而遭到德国右翼反动组织“康祖尔”的毒手。此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和自由职员总联合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议杀害威·拉特瑙的运动，在许多城市举行了“保卫共和国”的群众大会。6月27日，上述组织与德国共产党一起签署了《保卫共和国与工人基本权利》的柏林协定，要求政府和国会颁布一项保卫共和国的法律。鉴于形势的变化，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认为，为了坚决保卫共和国政府，为了在国内形成一支强大的民主派力量，保持对政府的社会主义影响，必须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紧密联合以至实现组织上的合并。7月14日，两党的国会党团进行了合并，8月29日举行了关于两党合并的正式谈判，9月6日公布了作为两党合并基础的行动纲领。纲领要求，将国家军队改造成可靠的保卫共和国的武装，实现广泛的民主化，反对等级司法，废除死刑，废除在一切公法私法中歧视妇女的规定，彻底、广泛地实行财政改革，开源节流，按照经济承受能力分摊负担。国家直接参与资本

---

①《过激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派主义》，第215页。

②同上，第216—217页。

主义企业的收益，对基础工业特别是矿山实行社会化，扩大社会立法，保护劳动力。扩大经济苏维埃制度，使之成为工人、职员、公务员社会经济利益的代表。在对外政策方面，两党要求继续与各国政府谈判，恢复外交关系，改善与各国人民的相互关系，从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出发，创造一个真正的国际和平环境。

接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分别于9月17—23日和9月20—23日召开了各自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两党合并问题。

在社会民主党的奥格斯堡代表大会上，维尔斯报告了两党之间就组织问题达成的协定。在现有组织章程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合并后，党内设主席三人，司库三人，书记六人，还有十名党报经纪人与主编。其中一名主席，一名司库，一名书记，四名经纪人将由原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合并后的监察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其中有七人是原社会民主党成员。大会批准了这个组织协定，选举了奥·维尔斯与海·米勒为主席的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批准了参加合并代表大会的146名代表并选出纲领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领导在代表大会上声称，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营垒。

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格腊代表大会上，以累德堡为首的七人代表小组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宣布独立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但他们的提案为大会多数所否决。大会以185票对9票通过了克里斯平提出的两党合并的议案。大会宣布在《行动纲领》和《组织协定》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合并，选出了135名参加合并大会的代表。9月24日，两党在纽伦堡正式合并，独立党最终回到它的母党之内。

### 第三章

## 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社会 民主党（1924—1928）

1924—192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严格地说，德国的相对稳定时期是以1923年底的币制改革为起点的。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德国发行一种新马克，使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受到抑制。1924年8月，德国国会通过“道威斯计划”，它确定德国可从美英等国那里得到贷款。第一批贷款为8亿金马克，其中美国占55%，英国占45%。此后，大量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1924—1929年间，涌入德国的外资至少有100—150亿马克长期投资和60亿马克短期投资。<sup>①</sup>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德国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25年，德国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8年相当于1913年的113%，再次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也相对得到改善。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提高，1924—1929年共增长了37%。<sup>②</sup>同时，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矛盾也得到缓和，政局日趋稳定。

这种形势为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力宣扬改良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通过海德堡代表大会和基

<sup>①</sup>《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373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尔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完善了改良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一套完整的、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针锋相对的改良主义战略模式。

1924—1928年6月，社会民主党一直未参加联合政府。它作为一个反对党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上，曾与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针锋相对，分庭抗礼，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始终把维护所谓“国家利益”和现存的民主制度当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资产阶级执政党的主要内外政策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因此，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称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为“忠实的反对党”。<sup>①</sup>

## 第一节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 组织章程和组织概况

### 一 1924年的柏林组织章程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1919年社会民主党魏玛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组织章程。魏玛组织章程基本上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原有的组织结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设置几乎原封未动，只是中下级组织的名称与设置有某些变更。魏玛组织章程奠定了魏玛时期社会民主党组织结构的基础。1924年柏林代表大会制定的组织章程，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

1924年柏林组织章程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

---

<sup>①</sup> 番尔斯特·海曼，托马斯·迈尔：《改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柏林一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153页。

关，党的所有重大问题都由代表大会来确定。党的代表大会负责选举党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并听取这两个委员会以及议会党团的活动报告；决定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地址；对地方党组织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提案作出决议。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1）各区党组织选出的党员代表，1924年柏林组织章程规定其总数不得超过300人；（2）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3）议会党团的部分代表以及代表大会的专题报告人。魏玛共和国以前，议会党团在党内享有特殊的地位，其成员全部是代表大会当然的代表。柏林组织章程规定，议会党团成员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1/5。这个新规定有利于防止议会党团控制和操纵党。但是，议会党团成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地方党组织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议会党团成员中大多数往往会被所属地方党组织推选为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柏林组织章程还规定，议会党团成员在代表大会上对有关议会活动问题只拥有发言权。

党的代表大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柏林组织章程对此增加了一条新规定：“如有重要原因，经党的委员会3/4多数同意，代表大会可推迟一年。”<sup>①</sup>1925年以后，代表大会两年举行一次成为惯例。代表大会在作出决定时，采取多数的原则，只有当半数以上有投票权的代表赞成某项决议时，该决议方能生效。此外，柏林组织章程还规定，党的执行委员会至少要在代表大会召开前8周，向全党公布大会的暂定议程。

根据柏林组织章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三个权力平行、相互制约的委员会组成：党的执行委员会、监察委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7页。

员会、党的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均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由各区党组织各选派一名代表组成。

“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是对全党进行领导”。<sup>①</sup>它的具体职责是，主持党的日常事务、管理党的资产、对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分歧进行裁决、监督党的机关报的原则立场，召集代表大会等等。1924年通过的组织章程增加了一项新规定，进一步加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它规定：“党的执行委员会随时可以对所有党的组织及其活动进行监督，可以要求开除某些党员。”<sup>②</sup>一些地方党组织曾反对赋予党的执行委员会这种权力，柏林代表大会上有人曾对此提出异议，但大会还是通过了这项新规定。

监察委员会是中央监督性机构，它的监督对象不是党的一般组织，而是党的执行委员会。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代表大会制定的组织章程曾明确指出：“为了尽可能防止执行委员会独断专行，党成立由11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sup>③</sup>“非常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曾一度取消了监察委员会这个专门机构，只是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设置了7名监察委员，但不久监察委员会又重新独立出来。1924年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为了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实行监督和审理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控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九名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sup>④</sup>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8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8页。

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卷，第47页。

④《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9页。

党的委员会同前两个中央机构不同，它不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各区党组织选派代表组成的。这个机构是1912年开姆尼茨代表大会设置的，目的在于使党的地方组织能直接参与党中央的日常重大决策。党的委员会的任务是，“与党的执行委员会共同商讨涉及全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讨论长期给社会民主党造成很大财政负担的党的中央机构的设置问题，以及确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指定专题报告人的问题”。<sup>①</sup>此外，如果党的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的某些成员提前离职，党的委员会可在听取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意见后，举行补选。党的委员会对所讨论的问题没有最后决定权，它只能以决议的形式对某个问题作出鉴定，供党的执行委员会参考。另外，党的委员会会议要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一般每季度举行一次，只有当1/3以上区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时，才可召开特别会议。因此，党的委员会在参与党中央日常决策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地方党组织进行了重大的调整。魏玛共和国以前，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党组织的基本结构是：邦党组织→社会民主协会→市镇协会。1924年柏林组织章程规定：“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根据政治和经济需要划定的社会民主区联合会构成党的组织的基础。区联合会分成若干地方协会，这些地方协会可通过区联合会组成若干附属区。为了进行组织工作和采取政治行动，地方协会又可分为若干鼓动小组。”<sup>②</sup>

同战前相比，地方党组织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名称上，而且也表现在实际内容上。其中最显著的变更是取消了邦一级的党组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9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517页。

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民主协会是按国会选区来划分的，并且它要通过专区联合会或邦党组织同党的执行委员会发生联系。但魏玛时期，“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社会民主区联合会不是完全按照国会选区来划分的，而是“党的执行委员会根据政治和经济需要制定的”。各社会民主区联合会与党的执行委员会直接发生组织联系，直接进行财务结算。1919年魏玛组织章程就取消了邦一级党组织，其目的在于加强党的中央机构对地方党组织的集中领导。但为了使同一邦内各区联合会能够就本邦重大问题进行合作，1919年的组织章程还规定：“在拥有若干区联合会的邦中，各区联合会可为解决本邦的政治问题而进行合作”。<sup>①</sup>

魏玛代表大会以后，某些邦的地方党组织根据这一原则建立了邦党组织中心，以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但党内很多人并不清楚这种邦党组织中心与战前邦党组织有何区别。为了澄清这个问题，1921年5月24日，党的委员会对巴伐利亚区邦党组织中心作出了如下鉴定：“邦党组织中心不是区联合会的上级机关，也不是区联合会与党的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中介机关，邦党组织中心与以前在组织方面按规定具有广泛权力的邦执行委员会的区别正在于此。”<sup>②</sup> 1924年柏林代表大会上，新组织章程的报告人重申了这一点。

1924年的柏林组织章程对社会民主党组织建设的突出贡献是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

1919年的魏玛组织章程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517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45页。

重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魏玛组织章程还进一步规定，每个党员都隶属于其居住地的主管党组织；一个党员不能同时成为两个下级组织的成员。<sup>①</sup>在此基础上，1924年的柏林组织章程增加了党员“等待期”的规定。柏林组织章程指出：“接纳党员首先由地方协会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有权提出异议。党的区领导机关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可依次对接纳问题作出否认的决定。如果在一年之内未提出异议，接纳便最终生效”。<sup>②</sup>因此，新党员的“等待期”为一年。在“等待期”内，党员不得在党内担任“信任性职务”。在“等待期”内，地方协会的党员大会便可作出清除某党员的决定，否则，只有区执行委员会才能作出开除某党员的决定。增加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确保党员的质量，使党能及时简便地将不合格分子开除出党。在柏林代表大会上，组织章程的报告人里宾奇解释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党，其成员要有在组织范围推行和促进党的政策原则的真诚愿望。因此，我们对临时性党员和最终性党员加以区分。那些不具备这种真诚愿望的党员应该在一年内通过一种比开除更简便的程序被清除出党。”<sup>③</sup>此外，柏林组织章程还为开除不合格党员规定了一种特别程序，它提出：如果一个党员参加其他政党、在经济上支持其他政党、为拥护其他政党或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不经组织程序，立即将该党员开除出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517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5页。

③《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41页。

党。

柏林组织章程增加了“党的职务”一节，要求党的干部以及党的议会代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柏林组织章程规定：区执行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候选人，乡、区、邦代表机构的候选人以及议会和国会议员的候选人都至少具有三年党龄。区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成员以及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也必须具备同样的条件。

为了加强对党在代议机构中代表的控制，柏林组织章程作了如下规定，只有经党组织的同意作为候选人提名的党员，才能在代议机构中代表党；各级议会选举的候选人提名，都要经附属区和区的领导机关认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权取消自己在相应的代表机构中的代表。

上述规定都是第一次写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因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魏玛组织章程和柏林组织章程都体现出不断加强集中化领导的趋向。这种趋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十分明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又得到加强。社会民主党强调集中化领导，一方面是为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念。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理想。魏玛共和国建立以后，各邦的独立倾向仍十分严重，分裂主义分子也时刻威胁着共和国的统一完整。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把维护共和国的统一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尔利茨纲领和海德堡纲领中都曾提出了维护共和国统一的要求。在柏林代表大会上，里宾奇专门说明党的集中化领导问题，他强调指出：“党的全部政策在于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德国，消除小邦割据状态。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党的魏玛代表大会决定加强党的集中化。魏玛宪法未能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各邦仍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因此各邦的党组织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去消除这种独立性。”<sup>①</sup>

1924年柏林组织章程使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得以确立，1925年海德堡代表大会又对党的组织章程进行少量修改，这些改动并不涉及社会民主党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根本问题。

## 二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状况

战争和革命造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高度政治动员，因此魏玛共和国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迅速壮大。1920年，党员人数突破了100万，总计为118万人。1922年9月，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使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上升为126万，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相对稳定时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的低谷时期。1924年，党员人数下降为94万人，1926年达到最低点，党员人数仅为80.6万人。1928年，党员人数恢复到1924年的水平，1930年，相对稳定时期结束后，党员人数才再次超过100万。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相对稳定时期的国会选举中，始终保持着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为了扩大自己在各阶层民众中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外围组织。这类组织有：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儿童热爱者协会、社会民主教师协会、社会民主教育工作全国委员会、工人福利总委员会。192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所有社会主义工人文化组织组合起来，成立社会主义文化联盟。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同拥有400万成员的全德工会联盟以及拥有60万成员的全德自由职员联盟保持着稳定的密切合作关系。除这些组织外，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在一些超党派的工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一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42页。



人组织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工人体操和运动联盟、自由思考者联合会、工人自行车运动联盟、工人运动员联盟、工人自愿护士联盟、“自然之友”等等。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认为，资产阶级化（或小资产阶级化）、官僚化和年龄老化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状况的基本特点。这种提法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发展的趋向。

相对稳定时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工人，非工人党员所占的比例很小。以不莱梅、汉堡和汉诺威为例，1905—1906年，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比例为93.2%，但1925—1926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下降为80.6%；同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比例却从6.4%上升为17.2%，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从0.4%上升为3.2%。<sup>①</sup>就整个社会民主党来说，1926年，知识分子、独立小生产者及自由职业者的比例已达17%。<sup>②</sup>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工人党员的比例不断下降，1930年下降为60%。<sup>③</sup>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下降，而在职员、公务员、知识分子等中间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较高的地方（如汉堡、不莱梅、普鲁士、萨克森等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党员成分的变化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各区书记、联邦议会和邦议会议员等职位，有1/3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所占据。很多受过高

---

①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436页。

②西格蒙德·诺伊曼：《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斯图加特1937年德文版，第33页。

③《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1926年）》，柏林—波恩1976年德文版，第23页。

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作为党的报刊的编辑，他们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增长，为改良主义思想在党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其次，在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内领取薪水的专职领导干部和职员日益增多，逐渐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这给党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党的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常务执行机关。1912年，莱比锡组织章程规定，党的执行委员会由2名主席、1名司库、2名协理员等组成，最多不会超过10人。而1924年柏林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由3名主席、2名出纳员、5名秘书和9名委员组成。党的领导机关的扩大并不是党员队伍扩大的自然结果，事实上1924年的党员人数还略低于1912年。

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出版机构中的专职干部与职员越来越多。1913年，党的新闻出版机构中的专职记者为267人，1924年上升为425人，而报纸的总发行量却从1,465,000份，下降为1,089,000份。<sup>①</sup>透过这个数字，不难看出社会民主党机构中的官僚化现象的一斑。这些领取薪水的干部和职员的生活状况比一般工人要优越得多。相对稳定时期，一个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年薪为3,120马克——5,289马克，新闻记者的年薪与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年薪相当，附属区书记略低一些。另外，党的干部一般还享受象“公费旅行”等特殊待遇。1926年，一般工人的年收入只有1,700马克，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年收入为2,000—2,200马克，大城市的技术工人年收入可超过3,000马克。<sup>②</sup>党的干部的收入显然高于工

---

① W. L. 格茨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75—1933年》，伦敦1981年英文版，第247页。

② 同上，第269页。

人的收入。此外，由于工人时刻受到失业的威胁，他们的生活状况极不稳定。由于生活境况迥异，这些党的干部和职员与一般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些干部和职员常常作为党的代表被选入各级代议机构，但在那里他们并不能忠实地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更多地倾向于中产阶级。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构成的第三个特点是年龄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中青年人的党，党员的绝大多数是中青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年龄构成逐渐发生变化。以汉堡区为例，1907年，20—40岁的党员占全部党员的62.3%，1928年—1930年，这个年龄组的党员比例下降为39.6%，同期60岁以上的党员比例从2%上升为9.6%。<sup>①</sup>党员的年龄老化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力，并加强了党的保守倾向。大多数30岁以上的党员都已完成职业教育，并且已有较稳定的职业，他们害怕大的政治动荡，热衷于用合法手段去逐步实现党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良主义的滋长。此外，女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也是社会民主党成分变化的一个表现。魏玛共和国建立以后，妇女获得选举权，成了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十分重视吸收女党员以及妇女运动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专门设置了一个“妇女处”，管理女党员和领导妇女运动。为了保证女党员在党内的平等地位，党的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要保证有妇女党员参加。1924年柏林组织章程规定，女党员人数为1万以上的各区，要额外选出一名妇女代表参加党的

---

<sup>①</sup>格茨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75—1933年》，伦敦，1981年英文版，第157页。

委员会。1925年海德堡代表大会对此作了修改，它规定，女党员人数在7,500人以上的各区，便可额外派一名代表参加党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还专门出版一份名叫《女党员》的杂志，1928年，其发行量达3万份。

因此，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别是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中女党员迅速增加，1922—1923年，党员总数约为126万人，女党员人数为13万，仅占10%。<sup>①</sup>1928年，党员总数不足100万，但女党员人数却上升为19万多，占全部党员人数的21%。<sup>②</sup>女党员在社会民主党各级议会选举和日常的宣传鼓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的海德堡纲领

### 一 海德堡纲领的制定过程

1922年9月24日，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在纽伦堡召开合并代表大会。纽伦堡代表大会通过了共同的行动纲领。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纲领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党纲。根据两党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代表大会任命卡尔·考茨基为纲领委员会主席。除考茨基外，纲领委员会由16人组成，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各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有：阿图尔·克里斯平、成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5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1928年）》，柏林—波恩1976年德文版，第146页。

康·狄特曼、鲁道夫·希法亭、托尼·森德尔、阿尔弗莱德·亨克、费利茨·塞格尔、施特洛布尔、克瓦尔德博士。社会民主党人有：埃德华·伯恩斯坦、阿道夫·布劳恩、马克斯·洛伊特利茨、赫尔曼·莫尔肯布尔、赫尔曼·米勒、马克斯·克瓦尔克、弗里德里希·施坦普弗尔、安东尼·普菲尔费。代表大会委托纲领委员会主席卡尔·考茨基首先拟定一个纲领草案，然后交纲领委员会集体讨论。

不久，考茨基按代表大会的要求完成了纲领草案初稿。这个草案继承了爱尔福特纲领的某些观点，如资本主义大工业取代小生产的必然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论等。纲领草案对金融资本进行了分析，考茨基把金融资本在政治上的统治称作“资本巨头的专政”。考茨基还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它只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得以进行的有利场所。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地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将得以展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将得以进行。”<sup>①</sup>

考茨基并不认为德国具备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纲领草案中考茨基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规定出一系列条件：工业高度集中，大企业垄断全部市场；无产阶级必须在道德上达到高级阶段，集体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发展；社会民主党必须赢得人口大多数的支持。考茨基还强调，社会主义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在充分的新闻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只有在国民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sup>②</sup>

纲领草案体现出考茨基“经典中派主义者”的独特风格，它力图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良主义的观点调和起来。结

---

①温克勒尔：《阶级运动还是人民党？》，德文版，第37页。

②同上。

果，纲领委员会成员中的“修正主义者”和左派都对纲领草案表示不满。“修正主义者”指责纲领草案只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来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具体任务，并且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描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左派则认为，纲领草案没有反映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只是简单地恢复了爱尔福特纲领。左派对纲领草案中关于社会主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地上才能得以实现的改良主义观点持否定态度。

考茨基完成草案初稿后，病重卧床达数月之久。1924年初，考茨基移居维也纳疗养。因此，纲领委员会一直未能开会讨论考茨基的纲领草案初稿。更重要的是，1923年德国的内政外交危机在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党内的“萨克森冲突”<sup>①</sup>也威胁着党的统一。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这种时刻对制定一个新的纲领是极端不适合的”。<sup>②</sup>由于以上原因，1924年柏林代表大会前，制定新纲领的工作仍进展缓慢。1924年，阿道夫·布劳恩在柏林代表大会上承认，纲领委员会没有完成代表大会的委托。柏林代表大会通过了莱比锡地方党组织的一个提案，要求纲领委员会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新的纲领，由代表大会讨论通过。<sup>③</sup>

1924—1925年，德国国内的形势日趋平稳，党内矛盾也得到了缓和，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纲领委员会集中精力于新纲领的制

---

<sup>①</sup>1923年底，萨克森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多数议员违反邦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参加包括德意志人民党在内的大联合政府。由此，萨克森邦议会党团多数派与萨克森党组织发生了冲突，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上被称作“萨克森冲突”。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95页。

<sup>③</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204页。

定工作。希法亭对考茨基的纲领草案初稿进行了修改。在海德堡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前进报》发表了修改后的纲领草案。根据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出版的关于新纲领的小册子指出：“新的海德堡纲领站在爱尔福特纲领和格尔利茨纲领的肩膀上。它将含有爱尔福特纲领的发展思想，它以格尔利茨纲领最重要的要求为基础”。<sup>①</sup>这的确反映了纲领草案的特色。纲领草案的“基本原则”部分转述了爱尔福特纲领中的一些理论观点，而“行动纲领”部分重申格尔利茨纲领的大部分要求。由于时间仓促，对新纲领草案的讨论未能在党内充分展开。

## 二 海德堡纲领的通过及其主要内容

1925年9月1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海德堡举行，共有398个代表出席大会。在海德堡大会开幕前，纲领委员会又增补了3个委员：保尔·坎波夫迈尔、罗伯特·施米特、保尔·列维。希法亭代表纲领委员会作了关于纲领的专题报告。代表大会对纲领草案只进行了短时间的辩论，共有9个代表发言。代表大会通过了两项修正提案。在对纲领草案进行表决时，有6个投反对票，代表大会最终接受了这个纲领。

同格尔利茨纲领一样，海德堡纲领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原则”，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论观点；第二部分是“行动纲领”，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要求和政策。同代表大会前的两个草案相比，正式纲领改动甚微。

与格尔利茨纲领不同，海德堡纲领没有完全回避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考茨基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它的纲领》一文中认为，

---

<sup>①</sup>德国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65页。

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中，资本主义大企业取代小企业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则需要一定的修正。考茨基这种观点被写进了海德堡纲领。海德堡纲领指出：资本主义大企业“在工业、商业和交通中，越来越排挤小企业并使其社会意义日益减少。”<sup>①</sup>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问题，海德堡纲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预见是错误的。希法亭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说明，爱尔福特纲领的基本原则部分关于农业发展的断言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爱尔福特纲领谈到了农民阶层的衰落。我们知道，人们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没有看到这种衰落，相反却看到了农民所有制的加强。”<sup>②</sup>

海德堡纲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修正”。马克思主义曾强调，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必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状况。海德堡代表大会前最初的纲领草案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降低各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趋势不断发挥作用，但同时又指出：“劳动阶级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阻止自己地位的不断下降。”<sup>③</sup>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斗争”不是指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而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改良的斗争。正式通过的海德堡纲领进一步指出：劳动阶级不仅可以通过“不断的斗争”防止处境的恶化，甚至还可以使处境得到改善。因为，“经过几代人作出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25页。

<sup>②</sup>同上，第277页。

<sup>③</sup>温克勒尔：《阶级运动还是人民党？》德文版，第41页。



重大牺牲的工作而大大加强的工人运动”已成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sup>①</sup>以后，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政治工资”的概念，就是这种思想脉络的发展。

海德堡纲领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作了简单的分析，纲领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欲望导致了一些工业部门以及互相衔接的生产程序的联合，并使经济组织化为卡特尔和托拉斯。这个过程把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联合成金融资本。”<sup>②</sup>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但它只限于一般性的事实描述，却没有涉及这种趋势所造成的结果。希法亭在海德堡大会上对此补充说：“随着集中趋势的发展，垄断趋势在增长。这最终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以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是自由竞争的话，那么它现在越来越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而被消灭了；资本的组织化趋势越来越成功地排挤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sup>③</sup>同时，海德堡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显然，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资本主义垄断趋势的不断发展就会消灭经济危机。因此，海德堡纲领对资本主义垄断化趋势的分析蕴含着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垄断化趋势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

海德堡纲领还论及了“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它指出：“金融资本随着自己影响的增长，运用国家权力来统治国外地区，把这些地区作为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资本主义投资场所。

---

<sup>①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5—6页。

<sup>③</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78页。

这种帝国主义的权力追逐不断以冲突和战争的危險威胁着社会。”<sup>①</sup>在这段分析中，海德堡纲领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但它并不包含列宁赋予这个术语的丰富内容。帝国主义只被看作是造成“冲突和战争危險”的因素。这反映了考茨基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经济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sup>②</sup>因此，考茨基反对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海德堡代表大会以后，考茨基曾表示，他无力对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因为“摆在这里的问题是这么复杂，以致人们无法用几句话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只能是胡言乱语”。<sup>③</sup>1927年，考茨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进一步确认：“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已经极深刻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它对于最多样的，甚至最绝望的局面的适应能力，没有任何经济理论上的论据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生命力”。<sup>④</sup>

如果说格尔利茨纲领只是回避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问题，那么海德堡纲领则力图用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这种新的理论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海德堡纲领没有再重复格尔利茨纲领中的“人民党”的提法，却声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必然而然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在海德堡代表大会前，党内有人对纲领草案放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一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6页。

②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见《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7页。

③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67页。

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53页。

弃“人民党”的提法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放弃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政策，其后果是十分危险的。<sup>①</sup>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事实上，海德堡纲领虽然未使用“人民党”这个用语，却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党”的思想。海德堡纲领提出了“中间阶层”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按照希法亭的解释，“中间阶层”指的是“脑力劳动工人”或者叫“职员阶层”。海德堡纲领指出：“随着大企业在经济上的突进，各种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作用日益增长。他们在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中行使领导、管理、组织和分配的职能，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改进了生产方法，随着他们数量的增长，他们越来越丧失了上升到特权地位的机会，他们的利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其余工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不仅无产者，而且中间阶层也不能完全享受生产力的增长所造成的物质和文化的进步”。<sup>②</sup>同格尔利茨纲领时期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此时仍然把“中间阶层”看作是社会民主党要获得议会多数而必须争取的力量。因此，希法亭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指出：民主越来越意味着去“争取那些中间阶层”。<sup>③</sup>但是海德堡纲领强调“中间阶层”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民主党扩大“政治民主”的需要，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由于这个阶层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承担着组织和管理的职能，因此它将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不可缺少的力量。希法亭在海德堡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需要这些阶层，因为正是从这些阶层中我们得到了发展经济民主所必需的

---

①温克勒尔：《阶级运动还是人民党？》德文版，第42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一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6页。

③同上，第276页。

帮助”。<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说，海德堡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党”的思想。

同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一样，海德堡纲领体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一贯倡导的所谓“阶级斗争政策”。海德堡纲领指出：“无产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sup>②</sup>这种表述同格尔利茨纲领把“阶级斗争”淡化为“道德的要求”的提法确有不同。但社会民主党人在海德堡纲领中所说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指的是议会斗争。为了防止人们把它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等量齐观，希法亭解释说：“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和尖锐显然不意味着可以这样说，阶级矛盾越来越必须以暴力的形式来加以解决。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它一方面为阶级矛盾的充分展开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使阶级矛盾可以按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得到解决。因此，阶级矛盾的尖锐绝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日益需要使用暴力和通过暴力行为来进行”。<sup>③</sup>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在“民主国家”中议会斗争是最恰当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表现为选票和议席的多寡；阶级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议会民主的方法得到解决。可见，海德堡纲领中的“阶级斗争”概念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改良主义内容。

从这种改良主义的民主观出发，社会民主党人否认魏玛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普选权的实现和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了真正的“政治民主”。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77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6页。

<sup>③</sup>同上，第283页。

在魏玛共和国的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丧失垄断权，他们对社会的统治只表现在经济领域。因此，海德堡纲领只强调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而不提它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纲领指出：“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工具为相对少数的资本家所垄断，他们借以保持着对社会的经济统治。”“个别资本家集团就这样成为经济的强大统治者，他们不仅使雇佣工人，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对他们经济上的依附。”<sup>①</sup>这种把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地位和其政治统治地位截然分割开来的观点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的观实，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海德堡纲领重申了格尔利茨纲领对民主共和国采取的立场。海德堡纲领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也不能充分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组织。他们把民主共和国当作这样一种国家形式，捍卫和发展这种国家形式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是绝对必要的。”<sup>②</sup>在海德堡代表大会对纲领草案进行辩论时，党内左派保尔·列维对这种改良主义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敌对的立场，列维指出：“正象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强调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尖锐对立，不是要拒绝民主，相反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中才能实现。”<sup>③</sup>由于左派在党内的影响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5—6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6页。

<sup>③</sup>同上，第286页。

很小，他们的观点无法在党的纲领中得到反映。

与格尔利茨纲领只字不提“社会化”的作法不同，海德堡纲领谈到“社会化”问题。在上面那段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论述中，海德堡纲领接着指出：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sup>①</sup>海德堡纲领把“夺取政权”作为实现“社会化”的前提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心目中“夺取政权”即是通过改良的方式在民主共和国内获得议会多数。这种改良主义战略与“社会化”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为了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1925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正酝酿着用“经济民主”的改革战略来取代“社会化”的目标。因此，海德堡纲领只是把“社会化”当作一种装饰品。

海德堡纲领的“行动纲领”部分重复了格尔利茨纲领的绝大部分要求。海德堡纲领还特别强调了“行政民主化”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要民主还是立法民主，民主就是不完善的，行政民主化，也就是自治，是不可缺少的补充”。<sup>②</sup>这种认识无疑充实和丰富了社会民主党“政治民主”思想的内容。此外，在对外政策方面，海德堡纲领除发展了格尔利茨纲领提出的改良的和平主义方案外，还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的任务。在社会政策方面，海德堡纲领提出建立“与普通司法权相分离的独立工人法庭”等要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同改良主义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是海德堡纲领的主要特色。造成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6页。

<sup>②</sup>同上，第276页。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海德堡纲领制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考茨基和希法亭是正统的中派主义者，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不尽相同，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结论。希法亭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宣称：“爱尔福特纲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性分析不仅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并且从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sup>①</sup>此外，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合并加强了党内左派的力量。海德堡代表大会前，左派曾对纲领草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不能不对纲领的内容产生一定影响。第三，战后革命危机年代，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阻止社会改革，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使工人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普遍产生怀疑。为了同共产党人争夺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必须把工人群众所熟悉的革命口号和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同改良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提高改良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因此，尽管海德堡纲领看起来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然而，实际上海德堡纲领不是对格尔利茨纲领改良主义倾向的纠正，而是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改良主义理论。在海德堡纲领中，社会民主党人对改良主义理论的探讨已超出了“政治民主”的范畴，开始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经济民主”思想纳入改良主义理论体系。海德堡纲领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78页。

### 第三节 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和改良主义体系的形成

#### 一 基尔农业纲领

1927年5月22日——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基尔召开代表大会，共有415名代表出席。基尔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农业纲领，并通过决议接受了希法亭在代表大会专题报告中所阐述的改良主义思想。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业地区和农民中的影响一直很小。因此，明确自己对农民问题的立场，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民主党一直缺少一个完整的农业纲领。1924年，党内展开了关于农业纲领问题的争论。1925年社会民主党海德堡代表大会就农业纲领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由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党的农业纲领。

海德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关于农业纲领的讨论更加热烈。1927年1月，农业纲领委员会公布了农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具有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它甚至没有明确提出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税收等问题。党内舆论对这个草案评价甚低。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区党代表大会拒绝接受这个草案，并通过了一个“关于农业纲领的方针”。基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农业纲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基尔农业纲领较全面地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农民问题的立场。纲领分为6个部分：土地改革、促进农业生产、规划农产品销售、税收、为农业和林业工人提出的要求以及农民的社会政策。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如何推动农民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行列，是工人阶级政党制定农业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农业问题看作是生产技术和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供应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农业理论家巴德在基尔代表大会上声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一个广大工业无产阶级都市群众的党，是一个广大都市消费群众的党。……从这种观点出发，农业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是都市群众的食物供应问题”，“首先是肚子问题”。<sup>①</sup>因此，基尔农业纲领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销售的问题。

基尔农业纲领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与马克思迥然不同的判断。基尔农业纲领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业和工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肥沃土地天然的有限性，单位面积上无限提高农业产量的不可能性说明，同工业截然相反，农业中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是可以并存的”，<sup>②</sup>也就是说，大生产取代小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种观点出发，基尔农业纲领把“确保中小农民企业足够的生存条件”看作是社会民主党农业政策的一项原则。

上述改良主义思想在纲领的具体要求中得到了体现。

基尔农业纲领要求实行“有计划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变更土地所有关系。一方面，消灭日益衰落的贵族所有制和现存的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确保中小农业企业的生存。土地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7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119页。

<sup>②</sup>同上，第273页。

改革的具体措施是比较温和的，农业纲领要求将大土地占有者超过750公顷的那部分地产和超过100公顷的那部分森林产业无偿地转归公有；通过在法律上确认出售权来扩大联邦、邦和地方土地所有制。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制。

为了促进现代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基尔农业纲领要求，扩大和改善农村的文化和教育设施。在税收方面，纲领要求，按照土地的纯收益来征收土地价值税。基尔农业纲领为农业和林业工人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工资、限制劳动时间、保证星期日休假以及结社和迁徙自由。

基尔农业纲领中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思想。纲领要求，扩大民主的农业自治机构，“企业委员会法也应在农业中切实贯彻”。<sup>①</sup>

最后，纲领号召农民为民主而斗争，并且阐明了工人与农民利益的一致性，纲领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民主而斗争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乡村自治，消灭地主财产所有制，把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国家转变为工人和农民的福利国家和文化国家。通过提高工业工人的生活水平，确保他们不致因疾病和年老而贫困化，可以使小农极端穷困的状况得到改善。提高工业工人的购买力，可以增加对农业企业重要产品的要求，可以保证这些产品的销路和更好的收益。”纲领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想使农民群众失掉土地，也不想剥夺他们的财产，而是要保证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场所。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的是大土地占有者的贵族土地占有制，而不反对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劳动所有制。它要消灭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剥削，并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7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77—280页。

自觉地有计划地使巨大的社会力量为提高城乡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服务”。<sup>①</sup>

从总体上看，基尔农业纲领是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在农业政策问题上的应用，但它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二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政治民主”

在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作了一个题为“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希法亭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

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希法亭1877年生于维也纳。1902年，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后同麦克斯·阿德勒一起在维也纳创办《马克思研究》丛刊。1906年，希法亭来到德国，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杂志和《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在政治立场上，他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1917年4月，他同考茨基、哈阿兹等人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2年，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希法亭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首领之一。此后，他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并多次作为财政部长入阁，推行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经济政策。1924年，希法亭创办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社会》杂志，他利用这个刊物在党内大力宣扬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因此，希法亭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形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7年）》，柏林一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81—287页。

成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早在1910年，希法亭就发表了《金融资本》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希法亭研究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现象”。他认为，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有三个标志：第一，由于小企业不断被大企业所吞并，由于大企业之间力图通过协议来消除竞争而形成卡特尔化，资本主义生产形成了垄断化的局面。第二，银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由于银行掌握大量资金并受少数股份所有者的委托，因而对企业获得了一种监督权和决定性的影响。大银行在许多企业中充当这种角色，这使得它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推行计划和协议制度，以避免激烈竞争造成损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相互渗透形成了金融资本。希法亭把金融资本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sup>①</sup>第三，国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化和组织化加强了它对国家的影响。因此，国家越来越成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基本上只充当市场的担保人，而国家在目前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却以直接干预的形式来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描绘了资本主义垄断化趋势的发展前景。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卡特尔化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所谓“总卡特尔”，即由一个单独的庞大的卡特尔联合会全面计划和领导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对卡特尔化来说，绝对的限界是没有的，……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总卡特尔。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由一个主管机构有意识地加以调整，这个机构决定一切

---

<sup>①</sup>《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0页。

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sup>①</sup>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因此列宁评价说：“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分析。”<sup>②</sup>后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无疑吸收了希法亭的部分观点。《金融资本》已包含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即经济的有组织性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还未正式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

1915年，希法亭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至少在两篇文章中使用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用语。第一篇是1915年5月发表于《斗争》杂志上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的政策》一文。在此文中，希法亭把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称为“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sup>③</sup>同年10月，希法亭在《斗争》杂志上又发表《这是阶级的合作吗？》一文。在文章中，希法亭更详尽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希法亭指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革命化的趋势”，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他认为，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缩短了经济发展中的萧条期，减缓了周期性的失业。在最发达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后备军。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统治的形成以及国家权力的加强抑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

---

①《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94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

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15页。

态，这包含了将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转变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萌芽。希法亭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象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出现崩溃，他指出：“取代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是一种以专制而非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经济的主宰者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巨头和国家结合而成的权力。……比以往更好地适应群众直接的物质需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阻止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sup>①</sup>

可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形成。魏玛共和国建立以后，希法亭用超阶级国家观去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使“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得到完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民主国家”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工人阶级可以用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性和组织性是与社会社会主义十分相似的组织形式，两者的发展和逐步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

20年代中期以后，希法亭利用《社会》杂志这个阵地，大力宣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使它逐步为全党所接受。

1927年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作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希法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在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再次强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以经济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来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纯粹由盲目的市场规律所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

---

<sup>①</sup>《希法亭文选（1904—1940）》，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66页。

化，也就是从各种力量的自由竞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sup>①</sup>

希法亭还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化趋势有4个特征：第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合成化学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这使生产不再完全依赖于天然原料。第二，新兴工业一建立就具有极高的组织程度。第三，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也日益组织起来的趋势得到了加强。第四，“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说明：“企业的领导不再是企业主私人的事情，而成为了一种社会事业”，<sup>②</sup>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越来越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相一致了。强调这一点对于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魏玛共和国以前，希法亭主要强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化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会消除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然而，这一结论与“社会主义”这个奋斗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崩溃是遥遥无期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将失去现实的可能性。“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要成为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就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说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性与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它的发展恰恰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希法亭指出：“因此，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由此可见，向我们这一代提出的问题不是别的，只可能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过去曾为争取政治权利，争取开始和扩大社会政策而进行了斗争，那末社会主义问题是通过

---

①《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1页。

②同上，第221—224页。

经济发展本身提出来的。”<sup>①</sup>

希法亭进一步说明，随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有计划的、自觉地管理的经济在更大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自觉影响，也就是说受到社会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影响，即国家的影响。”从这种认识出发，希法亭指出：“这无非是意味着向我们这一代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依靠国家的帮助，依靠社会的自觉调整的帮助，把这个由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成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经济。”<sup>②</sup>

利用现存国家的帮助去实现社会主义，是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它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过高地估价了通过“民主国家”对经济干预实现经济计划化的可能性，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能力。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民主党内许多人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始终是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

地方党组织提交给基尔代表大会的一些提案，对社会民主党领袖推行的议会民主的改良主义政策提出了批评，这些提案强调指出，魏玛共和国条件下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

希法亭在报告中针对这种观点，阐述了“政治民主”的问题。首先，希法亭指出：民主恰恰是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产阶级

---

<sup>①</sup>《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5—226页。

<sup>②</sup>《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5页。



的工具，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民主一直是无产阶级的事业”。他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另外一种形成国家意志的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民主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以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资产阶级民主这个用语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分析的观点看，都是错误的”。<sup>①</sup>希法亭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国家意志的形成无异于个人政治意志的组合”。统治者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否则它们的统治就会垮台。因此，争取议会多数是社会民主党发展“政治民主”的主要目标。

希法亭进一步指出：“形式上的民主”的提法也是错误的。这种提法把国家政策和政策的社会效果截然区分开，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政治现实中，这种区分却是完全错误的”。“政治民主”不仅不是形式上的，“她对于每个工人的命运都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sup>②</sup>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希法亭在报告中提出了所谓“政治价格”、“政治工资”的概念。他指出：“必须使群众明白，面包价格和肉类价格不仅是个经济价格，而是一个政治价格，它是由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必须使每个工人牢记：每周工资是一种政治工资，在周末如何确定工资，这取决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的力量，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议会外的社会力量对比。尤其是必须对工人的妻子们说：当你们去选举的时候，你们同时决定着面包和肉类以及工资的水平。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然是一种新的东西，这是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因素。”<sup>③</sup>

①《希法亭文选（1904—1940）》，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222页。

②《希法亭文选1904—1940年》，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223—224页。

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7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政治民主”和民主共和国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最完善的民主形式是民主共和国的形式”。<sup>①</sup>因此，保卫民主共和国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思想。他撇开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谈，把共和主义和君主主义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主要矛盾。这样，保卫民主共和国的生存就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至高无上的目标。为此，希法亭对社会民主党同共和资产阶级政党为保卫共和国而建立的组织——“共和旗帜联盟”大加赞扬，他指出：“我们希望，‘共和旗帜联盟’能够以这种民主共和意识去实现这一誓言，即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为保卫共和国和民主，付出多么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sup>②</sup>希法亭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君主主义相提并论，都视为民主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希法亭说“如果德国在民主的革命胜利之前出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疑这对我们德国人以至于整个东欧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sup>③</sup>

希法亭在报告中还阐述了“经济民主”的问题。希法亭认为，普选权的实现、“政治民主”的获得，打破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特权，但“工人面临着这样一种矛盾：政治上的占有特权已经消失，但经济上的占有特权仍然存在”。<sup>④</sup>因此，工人阶级在扩大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希法亭进一步指出：“工会运动的主要原则不再仅仅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影响国家，而且要为争取企业民主和经济民主而斗争。经济民主是使私人的经济利益服从于社会利

---

①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68页。

②《希法亭文选1904—1940年》，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223页。

③同上，第224页。

④《希法亭文选1904—1940年》，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222页。

益；企业民主是根据个人的能力为每个人提供领导企业的可能性”。<sup>①</sup>在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只是说明了“经济民主”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原则，未对“经济民主”思想进行更详尽的阐述。这一任务是由1928年全德工会联盟汉堡代表大会完成的。

在改良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希法亭还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希法亭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扩大“政治民主”，建立“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党应该更广泛地参加各级政府，以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基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由希法亭本人起草的决议，全面地接受了希法亭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思想。大会决议将这些思想概括为：扩大政治民主，建立经济民主，工人运动内部容忍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获取和保持社会民主党在乡镇、邦和联邦各层次上的权力职位，适时参加政府。<sup>②</sup>

基尔代表大会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思想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 三 “经济民主”思想

“经济民主”是作为“社会化”的替代物而产生的。魏玛共和国初期，社会民主党曾把“社会化”看作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方式，当时虽然已出现“经济民主”这个用语，但它只是“社会化”的陪衬，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地位。在革命危机年代，

---

<sup>①</sup>《希法亭文选1904—1940年》，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221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7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65页。

社会民主党为了同资产阶级政党保持合作，不得不一再推迟，以致最终放弃了“社会化”的目标。这使工人群众大失所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下降。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都力图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以填补由于放弃“社会化”而出现的理论空白。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民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工会领袖也不得不承认：“经济民主作为社会化的替代物是一种低层次安慰”。<sup>①</sup>

“经济民主”思想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共同创造的。1925年，全德工会联盟布列斯劳代表大会就讨论了制定“经济民主”纲领的问题。工会联盟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拟定纲领草案。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希法亭等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1927年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全面地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这对“经济民主”纲领的制定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28年9月全德工会联盟在汉堡举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纲领委员会提交的“经济民主的方针”。汉堡大会以后，工会联盟又委托弗利茨·纳弗塔利撰写一部宣传“经济民主”思想的小册子，题为《经济民主：本质、道路和目的》。这本小册子全面阐发了“经济民主”的思想。

首先，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论家认为，“民主国家”建立以后，政治生活已实行了民主化，但经济生活仍然是“专制的”。少数有产者阶级由于拥有财产特权和教育特权，因而在“民主国家”中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使大多数人还不能充分运用“政治民主”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必要补充。工人阶级只有在扩大和完善“政治民主”的同

---

<sup>①</sup>《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与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法兰克福—美茵1978年德文版，第一卷，第856页。

时，建立和发展“经济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见，“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不会有完善的经济民主，没有民主的经济领导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能实现”。<sup>①</sup>

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论家看来，“经济民主”的提出，是以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为前提的。

“经济民主”理论家埃里克·诺尔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民主思路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历史位置被确定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自由竞争原则越来越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规划和有组织的市场控制原则的时期。”<sup>②</sup>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互渗透，提供了实行“经济民主”计划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论家总结了魏玛共和国前期工人运动的经验，认为，以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改革战略是有局限性的。新的“经济民主”的改革战略是以“国家帮助”为核心的。

“经济民主”思想包含着四方面内容：第一、经济民主化主要通过建立自治经济团体公共企业、消费合作社、工会自有企业来实现。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专制抗衡的力量，在专制经济的海洋中建立起民主典范的小岛”<sup>③</sup>。第二、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关的民主化。主要通过工会的共同参与来实现。第三、劳动条件的民主化。主要通过扩大劳动权和企业民主来实现。“企业民主”在“经济民主”理论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涉及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只要求在企业范围内，使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得到参与企业领导的机会。第四、教育事

<sup>①</sup>《团结与人的尊严：德国工会运动史》，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186页。

<sup>②</sup>《团结与人的尊严：德国工会运动史》，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94页。

<sup>③</sup>《德国工人运动学习与研究手册》，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二卷，第412页。

业的民主化。“经济民主”思想特别强调，建立民主化的、对工人开放的教育事业。因为工人只有提高了文化水平，才有能力行使共同参与权。

1928年汉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民主的方针”提出了以下一些具体要求：扩大集体的劳动权和社会劳动保护权、扩大自我管理社会保险、扩大职工在企业中的共同参与权、工人在所有经济政策团体中要有平等的代表权、在工会的充分参与下对垄断集团和卡特尔进行监督、工业的联合组织要成为自治性团体、扩大公共的经济企业、通过合作社的组合和专业教育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工会自有企业、促进消费合作社、打破教育垄断。<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论家高度评价“经济民主”的战略意义，他们认为，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一般经济斗争不同，“经济民主”是一种战略性的任务，它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革”。随着“经济民主”的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经济民主不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是社会主义化的预备阶段和开路先锋”。<sup>②</sup>随着这种“中间地带”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将转变成社会主义。

历史上任何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都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经济民主”思想却完全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问题，而主张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通过国家帮助，经济机构的民主化以及扩大公共企业和合作企业等措施，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用“经济

---

①《德国工人运动学习和研究手册》，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419页。

②《在国家责任与阶级利益之间》，波恩1981年德文版，第115页。

“民主”取代“社会化”实质上是用改良的进化取代革命的变革。<sup>1</sup>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理论家十分强调，这种改良方式的渐进性，汉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民主的方针”指出：“经济制度的改造不体现为长远的未来目标，而体现为日常的逐步前进的发展过程。”<sup>①</sup> 弗利茨·纳弗塔利在《关于经济民主的争论》一文中也指出：“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可以用飞跃的形式完成，期待着通过危机和政治革命引起突变，这种观念是幼稚的，它同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很相似。”<sup>②</sup>

“经济民主”思想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政治民主观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经济民主”思想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改造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道路，它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第四节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政策

##### 一 “联盟政策”与1925年总统选举

“联盟政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来推行改良主义的一种策略形式。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政策”的直接理论依据是考茨基的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学习和研究手册》，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二卷，第418页。

<sup>②</sup>《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与魏玛共和国（1927—1933）》，法兰克福—美茵1978年德文版，第1卷，第298页。

所谓“阶级平衡”论。考茨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欧洲革命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哪个阶级要想单独执掌政权都必须诉诸国内战争。然而，国内战争既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只是策略问题。<sup>①</sup>考茨基甚至认为：“在纯粹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和纯粹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政府的一般形式是联合政府。”<sup>②</sup>

1919年2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共产党未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未获得议会多数。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拥护魏玛共和国的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联合组阁，建立了所谓“魏玛联盟”。这是社会民主党“联盟政策”的开端。

在战后革命危机年代，社会民主党共参加了六届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始终把保卫民主共和国的生存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为此，它在联合政府中一再向资产阶级政党妥协让步，不惜牺牲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结果，不仅社会民主党许诺的社会改革未能实现，并且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1924年，两次国会选举结果表明，敌视共和国的右翼政党的力量得到加强。

1924年6月，在柏林代表大会上，党内左派送交大会一项提案，对社会民主党在战后革命危机年代所推行的无原则的“联盟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案指出：“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

---

<sup>①</sup>霍尔斯特·海曼、托马斯·迈尔：《改良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柏林—波恩1982年德文版，第146页。

<sup>②</sup>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08页。



实行的政策——与资产阶级中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民主的集团联盟的政策，既不能消除内政外交方面的危险，也不能使工人阶级保全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所需要的权力”。左派建议，“党代表大会要求党和党的机关，在议会中，在报刊上，在实际政策以及宣传鼓动中，要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种思想出发”。<sup>①</sup>柏林代表大会未接受这项提案，而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认为，在多党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君主复辟势力日益猖獗，不断向民主势力发动进攻。1924年，君主主义分子制造了对现任总统艾伯特的审判案，控告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其它领袖在1918年1月曾参加过柏林五金工人罢工，因而犯有叛国罪。1925年2月28日，艾伯特因病逝世，这场审判才不了了之。

由于艾伯特病逝，七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必须提前举行。无论反动派，还是进步势力都十分重视总统职位的得失。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主党组成了人民联盟，三党各推举一名候选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普鲁士邦的内阁总理奥托·布劳恩。布劳恩在普鲁士邦曾长期与中央党和民主党合作，因而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有一定影响。代表右翼反动势力的民族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纳粹党组成了帝国联盟。德国共产党则单独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

1925年3月，第一轮选举结果揭晓，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一半以上选票。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举行第二轮选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210页。

②同上，第204页。

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又一次推行得心应手的“联盟政策”，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而是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一起推举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为共同总统候选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威尔斯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解释说：“为第二轮选举提出共同候选人，这事关支持和发展共和国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共和国的真正敌手——隐蔽的或公开的君主主义分子——是否会得到我们的朋友艾伯特曾担任过的职位。”<sup>①</sup>此外，社会民主党还企图通过支持中央党的候选人来换取中央党在普鲁士州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以保持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州联合政府中的地位。

1925年4月26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民主势力的候选人马克斯获得1370万张选票，而右翼势力的候选人兴登堡则以1460万张选票当选为总统。

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左派批评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在总统选举中的策略立场，他们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共和国的目标通过现存的共和国得到了实现，它们无论如何不肯继续前进。对于我们来说，现存的共和国并不是共和国的终点和理想典范。我们必须不断地强调我们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这种鲜明的对立。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共和国。”<sup>②</sup>但是，左派的意见再次被代表大会所拒绝。

海德堡代表大会以后，社会民主党内关于“联盟政策”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1927年基尔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左派在一项提案中分析指出：相对稳定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推行的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106页。

<sup>②</sup>同上，第227页。

政策使阶级矛盾尖锐化。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而在共和国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

“鉴于这种情况，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只能是反对党，而不是联合政府”。<sup>①</sup> 基尔代表大会没有采纳左派的意见，而通过了一项由希法亭起草的决议，它声称：“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要求社会民主党必须在联邦、各邦以及乡镇各层次上赢得和保持尽可能多的权力职位……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联邦政府完全取决于社会民主党在人民和国会中的力量能否确保它达到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参加政府时的具体环境提出的目标或消除反动派的威胁。关于参加政府的决定只是个策略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用一劳永逸的公式来加以确定。”<sup>②</sup>

这一决议是相对稳定时期以来，党内关于“联盟政策”的总结。这个决议的通过，使党内主张推行“联盟政策”的改良主义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为社会民主党重新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提供了合法依据。在这一决议精神的指导下，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执政，建立了米勒联合政府。

“联盟政策”是社会民主党全部改良主义策略的基础，社会民主党在各个领域中的改良主义实践都是以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为前提的。

## 二 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

经济领域中的实践是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实践的重要方面。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7年）》，柏林—波恩1974年德文版，第227页。

<sup>②</sup>同上，第265页。

相对稳定时期，在“经济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领域中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影响，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使劳动群众生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1924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德国大资产阶级逐渐恢复了元气。他们开始向无产阶级发动反攻，力图通过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恢复德国的经济。1924年，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组织德意志工业联合会公开宣称：“过去的主要祸害就是公式化的八小时工作日。雇主联合会的斗争矛头一开始就是专门指向八小时工作日的。”<sup>①</sup> 相对稳定时期，资本家开始全面地废除八小时工作日。1926年，一半以上在业人员的每周劳动时间超过48小时，有1/4超过54小时。

1925年1月，第一届路德内阁建立，参加这届内阁的政党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从内阁的政党构成不难看出这届内阁的反动性质。路德内阁上台后，宣布实行税收改革。不久，政府公布了若干有关税收的法律草案，如所得税法、财产税法、遗产税法等等。这些法律草案的具体内容说明，路德政府企图通过这次税收改革，把垄断资产阶级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广大劳动群众。

社会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各项法律草案进行了抨击，并与自由工会一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税收改革要求：“第一，根本上减轻给广大群众造成负担的间接税，特别是要减轻营业税。第二，改善所得税法，通过降低收入免税限额，最广泛地减少低收入的纳税义务人的纳税额。第三，对所有纳税义务人进行公平和真实的税额评定和收税。……第四，对大资产和遗产课以更重

---

<sup>①</sup>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40页。

的税收。”<sup>①</sup>无疑，社会民主党在税收政策问题上的反对派立场是很鲜明的。但必须指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是取消任何间接税，而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只要求减少间接税。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所得税法是税收法案的核心。因此，社会民主党对国家所得税收入情况作了专门统计，结果表明，除营业税收入外，工资税收入是国家最多最可靠的收入来源。社会民主党坚决要求，在工资税方面固定地减免一定税额，而不是按百分比减免。另外，工资免税起算额要从每月60马克提高到每月100马克。

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与路德政府的意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路德政府主张减少20亿马克财产税，但却反对减少7亿马克工资税。经过斗争，社会民主党取得局部胜利，工资免税起算额从每月60马克提高到80马克，1925年12月，又提高到每月100马克。此外，还通过了一个所谓“布鲁宁法”，这项法律规定，如果一个财政年度中工资税的总收入超过了政府预期要达到的120亿马克标准，政府还应该继续减少工资税。根据这项“布鲁宁法”，1927年，工资免税起算额提高到每月140马克。社会民主党对这种结局并不满意，因为改革后，工资税仍占全部所得税收入的70%—80%。他们谴责这项新的法律并没有消除不公正。就所得税法案整体而言，社会民主党的胜利更是有限的。社会民主党的提案要求对25,000马克以上收入征收50%的所得税。但最终通过的法案规定的最高税收率仅为40%，而且对34,000马克以上的收入才适用。

---

<sup>①</sup>《在国家责任与阶级利益之间》，波恩1981年德文版，第135页。

在讨论有关消费品税收的法案时，社会民主党从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观点出发，同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社会民主党认为，在降低财产税的同时提高消费品税是不公正的，并且广大群众购买力下降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社会民主党在消费品税收方面的提案几乎完全被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拒绝了。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倡议下，啤酒税、烟草税提高25%—30%，食糖和食盐税也有所提高。

总之，在税收改革中，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资产阶级内阁虽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这些微小让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税收改革的性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承认，1925年的税收改革是“大资产阶级的税收改革”。<sup>①</sup>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价值增值问题、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等方面，基本上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他们一方面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同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竭力把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全部纳入议会民主的轨道。党内左派多次要求通过议会外的斗争方式来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但这种要求总是遭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拒绝。

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在经济领域中的实践表明，魏玛共和国绝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民主国家”，而只能是垄断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工具。无论社会民主党在野还是参加政府，都不能改变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民主党通过“民主国家”对有组织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企图只能是一种幻想。

---

<sup>①</sup> 《在国家责任与阶级利益之间》，载恩1981年德文版，第145页。

### 三 社会民主党与剥夺诸侯运动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右翼政党在国会中的力量不断增长。在右翼政党的庇护下，被十一月革命推翻的封建贵族蠢蠢欲动，伺机进行反攻倒算。早在战后革命危机年代，在十一月革命中被剥夺的封建诸侯就向各邦政府要求，在政府的税收中支付给他们一笔数额可观的生活费。相对稳定时期后，旧诸侯进一步要求国家赔偿他们在十一月革命中被没收的财产。1925年底，诸侯要求发还的地产总数约达50万公顷，要求赔偿的耕地、森林、宫殿、艺术品和货币收入的总价值为26亿马克。诸侯的无理要求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义愤，一场震撼整个德国的无偿剥夺诸侯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1925年11月，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分别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有关诸侯财产要求的法案。德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拒绝诸侯的财产要求，通过法律无偿地剥夺诸侯。德国共产党在国会宣布，如果共产党的提案遭到拒绝，他们将诉诸公民表决。德意志民主党的提案力图在诸侯的要求与共产党的要求之间寻找一个妥协的方案，它要求通过法律给予被剥夺的诸侯一定赔偿。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问题的立场一开始就是很矛盾的。作为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坚决主张通过法律剥夺被十一月革命推翻的霍亨索伦家族，但从一贯恪守的“议会主义”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只希望通过国会各政党之间的协商和妥协来解决此问题，不愿意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25年12月2日，国会就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的法案进行辩论，谢德曼代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言，他一方面坚定地回绝了诸侯的无理要求，指出了这种要求在政治上、道德上、法律上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呼吁资产阶级政党采取妥协的立场，以避免引起大规模的

公民表决运动。

由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中央党的坚决抵制，国会辩论没有产生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事实表明，只采用议会斗争的形式无法达到无偿剥夺诸侯的目的。

1925年12月4日，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了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它建议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盟、全德自由职员联盟等组织共同发起无偿剥夺诸侯的公民表决运动。针对中央党提出的“把属于皇帝的还给皇帝”的主张，共产党提出“不给诸侯一分钱”的口号。<sup>①</sup>共产党的口号得到了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响应。1926年1月6日，成立了一个超党派的“无偿剥夺诸侯的公民表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著名科学家罗伯特·库钦斯基教授，因此这个委员会又被称为“库钦斯基委员会”。到1926年1月18日为止，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社会主义同盟、国际工人互助会、德意志人权同盟、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德国支部等25个党派与组织。但是最大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一直未表示参加无偿剥夺诸侯的公民表决运动，这使民主统一战线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强烈要求下，1月19日，社会民主党中央召开会议，商讨当时的政治形势。会议决定，改变迄今为止的立场，宣布赞成无偿剥夺诸侯的主张，并参加公民表决运动。会议的决议，还对德国共产党的无偿剥夺诸侯的法律草案提出了两点补充意见。

1月22日—23日，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库钦斯基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就共同推动公民表决运动达成了一致的见解，并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与资料》，柏林1975年德文版，第8卷，第285页。



且以德国共产党提交给国会的法律草案和社会民主党的补充意见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新的法律草案。它规定：“无偿地剥夺直到1918年国家变更时为止仍在德意志的一个邦进行统治的诸侯、诸侯王室、王室成员的家庭和其家庭成员的全部财产，以改善全民福利”。法律草案还指出：被剥夺的财产要用于改善失业者、战争伤残者、战争丧生者的家属、靠领取少量养老金和社会救济为生的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农业工人、小租佃者和小农的生活状况。<sup>①</sup>这个法律草案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充分反映了民主势力的要求。

通过这个联席会议的召开和新法律草案的制定，形成了一个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月26日，两党就公民表决运动中的合作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是相对稳定时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合作，但由于在基本理论与策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合作是很有限的。德国共产党曾建议，建立两党的“统一委员会”共同领导这场运动，但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项建议，坚持各党派组织要完全独立地进行活动。<sup>②</sup>同时，社会民主党还与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谈判，希望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月16日，政府正式宣布于3月4日—17日，在全国举行是否对无偿剥夺诸侯的法律草案进行公民表决的民意测验。在民意测验中，如有10%有选举权的公民签字，就可以对该法案进行公民表决。在民意测验的前一天，《前进报》发表了执行委员会致全党号召，它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这场运动参加者中最大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与资料》，柏林1975年德文版，第8卷，第306页。

<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1926）》，柏林—波恩1976年德文版，第7页。

的组织，要承担这场战斗中最重的担子，并一定要为赢得胜利，作出决定性的贡献”。<sup>①</sup>党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民意测验的签字，并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动员群众参加签字。在民主统一阵线共同努力下，共有1,200万人在民意测验中赞成对法律草案进行公民表决，这个数字超过了法定人数的两倍。

5月6日，国会再次审理无偿剥夺诸侯的法律草案。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民主党的部分议员赞成接受此项法案，而构成国会多数的资产阶级政党又一次拒绝了这项法律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表决势在必行。为阻止公民表决取得胜利，路德政府宣布无偿剥夺诸侯的法律草案为变更宪法。其实魏玛宪法并无与此项法律草案相抵触的条款。法律规定，必须有一半以上有选举权的公民赞成一项变更宪法的法律，这项法律才能生效。

为了取得公民表决的胜利，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宣传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整个公民表决运动中，社会民主党为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共支出了两千多万马克，组织公众集会达32,920次。<sup>②</sup>6月17日，《前进报》刊登了全德工会联盟执行委员会向德意志全体工人发出的呼吁，它揭露了反动派企图用威胁和恐吓等手段破坏公民表决的卑劣行径，并要求城市和工业区的工人在公民表决那一天尽早行使完自己的民主权利，然后到乡村去监督那里的投票活动。“呼吁”最后指出：“谁不参加公民投票，谁不投赞成票，就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就背叛了德意志全体工人的利益。”<sup>③</sup>

但是，6月20日举行的公民表决的结果，赞成票未达到法定

---

①《德国工人阶级为剥夺诸侯而斗争》，柏林1957年德文版，第82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1926年）》，柏林—波恩1976年德文版，第20页。

③《德国工人阶级为剥夺诸侯而斗争》，柏林1957年德文版，第96页。

数日，无偿剥夺诸侯的法律草案未得到通过。

这场社会民主运动失败后，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立场上，力图在议会中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10月份，在普鲁士，布劳恩政府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协商，产生了一个妥协方案，借此普鲁士旧贵族得到了巨额赔偿。

#### 四 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

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与它的“联盟政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社会民主党自己也承认，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首先是出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需要。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改良主义国家观的支配下，社会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抛弃了传统的“阶级政策”，而把所谓“民族利益”和“国家责任”视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社会民主党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首先是恢复和保证德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因此，无论执政期间还是在野期间，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合作比其它领域更为密切。

此外，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还具有浓厚的反苏色彩。这与它的改良主义议会民主思想是直接相关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极端憎恨西方战胜国，但他们认为，英法等西方国家与德国同属民主阵营，不会对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形成根本性的威胁，而苏维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是魏玛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民主党人就开始倡导改良的和平主义政策。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国际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这种形势为社会民主党改良的和平主义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25年，社会民主党海德堡纲领详尽地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它主张通过仲裁法庭、国际裁军、国际联盟民主

化、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建立欧洲联邦等措施，来实现国际和平。<sup>①</sup>显然，这种改良的和平主义计划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鲁尔危机以后，德国资产阶级认识到，同西方战胜国采取对抗的立场不能改变德国的处境，反而会招致革命危机。因此，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德国统治阶级改变策略，采取一种和解的姿态，力图在战胜国的帮助下，重新振兴德国经济。这种和解的姿态为德国对外政策披上了“和平”的外衣。社会民主党认为，这种对外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因此，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民主党在对外政策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资产阶级执政党采取密切合作的立场。在社会民主党的配合下，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国会获得多数政党的支持，甚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

1924年4月，研究赔款问题的专家委员会提出“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外国贷款的帮助稳定德国经济，从而提高德国偿还赔款的能力。“道威斯计划”作为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一个方案，对稳定国际局势，缓和资本主义各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控制和掠夺德国的计划，特别是“道威斯计划”规定，以对糖、烟草、啤酒、纺织等消费品征收的高额间接税作为赔款的重要来源，这实际上是把大部分赔款负担转嫁给德国人民。

社会民主党未能从阶级立场出发全面地看待“道威斯计划”的后果，便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道威斯计划”，并高度评价它为“通向和平的道路”。1924年，柏林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宣称：“道威斯计划”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的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5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0页。

开始”，意味着“确保和维护德国的统一”。社会民主党人还认为：“当社会民主党第一个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要求接受这项专家鉴定时，它采取了一个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sup>①</sup>在国会讨论“道威斯计划”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仅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一起赞同接受“道威斯计划”，并且力图说服主张民族复仇主义的民族人民党改变立场。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对外政策中另一个重大问题，是1925年的洛加诺公约问题。1925年1月，德国政府向英国提出一份莱茵地区保证条约的草案，草案要求：英法德比等国严格遵守莱茵地区的领土现状，签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仲裁条约；承认“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地区非军事化的条款。通过签定这个条约，德国政府力图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使法国军队按时从莱茵北部地区撤兵；第二，加入国际联盟，恢复德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

社会民主党一向肯定国际联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作用，并始终认为，德法和解是实现欧洲和平的保证。因此，德国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颇有“和平”味道的对外政策得到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1925年10月，洛加诺公约在伦敦草签。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对洛加诺公约进行辩论时，评价它是在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的一步。<sup>②</sup>

为了使资产阶级内阁的对外政策得到贯彻，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在群众中宣传洛加诺公约的意义，另一方面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克服来自右翼政党的阻力。一贯主张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柏林—波恩1973年德文版，第156页。

<sup>②</sup>海因茨·尼曼：《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柏林1982年德文版，第178页。

民族人民党，从民族复仇主义观点出发，极力反对逻加诺公约。10月，逻加诺公约在伦敦草签后，民族人民党退出了内阁。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出于策略的考虑曾作出了一项决定：如果民族人民党在国会表决时投票反对批准逻加诺公约，社会民主党也投反对票，造成国会解体，以举行新国会选举。这种策略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8月份强行通过的工业和农业关税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义愤。在这种形势下，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必将加强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引起了内阁中资产阶级政党的恐慌，它们立即与社会民主党进行秘密接触，要求社会民主党放弃这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再次向资产阶级政党作出了妥协，表示它将同资产阶级执政党一起赞同批准逻加诺公约。双方还商定，内阁要向英法要求把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批准逻加诺公约的条件。在社会民主党的配合下，逻加诺公约最终得到了德国国会的批准。

逻加诺公约并不是“和平的胜利”，而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逻加诺公约的签定和德国加入国联，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复仇和侵略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恰恰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完成的。

## 第四章

# 法西斯危险增长时期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1929—1933）

1929年，一场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爆发，结束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时期。德国的经济状况由高度繁荣突然坠入了严重的危机。1928年重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米勒联合政府执政不到两年，就在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被迫辞职，以中央党人布吕宁为首的总统负责制政府上台。希特勒法西斯政党借助国内几乎濒于崩溃的经济局势，打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赢得了几百万名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小资产者、破产农民和中间阶层的支持，在1930年9月议会大选中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法西斯势力的迅速膨胀严重威胁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布吕宁政府实行容忍政策，其目的是阻止议会民主制的解体，避免法西斯专政的前景在德国出现。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不顾本党选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向大资产阶级一再作出让步，忍受了布吕宁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所作出的最不得人心的措施，致使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以奉行法制、理性和人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民主党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容忍政策是有限度的，承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党应采取议会外斗争直至武装起义的非常措施，但是实际上，当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摧毁，民主共和国即将毁于法西斯势力之手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中央却把希望寄托在宪法和选举之上。他们害怕

暴力和流血，不愿将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措施付诸实施，从而错过了武装抗击法西斯主义专政的最后机会。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在一段时期内德国共产党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刺激，社会民主党中央和议会党团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对于德国共产党在策略转变时期提出的一些友好建议，社会民主党中央也一概予以回绝。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导曾提出过与共产党联合抗击法西斯的明智的建议。一些下层组织的党员和选民不顾社会民主党中央的禁令，与德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选民进行了共同反抗法西斯的活动。但是，这些建议和活动并未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股主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加剧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政党被法西斯政权取缔，社会民主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 第一节 面临危机和灾变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

### 一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德国的困境

1928年，德国似乎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在1924年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源源流入德国。1924—1929年，德国共获得外国贷款和投资326亿马克，暂时摆脱了资金奇缺的困境，稳定了币值，使几近崩溃的德国国民经济得到复苏。德国的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前景充满希望。借助这股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时隔八年之后又一次敲开了通向政府



的大门。1928年5月的德国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得票900多万张，比1924年增长了2.8%，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席位153个（原为131个），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组成了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大联合政府。192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实力再次达到高峰。它的组织包括1万多个地方支部，90多万名党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近500万名自由工会会员。社会民主党雄心勃勃，力图在“经济繁荣”的局势帮助下重新施展它的治国方针。

1928年8月27日，在签署了关于摒弃战争的凯洛格条约之后，政府转而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930年1月20日，英、法、日、意、比和德国政府代表在海牙达成了关于“杨格计划”的协议。杨格计划规定了德国赔款总额，延长了赔款时间，废除了道威斯计划对德国财政和经济的管制，规定协约国军队应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日期提前5年全部撤离莱茵区。1928年底，社会党团就批准建造A级铁甲巡洋舰预算问题举行辩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与党在政府中的部长们发生了冲突。议会党团在广大党员的支持下，决定履行党在竞选中的口号“与其建造铁甲巡洋舰，不如给孩子们饭吃”，反对批准预算。最后，在党和党团的强大压力下，慑于党的纪律，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如此，议会仍然通过了预算。社会民主党团与其部长的冲突几乎酿成党的危机，米勒政府在艰难中稳住了局势。然而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彻底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根基。

1929年底，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价格暴跌为发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美各国，结束了战后相对稳定时期。这次经济危机对负有大量外债的德国的打击尤为严重。1932年，当危机达到顶

点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比1929年下降了36.2%。德国下降了40.6%，仅次于美国（美国为46.2%），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德国的一些大康采恩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被迫改组或破产，宣告破产的中小企业达几十万家。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的全部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德国的对外贸易也一落千丈。1929—1935年，出口总额减少了69.1%，进口总额减少了70.8%。危机造成了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民大量出卖土地。1932年，拍卖土地事件达6,931起。大批小农破产，佃农人数迅速增加，德国的整个农业生产减少了30%。这次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25年，德国退到了1896年的水平。<sup>①</sup>

危机引起了严重的失业，工资减少，税收增加。1929年德国失业人数达200多万，1932年增加到600万，最多时高达800多万，失业人数占德国劳动人民总数的43.8%，就业人数只占33.6%，半失业者占22.6%。在失业队伍中，不少是来自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成员，破产的手工业者就达几十万，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艺工作者的失业人数达10多万，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职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减少。一个熟练工人的平均计时工资从1928年的1.05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84.8芬尼，一个产业工人的周平均工资由1929年的40马克20芬尼减少到1932年6月的22马克10芬尼。1931年德国工人的工资数目比官方统计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还要低58%。危机期间，德国的工资和薪金约减少了50%。1929—1930年，德国政府新增税收款额达125,400万马克，后来又增加了危机税、人头税、烟草税、独身税、零售税和就业税等五花八门的税收，沉重的赋税压得群众抬不起头来。在

---

<sup>①</sup>以上数字均摘自朱忠武等编：《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72页。

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通货膨胀之后，群众刚刚萌发的一点希望破灭了。

经济危机给德国米勒政府带来的头号难题是如何应付严重的财政困难，如何弥补国库亏空。本来米勒政府的前任给它留下的就是高额预算赤字。危机爆发后，外国资本市场不再对德国开放，短期形式的外国资本信贷大量流失，国内资本纷纷外逃，德国工业周转资金紧缩，国库黄金储备减少了4/5。米勒政府试图以借新债来抵亏空，但在严重的经济局势下，借款也很快化为乌有。

1930年春，一场以失业保险金问题为契机的争论导致了米勒大联合政府垮台。1930年3月27日，议会党团在讨论如何平衡国库亏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社会支出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代表工业界和雇主利益的德意志人民党主张通过减少失业救济金来实现收支平衡。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要求提高失业保险金。中央党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被德意志人民党所接受，而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同一天，最后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政府——米勒内阁辞职，魏玛共和国进入了衰亡时期。

## 二 社会民主党对危机的立场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念是建立在民主共和国基础之上的。毫无保留地捍卫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原则之一。早在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社会民主党就提出要为保卫业已获得的自由而贡献自己的一切，要把对民主的一切进攻视作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践踏而给予坚决的回击。1927年基尔党代表大会上，黑森邦总理卡尔·乌尔里希用一段精辟的话概括了社会民主党坚决支持民主共和国的原因：“我们必须告诉群众，我们决心誓死捍卫民主共和国，因为我们认为，它同君主制相比，是实

现我们的社会政治要求和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更有作为的战场”。<sup>①</sup>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种国家形式中通过经济民主的道路，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保卫共和国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参加政府，提高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执行改良主义政策，阻止反民主的力量接近权力中心；二是通过选举获得绝对多数。实现这两个目标有助于保持和扩大社会民主党在全德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维持实行议会制度的魏玛共和国的生存与发展。

基于以上原则，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面前，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力量保持共和国的平衡，这就出现了所谓“临床医师”和“遗产继承人”的说法之争。弗里茨·塔诺在1931年6月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阐述这一观点的著名讲话。塔诺说：“我们现在究竟是不仅作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诊断者，而且还要作治愈其病体的医生呢，还是要象个急不可耐的继承人那样，等不及末日的到来，宁愿用毒药来帮点什么忙呢？”<sup>②</sup>“有一些人认为，脱离这种困境，要靠我们的病人恢复健康，因此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治愈病人。而另一些人认为，现在病人已经喘息了，给它致命的一击才是正确的”。<sup>③</sup>塔诺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选择。从党的最终目标讲，

---

<sup>①</sup>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6—1983)》，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sup>②</sup>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德国工人运动史》，柏林狄茨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554页。

<sup>③</sup>同上书，第555页。

党应当充当资本主义遗产继承人的角色，即在资本主义废墟之上建造起社会主义的大厦。但是从目前具体的严峻的局势看，社会民主党似乎又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临床医师这个角色。社会民主党最后选择了后者。塔诺解释说：“我们同情的根本不是这个病人，而是它后面的群众。当病人喘息时，外面的群众在挨饿。当我们知道这些，并且知道药方时，我们并不相信这副药方能够治愈病人，但是至少可以减轻喘息，这样外面的群众又可以得到食物。”<sup>①</sup>这种解释只是说明了一个原因，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的共和国政府虽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资本大地主专政，但它毕竟实行的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度。在面临一个要破坏议会民主、用专制主义取代民主共和主义的危险——法西斯主义时，社会民主党宁愿选择目前的共和国政府。这就是后来被概括成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它是资本主义临床医生观点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如雪崩之势吸引了大量群众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要治愈资本主义的疾病，战胜法西斯主义，必须从拯救德国的经济入手。社会民主党在讨论克服危机的经济措施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1930年6月28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战胜经济危机方针的文章。文章指出，降低工人、职员和低级公职人员的工资不仅不能振兴经济，反而会加剧危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建造新的街道，扩大邮局和电讯设施，更新铁路设备，修建铁路和公路，以此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为实行这条措施，可为100万失业工人提供工作机会。但同时又要求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

---

<sup>①</sup>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德国工人运动史》，柏林狄茨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535页。

护，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日法和工人保护法，限制延长工作时间。这条被社会民主党称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全德工会的经济专家沃伊廷斯基、塔诺和博德拟订的。它遭到了党内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的反对。希法亭认为这项措施实际上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无处筹集大批资金来应付这样庞大的建设开支。<sup>①</sup>6月20日《前进报》文章还建议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克服由于经济危机而出现的财政困难。首先要降低军事开支，节省政府开支，减少高养老金和高薪阶层的薪水，规定退休金和待聘官吏薪饷的限度。文章认为，如果上述措施还不能完全满足预算的要求，就必须增加新的收入，主要是提高高工资阶层的收入所得税。总之，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是节约和合理分配必不可免的开支。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遭到来自右翼——法西斯政党极右势力和左翼——德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在议会形成决议。

如何对待危机中的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即米勒执政时期（1928年5月至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尽一切努力维护党在政权中的地位，因此全力支持政府。执政（无论是单独执政还是联合执政）是社会民主党梦寐以求的目标。希法亭曾经说过：“为了赢得国家政权的斗争使得尽最大可能参加和维护党在市镇和国家一级政权中的地位变得很有必要。只有通过积极的管理工作才能使共和国化和民主化成为可能。”<sup>②</sup>

第二阶段是从米勒政府下台、布吕宁政府继任到1930年9月议会大选。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反对党的态度。最突出的

<sup>①</sup>安德列斯·多帕伦：《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引自《现代史集刊》1983年第31卷第1分册，斯图加特版，第85页。

<sup>②</sup>沃尔夫冈·吕特哈特：《社会民主运动与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78年版，第1卷，第25页。

行动是1930年7月当布吕宁企图使他的关于平衡财政收支的法案作为紧急法令生效时，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紧急法令被取消，布吕宁解散了国民议会。

第三阶段从1930年9月到1932年5月。这一时期是魏玛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阶段，也是法西斯集团从一个小小的在野党一跃成为凌驾于德国之上的一股政治势力的发展时期。社会民主党鉴于法西斯的威胁，对布吕宁政府采取了容忍政策。

第四阶段是从1932年5月至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开始出任德国总理。这是魏玛共和国崩溃的最后关头。1932年5月底，兴登堡总统要求布吕宁辞职，由右翼中央党巴本接任。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放弃容忍政策。尽管社会民主党重新采取了反对党的态度，但此时它已无力挽救共和国。1933年1月底，魏玛共和国经过四年的挣扎之后终于走到了它的末日。

社会民主党对待共和国政府的态度变化与它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它和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它所确定的战略策略原则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这些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 三 党的分裂—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

早在1922年社会民主党与一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之后，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一个左派集团。1927年10月1日，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半月刊杂志《阶级斗争》问世，主编是库特·罗森费尔德、马克斯·塞德维茨和亨利希·施特勒贝尔。左派的纲领基本上是按照1926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林茨纲领内容制定的。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左派在坚持议会道路、支持民主共和国等观点上与党内多数派没有重大分歧。不同的是：第一，左派指出不停顿的阶级对立是自1918年以

来德国政治状况的一个特点。第二，左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一种斗争手段。第三，左派拒绝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策。第四，左派承认必要时使用议会外的斗争手段来对付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爆发、共和国动摇、纳粹兴起之后，左派与多数派在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容忍政策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最后导致了左派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另行组党。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社会民主党左派不同意多数关于目前危机将很快过去的说法。他们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性高度增强，但是，资本力量的互相对立和混乱状况却越来越加剧。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并不是一般的经济不景气，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将在世界范围内长期持续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sup>①</sup>这种危机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治愈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应该改变自己的路线，实行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政策。

关于法西斯主义。左派认为，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策的失败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同意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关于法西斯主义性质的观点。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资产阶级统治力量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镇压武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资本统治的两种形式。“当危机中资产阶级不再能用民主的手段达到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目标，如布吕宁做的那样，那么资产阶级就要使用法西斯的手段来反对民主和工人阶级，在‘恐怖的条件’下克

---

<sup>①</sup>引自伦格斯特夫：《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汉诺威1978年版，第24页。



服危机。”<sup>①</sup>从这种观点出发，社会民主党左派提出，不仅仅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希特勒，要反对站在它背后的垄断资本巨头，而且也要反对布吕宁，因为布吕宁是用另一种方式贯彻与法西斯主义相同的政策。

布吕宁上台后不久，社会民主党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进一步进攻，曾对布吕宁政府采取了容忍政策。社会民主党左派对这种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政策只能怂恿布吕宁提出进一步的反社会措施，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危机更为加剧。随后，人民将对民主和议会失去信任。布吕宁为了维持表面的民主，最终将拿工人阶级的力量去冒险。<sup>②</sup>左派主张，社会民主党应该让右翼政党包括纳粹去组织政府，把承担危机的责任推给右翼政府，自己充当失业者和受危机损害的所有阶层的代言人，同右派政府进行斗争。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一旦右翼政府无力克服危机，全国人民就会识破他们的宣传，右派政府就会不攻自破，自行垮台。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不妥协的反对态度将向人民表明，对于政府克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措施，社会民主党是没有责任的。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将吸引大批失业者和小资产阶级，防止他们投向纳粹。左派的这种观点遭到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强烈反对。多数派认为，左派的政策风险太大，因为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后，谁也无法阻止他发动内战，到那时，任何政治力量在法西斯运动面前都将会束手无策。

左派指出，在目前的这种力量对比中，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只

---

<sup>①</sup>引自伦格斯托夫：《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汉诺威1978年版，第77页。

<sup>②</sup>转引自伦格斯托夫：《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汉诺威1978年版，第79页。

限于维持现状，限于执行容忍较小祸害的政策，限于修补脆弱的民主形式，提不出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使人们从这种绝望的形势中看不到一点出路。总之，毫无作为，听天由命。在这里，左派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弱点。

左派主张，推翻布吕宁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议会外斗争上；与德国共产党联合成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的进攻。

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许多观点与德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非常接近。比如关于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德国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统治的两种形式。1931年5月，德国共产党政治局作出的一份决议中说：“法西斯主义决不是执行财政资本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面，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组织上的过渡。”<sup>①</sup> 1931年12月，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篇文章中说，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和纳粹相互交替使用来维持它的统治。1932年1月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又指出：“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不仅是具有同样阶级实质的两种形式，而且在表面方法上也很接近。”<sup>②</sup> 再如对容忍政策的批评。德国共产党认为布吕宁政府是贯彻法西斯专政性质的政府，极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对这个政府的姑息和迁就，主张推翻布吕宁。此外，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都强调把战略重点放在议会外群众斗争上。但是，在带有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国共产党是有原则区别的。左派坚持将民主共和国灌输以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为走向无阶级社会的一个步骤。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多数取得国家政权，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迈进。但

---

<sup>①</sup>引自弗勒希勒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9年版，第487页。

<sup>②</sup>引自弗勒希勒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9年版，第487页。

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议会外斗争的可能性。德国共产党则主张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完全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苏维埃取而代之。前者是要在旧的基础上向新国家过渡，后者则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设新国家；前者要求面临法西斯专政的危险时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不包括布吕宁这样的政府）；后者则是要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连同这个共和国的对手一齐埋葬。正是这些原则分歧妨碍了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左派进行联合。

1931年6月，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党内多数派的冲突在党的莱比锡代表会上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大会是社会民主党直至1945年希特勒政权崩溃为止在国内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两派就议会党团对布吕宁政府建造第二艘装甲巡洋舰计划的立场发生争论。1928年米勒政府执政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曾投票反对拨款建造第一艘装甲巡洋舰。但是当1931年3月议会讨论拨款建造第二艘装甲巡洋舰时，社会民主党出于对布吕宁政府命运的担心，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这等于是默认拨款议案被通过。9名左派议员不顾党团纪律，与德国共产党一道投票反对拨款。在莱比锡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主张对不执行党团决议的议员给予制裁，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左派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最后，9名议员中的6名议员宣布退出社会民主党。同年10月，在马克斯·塞德维茨、库特·罗森费尔德、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领导下，左派另行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有88名代表和125名被邀请的客人出席了党的成立大会。<sup>①</sup>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响很小，因为它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这两个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夹缝中求生存”，它没有能力去影响更多

---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第300页。

的群众，这一点在选举中表现得很明显。在1932年11月6日议会大选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获得的席位与其他小党派加起来才12个，在584个议席中仅占0.48%。<sup>①</sup>

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在那个动乱时刻的内部分歧。193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对9名议员进行党纪制裁的决议案是以324票对62票通过的。事实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现行政策的实际人数要比这个表决数字所显示的多得多。但一部分持反对意见的党员认为，目前党面临着日益强大的法西斯的威胁。在这种时刻，党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一个统一的整体比个体分散的力量要强大得多。所以，出于对党的忠诚，许多反对党的政策的人仍然决定留在社会民主党内。

##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与德国 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 一 1929年以前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工人运动分裂成几股势力：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改良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伯尔尼国际及维也纳国际。1923年5月，后两个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世界工人运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德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重要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领袖党。两党在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问题上存在

---

<sup>①</sup>(意大利)米兰·詹贾科莫：《1918—1933年的德国共产党》，米兰1961年版第208页。

巨大的分歧。作为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的支部，德国共产党的行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而苏共对于共产国际的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实际上也影响到它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在1929年以前，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1918年底到1921年初，两党关系呈紧张对峙状态。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斯巴达克派在1918年底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德国工人运动分裂，对立的两翼正式形成。围绕着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的分歧加剧。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的政策致使德国共产党创始人、领导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反革命势力所杀害。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德共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强烈愤怒，从此积下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怨恨。在1920年3月右翼军人企图推翻民主共和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卡普暴动中，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劝阻工人不要参加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举行的反对右派的总罢工，“无产阶级不会为了民主共和国而动一个指头”。<sup>①</sup>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指导下，德国共产党在1921年3月举行了针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三月行动”。社会民主党政府镇压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三月行动惨遭失败，两党之间的鸿沟加深。

第二阶段，1921年初到1923年。两党试图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开始缓和。中欧革命的失败促使共产国际政变了“世界革命”战略方针。1921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五个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始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各国共产党与各社会民主党及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结成统一战

---

<sup>①</sup>(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耳：《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注①。

线，尽力通过和平的日常斗争为工人争得日常利益，以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1921年到1923年，德国面临着急于在国内复辟帝制的右翼势力的挑衅和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双重危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这种危机威胁下走到了一起。德国共产党在恩斯特·迈耶尔领导下，试图与社会民主党对话、联系。

1921年10月，德国共产党提出在四点纲领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全德自由工会建立统一战线。这四点纲领是：没收旧皇室财产；工人苏维埃掌握工厂；将战争赔款转嫁给资产阶级承担；解散右翼资产阶级的非法武装组织。这几条纲领与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要求接近，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1922年6月24日，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之一、德国外交部长、民主党人拉特瑙被极右民族主义分子暗杀。这是保皇势力对共和国的又一次挑衅。6月27日，德国所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和全德自由职员联合会）在柏林达成协议，同意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要求清除一切来自军队、警察和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解散一切反共和国的武装，并发布了联合声明。

1923年1月，法、比军队入侵鲁尔，德国古诺政府实行“消极抵抗”政策，这一政策加剧了社会矛盾。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联合在议会对古诺政府施加压力。在议会外两党控制的工人苏维埃发动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最后迫使古诺政府辞职。1923年10月，萨克森和图林根两邦的社会民主党人政府先后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内阁，组成了“工人政府”。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分裂以来两个对立的工人政党在邦政府中联合执政的第一次尝试。统一战线达到了高潮。

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克服鲁尔危机的政策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结束消极抵抗运动，同协

约国就赔款达成协议。德国共产党则希望德国同协约国彻底决裂，变消极抵抗为德法对抗；社会民主党只承认合法的议会行动，德国共产党主张武装暴动。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德国共产党准备了详尽的武装起义计划，并于1923年10月组织了汉堡起义。社会民主党因此而疏远了德国共产党。汉堡起义只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萨克森、图林根的工人政府解散，短暂的统一战线解体。

第三个阶段，1924—1925年，两党关系恶化。鉴于1923年德、保、波三国革命的相继失败，共产国际开始重新考虑策略问题。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主席团讨论德国革命失败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第一次提出：“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翼，即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sup>①</sup>斯大林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了必须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任务。五大策略提纲中说：“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左右手。”<sup>②</sup>不久，社会民主党又被戴上了“世界资产阶级第三党”的帽子。1924年4月德国共产党九大通过决议：“放弃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过渡性解决办法，承认以彻底消灭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中心任务。”<sup>③</sup>九大撤换了党的领导阶层，极左派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不和突出表现在1925年总统选举中。

1925年，德国的保皇势力企图利用总统选举争取掌握德国的

---

①亚历山大·V·普拉托：《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柏林1973年版，第159页。

②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357页。

③《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104页。

领导权。在5月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等三个民主政党一致提名中央党国会议员威廉·马克斯为总统候选人。右派政党提名兴登堡。德国共产党提名台尔曼作为候选人。结果由于选票分散，兴登堡以1465.5万对民主派的1375.1万获胜。选举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对立。

第四阶段，1925—1928年，两党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重新接近。1925年初，共产国际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承认两种稳定（苏联的稳定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在一些国家如德国，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会议指出，德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利用资产阶级阵营的矛盾争取扩大工人阶级队伍。这就是说，德国共产党应从1924年的政治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自1922年拉巴洛条约以来，苏联与德国一直保持友好的贸易往来和军事联盟。1924到1925年初，德国共产党的路特·费舍集团对共产国际保持“半独立”的态度，积极推行极左政策，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很大不满。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5年7月德共十大决定结束极左路线的统治。大会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声明德国共产党愿在此纲领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台尔曼接替费舍担任党的领导，开始实行现实主义的政策。

1925年9月1日，德国共产党发布公开信，号召“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用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实施统一战线策略！”<sup>①</sup> 1925年12月2日，德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呼吁，建议联合起来，开展无偿没收诸侯财产的公民投票运动。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在工人的压力下表示同意。1926年1月6日，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积极组织下成立了“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全民投票委员会”。1926年3月9日至17日，250万选

<sup>①</sup>《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共产主义》，第134页。



民签名支持公民投票。6月20日，公民投票举行，450万人赞成剥夺前皇室的财产；这个数字超过了1924年12月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所得票数的总和。尽管由于票数不够宪法规定的投票总数的50%，皇室财产未被剥夺，但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了反对票（1926年7月2日），皇室的财产也未能得到补偿。联合投票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行动的高峰。在工厂和失业者中，两党也进行了一些联合活动。1926年12月，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共产党工人举行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弗里茨·黑克特在会上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同月，失业者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3名社会民主党人和114名非共产党工人和德共工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建立了一个失业者中央委员会。

统一战线的局面并未持续下去。192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外交政策转变。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德国工人运动再度分裂。

## 二 社会民主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

早在1922年，当法西斯在意大利得势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内就有人开始研究法西斯主义问题。当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要得出一个有关法西斯主义的全面的概念。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研究开始深入，涉及到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作用、其社会基础以及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可能性。研究的权威性成果主要反映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sup>①</sup>在1931年6月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

<sup>①</sup>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1874—1944），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随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并入社会民主党。1923—1931年，他是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担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外政策的主要发言人。1931—1933年，被选入党的执委会。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布赖特沙伊德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国家形式，或者说是向这样一种国家形式转化的运动：它与民主相反，不是全体平等的国民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构成政治意志的权力，而是少数人或者一个特权阶层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左右政治意志的权力。”<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西格弗里德·马克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具有威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sup>②</sup> 库特·凯泽尔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既不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自愿的帮助者。它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只是反对资本主义下的具体现象。它要求消灭信贷资本的剥削，而不触动私有制，不触动垄断资本方式。<sup>③</sup> 可见，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概念，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已经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的、维护资本统治的新国家形式，这种形式不能容忍其他资本统治形式的存在。

关于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作用。布赖特沙伊德指出，法西斯主义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运动已成为资本的雇佣军，由资本掏钱收买的军队。亚历山大·施夫林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仅是资本危机时期的傀儡，不仅受垄断资本的操纵，而且它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它成为无产阶级危险的对手。<sup>④</sup>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都认为是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

---

①②《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327页。

③《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61页。

④同上，第262页。

通货膨胀中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在垄断资本的进逼面前，丧失了他们独立的地位，沦为无产阶级或正在无产阶级化。这批人很容易受法西斯运动的宣传和引诱，成为打着反资本主义旗号，实际上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西斯运动的支柱和后盾。<sup>①</sup>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生存能力。布赖特沙伊德认为，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兴盛在德国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德国不会遭到与意大利同样的命运。因为意大利政府虚弱，意大利社会党内部分裂，对于法西斯的进攻无能为力。而德国的民主政府比意大利坚强，作为民主政府支柱的社会民主党也比意大利社会党团结，具有几十年光荣传统的德国工人阶级有能力战胜法西斯。经济危机只是暂时的，一旦新的繁荣出现，法西斯主义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布赖特沙伊德甚至认为：“希特勒主义者和他们的领袖能否取得政权……这一点至少是值得怀疑的。”<sup>②</sup>与德国共产党一样，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对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的速度和生存能力估计不足。尽管他们慷慨激昂地谴责法西斯主义，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认清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特征和潜在的危险性。许多人认为党经受过比这更大的困难，战胜过比法西斯更强大的对手，因此，这一次也会很快取得完全的胜利。盲目的自信心和轻敌使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势力面前缺少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也使社会民主党始终认识不到应与德国共产党等其他工人政党和组织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社会民主党认为它同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对立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他们攻击共产国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与

---

①《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62页。

②《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335页。

法西斯专政的实质相同：都是专制主义的政权。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在1931年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明确表达了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观点。他说：“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中，民主被排除了，政治意志不是由全体国民来体现，也不是由全体无产阶级或者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来体现，而是由少数特权阶层来体现。从国家权力的实现来看，在莫斯科和罗马之间没有区别。我们还可以确定，斯大林的政权与墨索里尼的政权有着友好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所依靠的阶级不同和目标的不同。在苏维埃制度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为民主而战斗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则为了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民主。”在社会民主党看来，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共产党都是带有反民主特征的对手。

1929—1933年，社会民主党对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大致可分成如下两类：

在大多数情况下，党的执委会和大部分领导人对此持拒绝的态度。德国共产党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促使他们坚定了这种立场。德国共产党在策略转变时期提出的一些友好建议也遭到回绝，以致在重大的事件中社会民主党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

同时，社会民主党个别比较明智的领导人曾经多次向德国共产党发出过联合行动的建议。一些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主动与德国共产党党员和选民联系，直至采取联合行动。

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对统一战线持反对态度。1928年共产国际召开六大，宣布要加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对此作出决议，明确禁止其支部参加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行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主要领袖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议对它有一定的约束力。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敌视态度的同时，社会民主党利用政权的力量对德国共产党的活动进行限制乃至镇压。1929年5月1日流

血事件就是明显的一例。①这次事件激起了德国共产党党员和选民的极大愤慨。1929年6月德国共产党十二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德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保卫苏联、打击社会民主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为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德国而斗争。米勒政府执政期间通过了所谓“保护共和国法”。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议员明策尔贝柯说，根据这个法的第一条，就将有7,000名工人被判处6,000年的徒刑。②1929—1930年，有2,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和其他反对政府政策的工人被社会民主党的老板所解雇，1,000名属于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的工人顶替了他们的职位。③

对德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社会法西斯”、“人民革命”的口号以及它的一些行动，社会民主党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两党交替着互相攻击，隔阂越来越深，以至于当德国共产党决定改变其策略，试图与社会民主党共同采取行动时，社会民主党也报以不信任的态度而予以拒绝。1931年8月9日，德国共产党参加了右翼政党组织的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民投票。9月，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诺伊曼建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共同组织一次为9月14日的选举作准备的群众集会。社会民主党断然拒绝。事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朗茨·孔斯特在一篇演说中说，8月9日事件表明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参加了德国反革命的行动，它打开了工人们的眼界。德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喧嚣与它的全部策

---

①1929年5月1日，德共在柏林组织大规模的五一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柏林警察总监措尔吉贝尔下令警察开枪射杀徒手示威者，25人死亡。5月6日，普鲁士政府下令取缔德共的自卫组织红色阵线同盟，德共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被禁止发行三周。

②《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第200页。

③同上书，第242页。

略一样都是毫无诚意的。①同年11月18日，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发表社论《谁是主要敌人？》社论说：“共产党人把概念弄混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被贴上了‘社会法西斯’的标签，这只能是模糊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妨碍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红旗》（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鼓吹的统一战线是只有一个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党），而这种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的对立面。”②

1932年4月总统选举之后，鉴于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的危险，德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行动。4月25日，德国共产党以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议会党团的名义向德国全体工人呼吁：“我们准备同愿意联合工人阶级、真正领导反对裁减工资和救济金斗争的一切组织共同战斗。”③5月24日，台尔曼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党要来一个急剧转变，转向实际上的统一战线。”④对于德国共产党的主动提议，社会民主党坚持必须在履行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统一行动。一是德国共产党要立即停止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二是这种统一战线的谈判必须在两党中央一级领导人之间进行。1932年6月17日，德国共产党柏林支部发出致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和国旗队柏林支部的公开信，建议共同举行反法西斯的示威游行。第二天，铁的阵线⑤在回信中说：“我们认为，作为

①转引自《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 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19页。

②《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26页。

③《德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第507页。

④同上，第568页。

⑤1931年12月，为了与极右政党和组织新成立的“哈尔兹堡阵线”对峙，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和工人体育组织合并成立“铁的阵线”。这是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的一支对抗法西斯运动的军事战斗组织。

这种联合的前提，德共应该停止对我们的组织和领导人的攻击”。<sup>①</sup>6月29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发布通知：“从德共政治局和德共领袖的表白和刊物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反法西斯行动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反社会民主党行动。他们表示，反法西斯行动不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搞统一战线。每个人都知道，富有成效的谈判只能在中央一级党的领导人之间才可能进行。地方一级的谈判不可能产生联合的明确效果，而只会导致分裂和混乱，因此应该严格避免这种谈判。”<sup>②</sup>这份通知实际上是一道禁止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与德共谈判的命令。即使在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社会民主党也不放弃它关于统一战线的条件。宁愿对法西斯的进攻保持沉默，也不愿与共产党进行有条件、有限度的合作。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变发生时，德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全德自由职工联合会呼吁，要求联合举行反对政变的总罢工。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压制它的党员和选民要求抵抗政变的呼声，另一方面对德国共产党的呼吁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结果等于在沉默中交出了普鲁士政府的权力。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德国实际上已落入了法西斯的魔爪中。即使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还是拒绝了德国共产党联合行动的多次呼吁。

不过，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导人意识到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法西斯夺权的紧迫性。他们在一些场合曾提出与德国共产党对话的要求。如1931年11月15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布赖特沙伊德在达姆施塔特发表讲话，建议消除两党在进行共同斗争道路上的障碍物。<sup>③</sup>1932年11月6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成员施坦普费

---

①《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34页。

②同上，第239页。

③同上，第210页。

尔提议，鉴于11月6日的选举结果（纳粹选票曾一度下降），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应该考虑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可惜，这些领导人的意见在社会民主党中央不占主导地位。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宣布施坦普费尔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sup>①</sup>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抱积极态度，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的一些工人还是不顾党的执委会禁止，主动与德国共产党相应组织的工人联系，参加两党党员共同主持的反法西斯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甚至有的党员公开对社会民主党中央阻止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批评。1932年7月10日，一位社会民主党代表在柏林反法西斯联合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建立所有工人阶级参加的战斗的统一战线，而不论其原来属于哪个组织。我们最强烈地抗议党的执委会发布的关于禁止在工厂、居民区与革命工人一起举行会谈和采取行动的禁令。我们坚决拒绝我们报刊上散布的一切诽谤。”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也坚决主张与德国共产党联合，以致与党的多数派发生分歧，退出了社会民主党。这表明在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要求现实地看待国内形势，暂时摒弃前嫌，与德共携手合作，共同击退法西斯进攻的趋势。社会民主党内的纪律使这种趋势无法形成主流。一些与德共频繁接触的党员和工会会员被党组织和工会开除。仅在1928—1929年，自由工会的矿山工会就有1,200名工人被开除。冶金工会有5,000名工人被开除。<sup>②</sup>这样，一直到希特勒上台，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共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

①《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09页。

②《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第231页。



### 第三节 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上台

#### 一 法西斯危险的增长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政策

1924—1928年是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法西斯运动在德国还没有成为一种具有全国性威胁的势力。纳粹在议会的493个议席中仅占12席，占总数的2.4%。<sup>①</sup>1929年年底，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德国。法西斯认为时机已到，立刻开始了攻占柏林的黑色进军。纳粹的目的在于通过宪法手段从内部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1929年12月底，纳粹党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发起反“杨格计划”签名运动，得到了600万人的支持。纳粹作为一个政党第一次闻名全国。1930年9月国会大选，纳粹党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从此以后，法西斯运动如同一股难以遏止的逆流，凶猛地冲向魏玛共和国这座本来就不稳固的大厦。1931年年底，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和泛德意志联盟等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哈尔兹堡温泉城开会，结成了哈尔兹堡阵线。紧接着，1932年初，希特勒出席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召开的德国垄断资本代表会议。纳粹与其他极右势力和垄断巨头正式勾结和结盟。有了垄断资本的财政援助和各种极右势力的支持，希特勒便更加有恃无恐地向共和国挑衅，开始了夺权的步骤。于是发生了1931年夏极右势力联合驱逐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政府的公民投票事件。1932年总统选举，希特勒获得的票数相当可观，占

---

<sup>①</sup>参看《1918—193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08页。

总票数的36.8%。纳粹党徒的数目在这个时期大大增加，从1928年的10万猛增到1931年的80.6万人。<sup>①</sup>法西斯夺权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1930年春，米勒政府的垮台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策的彻底失败。接任的中央党人布吕宁政府是自稳定时期五届内阁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少数党执政。由于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布吕宁政府靠魏玛宪法第48条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实行统治。德国实际上开始了总统负责制政府时期，议会民主名存实亡。布吕宁是保守的中央党人，代表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他力图依靠除共产党之外的德国各大政党的支持，修改宪法，使霍亨索伦王朝复辟。布吕宁政府当政之初，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采取的是反对党的姿态，但是只保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1930年9月大选之后，共和国形势严峻，这一现实迫使社会民主党重新估价它的策略：是继续充当反对党，还是支持布吕宁政府？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党内占上风的意见是：为了阻止纳粹党人进入政府，除了支持布吕宁，别无他法。这就产生了著名的容忍政策。

所谓容忍政策，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奥尔格·德克尔的话说，就是“一个党处于政府的反动派地位，但是它避免推翻政府，也就是说，这个党容忍政府”。<sup>②</sup>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要支持过去它曾激烈批评过的政府提出的那些政策，而不管这种做法是多么违背党的传统和拂逆民意。容忍政策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得到确认。德克尔于1930年12月在《前进报》上发表《论容忍政策》一文，系统地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实行容忍政策的原因、目的、困难、限度以及后果。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布赖特

<sup>①</sup> 参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280页。

<sup>②</sup> 《社会民主运动与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的社会发展资料》第1卷，第54页。

沙伊德在莱比锡大会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容忍政策的根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这个理论确认：虽然布吕宁政府是财政资本、大资产阶级及其封建党羽的政府，但它没有损害民主的主要基础——议会机构和民主自由权利，它是一种较小的祸害。“如果推翻这个政府，那么继它之后的另一个政府将会更坏”。<sup>①</sup>另一个政府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府。希特勒政府的目标是完全取消议会和德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长期实行军事独裁，摧毁一切工人组织。德国工人阶级几十年奋斗换来的民主自由将毁于一旦。为了避免这种前景，社会民主党决定在两个政府中容忍其中一个危害较轻的政府。

容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法西斯的进攻，阻止议会政府的解体，制止政变和内战，保卫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堡垒。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民主制度，捍卫宪法和议会制。它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容忍布吕宁政府，或者防止它依附于纳粹党，或者避免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取而代之。这种容忍不是最佳选择，但目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布赖特沙伊德说：“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容忍政策和回避政策并不是我们情愿执行的，相反，我们认为执行它只是出于暂时的被迫的需要。我们并不会由于向资产阶级政府作了让步而变成了资产者。我们让布吕宁内阁存在下去，只要它决定并且能够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野心。我们容忍的只是对民主形式的损害，为的是拯救宪法民主的实质。”<sup>②</sup>

要执行这种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预见到了这一点。第一种困难在于，“要确定什么时候这种政策才能被视为拯救民主的方针，什么时候它本身将转变成为对民主的威

<sup>①</sup>《社会民主运动与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的社会发展资料》第1卷，第54页。

<sup>②</sup>《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350页。

胁”。<sup>①</sup>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拯救民主的方针，容忍政策何时能够生效，如何才能使这种政策不致被滥用，转变为民主的对立物。可惜的是，社会民主党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种困难是指“对许多人来说，当然不是对所有人，这种支持意味着一种英勇的自我克制……人们不可能忘记，布吕宁政府曾经被描绘为民主的最大危险”。<sup>②</sup>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选民必须在感情上经历一个从厌恶、反对到容忍、支持布吕宁政府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第三种困难是来自党外的不同反应。布赖特沙伊德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态度会使工人们产生疑虑，这些工人并不一定全是我们组织的人。……资产阶级政党从我们将抵抗法西斯作为头等重要的决断同时从我们相应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其他方面获得好处。……共产党将利用我们被迫放弃我们纲领中的一些要求来反对我们。……当原来支持我们的选民倒向共产党时，我们应不致于对此感到意外。”<sup>③</sup>布赖特沙伊德将这种种反应看成是党执行容忍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种困难构成了对容忍政策的挑战。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加上容忍政策本身的缺陷，最后终于使这项政策成了束缚党放手行动的绳索。

容忍政策的限度在哪儿？这是社会民主党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布赖特沙伊德援引希法亭在1930年12月的话说：“一旦社会民主党对一项政策期望过高，而这项政策是一项自我毁灭的政策，并且摧毁了抵抗内战和反革命力量的最坚固的围墙时，那么容忍政策就走到它的极限了。”<sup>④</sup>这就是说，容忍政策的限度在于，当事实证明它是一项自我毁灭的政策，以至于被反动势力利

①《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1卷，第55页。

②③同上。

④《社会民主运动和魏玛共和国1927—1933年社会发展资料》第2卷，第26页。

用来摧毁了捍卫民主的最坚固的堡垒（这种说法通常是指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容忍政策就走到尽头了。那么取而代之的策略是什么呢？德克尔和布赖特沙伊德都谈到了议会外斗争的方法——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直至武装起义。但是他们很快又指出运用这种非和平非议会方式时会出现的可怕情景——一场全面的内战。他们强调，目前看来，没有任何理由促使党改变迄今为止证明是正确的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方式。事实上，不仅仅是目前，即使后来，当社会民主党的“最坚固的堡垒”普鲁士政府被摧毁时，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改变它的和平策略。

容忍政策使社会民主党陷入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境地。表面看来，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布吕宁政府才不至于垮台，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是被布吕宁政府捆住了手脚。由于害怕布吕宁政府辞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支持那些不为群众所欢迎并遭到本党拥护者拒绝的紧急措施和紧缩政策，不得不接受那些为大地主利益服务的法律。例如，1931年11月布吕宁政府提出一项紧急法令，其内容有四点：削减10%—15%的工资；废除罢工权利；削减社会养老金，提高社会保险率；将工厂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选举推迟一年。<sup>①</sup>很明显，这项法令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剥夺工人阶级民主权利的。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却不得不在表决中举手赞同。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不满，遭到了德国共产党的强烈抗议。社会民主党一味妥协、退让，至多只是延长了布吕宁政府的寿命，却无法抗拒与极左势力、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法西斯政党越来越强硬的进攻。

社会民主党把挽救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容忍政策上，企图用这种建立在理性、法治、民主原则基础上的防御性政策抵挡住杀

---

<sup>①</sup>《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第209页。

气腾腾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它放弃了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武器，放弃了与德国共产党力量的联合，放弃了利用它本身强大的工人组织（包括军事、体育组织）力量的机会。社会民主党的悲剧也从此开始了。

## 二 巴本政变和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政策

普鲁士政府素有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堡垒”之称。社会民主党人在奥托·布劳恩领导下，同中央党和民主派一道在普鲁士已执政近14年。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了普鲁士的行政机关和警察部队，内政部长泽韦林和柏林警察局长克谢辛斯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来，纳粹党人视普鲁士政府为眼中钉。只有摧毁了这个“堡垒”，它才能上台执政。

1932年6月1日，弗朗兹·冯·巴本接替布吕宁就任德国总理。巴本出生于天主教贵族兼大资本家的家庭，保守党人，属于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集团。他上台后，组织了一个无党派右翼贵族兼军阀的政府。为了取得希特勒法西斯党对他的支持，1932年7月20日，巴本政府发动了著名的“巴本政变”，代替纳粹党人实现了摧毁社会民主党普鲁士政府的阴谋。巴本先是采取狡猾的手法把普鲁士内阁代表骗进总理府，然后宣布，根据兴登堡总统拥有的权力，布劳恩和泽韦林已被撤职。同时，巴本宣布对柏林近郊实行戒严，由国防军地方部队司令接管普鲁士警察局。不久，巴本自任为邦长官，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政府一夜之间被完全摧毁。

这是一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政变。社会民主党的反应如何呢？

——四天以前即7月16日，党的执委会成员奥托·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希法亭、克里斯平、施坦普费尔等人曾研究了普

鲁士的局势。当时已有政变的征兆。在会上，普鲁士内政部长泽韦林提出动用警察，在铁的阵线支持下进行抵抗。但是讨论的结果是：“不论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决不放弃宪法规定的法律基础。”<sup>①</sup>

——政变的消息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犹如晴天霹雳。党的执委会成员奥托·韦尔斯后来回忆说：“这一消息使人感到沮丧，没有人发出愤怒的话语，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激动情绪。我的印象是大家都不知所措。”<sup>②</sup>在柏林警察局长克谢辛斯基和警长被捕以后，泽韦林于当天晚上撤离了他的办公室。巴本政府对柏林近郊的戒严和国防军接管警察局的行动未受到任何抵抗。

——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力量大致如下：普鲁士警察有近9万名，铁的阵线有300万队员，其核心是“保卫团”。“保卫团”是一支有战斗力的、经过军事训练的精锐队伍，自称有40万人。此外还有广大的党员和工人。7月20日，报纸公布了政变消息，工人们激动异常，成群涌上各城市街头等待战斗和总罢工的信号。只要社会民主党中央一声令下，工人们立即就会投入到保卫普鲁士民主政府的战斗中去。

——7月20日当天，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全德自由工会、全德职工联合会等7个工人组织分别发出公开呼吁书，中心内容是：第一，“必须保持冷静；普鲁士的局势并没有最后定局，我们还可以诉诸于国家法院！”<sup>③</sup>第二，“保持纪律，不要受煽动的影响！现在每个真正的战士都必须保持镇静！揭露那些鼓吹总罢工的挑拨离间者，工会不要参加周四晚上德共召集的工厂委员会会

---

<sup>①</sup>引自《德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第585页。

<sup>②</sup>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第155页。

<sup>③</sup>“全德自由工会等7个组织于1932年7月20日给全体德国工人的信”，引自《德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第590页。

议。”<sup>①</sup>第三，“最近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为了在德意志共和国重建法制而进行选举。……现在，所有人都要集中全部力量为7月31日（国民议会选举——作者注）那天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出力……对于德国人民来说，他们应该在7月31日那天用他们的力量裁判来结束目前德国的这种状况。”<sup>②</sup>简而言之，社会民主党及工会的号召不过是要求：保持冷静；等待国家法院的裁决；利用即将到来的大选挽救局势。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对付巴本政变的政策。

巴本政变的顺利出乎纳粹党人的意料之外。这一成功使法西斯主义者欣喜若狂。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人们只要给赤色分子一点厉害，他们就会屈服。”一天以后他又写道：“赤色分子错过了他们的伟大时刻，而这一时刻再也不会出现了。”<sup>③</sup>纳粹通过巴本政变看到，向共和国发动最后冲击的时刻到来了。在这场冲锋中，突然袭击和无情的暴力更能达到目的。

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持久的抵抗行动，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人的奋起自卫意志受到致命的一击。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党和组织的能力，原来高昂的信心逐渐减弱。

普鲁士政府是社会民主党保卫民主的希望所在。当初社会民主党执行容忍政策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住这个堡垒。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政府解体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会采取不抵抗政策呢？

第一，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深信用理性、民主和法治的原则能够战胜任何人，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议会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式。长期以来，党利用议会和

<sup>①</sup>“全德自由工会等7个组织于1932年7月20日给全体德国工人的信”，引自《德国工人运动史》第4卷，第592页。

<sup>②</sup>同上书，第590页。

<sup>③</sup>转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第156页。



宪法为工人阶级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广大党员受到的是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熏陶，相信和依靠法治的观点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这种观点妨碍他们真正认清法西斯运动的实质。即使在法西斯夺权以后，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还没有放弃这种近乎幼稚的幻想。1933年3月23日，党的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国会大厦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刺刀庄严地宣布：“魏玛宪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我们赞成宪法里规定的关于法治国家、平等和社会权利的原则。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庄严地宣布拥护人道主义、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原则。任何授权法都没有给你们以权利去消灭永恒的和不可摧毁的思想。”<sup>①</sup> 尽管韦尔斯的声明慷慨激昂，表现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捍卫民主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但是他的讲话也可悲地说明，直到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认清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肆意践踏任何民主原则，只崇拜暴力、恐怖、棍棒和谋杀的现代史上罕见的极权主义政党和运动。在近乎野兽一般的纳粹党徒面前，是丝毫也谈不上法律和民主的。

第二，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盲目信奉历史的必然重复性，希望通过等待和忍耐取胜。许多人将法西斯主义与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相提并论。他们相信，既然半个多世纪之前德国工人运动能够战胜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今天也同样能战胜希特勒。韦尔斯在1933年3月23日的发言中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消灭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可以从新的迫害中吸取新的力量。”在1932年的新年献辞中，韦尔斯说：“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经不起长期消耗的，我们却能。我们在严格的学校中已经掌握了政治战略的最复杂的技巧，我们的政治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第160页。

领导人知道，谁能够等待，忍受过去的失败，谁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sup>①</sup> 韦尔斯的讲话表达了社会民主党内大多数人怀有的一种希望，即违反法律的状态只是暂时的，纳粹主义将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可是这一次他们估计错了。

第三，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抱有保全组织、不想冒险的心理。这些人厌恶流血的暴力行动，十分害怕抵抗会导致一场使生灵涂炭的内战。他们深信，一场内战将不可避免地消灭民主和魏玛共和国，使工人阶级的事业倒退几十年。所以，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承认以工人阶级的暴力抗击法西斯暴力的必要性，并且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对此承担了义务，但一旦出现真正的紧急状态，他们却不敢付之于实践。保全组织、避免流血，这是当时大部分领导人心中的想法。巴本政变发生时，当柏林警察局长克谢辛斯基催促采用某种形式抗击政变时，内政部长泽韦林回答说：“我们可千万不能让流血事件发生。”<sup>②</sup>

第四，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在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不敢下决断。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党的领导层在巴本政变发生时显得犹豫不决，以前设想的几种方案此时似乎都有不可弥补的缺陷：举行政治大罢工吗？庞大的失业大军将很快取代罢工工人的位置。通知铁的阵线举行示威游行吗？这种游行能够显示多大的力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内战而以失败告终。进行武装抵抗吗？工人阶级面临的是配备坦克和大炮的国防军和冲锋队以及钢盔团，取胜的希望恐怕很小。权衡利弊，似乎只剩下投降这条路。事实果真如此吗？尤利乌斯·

<sup>①</sup> 沃尔夫冈·胡果、沃尔夫冈·舒曼：《德国历史文件 1929—1933》，柏林，1975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443页。

布劳恩塔在《国际史》这部专著中说：“尽管如此，只要工人阶级进行抵抗，看来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无论如何难以设想，在国会和地方都不占多数的政变政府，可以不经过最艰巨的、长达几星期之久的、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展无数次的游击战，就能把几十万奋起抵抗的工人镇压下去。法西斯主义决不可能在工人阶级表示不惜流血牺牲决心战斗之后不到半年就掌握政权，并毫不费力地消灭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

### 三 1933年1月30日

巴本政变为纳粹党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11月17日，巴本辞职。一直在幕后操纵的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接替总理。经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如愿以偿，接替施莱彻尔担任德国总理。法西斯在德国的夺权终于成功。希特勒粉墨登场、宣誓就职的当天晚上，就得意忘形地站在柏林威廉大街总理府的阳台上，眉飞色舞地检阅了纳粹冲锋队员们的火炬游行。身穿褐色制服的冲锋队员们手中高举的火把，汇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柏林的夜空，列队而过的冲锋队员们长统皮靴的嚓嚓声不绝于耳。在这种褐色“革命”的进军声中，人们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纳粹马上就要实行白色恐怖了。果然，2月27日，国会大厦冒出了滚滚浓烟，随后德国共产党被取缔。5月20日，纳粹向全德自由工会开刀，占领了各地工会会址和工会银行。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查禁，其他党自行解散。7月14日，“禁止新建政党法”公布，从此开始了纳粹党的独裁统治。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告终了，德国人民十四年来为实行民主制度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

<sup>①</sup>《国际史》第2卷，第442页。

## 第四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 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的地位

自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党。在此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曾分属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伯尔尼国际和中派的维也纳国际。1922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上的合并，为伯尔尼国际与维也纳国际联合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德国党的领导人韦尔斯与克里斯平分别作为两个国际的代表，参加了筹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十人组织委员会。

1923年5月21日，在汉堡工会大厦举行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主席韦尔斯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到会的43个社会主义政党的426名代表中，德国代表达79人之多。在开幕式上，汉堡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洛伊特里茨致欢迎词，他说：“去年，我们曾欢欣鼓舞地实现了德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汉堡以至全国范围的统一，现在我们更期望，两个兄弟的国际统一起来。我们相信，在汉堡一定会很好地完成这一事业。”<sup>①</sup>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

---

<sup>①</sup>《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狄特莱夫·奥威尔曼出版社1974年德文影印版，第1卷，第9页。

三位主席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即：克里斯平（1923年5月—1936年5月在国际任职）、赫尔曼·米勒（1923年5月—1928年6月，1931年2月—3月在国际任职）、韦尔斯（1923年5月—1938年夏在国际任职）。另外还有约翰内斯·施泰林也曾被选为德国党在国际执委会的成员（1928年6月—1931年3月，1938年夏任职）。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第一大党。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它拥有最多的投票权，左右着国际各项议案的命运，成为社会改良主义的国际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国际内影响很大，直接反映在国际所通过的有关文件中，影响到各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实践。

1925年8月22日至27日在马赛举行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的德国代表52名，拥有40票的投票权。希法亭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危险的报告。报告中首先回忆了大战前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与饶勒斯的著名辩论，他对辩论中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关系的论述表示怀疑。他说：“这种相对的命题即：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它在今天已经非常不够了。”他宣布：“一个现实的和平主义阶段已经开始了”。<sup>①</sup>

希法亭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从理论上为改良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国家的观点辩护。他声称，工人阶级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失以前就已经使上层政治建筑民主化，作为经济上独立的一个阶级，是能够在政治上实现统治的。他说，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强大的影响下，许多资本主义

---

<sup>①</sup>《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2卷，第259、261页。

国家已经过渡到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这种现代民主区别于以前所有的政治形式。现在，劳动居民群众已经参与政治”。“在这种共和国的形式中，一部分上层建筑已经受到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力量的影响”。这种“政治建筑的变化”为反战斗争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且要求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希法亭拒绝组织革命的反战行动，他声称，“保卫和平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组织问题”。“我们在这场争取和平斗争中所贯彻的思想就是消灭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有一种资产阶级观念，认为各民族为了争夺权力就要不断地相互对抗，不断地进行竞争斗争，这是同无产阶级的观念、团结的思想、民族合作的思想相对立的。在这里实质上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即用无产阶级的民族活动原则代替资产阶级的民族活动原则”。<sup>①</sup>希法亭的报告获得代表们的热烈支持。他主持起草的决议——《国际社会主义和平政策》为大会一致通过。

在1928年8月5日至11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58名，其中有投票权的代表40名。德国代表弗利茨·纳夫塔利作了关于战后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报告。

纳夫塔利根据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说：“今天，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比我们所估计的有更大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作用还没有衰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正在不断经历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一个新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因素正在确定无疑地形成”。<sup>②</sup>纳夫塔利说，如果就表面形式看，可以把“有组

---

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2卷，第261页。

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3卷，第2册，VI第31页。

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原则等量齐观。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曾对垄断化和国家垄断的发展进程作过估计。他认为这一过程可以使“由资本家组织和指导的经济变为民主国家领导下的经济”。<sup>①</sup>根据这一观点，纳夫塔利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继续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发展趋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使垄断组织处于全民监督之下”。而要实现这一点，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在本国范围内加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要参加、推动国联经济组织的发展。<sup>②</sup>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在这里仅仅意味着对垄断进行监督、失业保险以及其它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利。

大会就这个议题一致通过了《战后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文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抛至九霄云外，文件浸透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它不再把剥夺剥夺者作为目标，而只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垄断置于公共机关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监督之下”。垄断尽管会产生一些令人憎恶的现象，如“对各民族的沉重压迫”。但决议认为，作为民族和国际范围内历史进步的支柱，“它的发展本身将会用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代替竞争……当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服从世界人民和国家对世界资本的统治时，它就表现出另外一面，出现了消除世界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前提，发展为有计划的国际经济领导”。<sup>③</sup>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显示出希法亭改良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理论权威考茨基，在以他的“超帝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1927年基尔代表大会记录》，第168页。

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3卷第2册，VI第31页。

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3卷第2册，IX第21—22页。

“国家主义论”影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裁军、反战决议之外，还试图凭借自己的威望，加强国际的反苏倾向。1925年11月，在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等问题的前夕，考茨基起草了致国际执委会的备忘录《国际与苏维埃俄国》，并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狄茨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发表。他在备忘录中发泄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污蔑苏联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比卑鄙的匈牙利霍尔蒂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还要坏”。他声称，“正如所有其它的军事独裁主义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消灭一样”，社会民主党应参加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斗争。他说：“如果我们的国际指示拒绝参加广泛兴起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把任何反对他们的起义都定为反革命行动，禁止我们在俄国的成员参加这种起义的话，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sup>①</sup>考茨基的观点得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也遭到一些中派领袖的反对。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奥托·鲍威尔，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无可争议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尽管有分歧，但彼此还是有一种“现实利益上的共同性”。<sup>②</sup>

考茨基和鲍威尔的争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除了考茨基宣传一种公开仇视苏联的政策之外，在第二国际还出现了一个左翼派别，要求对苏联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它的突出代表就是奥托·鲍威尔。”<sup>③</sup>

<sup>①</sup>卡尔·考茨基：《国际与苏维埃俄国》，柏林1925年版，第10、11、17、44、56、61页。

<sup>②</sup>奥托·鲍威尔：《马赛代表大会》，见奥地利《斗争》杂志1925年8、9月合刊，第282页。

<sup>③</sup>《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纪要和决议》（1926年2、3月），汉堡1926年德文版，第30页。



## 二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挽救德国危机的努力

20年代中叶，随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得势，整个欧洲以至世界和平、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处于抗击法西斯第一线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机关和各国党的密切关注。德国问题在20年代末以后，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各种会议的重要议题。

1931年7月23日至8月1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中央大厅举行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德国与中欧的形势及工人阶级保卫民主的斗争》。当时德国正陷于灾难性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希特勒纳粹主义运动的凶焰直接威胁到魏玛共和国的生存。危如垒卵的形势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和预定作为大会重要报告人的希法亭在柏林几乎无法脱身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维也纳代表大会。国际领导人虑及德国问题至关重要，曾表示如果没有德国代表参加，大会将暂时推迟。但最后，德国还是派出了一个92人的庞大代表团，拥有40票的投票权。大会如期举行。

鲍威尔是大会第二项议程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主持人。他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德国危机的激化“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的特点表现为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动荡”。<sup>①</sup> 财政危机必将导致德国工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贫困化，并将对欧洲和世界发生巨大影响。他设想，今后可能取消资产阶级政党实行的资产阶级议会统治制度，将由强大的德国

---

<sup>①</sup>《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记录》第4卷，第2册第519页。

大工业家指挥反动的雇佣兵夺取政权，并以军国主义思想实行德国法西斯主义。这是人民群众经济和社会贫困化最终可能出现的政治结果。这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将使莱茵河以西的整个欧洲的民主受到严重威胁”，一切争取欧洲和平、谅解、裁军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最后将注定导致战争”。<sup>①</sup>基于这种形势估计，鲍威尔要求：第一，主张民主和平的西方大国应向资本主义德国提供信贷帮助。第二，期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起来保卫民主与和平。第三，强调一旦德国统治阶级抛弃民主，工人阶级应当使用一切强力手段。

鲍威尔提出的国际贷款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激烈辩论。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团团长詹姆斯·马克斯通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并不是要求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给资本主义德国提供贷款。筹措信贷是财政资本的事情。社会主义国际也没有任务拯救德国的资本主义。它的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斯通特别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奉行的容忍政策，希望德国党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决战。在左翼代表的批评下，对鲍威尔代表起草委员会多数派提出的决议草案作了某些修改，经过整整一天的辩论，以316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鲍威尔的决议草案。

维也纳代表大会的结果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尽管估计了德国形势，提出了反对危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任务，但是，他们的目标在于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象医生一样，医治资本主义的创伤，奉行的不过是保护资产阶级议会制，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战略方针。正因为如此，大会多数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路线基本上没有作什么批评，而且

---

<sup>①</sup>《1931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第4卷，第2册第521、591页。

百般维护，鼓励了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的关键时刻，继续推行一整套错误方针。

### 三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关于德国法西斯问题的辩论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夺取了政权。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策遭到公开破产。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柱的垮台。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迅速扩张，社会民主党和其它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处境日益困难，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在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党或者受到各种限制，如波兰、匈牙利，或者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成员遭受迫害，如意大利（自1926年）、德国（自1933年）、奥地利、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自1934年）。长期习惯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合法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旦失却合法活动的基地，组织本身的生存立刻成为问题。1933年春夏，广大社会民主党基层党员、干部强烈要求从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确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方针。国际的领导人对此也深有所感。阿德勒声称：“在德国工人运动遭受巨大的总崩溃之后，我们要十分严肃地研究，将来会怎么样？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都要重新思考”。<sup>①</sup>

1933年2月18日、19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召集会议，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统一战线斗争问题作了重新研究。在作为决议的《致全世界工人》的号召书中，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宣布要同德国工人团结一致，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艰苦英勇

---

<sup>①</sup>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党在暴力压迫下流亡中的任务》，1932—1933年版，第260页。

斗争。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是对整个中欧无产阶级的严重威胁，是对整个世界反动派的鼓励。“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波兰的皮尔苏茨基、匈牙利的霍尔蒂、南斯拉夫的国王独裁政权、所有巴尔干国家公开的或隐蔽的独裁政权——他们都在准备把作为他们国内统治的基础的暴力转而引向国外，再一次变欧洲为战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兄弟鬩墙是削弱它的力量的最基本的原因，因而是法西斯主义最得力的盟友”，建议在公开和真诚谅解的基础上，整个工人阶级实现统一行动。号召书最后呼吁“德国和所有其它国家的工人，鉴于他们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停止相互攻击，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sup>①</sup> 号召书的作者们虽然没有对自己以往的政策作出任何自我批评，但是开始放弃对共产党人的敌对立场，是符合广大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要求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的几个月，即1933年春，还幻想适应法西斯制度而合法存在。1933年3月19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发布了新的决议——《打倒法西斯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团结万岁！》决议谴责了希特勒政府的恐怖政策，特别强烈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统一战线问题上顽固地坚持原来的态度”。<sup>②</sup> 德国党的领导人韦尔斯居然反对国际的这个决议，为此暂时退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65名国会议员，一致投票支持希特勒要求德国再次扩军的1933年3月17日对外政策声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开始公开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阿德勒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行动使所有执行局成员都感

<sup>①</sup>转引自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第410、411页。

<sup>②</sup>转引自韦尔纳·科瓦爾斯基主编：《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史》，1985年柏林版，第185页。

到震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公开声明，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的行动方式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无保留地赞成希特勒政府对外政策声明并不能反映德国工人的真正意愿。1933年6月10日阿德勒在一次个人表态中说：“在德国一切适应政策的尝试都是愚蠢的”，它只能帮助希特勒，使工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信任继续破产。<sup>①</sup>

1933年8月21至25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事先规定，会议的主要题目是《法西斯主义反动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参加会议的有32个党的145名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奥夫豪泽尔、奥伦豪尔、斯坦普菲尔、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希法亭等七人参加了代表大会。

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谈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破坏性的后果，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战争危险的加剧，强调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和社会主义代替它的必然性。根据社会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念，要求建立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经济的新形式。决议号召劳动人民坚决地起来保卫民主自由，根据各国的具体形势确定各自的具体任务：在法西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要求革命地唤起人民群众去推翻法西斯专政。在法西斯业已威胁到民主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应当以一切手段坚决地进行斗争。在民主继续存在的地方，工人阶级应当努力维护它。

巴黎代表会议的决议对法西斯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在德国，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利用贫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绝望心理，战胜了工人阶级，把整个德国人民投入恐怖的专制主义

---

<sup>①</sup>阿德勒：《党在暴力压迫下流亡中的任务》，第279页。

之中”。<sup>①</sup>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眼里，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支附属力量，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专政。

在大会辩论中多数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由它的政策而不是由它的阶级性来体现的。作为本质性特征是：法西斯国家机构的野蛮压迫、恐怖和暴力、纳粹主义和沙文主义。很多人都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戈里姆、布吕姆等人还提出，法西斯主义的原因要从经济危机中寻找。并且重申，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实质，就是“反对危机的斗争”。布吕姆声称：“要想取消危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削弱、减轻它的有害的可怕影响还是可能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就能使国家防止法西斯主义，使它不会被法西斯打倒，我们就能使目前欧洲现有的法西斯主义策源地逐渐被孤立而缩小。”<sup>②</sup>

代表会议的参加者避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原因作彻底追究。德国党的领导人韦尔斯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发言，为自己党的政策辩护，没有自我批评地寻找德国灾难发生的原因。韦尔斯把希特勒胜利的责任放在凡尔赛条约、放到西方大国和德国共产党的身上。多数代表接受了他的辩解。代表会议承认，由于力量被工人运动的分裂所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保卫民主、抗击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迫不得已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乃是势所必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负的责任，仅是它在193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变的时刻没有呼吁工人阶级使用暴力。鲍威尔在总结多数代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时说：“谁都清楚，1933年的失败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1918年革命只能在西方帝国主义战胜国列强为德国革命所规定的界线内进

---

<sup>①</sup>《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巴黎国际代表会议记录》，狄特莱夫·奥威尔曼出版社1976年影印版，第257页。

<sup>②</sup>同上，第156页。

行。因此，对这次失败的责任要谨慎判断”。<sup>①</sup>

左派代表组成代表会议的少数派。他们不满意于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批评。德国代表团中的左派奥夫霍泽尔提醒与会者，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为例检验传统的改良主义政策。他首先反对社会民主党期待国家资本主义自动发展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很多左派代表对德国党的领导毫无自我批评精神表示失望。尽管这些左派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还没有彻底抛弃一些理论偏见，但他们已经准备同共产党一起，动员群众，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33年的巴黎代表会议是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国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世界战争危险的新形势下，多数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无力根本改变以往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只是一味徒说空话。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强烈要求实现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

在巴黎代表会议结束辩论时，鲍威尔说道：“我相信，对于需要如何，必需如何说得太多了，但我们并不准备样样都要做到。而且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著作还没有从目前形势中引出教训”。<sup>②</sup> 鲍威尔表示希望，关于反法西斯斗争、关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的辩论不要随着巴黎代表会议的闭幕而结束。

如他所说，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导致许多党内部的分化加剧。

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全面失败，在社会主义工人

<sup>①</sup>奥托·鲍威尔：《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1933年8—9月号，第321页。

<sup>②</sup>《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巴黎代表会议记录》，第280页。

国际内部的影响日益衰落。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疯狂迫害下，这个党处于非法状态，主要领导人东躲西藏，无力从事国际工作。自巴黎代表会议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作用日趋缩小，与它在国际前期活动中的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照。



## 第五章

# 法西斯执政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33—1938）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仍然坚持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机会主义政策，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动本质，所以，当希特勒政府将反革命恐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德国工人运动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既没有改变他们的合法主义立场，做好开展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准备，也没有改变他们敌视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同共产党人采取统一行动，共同开展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错误政策终于将自身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33年6月22日被取缔。

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取缔以后，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成立了以奥托·韦尔斯和汉斯·福格尔为首的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孤立境地和实现组织领导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要求，于1934年1月发表了布拉格宣言。布拉格宣言根据对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训和法西斯专政危害的分析，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对反法西斯胜利后的未来新国家的总体构想。宣言对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不仅自己拒绝同德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且反对其他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个人与德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尽管如此，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与

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积极为建立德国人民阵线而斗争。留在德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共产党人采取共同行动。

1933年至1938年的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是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不仅有流亡执委会，而且还有“新开端”、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和红色战士这些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以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为主体的红色突击队、社会主义阵线和劳动解放社等社会民主党组织也在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一节 社会民主党由合法的党 变为非法的党

### 一 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政府的错误认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严重失败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认为希特勒政府是“封建的、大资本主义的和大农业的联合”，<sup>①</sup>是“反动的大资本主义和大农业的集中”，<sup>②</sup>但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仍然坚持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政策，并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动本质。

<sup>①</sup>1933年1月30日《前进报》，见库恩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美茵）1977年德文版，第218页。

<sup>②</sup>赖因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科隆1978年德文修订第3版，第232页。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始终认为，法西斯势力虽然一时得势，但它终于会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不一致和追随者利益上的矛盾而失败，即使对魏玛共和国的生存构成威胁，也是暂时的。所以，当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取得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领袖既不能提出符合需要的理论，也没有做好实际斗争准备。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希特勒是通过合法途径上台的，因此与巴本和施莱歇尔的总统内阁没有本质区别，它是一个“符合宪法的保守政府”，希特勒是“保守政府的首脑”。<sup>①</sup>由于政府里真正掌握实权并决定未来政策的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而是大农业和大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不能认为新政府是法西斯政府。正如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933年1月30日在题为《希特勒——巴本——内阁》的评论中所说：“作为弗兰茨·冯·巴本的杰作的新内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哈尔茨堡阵线内阁。……具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征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这里有3个人：希特勒、弗立克和格林。……比这3个民族社会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另外3个人：希特勒、巴本、胡根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法西斯的试验与他们的交易是一致的，只有不远的将来才能说明”。<sup>②</sup>

因此，社会民主党领袖将希特勒政府垮台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内部矛盾上。纳粹党在联合政府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它只拥有11个内阁职位中的三个职位，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其他两个都不是重要职位。几个重要的部都掌握在保守主义者手中，尤其是巴

<sup>①</sup>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1933年1月31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上的讲话，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20页。

<sup>②</sup>1933年1月30日《前进报》，见《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 and 文献》，第218—219页。

本，不仅是联邦副总理，而且兼任普鲁士总理，同时又有兴登堡总统做后台。参加联合政府的人分别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彼此利益上的冲突使联合政府处于动荡之中。因此，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即使没有外部打击，希特勒政府也会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而垮台。法西斯运动获得巨大发展和大批追随者的原因是希特勒许诺给他们工作和面包，将他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现在他们欢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是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会履行自己的诺言。政府事实上不可能缓和危机所造成的社会贫困，因此希特勒的追随者会因为失望而大量减少。社会民主党领袖根据这种假设预测，3月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是给执政党带来失败，希特勒会由于在国会中得不到多数而下台，否则就会导致激烈冲突。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总统会根据宪法解散政府。同时，将军们也会站在民主力量一边，为保卫魏玛共和国而积极参与政治斗争。

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新政府不是法西斯政府，它将由于内部矛盾而自行垮台，所以他们极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利用示威游行、政治集会和总罢工等议会外措施反对希特勒政府。在全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党员纷纷要求采取议会外行动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不得不于1933年1月30日召开联合会议。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在会上说：“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是议会外的行动，提出举行旨在不同于向大街进军的群众罢工、单独罢工、示威游行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反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议会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我想谈谈我对此的看法。当希特勒基本上站在宪法基础上的时候，纵然可能是百倍的虚伪，但如果我们为他提供破坏宪法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同时

会使内阁之中的不团结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sup>①</sup>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在同一天发表的号召书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继续坚持合法斗争。“我们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政府使用或声明其权力反对宪法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工人阶级和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对。个别组织或独立团体的无纪律的行动将会给全体工人阶级带来最严重的损失”。<sup>②</sup>那么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追随者应该怎么办呢？布赖特沙伊德的回答是“为宪法被破坏的时刻做准备”。“准备好就是一切！”“适合于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是做好准备；适合于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是积聚力量。过早的行动只能延长权威思想的寿命”。做准备的目的都是为了迎接希特勒政府垮台后必然到来的“劳动人民政府”。<sup>③</sup>

作为德国最大工会组织的全德工会联合会也采取了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立场。联合会领袖在1933年1月30日的号召书中要求其会员：“为了严格和有效地防止破坏宪法和民权的行为，冷静和审慎是第一原则。千万不要草率行事并进行有害的单独行动”。<sup>④</sup>

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会会员对他们的领袖是信任的。他们相信，他们的领袖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利用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阻止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但是，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事实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所说的“准备好就是一切”，不是为进行议会外斗争做准备，而是准备参加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同时，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1月30日

①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20页。

②《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232—233页。

③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20、222、223、220页。

④《全德工会联合会1933年1月30日告工会会员书》，转引自克劳斯·马姆马赫：  
《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33—1939》，柏林1974年德文版，第20页。

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建议反应消极。这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认真考虑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希特勒政府。因此可以说，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向广大党员所做的许诺，只不过是阻止已经出现的一些地方组织和部分党员的议会外行动，和平息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

## 二 希特勒政府镇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在社会民主党领袖用“为宪法被破坏的时刻做准备”来慰藉广大党员及其追随者的时候，希特勒政府已将反革命恐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了其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最大障碍——德国工人运动。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德国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希特勒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最后达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目的。对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公开镇压，尽快取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希特勒则选择了一条分阶段限制的策略。

希特勒镇压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兴登堡总统于1933年2月4日签署的一项《关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命令》。其内容主要涉及到集会、示威游行和散发印刷品等活动。由于其附加条款具有很大弹性，所以国家机关和警察机关可以极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限制和破坏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活动，查禁反法西斯组织的报刊和宣传材料。根据这项命令，希特勒政府立即取消了共产党的集会，查封了共产党的报刊。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遭到冲锋队的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报刊一次又一次被勒令停刊，甚至机关报《前进报》也由于发表社会民主党竞选号召而被迫停刊3天。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利用这项命令破坏工人阶级政党参加3月5日的国会选举，从而使选举产生有利于稳定希特勒政府的结果。

国会纵火案的次日，即1933年2月28日，希特勒使兴登堡总

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虽然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但由于宣布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第七款，从而使魏玛宪法中重要的基本民主权利失去效力。从此，德国共产党正式被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还能在议会里进行有限的活动，但希特勒政府已经开始加快限制社会民主党的步伐。在三月份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被捕。黑森地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乌利希在集中营里被折磨致死。仅在1933年3月23日国会会议之前，就有9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被监禁。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被勒令停刊。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常常遭到禁止。社会民主党的钢铁阵线和旗帜团组织被取缔。

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格林不仅解除了普鲁士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的职务，用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取而代之，而且命令警察尽量避免同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发生冲突。2月20日，格林组建了一支拥有5万人的辅助警察部队，其中4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万人来自钢盔队，从而使纳粹党的暴力组织具有了警察的职能，镇压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加强。

希特勒政府还将掌握的警察机构和司法机构用于镇压工人运动。从2月份开始组建的国家秘密警察是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主要力量。国会纵火案以后，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搜捕。被捕的人被投入集中营，失去了人身自由。那些未流亡或未隐藏起来的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成了盖世太保的牺牲品。

1933年4月7日颁布的《重建职业公职人员法》，不仅使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被依法赶出国家机关，禁止担任公职，而且那些不愿意退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勒令辞职。

1933年3月23日在柏林克罗尔剧院举行的国会会议上，希特勒宣布了他的所谓政纲，迫使国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消除人民和

国家痛苦法》的授权法。授权法规定：政府可以在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外制定法律。因此，授权法成为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希特勒从这一天起正式成为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之奋斗和全力保卫的议会民主制度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了。

从1933年4月开始，法西斯政府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了全面进攻。法西斯政府不仅查封了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报刊，而且接管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印刷厂。5月2日，冲锋队占领工会大厦，工会被勒令解散，大批工会干部被关进集中营。5月10日，希特勒政府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它所控制的旗帜团的全部财产和全部新闻机构。5月7日的国会会议以前，有18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和监狱里。从6月21日开始在柏林的帕尼克区发生的流血周里，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约翰内斯·施特林在内的许多社会民主党领导干部被冲锋队杀害。

1933年6月22日，希特勒政府内政部长弗立克正式签署了取缔社会民主党的命令。弗立克不仅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党，“不能要求得到与人们给予共产党的待遇所不同的待遇”，而且要求“各邦政府根据总统1933年2月28日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制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措施，特别应立即禁止所有今天仍为议会和地方代表机构成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继续行使其代表权”。<sup>①</sup>根据这项命令，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辅助组织和后备组织全部被取缔，报刊被查封，包括自由工会的财产在内的全部财产被没收。

希特勒政府利用分阶段限制策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拥有几十年光荣历史和100万党员

---

<sup>①</sup>《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198—199页。



的德国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

### 三 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态度及其被取缔

虽然希特勒从一上台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社会民主党，但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始终采取容忍态度，决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在野派，试图以此保证其党组织合法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国会纵火案和兴登堡总统签署《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以后，作为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和《前进报》主编的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菲尔仍然认为法西斯主义者“只能象合法政府那样行动，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做一个合法的在野派”。<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虽然于1933年3月23日在国会表决授权法时不顾法西斯分子的威胁投了反对票，但这决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领袖已经放弃了他们所奉行的容忍政策。诚然，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在其著名的演说中猛烈抨击了授权法。他说：

“在社会民主党经历了最近一个时期的迫害以后，谁也无法要求或希望它对这里提出的授权法投赞成票。……自从德国有国会以来，选举的人民代表对公共事务的监督在目前这种程度上和由于新的授权法在更为严重的程度上被取消，是从来没有过的。政府拥有如此无限的权力，不仅必然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使出版失去任何活动自由。”<sup>②</sup>他呼吁执政党运用3月5日的选举结果为自己提供的“严格按照宪法条文和规定进行统治的可能性”，<sup>③</sup>并且庄严声明：“魏玛宪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但是，我们信守其中所确立的关于法治国家、平等和社会权利的原则。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声明

<sup>①</sup>1933年3月11日《前进报》，转引自《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33—1939》，第49页。

<sup>②</sup>《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234页。

<sup>③</sup>同上，第234页。

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们摧毁永恒的、坚不可摧的思想的权力。”<sup>①</sup>但是，奥托·韦尔斯在其演说中仍然首先强调他们同意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他说：“总理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德国享有平等地位的外交政策，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特别表示赞成，因为我们历来就在原则上这样主张的。”<sup>②</sup>同时他还保证说：“我们既没有向巴黎请求干涉，也没有把几百万钱转移到布拉格去，也没有向外国发布夸大事实的消息。”<sup>③</sup>

社会民主党领袖对待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态度也表明他们在奉行容忍政策。

从3月初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断被勒令停刊。为了说服政府取消对其报刊的禁令，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于3月底派代表就社会民主党报刊复刊问题同格林进行谈判。格林认为，只有外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停止报道法西斯政府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恐怖行为，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才能复刊。在3月24日进行谈判以后，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菲尔、维克托·席夫、保罗·赫茨和埃米尔·基尔希曼分别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士等国进行游说，试图说服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德国的法西斯恐怖做所谓实事求是的报道。

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韦尔斯于1933年3月30日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韦尔斯与社会主义工

---

①《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235—236页。

②转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101页。

③同上，第101页。

人国际书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于1933年3月17日和18日通过和发表了两项决议。第一项题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对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的间接回答。早在这项决议公布以前，韦尔斯就向阿德勒提出了强烈抗议。第二项题为《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对德国政治状况的态度。决议对法西斯政府迫害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怖措施提出了强烈抗议，呼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工人阶级政党与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韦尔斯声明他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因是国际通过了上述两项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向新闻界声明，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决议不负任何责任。韦尔斯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不仅使党内人心涣散，而且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威望，失去了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其结果只能是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有利。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柏林区领导与柏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组织的冲突也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顽固地奉行容忍政策。社会民主党柏林青年组织的领导干部认为，社会民主党很快就会被取缔，社会民主党领袖所采取的放弃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方针是灾难性的。他们决定将柏林青年组织转入地下。可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却采取各种措施阻止柏林青年组织的正确行动，甚至在大多数柏林青年组织反对的情况下将柏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干部开除出党。

在1933年5月17日的国会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同样表现了对希特勒政府的无条件的容忍态度。119名社会民主

党议员，只有6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18人被关押在法西斯的集中营或监狱里。其余的人或者已经流亡国外，或者没有出席国会会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仅不抗议法西斯的恐怖行为，而且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其关于投票赞成希特勒《和平决议》的声明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社会民主党议员同意5月17日的国会决议并不意味着对希特勒政府投信任票，而是同意德国的和平外交政策。”<sup>①</sup>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这种态度给国内外舆论界一种假象，似乎全体德国人民都一致拥护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为希特勒宣传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

在法西斯上台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在对待希特勒政府的态度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德国社会民主党1933年4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表明了这一点。这次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党的政策的决议，大多数执委会委员重新当选。但是，1933年5月17日，党的领导机构与议会党团之间就国会决议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且未取得一致意见。从这时起，在党的领导机构内开始存在着两个相互斗争的派别。一派是以韦尔斯为首的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另一派是以保罗·勒贝为首的留在柏林的执委会委员以及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

韦尔斯和汉斯·福格尔以及另外4名执委会委员根据执委会的决定于1933年5月初开始流亡生活，在当时尚属法国管辖的萨尔布吕肯组织流亡领导机构，其任务是在党组织被取缔以后保证党的领导机构能够正常工作。在5月2日工会被取缔以后，社会民主党合法存在的日期已经屈指可数了。社会民主党的财产

---

<sup>①</sup>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27页。

于5月10日被没收以后，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放弃了对党组织继续合法存在和进行合法活动的幻想。于是，他们决定开展反法西斯抵抗斗争。同时，他们在外国看到，德国共产党由于其不妥协的抵抗政策和积极为工人阶级统一行动而进行的斗争在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得到不少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和理解，正如韦尔斯所说，欧洲至今只看到一个共产主义的反对派。<sup>①</sup>因此，社会民主党领袖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立即停止执行妥协政策，就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带来更大的损害和失去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支持。为此，他们试图阻止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希特勒外交政策投赞成票，并于1933年5月21日与来自柏林的执委会委员埃里希·林耐尔和马克斯·韦斯特法尔共同决定将流亡执委会转移到布拉格，在那里出版《新前进报》，委托林耐尔和韦斯特法尔组织德国国内的非法活动。以勒贝为首的留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坚决拒绝这一决议，并于6月19日在柏林召开有留在柏林的执委会委员、国会和邦议会领袖以及一些区委书记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选举了以勒贝为首的新的执委会。他们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声明：

“在柏林新选出的党的执委会独自负责党的领导工作。那些流亡国外的党员同志不能为党发表任何声明。对于他们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党明确声明不负任何责任”。<sup>②</sup>两派的意见分歧终于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以勒贝为首的一派始终坚决反对对法西斯政府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在他们看来，依靠对法西斯政府的妥协就可以防止党最终被取缔和使政府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强制措施。但是，他们的善良愿望并没有能够使社会民主党免遭被取缔

---

<sup>①</sup>参见《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33—1939》，第53页。

<sup>②</sup>转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111—112页。

的厄运。这次会议后的第三天，即6月22日，内政部长弗里克就发布命令，以“反对德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叛国罪”为罪名宣布取缔社会民主党。7月7日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邦议会、市政厅和各种代表机关中的代表资格全部被废除。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近三千名社会民主党的干部被捕。成千上万名社会民主党员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遭到法西斯分子残酷折磨以至屠杀。

## 第二节 1934年布拉格 宣言的发表

### 一 布拉格宣言产生的过程

德国社会民主党1933年6月22日被取缔以后，党的执委会大多数成员陆续流亡国外，最后在布拉格建立起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以韦尔斯和福格尔为首的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披露真相”，进行宣传工作，为国内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提供宣传品，鼓吹进行“反对希特勒的革命”，并组织领导国内外全党的抵抗斗争。但实际上要起到这样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困难。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上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被镇压本身已宣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在此之前所执行的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政策的破产。可是，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却继续坚持同共产党相对抗的立场，反对同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对历史经验的痛苦回顾和对严酷现实的认真思考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广大工人党员和基层干部纷纷觉醒。他们在积极投身反

抗法西斯斗争的同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抵制。在流亡执委会收到的一份报告中说：“凡是碰到青年人的地方，到处都在责骂党的领袖，到处都在努力同德国共产党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强烈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立场”。<sup>①</sup>有的报告说，多数地下小组拒绝布拉格执委会的领导。

此外，早在法西斯上台以前，因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路线，组织上脱党而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建立了各自的地下组织，他们同在巴黎、英国、瑞士以及布拉格的流亡者一起，在许多刊物上著文批评党的右翼领导。这些批评集中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所奉行的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政策。例如阿·列文特洛夫写道：“我们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而我们的任务却在于不调和地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执行阶级政策，从削弱阶级意识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系中解脱出来，……我们之所以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是由于我们处于有很好保障的地位，因此欺骗了自己”。<sup>②</sup>他们的批评，无疑对社会民主党队伍的继续分化和削弱流亡执委会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中间威信很低、十分孤立，而且由于党在法西斯上台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流亡执委会主席韦尔斯在1933年3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在国际上也遭到了谴责，受到了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批评。

在这种极端孤立的形势下，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被迫作出某种转变。首先，让党内的左派伯歇尔、奥夫豪泽尔进入执委会。其

<sup>①</sup>《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67年第6期，第1504页。

<sup>②</sup>《新前进报》，1934年1月4日。

次，他们考虑要制定一个新的纲领性文件并在其机关刊物《新前进报》和《社会主义行动报》上发表，进行公开讨论，以便统一思想，一致行动。

1933年秋，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托执委会委员施坦普菲尔和林耐尔以及《新前进报》编辑库尔特·盖尔三人共同起草一个新纲领。纲领的第一个草案于同年年底起草完毕。这个草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观点。

草案首先就社会民主党领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草案承认，“社会民主党由于一系列最严重的错误和软弱而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在不抹杀其他党的过失的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引咎自责”。草案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夺得政治民主之后，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结构和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企图通过改善工人状况、实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尝试已被撞得粉碎”。草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重工业和银行转变为人民所有制，并且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每一个反对人民意志的人都将被剥夺，从而失去公民权利”。<sup>①</sup>同时，草案还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中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垄断资本通过托拉斯和卡特尔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企图已经遭到彻底失败”。<sup>②</sup>

草案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中间阶层的暴乱，而法西斯主义之

---

①埃里希·马蒂亚斯主编：《面向德国》，杜塞尔多夫1968年德文版，第197—211、205页。

②埃里希·马蒂亚斯主编：《面向德国》，杜塞尔多夫1968年德文版，第199、192、203、211页。



所以能够上台，首先是因为法西斯领袖成功地把大资本的代表、旧贵族集团拉到自己一边，“为了消灭民主及其缔造者——无产者有组织的力量，集合了所有的反动运动”。草案还初步承认实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的必要性，认为“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求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力量”，要把所有坚持“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他政党的代表”联合起来。<sup>①</sup>

这个草案在自我批评方面的尖锐措辞吓坏了流亡执委会的多数人，草案为执委会多数所否决。同时，党内的左派，特别是许多地下小组也不赞成这个草案，因为他们不同意草案关于法西斯本质所下的定义，强烈要求具体规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途径。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把这个纲领草案交给流亡巴黎的鲁道夫·希法亭和格奥尔格·德克尔，委托他们进行修改。在采用了德克尔的具体补充建议基础上，希法亭又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1月20日希法亭的草案几乎毫无变动地为布拉格执委会多数所接受，投反对票的只有奥夫豪泽尔和伯歇尔。在执委会批准之后，文件以《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标题，于1934年1月28日在《新前进报》和《社会行动报》上同时发表。这个文件就是人们所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34年布拉格宣言。

## 二 布拉格宣言的主要内容

布拉格宣言首先明确声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在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国家里，人民正忍受着被奴役和无法制的痛苦。德国工人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任务是以自由的权利代替被奴役的地位，以社会主义制度代

<sup>①</sup>埃里希·马蒂亚斯主编：《面向德国》，杜塞尔多夫1968年德文版，第199、192、203、211页。

替无法制的统治”。①

接着，宣言分别阐述了七个问题。

在第一部分以“革命斗争的条件”为标题，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没有妥协、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位置。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取决于夺取以及巩固国家政权的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这个策略要求用一切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去推翻专政”。②在谈到社会民主党自身的改建时，宣言认为：“革命的斗争要求革命的组织。旧的形式、旧的机构已不复存在，使之重新恢复的企图不符合新的斗争条件。由富有牺牲精神的战斗者组成的新的组织形式必将出现。我们并不能自由选择这些形式。敌人通过其措施上的优势及其残酷的应用将行为规范强加于我们，甚至处于经济、物质和精神恐怖的高压之下的德国社会状况也将行为规范强加于我们。那些必须以昂贵的代价换取其活动经验的组织构成了革命者的精英”。③由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使德国国内的非法活动处于分散状态，所以宣言要求各地的地下小组要加强联合，克服本身的分散性，努力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在宣言的第二部分“群众运动的目标”和第三部分“政权的行使”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首先提出了争取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推翻法西斯专政的两大任务。作者写道：

“为了能够使工人运动重新成为群众运动和使社会主义的解放斗争成为群众自觉的斗争，必须重新夺取民主权利。任何民主权利都是对专政继续存在的威胁。争取民主的斗争将发展成为彻底战

---

①迪特尔·多韦、库尔特·克洛茨巴赫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26页。

②③同上，第226页。

“胜利纳粹国家政权的斗争。”<sup>①</sup>宣言认为：“这一斗争只是夺取整个国家政权的革命过渡阶段。专制制度的垮台，如果不是外部灾变所致，就只能在暴力的胜利之中实现，只能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实现。当一个坚定的、充满激进的斗争精神的、由一批富有经验的优秀分子所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利用客观革命形势时，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它只能产生于群众自身的行动。”<sup>②</sup>宣言在总结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失误时指出：“1918年的变革发生于由于战争和人民群众的民族激情所造成的反革命的发展时期结束之时。皇权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有准备的、积极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战场上的失败被推翻的。社会民主党作为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未遇反抗而获得国家领导权。它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僚、甚至改组后的军事领导机构分享这个领导权。它把旧的国家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了。这是在战争期间迷失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所犯的严重的历史性错误”。<sup>③</sup>在展望未来的革命斗争时，宣言认为，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以后“将建立一个由工人革命群众政党支撑和监督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取得胜利的革命捍卫国家政权；铲除任何可能反抗的根源；将国家机器变成人民群众的统治工具”。<sup>④</sup>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革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政治和社会措施包括：成立革命法庭，审判犯有谋杀罪和侵犯公民权利罪的政治犯；任命革命政府最可信赖的人担任司法部门的要职；废除官僚机构；组织可以信赖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改组军官团；废除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28—229页。

②③同上，第229页。

④同上，第229—230页。

一切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和纳粹专制政府发布的命令；实现没有种族和宗教差别的完全的公民平等；教会和国家分离；颁布有关社会、经济 and 财政方面的必要的法律。经济措施包括：立即无偿没收大地产和大工业；将森林和银行收归国有。国家政权通过上述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得到巩固以后，开始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以绝对多数选举政府首脑，然后由政府首脑组阁。新内阁的组成标志着革命政府的使命已经完成，新的自由国家已经建立起来。

在第四部分“经济革命”和第五部分“社会革命”中，宣言说明了工人阶级在新的自由国家里将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进行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因为重工业、银行和大地产的社会化只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

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克服经济危机和失业；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代替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用对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追求代替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用劳动力的节约代替旨在提高利润的无规律的合理化；用生产力的有计划提高、生产和消费的同步增长代替以消费为代价的生产部门的无规律的膨胀；用不同部门之间的和谐的发展代替彼此之间的破坏性的斗争”。<sup>①</sup>

宣言认为，在新的自由国家里，不仅要进行经济革命，而且还要进行广泛的社会革命。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资本财产，保护劳动财产，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村和城市的劳动财产将从大农业和大工业的占有和银行资本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第二，技术和领导的意义将由于对生产的改组和革新得到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31—232页。

提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虽然仍然需要训练有素的领导者，但将赋予其工作新的内容和地位。第三，将废除教育特权，继续升学的唯一标准是才能和天赋，而不是出身。正在成长的一代不仅要受到未来职业方面的教育，而且还要教育他们如何履行自己在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义务。第四，将重新恢复精神自由和科学自由，保证文化和艺术不受官僚势力和教会势力的干涉，将个人不容让渡的权利和人类的尊严重新还给个人。第五，劳动将成为增加社会财富的社会服务。对技术进步的有计划的控制将使人类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消除经济危机将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缩短劳动时间和人类从维持生存和寻找工作的日常物质忧虑中解放出来将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成员都能够关心艺术和科学以及欣赏艺术，将会产生新的集体精神、新的生活观和旨在充分发展的新竞赛。第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数百年之久的对立将逐步被克服；依靠军队、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来维持的强权国家将为人人参加管理的社会自治所代替；意味着专制和不负责的领袖原则和政党专制制度将为自由人完成任务的责任感所代替；人类将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sup>①</sup>

在题为“裁军和战争危险”的第六部分中，宣言揭露了法西斯专政的危害性和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认为法西斯专政“不仅对德国来说是耻辱和危险，而且意味着对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胁”。<sup>②</sup>希特勒所要发动的战争不仅会使其他民族失去土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意味着用无限完善的破坏手段毁灭文明。法西斯专政的胜利意味着国内的永恒的奴隶制度和残暴统治，它将向世界蔓延”。<sup>③</sup>同时，宣言指出：“希望通过战争来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32—234页。

<sup>②</sup>同上，第235页。

<sup>③</sup>同上，第235页。

推翻专制制度，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制止战争。因此，他们坚决谴责对希特勒德国的任何军事上的妥协，警告全世界的工人政党不要低估德国民族主义的危险。……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文钱，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也一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口号”。<sup>①</sup> 宣言特别强调：“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来自外部的、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德国专制制度的崩溃来肢解德国的任何企图。他们不承认导致德国分裂和意味着阻碍德国自由和经济发展的和平”。<sup>②</sup>

宣言的最后部分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统一”。宣言在这一部分中论述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德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问题。文件声明：“在这场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结成战线。它将呼吁被纳粹许诺所欺骗的农民、小工商业者、商人，在现政权下承受难以想象的压迫和侮辱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共同斗争”。<sup>③</sup> 因为，“工人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已由它的敌人所消除，分裂的原西已不复存在。推翻专政的斗争不能以不同于革命的方式进行。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无论是无数分裂组织的支持者还是专政的敌人，都将会在斗争中由于斗争条件而成为同样的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sup>④</sup> 宣言申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知道，必须摆脱任何宗派的隔绝，已经意识到它所担负的将工人阶级团结于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之中的使命。如同它准备支持一切开展反对专政而不是反对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的组织所进行的非法工作一样，为了讨论革命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这些问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35—236页。

②同上，第236页。

③同上，第236—237页。

④同上，第237页。

题，它将开放自己所有的报刊、杂志和出版物。因为它确信，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由共同的精神工作实现”。<sup>①</sup>

布拉格宣言的结尾写得十分精彩。希法亭充分抒发了德国工人阶级反抗法西斯的坚强意志和豪迈气概。他庄严声明：“我们要为人类伟大而不朽的思想而斗争。我们是冲破中世纪的禁锢以来的伟大的历史发展的支撑者，我们是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朽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愿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我们要为自由而战，为没有阶级统治的自由而战，直到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统治人的现象为止！……德国工人们，你们失去的只是奴役你们的枷锁，你们得到的将是自由的世界和社会主义！……通过自由走向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自由！”<sup>②</sup>最后，宣言将“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万岁！”<sup>③</sup>作为它的结束语。

总的来说，布拉格宣言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的表述上，同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海德堡纲领相比，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 三 布拉格宣言的作用及其影响

布拉格宣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取缔以后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流亡执委会内部左右两派互相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因此，宣言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

部分社会民主党左派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宣言恢复了党的

---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37页。

②同上，第237—238页。

③同上，第238页。

马克思主义传统。例如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施夫令在1933年底就曾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两种传统：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过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卢森堡，以及写作《金融资本》一书时的希法亭，直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另一种传统是由拉萨尔和施韦泽创立的，经由福尔马尔和大卫传至艾伯特和赖尔巴特。第一种传统是有生命力的，后一种传统已经死亡”。<sup>①</sup>

诚然，宣言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宣言关于推翻法西斯暴政，实现工人阶级统一，建立反法西斯战线的号召，集中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因此，布拉格宣言是继爱尔福特纲领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错的一部纲领，对它的作用和影响不能低估。

但是，宣言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自1914年以来背叛马克思主义、投靠资产阶级的历史罪恶，是不能用几句自我批评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当时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奥夫豪泽尔和伯歇尔就曾指出，宣言带有隐蔽的改良主义性质。他们要求党充分揭露和克服改良主义。<sup>②</sup>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执委会其他成员的响应。

希法亭在起草宣言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以奥夫豪泽尔和伯歇尔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左派的观点。但是，由于奥夫豪泽尔和伯歇尔没有参与纲领的起草，他们所提出的尖锐批

---

<sup>①</sup>转引自埃·马蒂亚斯：《社会民主主义与民族》，斯图加特1952年德文版，第26页。

<sup>②</sup>1934年2月18日《新前进报》。



评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分析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要求也未在宣言中体现出来。所以，在宣言发表以后，他们一方面在《新前进报》上撰文批评布拉格宣言，另一方面又起草一份题为《通向社会主义德国之路——统一战线的基础》的文件，并提交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要求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以韦尔斯为首的多数派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才于1934年秋天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作委员会政治目标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他们在文件中声明拥护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愿意与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并将推翻希特勒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奥夫豪泽尔和伯歇尔企图以此争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拥护新政策，从而使布拉格流亡执委会“革命化”。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当时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并未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最后连他们本人也于1935年1月被开除出布拉格流亡执委会。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在宣言发表以后的实际行动表明，以韦尔斯为首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很快就完全背弃了他们亲自举手通过的布拉格宣言。西格蒙德·克虏门埃尔在2月4日的《新前进报》上对那些企图改变被他称为社会民主党传统原则的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盖尔在2月28日的《新前进报》上撰文反驳“革命社会主义者”对流亡执委会的民主概念的批评。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在1936年1月30日为抗议法西斯上台三周年举行的政治集会发出的题为《拥护德国，反对希特勒》的号召书中，将布拉格宣言中与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和经济民主化相联系的政治自由概念简单地归结为对“自由选举一个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对人民负责的全国领导机构的人民代议机构”<sup>①</sup>的要求。1935年12月

---

<sup>①</sup>1936年2月2日《新前进报》。

29日的《新前进报》公开声明要用英国式的民主制度代替希特勒专政。<sup>①</sup>这表明，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不仅公开在报刊上为魏玛民主恢复名誉，而且抛弃了布拉格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统一战线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流亡执委会也没有用任何实际行动表明他们要改变以前的立场。相反，韦尔斯却认为与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只能“给争取共产党工人的工作增加困难”。<sup>②</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背弃布拉格宣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通过布拉格宣言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企图以此扩大自己对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从而使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在众多社会民主党流亡组织中获得合法的领导地位，将党内反对派纳入自己的行动轨道。正如韦尔斯所说，布拉格宣言是由于“形势的压力”对“时代精神”所做的让步。<sup>③</sup>施坦普菲尔在给盖尔茨的信中认为，当时在1933年至1934年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一种骗局。贝尔斯和考茨基也承认，布拉格宣言所讲的一切是基于对形势的考虑，而不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放弃原来的立场。他们背弃布拉格宣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流亡执委会对德国国内抵抗运动估计的变化。直到1935年初，流亡执委会对德国国内抵抗运动一直持乐观态度，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经济困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1934年7月的冲锋队叛乱将构成希特勒政权垮台和新政权建立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们不是根据宣言的要求同德国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是将推翻希特勒专政

---

<sup>①</sup>1935年12月29日《新前进报》：《民主的伟大教训》。

<sup>②</sup>海因茨·尼曼、奥托·芬戴森等著：《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柏林1965年德文版，第231页。

<sup>③</sup>转引自汉斯·J. L. 阿道夫：《奥托·韦尔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1894—1939》，柏林1971年德文版，第309页。

的希望寄托在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伙伴的合作上。于是，韦尔斯于1935年2月同海因里希·布吕宁和特雷维拉努斯就在德国建立保守军人过渡政权问题进行谈判。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国防军至少会保持中立，甚至可以争取他们支持反法西斯斗争。这样，通过在德国建立保守军人政权这个过渡阶段，可以重新获得自由和民主。

但是，冲锋队的叛乱没有对希特勒政权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领袖所期望的经济混乱也没有出现。于是，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于1935年初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现政权很稳定，也不可能由于经济危机而垮台。然而，新的估计仍没有促使流亡执委会去与德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领袖又将推翻法西斯专政的希望寄托在法西斯国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上，认为希特勒政府对私人企业的不理智的强制政策会日益增加德国资产阶级的忧虑。

德国共产党领袖由于未能克服本身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极左态度，也没能对布拉格宣言做出公允的评价和正确的反应。他们认为布拉格宣言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诡计”和“资产阶级的帮凶”。<sup>①</sup>直到1934年秋天，皮克和乌布利希才得以反对这种狭义的宗派主义观点。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德国共产党准备接受布拉格宣言的基本观点，推动流亡执委会以宣言为基础同共产党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为时已晚，因为流亡执委会已经背弃了布拉格宣言。

布拉格宣言在广大社会民主党党员中间也引起了不同反应。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对宣言表示欢迎，其中有不少人由于积极传

---

<sup>①</sup>转引自弗兰克·莫拉夫：《“统一”的口号与社会民主党》，波恩—巴特戈德斯堡1973年德文版，第26页。

递和散发宣言而被捕。但是，由于宣言在如何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和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等问题上只限于一般号召，没有提出具体设想，所以也令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失望。例如一个边境秘书处在1934年4月给流亡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难道现在还不到从我们这方面说明哪些是直接目标和谁是我们斗争中最欢迎的人的时候吗？现在我们要的不是宣言，而是明确的口号。”<sup>①</sup>另一份报告中说：“同志们在渴望着关于目前策略的方针。”<sup>②</sup>苏黎世、卢森堡、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流亡组织甚至拒绝接受布拉格宣言，因为他们认为宣言是由旧的改良主义的领袖发表的。

### 第三节 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斗争

#### 一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抵抗斗争及其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宣传工作，反映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声，向世界披露德国真相，为国内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筹措经费，提供宣传品。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流亡执委会在出版报刊、印制宣传品的同时，在德国邻国境内组建了边境秘书处网。

因为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政府没收其财产以前就已经成功地将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所以流亡执委会的活动拥有一定的物质

---

<sup>①</sup>转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192页。

<sup>②</sup>同上，第192页。

保证。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拥有自己的财产，又有苏台德地区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帮助，所以很快在国外建立起了自己的印刷厂，从而使其出版报刊、印刷传单和宣传品等工作得到保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流亡执委会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卡尔斯巴特等地出版了《新前进报》、《社会主义行动报》、《社会主义杂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德国报告》（自1937年起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报告》）、《消息报》等5种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前进报》。它自1933年6月18日创刊起，每周出版一期，1936年每期的平均印数是4,300份。除了出版报刊以外，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还根据形势的需要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和传单。例如，在1934年8月19日的公民表决之前，流亡执委会印制了《告德国人民书！》以及《天主教徒们！》、《希特勒——欧洲的头号公敌！》等传单。反法西斯主义者在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散发的《我们呼唤世界青年！》这份传单就是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印制的。

为了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进行联系，沟通信息，流亡执委会在德国邻国的边境附近建立了边境秘书处网。在德国的7个邻国共建立了16个边境秘书处，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有6个，波兰、比利时、法国和瑞士各有两个，丹麦和卢森堡各有1个。流亡执委会根据每个边境秘书处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它们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流亡执委会将布拉格作为活动基地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容忍抵抗运动，而且与德国的巴伐利亚、图林根、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许多地区接壤，从这些地区又可以到达工人人口稠密的德国中部地区和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边境秘书处是流亡执委会与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它们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将流亡执委会的文件、报刊、宣传材料等印刷品通过秘密渠道转送到国内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党员手中，由它们在群众中散发。除一般的文件和报刊外，它们还曾散发格哈德·泽格撰写的关于他在奥拉尼恩堡集中营经历的小册子以及1934年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集中营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边境秘书处又是情报中心，它们收集来自德国国内的各种情报，报告给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流亡执委会根据这些情报评估自己的政治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并根据形势的需要将这些情报在内部传达或公诸于世。

边境秘书处由布拉格流亡执委会直接领导，其工作人员都是来自所在秘书处直接负责的地区的积极可靠的社会民主党骨干。他们将所负责地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组织起来，建立了发行网，散发秘密运入德国的文件和宣传材料。由于发行网在1935年和1936年的大搜捕中几乎全部被摧毁，因此边境秘书处工作人员开始亲自承担运送和散发任务。他们打扮成商人，带着有伪装的宣传材料越过边境进行散发。但是，随着纳粹恐怖的加剧，边境检查越来越严，从而给边境秘书处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为了将报刊和宣传材料及时送到国内反法西斯主义者手中，流亡执委会还与埃多·菲门斯领导的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利用国际货运列车、远洋运输船队和内河运输船队运送宣传材料。同时还对宣传材料进行伪装，许多宣传材料，从封面和前几页看完全是商品广告或宗教宣传品，中间则是政治性文章。《布拉格宣言》的封面上印的就是《自我剃须艺术》。《新前进报》则是用小型字典纸印刷的。在德国为流亡执委会散发材料和提供情报的不仅有社会民主党组织，而且还有汉堡、基尔和卢卑克等城市的运输工人、码头工人和海员。其中

有不少人因此而被捕。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的宣传活动是第三帝国初期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35年初，《社会主义行动报》每期刊在德散500—1500份，约有6000—12000名读者。此外，1935年至1936年，反法西斯主义者每年在德散发的传单约有160万份，1937年约有90万份。但盖世太保认为，其中70%是由德国共产党散发的，其余的是由社会民主党以及与之相接近的组织散发的。<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因为社会民主党遭到与德国共产党相同的命运而放弃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敌视德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始终坚决拒绝同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布拉格宣言虽然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但宣言既没有提出具体设想，流亡执委会也没有实际行动，而且社会民主党领袖很快就背弃了布拉格宣言。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早在共产国际七大和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以前就曾向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提出过举行谈判和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在1935年工厂信任委员会选举以前，德共中央委员会于2月11日向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建议号召两党党员共同提出工人候选人，就选举口号和策略问题达成协议。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建议被流亡执委会以反对参加选举为由而拒绝。1935年上半年，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于2月、4月和6月三次向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提出关于共同行动的建议，直到8月6日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才与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举行关于在流亡国家召开共同会议的谈判。

---

<sup>①</sup>里夏德·勒文塔尔等主编：《德国的抵抗和拒绝1933—1945》，波恩—柏林：1984年德文版，第89页。

1935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策略转变。决议认为法西斯得逞的原因是工人阶级被分裂，所以国际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德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于1935年10月在莫斯科附近召开代表会议。为了迷惑敌人，宣称这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所以史称“布鲁塞尔会议”。会议做出了争取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德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尤其是宗派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德共决议认为，在法西斯统治下，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任何将统一战线视为扩大德国共产党队伍的行动或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机会的企图都是错误的。

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以后，德共中央委员会于11月10日写信给布拉格流亡执委会，详细阐述了布鲁塞尔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并建议号召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干部和党员共同协商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任务和共同行动，希望达成关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同行动、反对物价上涨和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协定。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关于实现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在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施坦普菲尔、福格尔、赫茨、希法亭和考茨基等人改变了以往对德国共产党的建议置之不理的态度，主张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以适当的方式同德国共产党进行谈判。盖尔、林耐尔、韦尔斯和奥伦豪埃尔等人则始终拒绝同德国共产党进行任何谈判。最后，两党代表于1935年11月23日在布拉格举行谈判。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来看，这次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自1922年为反对拉特瑙谋杀案而采取共同



行动以来两党代表第一次共同坐在谈判桌前。

在谈判期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弗兰茨·达勒姆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向流亡执委会的代表施坦普菲尔和福格尔介绍了德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和目标的想法以及布鲁塞尔代表会议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流亡执委会的代表虽然承认在德国人民各阶层中间，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形成推翻希特勒专政的共同意志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但仍然拒绝了德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德共代表在建议被拒绝以后准备签署一项停止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协议，但也被流亡执委会的代表拒绝。其理由是德国共产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长达17年之久的攻击使自己失去了任何信任。国内抵抗战士反对两党达成协议。共同行动“将会给德国当权者提供一个求之不得的良机，让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幽灵重新复活，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将那些现在准备加入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民主党的人驱向右翼”。<sup>①</sup>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不仅自己拒绝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而且还反对其他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党员与共产党进行合作。流亡执委会在1936年1月24日致全体边境秘书处的通告信中指示它们不准与共产党进行合作，设法让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那些有共产党人在其中活动的组织。对于拥护统一战线的个人和组织，流亡执委会拒绝给予任何财政支持。

1939年1月德国共产党伯尔尼代表会议后，德共中央委员会又向已迁往巴黎的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和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宣布希特勒的行为不符合德国人民的意愿和

---

<sup>①</sup>转引自《面向德国》，第244页。

委托；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希特勒政权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切身利益；控告希特勒是战犯；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达到团结的目的在于推翻专政和重建和平。流亡执委会直到6月中旬才作出否定的反应。盖尔、希法亭和施坦普菲尔等人在报刊上声明，他们拒绝与共产党进行合作的立场不变。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看，主要有下列因素阻碍其与德国共产党改善关系。

首先，对推翻希特勒专政的力量的看法不同。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只有依靠军队中的反对派和垄断资本的某些集团才能推翻法西斯专政，因此他们同自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盟友进行合作，同黑色阵线的领袖、著名法西斯主义者奥托·施特拉塞尔保持联系。当希特勒从1938年开始将一些感到不可靠的将军撤职以后，他们又试图从外部寻找推翻希特勒专政的力量，认为只有西方列强在战争中打败希特勒才能推翻法西斯专政。德共则主张在苏联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希特勒专政。

第二，对苏联的态度不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贯穿于流亡执委会的全部政策之中。韦尔斯1933年8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他说：“法西斯主义之路是肆无忌惮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将是肆无忌惮的。我坚信，如果欧洲世界只能在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德国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资本主义欧洲的帮助将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德国，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德国。”<sup>①</sup>德国共产党则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方针。

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和指导思想

---

<sup>①</sup>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39页。

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原则区别。社会民主党组织非法工作的最高原则是尽量避免冒险和牺牲，认为同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的合作会给在德国从事非法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带来严重的危害。共产党则主张义无反顾地将全部力量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甚至要求面临危险时也要继续进行非法活动。<sup>①</sup>社会民主党认为，德国共产党始终将消灭社会民主党作为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前提，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争取社会民主党群众的策略。<sup>②</sup>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后的目标问题上，社会民主党要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则是以俄国为榜样的苏维埃共和国。<sup>③</sup>

正是基于以上原则分歧，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改善。

## 二 国内社会民主党人与反法西斯统一行动

尽管流亡执委会极力反对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但一部分人仍然冲破阻力，同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

1934年和1935年，黑森、法兰克福、汉诺威、中巴登和上巴登、鲁尔区和柏林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达成了关于统一行动的协议。在当时尚由国联代管的萨尔区还成立了影响颇大的人民阵线。参加人民阵线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共同举行的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关于萨尔区与德国合并的宣传，要求维持萨尔区现状。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克斯·布劳恩和共产党代表弗里茨·普菲尔德于1934年7

---

<sup>①</sup>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53页。

<sup>②</sup>同上，第253—254页。

<sup>③</sup>同上，第254页。

月联名发表了萨尔地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呼吁书，号召工人和全体萨尔人民“共同举行反法西斯政治集会、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sup>①</sup>

同年11月，萨尔地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又联合发表了建立萨尔人民阵线的呼吁书，号召全体萨尔人民为维持萨尔区现状和将来与一个自由的德国合并而斗争。

在1934年和1935年的管理工厂的信任委员会选举中，由于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采取统一行动，取得很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统一行动的威力。根据1934年1月20日颁布的《国家劳动秩序法》，工厂委员会被信任委员会取代。法律规定，信任委员会及其助手的名单由企业主和纳粹工厂组织的领导人协商提出，工人们只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

在1934年春天的信任委员会选举中，绝大多数工人投了废票或不参加投票，法西斯分子总共才获得25%的选票。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800名职工全部投了废票；埃森的有轨电车公司只有30%的职工参加投票；在杜塞尔多夫的亨克尔工厂，2,800名职工中只有800人投法西斯候选人的票。在1935年的信任委员会选举中，虽然布拉格流亡执委会拒绝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共同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建议，但国内反法西斯主义者仍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共同行动。

不仅在许多工厂里反法西斯主义者联合抵制信任委员会选举，而且在许多地区还出现了由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前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联合组成的自由工会组织。1934年至1935年间，在乌珀塔尔共成立了61个纺织工人协会

---

<sup>①</sup>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56页。

和冶金工人协会。在柏林、萨克森、莱茵—鲁尔区、汉堡和上西里西亚等地区的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中也建立了许多类似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前工会会员在这些组织中进行合作。虽然许多工会组织不断地遭到破坏，大批工会会员被捕，受到审判，但自由工会组织的活动仍然很活跃。在柏林的建筑、冶金、木材等工业部门和铁路部门的自由工会组织都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

组织罢工和怠工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主要活动。他们通过组织罢工和怠工，反对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仅在1935年7、8月份，就发生了13次罢工和39次怠工，有4,006人因此而被捕。1935年10月18日，在埃斯勒本县区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虽然有5名参加罢工的人被捕，但企业主仍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1936年又发生了一系列比较大的罢工事件，其中包括6月25日欧佩尔——吕塞尔斯海姆汽车工厂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大罢工，有37名参加罢工的工人因此而被捕。盖世太保最为担心的是高速公路工地，因为这些公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如此，这里仍然不断发生罢工和怠工。1934年10月18日，在汉堡至不来梅的高速公路工地爆发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1935年夏秋两季，不少地区的修路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逮捕和解雇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还积极参加德国红色救助会的工作，与共产党人一起为被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帮助，帮助有被捕危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逃走，搜集有关法西斯政府迫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材料，提供给国内外新闻界。

1936年3月29日的议会选举前夕，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发表了告劳动人民书，告诫德国人民：“法

国、西班牙的例子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表明，只有共同合作和共同开展反对希特勒政权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就……。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自由工会会员要求你们在3月29日的选举中一致投反对票，反对希特勒”。<sup>①</sup>同时他们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撕毁盖世太保所贴的标语。

1936年夏天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虽然盖世太保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仍然向奥运会散发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其中有柏林自由工会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签署的《告奥林匹克参加者和奥林匹克客人书》，有《亲爱的奥林匹克客人！》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的传单、袖珍版的《工人画报》特刊号以及《请您了解美丽的德国！》和《我们呼唤世界青年！》等宣传材料。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这些宣传材料揭露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罪行和战争阴谋。他们还秘密地跟外国记者谈话，向他们揭露法西斯政权的白色恐怖。

一些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团体于1936年底在柏林成立了德国人民阵线，提出了十点纲领，主要包括下列内容：推翻希特勒独裁统治；废除血腥的司法制度，释放政治犯；保证信仰和世界观的自由；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国家里实现德国人民的完全自治；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兴办大规模的农民住宅；对银行、重工业和能源经济实行国有化。

社会民主党人与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统一行动虽然由于盖世太保的多次大搜捕而受到沉重打击，但到1939年，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又开始与共产党人恢复联系，

---

<sup>①</sup>转引自《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33—1939》，第144—145页。

进行合作。

### 三 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抵抗斗争

“新开端”、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和红色战士，这些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逐渐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由于摆脱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干涉，又及时转入地下做好了进行非法斗争的准备，所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

瓦尔特·勒文海姆（化名为米勒斯）领导的主要由青年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开端”，是一个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谋组织。法西斯上台以前，它就做好了进行非法斗争的必要准备。法西斯上台以后，“新开端”不仅以柏林为基地同其他城市的“新开端”组织保持联系，而且还同其他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和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933年春天，“新开端”约有一百名积极可靠的成员，并且与转入地下的柏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进行密切合作。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的年轻干部弗里茨·埃勒也参加了“新开端”的工作。“新开端”虽然认为自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新领袖，但它反苏反共和亲西方的倾向十分明显。它认为只有西方大国取得战争胜利才能推翻希特勒政权。它在1933年9月在卡尔斯巴特发表的题为《新开端》的纲领性文件中，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并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的本质是一样的，要求解散共产国际。

1934年和1935年，“新开端”同布拉格流亡执委会的边境秘书处保持着联系。分布在各地的“新开端”成员经常聚会，学习文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设在布拉格的“新开端”国外局收集关于形势和德国人民情绪方面的情报。1935年夏天，“新开端”的领袖们在继续进行非法斗争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上发生

了意见分歧，并导致“新开端”分裂。勒文海姆宣布“新开端”解散。一些干部和成员在里夏德·勒文塔尔（化名为保罗·泽林）的领导下继续活动。“新开端”的严密的组织形式，使其部分成员在1935年至1936年初的盖世太保大搜捕中幸免于难，得以继续进行活动。在柏林地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不仅与国外局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同柏林的德国人民阵线有往来。它们共同印制了一批宣传材料。这个在柏林地区活动的“新开端”组织于1938年夏天被盖世太保破获。弗里茨·埃勒同时被捕，次年被判处10年徒刑。在斯图加特、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等地区的一些城市里也有“新开端”组织，但它们很少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和其他抵抗活动，只是注意形势的发展，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1931年由国会议员马克斯·赛德维茨、库尔特·罗森费尔德和海因里希·施特勒贝格建立的。当时是中学生的维利·勃兰特也加入了该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在柏林、汉诺威、东萨克森和德国南部等地区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帮助受法西斯政权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逃跑，为其家属募捐。早在1933年和193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部分组织就遭到了盖世太保的破坏，不少人被捕。为了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进行合作，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干部曾到布拉格，同在那里的流亡执委会成员马克斯·赛德维茨进行协商，而且还同德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取得了联系。布勒斯劳、德累斯顿、汉诺威、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和纽伦堡等地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于1936年被盖世太保破获，其成员被捕。曼海姆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则一直活动到1938年春天。它不仅与德国南部地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其主要活动是散发从国外得到的反法西斯宣传材料，为被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家属进行募捐，为设在巴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领导处搜集情报。1938年



春天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被盖世太保破获。

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前身是1917年由哥廷根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奥纳特·内尔松创建的国际青年同盟。1925年改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约有300名成员，其中主要是职员、教师、知识分子和少量的工人。法西斯上台以后，流亡巴黎的维利·艾希勒领导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在国内组织成立了很多战斗小组。它们开始只是散发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秘密运入德国的宣传材料，不久以后就开始自己印刷传单。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商讨反法西斯口号。在柏林活动着一个由20—25人组成的组织，其成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领导人是中学教师尤利马斯·菲利普森。在不来梅、汉堡、科隆、马格德堡等城市也有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组织在活动，而且个别组织还同共产党进行合作。1935年夏天和秋天，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组织大部分被破获，很多成员被捕。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传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文章末尾印有一个悬挂在绞刑架上的纳粹党的卐字徽章。1936年以后，未被破获的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组织继续编写和印制传单，谴责法西斯的战争政策，揭露战争危险，为支持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募捐，并与德国共产党交换反法西斯宣传材料。在德国西部地区，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组织还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的铁路工人工会会员建立了联系。1936—1938年，奥格斯堡、柏林、不来梅、法兰克福（美茵河畔）、汉堡、汉诺威和科隆等城市的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组织全部被盖世太保破获，其成员被捕。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在国内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抵抗从此结束。

由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红色战士既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反对德国共产党，但同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保持着联系。1936年，红色战士组织的领导之间发生了权

力之争，从而导致组织分裂。1936年底和1937年初，盖世太保在柏林、德累斯顿、杜塞尔多夫、埃森、汉堡和斯图加特等城市逮捕了约150名红色战士成员，红色战士组织被彻底摧毁。

这些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虽然拥有明确的反法西斯斗争目标，但由于更多地是在纠缠内部组织问题，常常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甚至导致组织分裂，所以，它们的反法西斯斗争受到很大的限制。

以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为主体的红色突击队、社会主义阵线和劳动解放社等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的活动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1935年在柏林地区活动的红色突击队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组织。其领导人和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帝国旗帜团、工会组织和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要组织一批将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精英分子。1933年5月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为真正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我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红色突击队的下属组织一般由3—10人组成，分布在柏林各个地方。它还拥有自己的《红色突击队报》。1933年11月，每期印数为4,000—5,000份。红色突击队虽然既反对德国共产党，也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但他们曾于1933年秋天同流亡执委会进行联系，并在1935年2月至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经过军人专政达到魏玛式的联合作为奋斗目标。同时他们还试图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取得一致意见。红色突击队同比勒菲尔德、德累斯顿、哈勒、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1935年的大搜捕中，红色突击队组织被盖世太保摧毁。

维尔纳·布鲁门贝格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拥有3,000名骨干

分了，主要在汉诺威地区活动。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社会主义阵线就已经转入地下，做好了开展抵抗斗争的准备。社会主义阵线在其机关报《社会主义阵线报》创刊号上分析了法西斯专政，提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任务和目标，认为“希特勒专政的垮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希特勒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通过部分工人暴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它带给我们的不是能够在其基础上生长法西斯毒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阶级统治”。<sup>①</sup>因此社会主义阵线的任务是“在被压迫的时期里聚集德国工人阶级”。<sup>②</sup>因为将来号召工人阶级进行最后斗争的既不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这些党里的精英分子，所以社会主义阵线要为“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胜利运动创造条件”。<sup>③</sup>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活动是散发和邮寄自己的报纸和传单，开展宣传工作，吸收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自己的组织。1936年，大批社会主义阵线成员由于叛徒的告密而被捕，并于1937年对200多名被捕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处以重刑。

除红色突击队和社会主义阵线以外，类似的反法西斯抵抗组织还有在图林根地区活动的劳动解放社，以及在其他城市活动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和帝国旗帜团的组织。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印制和散发反法西斯传单，为受到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家属进行募捐。

红色突击队、社会主义阵线和劳动解放社这些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由于它们拒绝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向它们提出的承认其对社

---

<sup>①</sup>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第229页。

<sup>②③</sup>同上，第230页

会民主党的领导权和执行其政策的要求，一般也不愿意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从而使它们的活动在内容和范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 四 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历史评价

德国社会民主党1933年至1938年的抵抗斗争不仅没有能够阻止希特勒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使自己遭受了很大损失。抵抗斗争的规模日益缩小。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抵抗斗争是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西斯专政在德国建立以后，几乎所有阶级和阶层都有代表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从职业上看，他们之中有工人、职员、农民、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以及资产阶级。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来看，他们之中有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宗教界人士、和平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只有德国工人阶级从希特勒专政建立的第一天起就积极和自觉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代表则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大工人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存在着原则分歧，但在推翻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两大工人阶级政党都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从而成为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从盖世太保关于非法活动的形势报告来看，盖世太保首先关注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抵抗运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抵抗斗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付出了重大牺牲。法西斯政权的恐怖统治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所面临的最大困难。盖世太保的监视网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到30年代中期，最早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抵抗

组织大部分被破获，并根据《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反对政治骚动法令》和《防御对振兴民族的政府发起阴谋进攻的法令》等法令，对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处以严刑。法西斯上台初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前国会议长保罗·勒贝、库尔特·舒马赫等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1933年至1939年的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中，究竟有多少社会民主党人被捕，很难确切统计。仅在1936年至1938年这3年中，就有2,828名社会民主党人被捕。<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始终坚持以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韦尔斯早在1933年3月23日反对授权法的演讲中就宣布：“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庄严声明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sup>②</sup>韦尔斯的发言因此而得到很高的评价。《布拉格宣言》以拥护“人类伟大而不朽的思想”作为它的结束语：“我们不愿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我们要为自由而战，为没有阶级统治的自由而战，直到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统治人的现象为止！……通过自由走向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自由！”<sup>③</sup>流亡执委会在题为《拥护德国，反对希特勒！》的号召书中声明：“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联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就没有自由抉择。”<sup>④</sup>流亡执委会在1938年9月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发表的《告德国人民书》中号召德国人民“为自由而战！”<sup>⑤</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德国社

<sup>①</sup>参见《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33—1939》，第180页。

<sup>②</sup>《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235页。

<sup>③</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38页。

<sup>④</sup>《德国法西斯主义资料和文献》，第415页。

<sup>⑤</sup>同上，第421页。

会民主党党内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等组织就是意见分歧的产物。法西斯上台以后，不仅党内旧的分歧没有消除，而且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在分析法西斯获胜的原因和社会民主党失败的教训时，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式等一系列问题上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些原因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组织无法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起来。从客观上看，由于盖世太保对邮件、电话、电报等通讯工具进行检查，反法西斯主义者也难以保持固定的联系。

诚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抵抗斗争既不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不可能推翻希特勒政权，但是，它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不仅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强的斗志，而且也使不少德国人受到教育和启发，认清了法西斯政权的本质，了解了法西斯恐怖的真相，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们所做的援助工作使不少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免遭法西斯政权的迫害。所以，虽然不能过高地估计德国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功绩，但也不能否认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1939—1945）

1939年，希特勒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拖进了死亡与灾难的深渊。在战争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执委会依旧坚持反苏、反共的立场，把德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帮助，寄托在德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运动上。在德国国内处于反抗法西斯暴政第一线的广大德国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随着战火的蔓延，流亡者几无容身之地。1940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亦称“索巴德”）被迫宣布解散。

战争后期，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内重新开始了理论争辩的热潮，在西方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再次发生演变。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德国流亡者的理论探索中已初具雏型。

### 第一节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斗争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反战方针

1937年底，希特勒德国完成了军事一体化的过程，开始制定

法西斯战争计划。在这一年11月5日召开的希特勒和负责国家事务的五名顾问的联席会议上，提出德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要为组成德意志民族的8,500万人民取得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希特勒主张，首先要兼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42年以前把居住在中欧的德意志人合成一体；然后，侵略波兰和乌克兰，在欧洲大陆本土获得“农业方面的有用空间”。这时，德国的军火生产正处于狂热的峰颠，大约是英法两国同期全部军火生产的两倍或三倍。但羽翼丰满的希特勒暂且还不敢设想发动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历史表明，正是西方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的绥靖主义政策，在法西斯战争危险面前西方统治集团内部笼罩着的苟且偷安、不惜任何代价谋求和平的萎靡情绪以及东西方反战力量的分裂刺激了法西斯分子的战争野心迅速膨胀。

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9月开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基本摧毁了这个国家。接着，点燃起世界大战的战火。

1939年8月31日傍晚，在夜幕笼罩下，150万德国军队越过边境，向波兰的前沿阵地移动。午夜，12时30分，希特勒正式签署入侵波兰的作战命令。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法西斯出动了57个师、2,500多辆坦克、2,300架飞机，对波兰进行突然袭击。德军很快突破了波兰的主要防线，分三路大军从西南、西北、北面向波兰首都华沙进攻。对波兰的侵略战争标志着德意志法西斯的战争行动的全面升级。9月3日，英国、法国向法西斯德国正式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在波兰沦陷之后，1940年4月，法西斯德国侵占了丹麦和挪威。5月，卢森堡、荷兰、比利时被迫投降。法国军队与德军进行不到40天的战斗之后，法国政府代表于6月22日签署了条件苛刻的德法停战协定，宣布投降。很快，除上述国家以外，整个欧洲的中部、南部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



区、非洲北部先后为法西斯德国所控制。希特勒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当时苏联共产党人片面地认为这场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或是由于某些当局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的确是有的。其实，这次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各种世界经济和政治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原来，各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的发展，通常是经过相当时期便要引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均势状态的猛烈破坏，而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充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是企图以运用武力的手段来改变现状，重新分割‘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己。结果便是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营垒而互相进行战争……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便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sup>①</sup>

1939年11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了《呼吁书》，分析了国际形势，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在战争形势下的任务。《呼吁书》把这次战争描述为帝国主义双方的战争、非正义的反动战争。战争的责任：“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先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sup>②</sup>共产国际的领导还认为，由于战争的爆发，两个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认清这场战争的完全的、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性质，要尽一切力量防

---

<sup>①</sup>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17—18页。

<sup>②</sup>《世界新闻与评论》第19卷，第53期，第1074页，1939年11月11日。

止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定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受到威胁。共产国际还要求所有受到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国家的共产党，要发动人民进行民族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但是，不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国内和平。

在战争爆发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不断地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阴谋及其侵略本性，号召德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战斗争，推翻希特勒暴政，为民主、自由的新德国而斗争。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制定并推行了与共产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针锋相对的方针、政策、路线。

1939年春，在巴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索巴德）开始讨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所应采取的立场。同年8月13日，在战争爆发前夕，社会民主党的《新前进报》发表文章指出：“除了希特勒自己，并没有别人强迫德国进行战争。不是别人威胁了德国，而是希特勒正在威胁其它民族。”“并没有人想消灭德国人民，整个欧洲都希望德国人民保持和平。而希特勒却想以灭绝性的战争反对其它民族。因此，面临的战争就不是德国人民为了自卫而进行的斗争，而是被迫为了希特勒的疯狂掠夺、毁灭性的目标作战。”“在希特勒和德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共同之处。”因此，“推翻希特勒就意味着德国人民的解放与和平，自卫的责任要求德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希特勒的命运区别开来，在战争中，首先要把希特勒当成自己的敌人。”<sup>①</sup>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进攻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表了关于战争的声明。声明由施坦普菲尔起草，经党的执委会讨论，希法亭最后参加定

---

<sup>①</sup> 《新前进报》，1939年8月13日。

稿。声明说：“随着希特勒的罪恶进攻，战争开始了”，“对和平与人类所犯下的前所未有的滔天罪行都应归咎于希特勒及其制度。消灭自由、摧毁世界和平，从一开始就是纳粹政策的内容，因此，推翻希特勒是我们同欧洲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斗争的目标。”“希特勒与新的德意志军国主义是一个东西，这个军国主义的失败与最终消灭是实现和平与欧洲复兴的前提条件”。声明号召：“我们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保障欧洲自由、和平与民主的伟大目标而进行这场斗争。我们呼吁德意志人民：为了你们的自由起来斗争！推翻希特勒！打倒这个制度、结束战争、保卫千百万人免遭死亡、拯救人民！”这个文件揭露了战争的真实原因和帝国主义性质，但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应该如何同纳粹专政进行斗争。

在希特勒军队把战火不断蔓延到整个欧洲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接连发表类似内容的声明。

在1940年底的声明中，流亡执委会宣布：“我们今天正注视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希特勒制度对这两个民族的暴行真是令人愤慨。我们不相信，德国人民在了解这些罪行之后会保持沉默，或者甚至视而不见。我们深知，我们的义务就是要告诉德国人民，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波兰，出现了一场空前巨大的民族悲剧，大规模地掠夺、屠杀波兰的平民、妇女、儿童，进行着反对整个波兰民族的全面的毁灭性战争。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席卷着大规模逮捕与屠杀的恐怖。”声明强调：“如果德国人民不自己动手推翻希特勒，如果不同希特勒的罪行划清界限，希特勒政策的牺牲者将把德国人民视为同谋犯。如果德国人民不去自我拯救、而是通过敌人的刺刀获得解放时，胜利者就会收回友谊的双手向你们喊道：‘你们是同谋犯！’因此，我们向德国人民说，不要由于你们的沉默、容忍以至视而不

见而使自己成为如此巨大罪行的同谋。”<sup>①</sup>

在1940年4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希特勒军队入侵丹麦、挪威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满怀愤怒地看到，由于这次军事进攻，摧毁了自由的人民在和平建设中的创造。

我们震惊地看到，由于这一新的罪行，德国人民的名誉又一次蒙受耻辱。

我们向德国人民说，进攻丹麦和挪威是一种卑鄙的暴力行动。”

声明最后呼吁德国人民：“德国的幸福与未来要求你们违抗命令，进行反抗，与政府的罪恶行径进行斗争！你们要起来为了自由而战斗！”<sup>②</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翼力量始终拒绝与德国共产党合作，把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国际都视为敌对的异己力量。

大战前夕，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定了有效期为十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关于这个条约的声明中，攻击条约的签字是苏联与希特勒之间“进行的一场赌博”，是“在极其危险时刻对和平事业的背叛”。声明夸耀：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苏联政策所持的独立自主立场不断地得到验证，他们强烈谴责苏联对欧洲和平、自由的打击。他们重申为了推翻希特勒专政、创造一个和平的欧洲，要尽一切力量继续这场斗争，要为了自由与和平而斗争。”

声明接着攻击德国共产党“象共产国际其它支部一样，把这

---

<sup>①</sup>引自弗兰茨·奥斯特洛特、狄特·舒斯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事记》，狄茨出版社1980年德文版，第2卷，第389—390页。

<sup>②</sup>同上，第390、391页。

个毁灭性条约的签署作为斯大林的一个伟大功绩来庆贺。这再一次证明，他们除了作斯大林专政在国外的对外政策宣传工具之外，没有其它任务。”声明最后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与在德国活动的党的信托人观点一致。在过去的年代中，他们不断拒绝同共产党人合作。现在，鉴于斯大林的背叛所形成的国际形势，鉴于德国共产党领导有失体面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拒绝同德国共产党实现任何联合或者在有德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组织内进行合作。它提醒所有党员，他们应以同样的精神行事。”①

流亡执委会的右翼领导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的原则区别，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统称为“极权主义”而加以反对。他们把粉碎希特勒暴政的希望完全寄托到西方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对法西斯德国的军事胜利上。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现在是捍卫人权和文明发展的先锋战士”。②施坦普菲尔声称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一样，都应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希法亭则毫不掩饰地宣称，战争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引起来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家一样，都是不希望战争的。他写道：“英国、法国对希特勒的胜利将是民主派对主要极权国家的胜利……我们深知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毫无保留、毫不迟疑地谋求英国和法国的胜利。”③库尔特·盖尔公开宣布，在法西斯专政推翻以后，无论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它都必须成为一道反苏的防线。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德国”，恢复类似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积

---

①《新前进报》，1939年9月10日。

②《新前进报》，1939年9月24日。

③《新前进报》，1939年9月31日。

极主张的建立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方针受到党内左派小组不同程度的反对。“新开端”的国外局坚决反对无条件支持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阿根廷、荷兰、法国流亡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组，例如奥古斯特·西姆森在布宜诺斯埃利斯领导的小组，以及阿尔弗莱德·莫泽尔在荷兰领导的小组都表示拒绝接受党执委会的路线，而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共蛊惑划清界限。他们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所引起的”，他们强调：要看到，参加这场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大国集团对自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目标，甚至这些西方大国并不想“进行一场真正的反法西斯战争”。<sup>①</sup>一些富于远见的人指出，如果对英法两国的军事实力抱过高的希望，那么再度兴起的德国工人运动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

这些反对派小组在批判流亡执委会全力依靠英法资本主义大国政策的同时，对社会主义苏联也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1939年12月初，“新开端”国外局在其出版的《社会民主新闻通讯》中写道：“在红军刺刀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反对在推翻德国法西斯以后，通过西方的干涉建立一个新的反动军事统治政府，或者肢解德国。但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反对东方的干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使我们被迫继承俄国的落后性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僵化模式。”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无意组织群众性的反法西斯斗争，由于党内意见分歧和国内外联系的隔绝，尚在德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基层干部的反法西斯、反战斗争不得不处于孤立、自

---

<sup>①</sup>《社会民主新闻通讯》，1939年9月，合订本第48卷，第11页。

发、各自为战的状态。

## 二 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战斗争

战争爆发前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加强了对国内反法西斯力量的野蛮镇压，扩大了血腥的恐怖制度。据1939年4月10日在国外公布的一份盖世太保的统计，当时在德国有162,734名政治犯被投入集中营，112,432名反法西斯主义者被判监禁，27,369人待审。9月3日，保安警察头目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向所有国家警察局的负责人颁布《战时国家内部安全基本原则》，要求“无情”地镇压任何反战行动。逮捕“任何对德国人民的胜利表示怀疑，或者对战争的正义性提出疑问的人”。在9月20日发布的公告中，命令“残酷无情”地惩治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可以不通过法庭审理即可处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制止反法西斯运动。9月27日，在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建立了帝国主要安全机构、臭名昭著的杀人恐怖中心——国家保安总署。它集中合并了所有法西斯镇压机构，协调它们的活动。新的办公厅包括七个局，它的核心是盖世太保（第四局）。随着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一开始，盖世太保逮捕了大量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它反法西斯战士。

残酷的政治环境、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迫害使得成千上万的社会民主党人走上同德国共产党人合作，并肩战斗的道路。在德国的各个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战斗小组。

例如在柏林，早在1938年由60多名年轻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和其它民主青年组织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斗团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海因茨·卡佩尔，他在一家印刷所工作。在那里，他联合了原来的社

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他们共同印制反法西斯传单。1939年9月9日深夜，这个组织的年轻战士们在柏林散发了几百份传单《我向世界青年呼吁》。这个传单揭露了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战争目标，号召青年们起来坚决地同法西斯政府进行斗争。

1939年9月初，在柏林出现了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一分标题为《德国人民！这场战争是由希特勒挑起来的！》的呼吁书中号召德国人民组成反对希特勒战争和纳粹专政的人民阵线，结束这场违反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战争。呼吁书说：“现在，德国只能通过人民自己来挽救。”“从战争一开始，每一个富于责任感的德国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应在这样一个广泛目标的鼓舞之下：立即尽快地结束这场罪恶的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毁灭威胁的战争！”<sup>①</sup>

1939年5月，柏林西门子工厂工人中的工会会员、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建立了一个统一阵线委员会。秋天，这个委员会在《致军火工厂工人和全体柏林居民》的呼吁书中，号召他们推翻希特勒专政，起来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委员会与法西斯分子蛊惑人心的“生存空间”的口号针锋相对，提出德意志民族的真正任务是实现民族自决权。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还说明，为什么必须要用一个民主国家制度代替希特勒专政，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实现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sup>②</sup>

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内反抗运动的发展，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在国内的镇压活动日益加紧。1939年11月—12月，盖世太保在20个大城市逮捕772名反法西斯工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

---

<sup>①</sup>引自《1933—1945年德国反法西斯反抗运动史》，1958年德文版，第169页。

<sup>②</sup>引自《德国工人运动史》，第5卷，第528页。



主党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格罗提渥因涉嫌参与密谋推翻希特勒政权而多次入狱。1940年5月，盖世太保在柏林、不伦瑞克、开姆尼茨、达姆施塔德、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哈雷（萨利河）、卡尔斯鲁厄、马格德堡进行了大搜捕，逮捕了127名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这并未能扑灭国内的反希特勒战争的斗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向苏联不宣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国内的反抗运动也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反法西斯斗争烈火中经受考验的广大社会民主党党员干部在这时更加成熟了，更多的人认识到，迫切需要消除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在德国许多企业内从事地下反抗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工人的怠工、停工斗争，进行反法西斯宣传鼓动工作，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播外国电台的新闻消息，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例如支伊伦罗达的社会民主党女工施泰因·埃玛经常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她得到社会民主党员、工人麦·菲舍尔和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弗·罗泽的支持并一起在工人中传播新闻。许多社会民主党反抗小组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联合行动。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员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反抗组织。在柏林、开姆尼茨、德累斯顿、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汉堡、卡尔斯鲁厄、科隆、莱比锡、马格德堡和其它城市的共产党反抗组织中都有大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其中德累斯顿反抗组织的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它是早在1934—1935年起即由阿·亨泽尔、弗·舒尔策、卡·施泰因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反抗组织内，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及无党派反法西斯战士捐弃前嫌、紧密合作，贯彻了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政策。舒尔策—施泰因反抗组织成员多达100多人，各个行动小组的成员们经常收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组织援助被捕的

反法西斯战士的家属。在德累斯顿的许多企业（如伯梅和亨南公司、格尔林和罗克施特罗公司、发电厂、五金工业有限公司、奈马塔格、门德广播公司、萨克森工厂、赛德尔和瑞曼公司以及伊公·蔡司有限公司分公司）都建立了固定的据点并同科斯维希、德累斯顿、弗赖塔尔和迈森—布施巴德较小的反法西斯小组建立进一步的联系。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实践中，许多基层的社会民主党干部和党员群众，接受了德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阵线的口号。在德国国内，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反抗运动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前提条件，始终未能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分子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人类的进步、正义与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2年，世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希特勒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连续遭到惨败。英美军队在北非、在西西里岛登陆参战。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垮台。这一切都预示了希特勒法西斯行将灭亡的命运。德国军界的许多高级军官及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看到败局已定，害怕德国人民和其它各国人民利用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失败，彻底消灭德国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试图组织推翻希特勒的宫廷政变，抛弃希特勒，借助西方大国的帮助挽救德国帝国主义的灭亡命运。以退休上将贝克、卡·戈台勒、乌·冯·哈塞尔和约·波皮茨为核心的密谋分子同垄断资本的一些极有影响的势力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中有所谓罗伊斯集团、波施集团、汉莎航空公司、克虏伯股份公司的重要人物。此外还有容克地主的代表、军界领导人、德苏战场和后备军参谋部的一大群参谋军官、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密谋分子制定了政变计划，起草了未来国家的宪法和各种法律制度草案，指定了未来政府的人事安排。他们准

备在推翻希特勒以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或其它维护特权的等级制国家以保持、发展垄断资本的无限统治。大垄断联盟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应保留成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他们起草的宪法草案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各种民主权利，如选举权、结社权、罢工权。他们规定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迅速与帝国主义西方大国缔结和约，集中力量阻止红军的继续向前推进，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战线。

在密谋分子中也有一批进步力量。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尤利乌斯·勒伯尔、威廉·洛伊施纳、阿道夫·赖希维因等人。他们与组织政变的核心人物，以冯·施陶芬堡为首的一批青年爱国军官密切合作。他们坚决反对密谋分子中多数右翼势力的反动政策，主张推翻希特勒政府，立即结束一切战场上的战争，同苏联进行接触并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同共产党临时领导以及“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进行接触和建立一切民主力量的联盟。施陶芬堡深受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主张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新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洛伊施纳被内定为未来政府的副总理，勒伯尔被内定为内政部长。

密谋者计划于1944年7月20日用炸弹杀死希特勒，然后发动军事政变。施陶芬堡把一枚炸弹携入设在拉斯滕堡附近的元首大本营的会议室内，引爆后希特勒仅受了一点轻伤，在柏林发动的代号为“女神”的政变也很快地失败了。此后，希特勒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施陶芬堡和冯·黑夫滕中尉、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克维尔恩海姆上校等人当天深夜即被枪决。据估计，由于直接参加7月20日事件被希特勒杀害者有180—200人，从1944年初至战争结束时（军事法庭的判决不计在内）处死的总计有4,500人。

社会民主党人勒伯尔和赖希维恩在1944年6月同共产党领导

人秘密会见时被秘密警察缉捕，受尽酷刑，于1945年1月被杀于狱中。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为1944年7月20日反抗运动的失败，使德国上层的反希特勒法西斯斗争从此一蹶不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寄希望于上层抵抗运动的方针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 第二节 社会民主党流亡国外的组织状况

### 一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解散

德国的反法西斯流亡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流亡，它在各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流亡者来自德国各个社会阶层和集团。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和宗教、政治信仰。从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自觉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对于他们来说，流亡是被迫转移斗争岗位。另一部分人是法西斯上台前并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流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者则属于前者。

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火的蔓延，流亡者能够躲避纳粹法西斯迫害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英国、美国、瑞典和瑞士几个国家。流亡者纷纷从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法国辗转流入这些国家。随着国际矛盾的激化，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德国流亡者的严厉控制，流亡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没有适应的住处，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亡者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组织上

处于极其分散的状况。设在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开始还试图克服这种分散状况，把在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流亡小组从政治上、组织上统一起来。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938年，希特勒军队占领奥地利，进逼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布拉格的流亡执委会被迫迁往巴黎。

1940年以前，法国是德国反法西斯政治流亡者的中心。早在1933年4月至11月，法国政府就收容登记了7,195名德国流亡者。1936年他们在法国大约有8—10万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长期流亡在这里。此外，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等20多个德国流亡者政治组织。

1938年9月14日，流亡到巴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在一份呼吁书中宣布，执委会最近的成员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党员选举出来的，它有权向全党讲话。这份呼吁书再次反映了流亡执委会多数成员的悲观情绪，闭口不谈在德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应当如何组织联合起来，推翻希特勒政府，阻止战争，而是宣布要通过西方大国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来打倒法西斯专政。

在法国的流亡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法国政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设立了拘留营。在拘留营中，多数“政治上没有嫌疑”的人很快被释放，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积极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则作为有“嫌疑”的人被长期拘留。1940年5月，比利时被占领后，在抵御纳粹扩张行动的过程中一再失利的达拉第政府，受到一种普遍的憎恨“敌方外国人”情绪的影响，开始了第二次拘留浪潮。除了少数例外，德国、奥地利的流亡者几乎全被关进拘留营。在法国拘留营里，居住、食品、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被拘留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受了很大的痛苦。

1940年6月22日，法国和德国实现了停火。根据停战协定第19条，德意志帝国有权要求从整个法国和它占领的地区引渡德国

公民，而在未被占领地区要重新建立拘留营，禁止向德国公民提供积极的保护，禁止在德军接近拘留营地时释放他们。德国流亡者的生命处于极端危险之中。直到最后的时刻，拘留营的大门才被打开，人们发疯似地四处逃散，多数人偷越边境逃到西班牙，然后取道葡萄牙前往美国或英国。在众多的难民中，只有少数人到达了这两个国家。

1940年9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在法国决定转移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同年11月初，流亡执委会解散。成员各奔东西。林耐尔和施坦普菲尔到了美国。在此之前，执委会的一些成员如玛丽·尤沙茨、格奥尔格·狄特里西和保尔·海尔茨已先期到达那里。此外，汉斯·福格尔、埃利希·奥伦豪尔、库尔特·盖尔和弗里茨·海涅在12月底至1月初，先后到达伦敦。至此，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在从法国逃亡的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前国会议员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和党的著名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被法国警察逮捕。1941年2月希法亭被引渡给纳粹德国最后死在巴黎的监狱里。布赖特沙伊德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

## 二 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与斗争

法国全面崩溃以后，英国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的主要活动中心。

英国政府在战争过程中较好地修改了他们的难民政策。战争爆发后，英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从事检查、审批外国人避难申请的工作。在审查的71,200名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中，有55,400人作为“受到纳粹迫害的难民”得到承认，其余10,000人中，有350人作为“著名的纳粹同情者”被立即拘留。1940年5月，由于害怕德国反抗力量可能会袭击这些拘留营，英国政府增派部队

进行守卫。法国投降以后，这些拘留营内有6,000多人被送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中，有一只满载难民的英国船只在大西洋因触德国水雷而沉没。此后，英国公共舆论在报纸、广播、议会内强烈批评政府的难民政策。一年后，设在英国的拘留营多数被解散。

德国的流亡者在英国较少受到歧视，他们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他们获得了就业许可，而且时常被通知从事某些统一的军事服务工作。在个人生活方面，英国政府对侨民限制不多。战争期间，对口头和书面发表政见的言论自由只有很小的限制。结社、集会自由依然如故。在这样的环境内，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了。

当时在英国的德国社会主义组织有“新开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等组织的残余小组。原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成员汉斯·弗格尔和埃利希·奥伦豪埃尔试图在英国重建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为此，补选了库尔特·盖尔、弗里茨·海涅、海尔塔·哥泰尔夫、威廉·杉德尔、维克多·席夫、弗里茨·泽卡尔和亨利希·左尔格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始终未能使他们的领导资格获得公认。在英国，充其量不过是作为“索巴德”小组进行活动。弗格尔和奥伦豪埃尔开始同其它社会主义者小组进行接触。1941年2月28日，在所有社会主义小组参加的情况下，建立了旅英德国工会小组。3月19日，在“新开端”的倡议下建立了“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同盟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中，由汉斯·弗格尔担任主席。此外，还有“新开端”的领导人埃尔温·舍特勒、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保尔·瓦尔特、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领导人维利·埃希勒以及旅英德国工会代表汉斯·哥特伏西特担任同盟执行委员。这种联合并没有因此取消各个小组的独立性。彼此政治

上的分歧、界限也没有立即消失。但是，同盟的建立标志着，从此开始了各个社会主义小组思想上的接近、融合过程。在宣布同盟成立的文件中说明：“在大不列颠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致相信：军事上的失败、希特勒制度的垮台将最终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扫除希特勒专政的社会基础，形成对于持久和平、欧洲复兴和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未来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考虑到旅居大不列颠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特殊任务，以下签名的各个组织声明他们的决心，在保持各自政治独立性的情况下，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者要同自己的同胞们一道，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同一切反对极权势力的人结成同盟，为打败希特勒而斗争”。<sup>①</sup>这个文件表明了“新开端”小组对整个同盟的思想路线起着主要的影响。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在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残余小组以奥伦豪埃尔和福格尔为首，把希特勒进攻苏联仅仅看作是“战争过程中的戏剧性换场”。在美国的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菲尔认为，西方反法西斯同盟的出现将有力地抵制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1941年6月底，执委会残余小组公开表示，希望在长期的战斗中使希特勒的军事力量与苏联红军一起互相消耗殆尽，由此使西方大国在政治上重建世界的过程中成为统治性的因素。7月，在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乎使同盟濒临分裂的边缘。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新开端”国外局的代表坚决反对这种反动观点。“新开端”国外局的代表声明，根据他们的立场，不仅现在要反对希特勒，保卫苏维埃国家，而且以后要保卫苏联

---

<sup>①</sup>《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政治宣言与纲领路线》，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出版，伦敦，1945年，第26页。



继续实现、发展它的革命成果，保障它未来的建设。打败希特勒以后，帮助苏联消除其孤立处境，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利益所在。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小组被迫表示放弃原来观点。

这期间，设在伦敦的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小组试图与国内零散、微弱的反抗斗争建立联系，但几乎没有结果。1942年底以后，执委会小组开始每三个月作一次国内政治形势报告。但由于与国内联系的断绝和资金的匮乏而被迫中断。1941年12月，领导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维利·埃希勒领导出版了胶印的新闻报纸，报道来自德国、法国和其它在纳粹势力范围内其它国家的情况，两周一期，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1941年底，瓦尔特·奥尔巴赫和弗利茨·埃伯尔哈德领导的独立社会主义流亡小组创设了“欧洲革命电台”，试图领导德国国内的反抗运动。但是，直至战争结束，国外的政治流亡者与国内反抗运动始终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流亡者的活动未能对德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产生直接的影响。

大战期间，美国和瑞典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聚集的另外两个中心。

美国自1941年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由于它远离欧洲战场，很少受到战争破坏，美国政府的难民政策相应地始终如一。因此，与战时英国相比，美国对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前提条件。

1939年3月10日，在纽约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尔贝特·克谢辛斯基、鲁道夫·卡茨、格哈德·泽格、马克斯·布劳尔及黑德维希·瓦亨海姆等人创建了旅美的德国工人代表团。这个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辅助性和代表性机构。

法国投降以后，为了援救陷于危境滞留在法国拘留营中的德

国政治流亡者，旅美德国工人代表团向犹太工人组织工作委员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呼吁采取救援行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华盛顿政府同意发放600张政治流亡者的签证。德国工人代表团派遣弗兰克·波恩教授到马赛领导这次行动。同时，他们在美国继续组织了紧急救援委员会等自发的、由私人倡议成立的组织，向法国南部派去了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转道逃往美国。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政府都表示要履行同法西斯德国签定的协议，给救援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逃亡者不得不绕开通衢大道，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只有很少一部分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国。

在美国的德国工人代表团政治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势力聚集的中心。在流亡执委会的一些成员来到美国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继续追随原来执委会的反共路线。他们希望美国尽可能地站在英国一边，使战争在希特勒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他们的观点很投合英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心愿。这些集团正努力使德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对准苏联，使法西斯德军和苏联红军互相消耗，然后使这两个精疲力尽、元气大伤的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意志，使他们能够在政治上主宰欧洲和世界。

瑞典在战争期间建立了收容营，安置了不过三百多名流亡者。在瑞典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有库特·海尼格和弗里茨·塔尔诺夫为代表的右派，也有一些左派小组。但无论从人数和政治作用来说，都远不能和英国、美国的政治流亡集团相比较。

并非所有德国政治流亡者都投奔西方自由世界。有相当多的人来到苏联，其中包括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1943年，在苏联建立了德国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它的政治纲领和活动为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铺平了道路。同年9月底，

在巴黎建立了自由德国运动西方委员会。法国解放以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自由德国西方委员会开始公开活动。委员会的120名委员中有17名共产党人、18名社会民主党人、15名中央党人、11名德意志国家党人。这个委员会领导了2,500名滞留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其中350名共产党人、250名社会民主党人，1,200名工会成员。

### 第三节 战争流亡时期社会 民主党的理论探索

#### 一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民主社会主义者宣言》

战争流亡时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上痛苦地反思、总结的阶段，也是党内思想进一步分化的时期。大战以来的种种事变，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血的经验教训，在集中营，在流亡中所经受的痛苦磨难迫使社会民主党人深刻反省。在同苏联红军、共产党人接触过程中，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向左转。在西方自由世界长期旅居的另一部分人，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则逐渐向右转。二次大战后风靡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若干基本理论观点。这是一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图景。这对于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化和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第一线的社会民主党反抗小组不顾流亡执委会的禁令积极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交换情报，缔结协议，共同行动。他们与共产党人一起并肩战斗，反抗法西斯的残暴迫害。很多社会民主党人被关入法西斯集中营惨遭杀害，但是更多的

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而觉悟，同共产党人一起在集中营内以统一行动的方式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得出必须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阵线的结论。战争结束前一个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出现的一份宣言，集中代表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情绪。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希特勒法西斯囚禁各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大型集中营。据统计，自1937年7月16日至1945年4月10日，有238,980人曾在这里关押，其中56,545人被杀害。

1943年夏季，被囚禁的各国政治犯秘密建立了国际集中营委员会。委员会中有来自各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他们是：瓦·巴特尔（领导人）、恩·布塞（德国）、多·西乌福里（意大利）、亨·格利纳尔（比利时）、扬·哈肯（荷兰）、奥·霍恩（奥地利）、埃·赫泽尔（捷克斯洛伐克）、克·英奈曼（捷克斯洛伐克）、扬·伊楚多列楚克（波兰）、尼·克容格（苏联）、哈·库恩（德国）、弗·曼埃斯（法国）、阿·诺伊曼（捷克斯洛伐克）、马·保尔（法国）、古·舒斯特尔（奥地利）、尼·西马科夫（苏联）、伊·斯米尔诺夫（苏联）和鲁·祖佩克（南斯拉夫）。在这个国际性的战斗团体中，850名犯人组成178个秘密小组，接受军事训练，积极进行各种起义的准备工作，搞到91件卡宾枪等武器。1945年4月，战争结束前夜，希特勒法西斯强令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撤退。28,285名犯人被赶上死亡的转移途程。国际集中营委员会领导的抵抗组织采取拖延策略，阻止了集中营的全部转移。21,000多名犯人得以幸存下来。4月11日，犯人发动了起义。按照计划，武装起来的犯人驱逐了党卫军看守人员，抓了很多俘虏。国际集中营委员会接管了集中营的领导。4月13日美国军队解放了这个集中营。政治犯们公布了《布痕瓦尔德宣言》（全称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民主社会主

义者宣言》)。宣言的作者是卡尔·考茨基的儿子本·考茨基以及伯麦斯特、布利尔、施林、塔贝等人。文件自称是在德国、奥地利各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

宣言描绘了对未来德国政治制度的设想，强调必须毫不迟疑地消灭一切法西斯统治工具。建立“新型民主”。这种“新型民主”不依赖于空洞的徒具形式的议会制，而要使广大城乡群众能够有机会参与政治和管理。<sup>①</sup>

宣言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委员会。委员会首先要召开全德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任命政府，选举人民代议机构。宣言强调管理机关应当是简朴、节省的，用人民的公仆代替特权官吏。

在社会方面，宣言提出立即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和集体协议制度。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应着手建立和巩固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自主管理，以便使他们对“整个社会化的进程”发生影响。宣言指出，“在经济方面，只能按社会主义原则重建德国”。<sup>②</sup>

布痕瓦尔德宣言表示了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其中强调：“德国的对外政策应当在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密切协调中实现”。<sup>③</sup>文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同一切社会主义领导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可以通过组织欧洲集体体在大陆上建立秩序，保障幸福和安宁。

文件特别注意到精神复兴问题。指出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

<sup>①</sup>波特诺夫：《从开始至1946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4页。

<sup>②</sup>同上，第125页。

<sup>③</sup>同上，第126页。

就是新的教育和培养制度。

从以上观点出发，文件号召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只能在原则基础上，需要辩论自由和保证执行所通过决议的纪律。文件提出立足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政党和工会要尽快地建立起负责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代表大会的目标是通过统一的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举新的党的机关。宣言在要求“必须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统一”的时候，提出要建立“包括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国际政治和工会组织。

在宣言的结尾，号召德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自由的、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德国”，实现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成立全世界社会党人国际。布痕瓦尔德宣言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左派思想和愿望。他们在法西斯集中营的严酷环境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主张和战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愿望。

## 二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雏型

如果说，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第一线的社会民主党人比较容易左倾化，那么，那些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流亡者则更多地受到典型资本主义政治空气的熏陶，思想大多向右转。

在战争和流亡期间，库尔特·盖尔、埃利希·奥伦豪埃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右翼理论家。

盖尔在流亡期间的理论活动占有特殊的地位。1938年他在巴黎被遴选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1939年，他发表了《自由党》一书。<sup>①</sup>这本书是同当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sup>②</sup>进行

<sup>①</sup>盖尔：《自由党》，见卡·克洛茨巴赫编：《流亡中的三篇文章》，柏林1974年版，第299—356页。

<sup>②</sup>鲍威尔：《非法的党》，见《流亡中的三篇文章》，第89—298页。

辩论时所产生的作品，辩论的题目是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同法西斯斗争时应采取什么活动方式。盖尔在论述自己对党活动原则的理解时，把它同世界观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基点在于自由，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活动应当从自由出发。

盖尔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他断言：“不要相信什么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历史有朝一日会实现我们的愿望，也不要相信从这个被崇奉的规律中推导出来的工人使命作用，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前进。”<sup>①</sup>

盖尔反对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他声称，无论哪一个国家或经济组织如果不是生活在人民的心目中和意志里，就不会保障自由。盖尔从这个观点出发，作出如下结论：“对党历史作用的这种理解要求对党的性质作出比正统马克思派所规定的更加广泛的定义。要更灵活、更生动、更有生机、更注重精神，而少弄一些僵死的、教条主义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党内才会有思想运动的地位，无论是正统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在党内有一席之地。”<sup>②</sup>

这是对二次大战以后被称作“世界观多元论”或“入党动机多元论”理论的第一次朦胧的表述。盖尔的著作在1974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丛书》再版，被称作是“重要的历史性文件”。主编克洛茨巴赫在《序言》中称赞盖尔：“在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方面，在克服机械经济论方面，在毫不含糊地解释多元化民主和确定人民党的方向上，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先驱者。他所发出的信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党内辩论中发生了影响，导致了1959年在哥德斯堡通过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原

---

①盖尔：《自由党》，见《流亡中的三篇文章》，第253页。

②同上。

则纲领”。<sup>①</sup>

库·盖尔的书表明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开始正式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以前的修正主义者，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改良主义者都不敢如此公开表白，只是从各方面作了一些准备。

与“世界观多元论”的观点相并列，流亡时期还有人提出了后来写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中的“法治国家”的思想。这最早是由流亡到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

在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流亡年代没有制定出任何突出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他们在讨论未来德国的模式时触及到了一些纲领性问题。例如，1943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席会议上，弗·施坦普菲尔和埃·弗伦克尔之间曾为此展开一场辩论。

施坦普菲尔在报告中提出：“德国人民应当证明，他们象进行战争那样，能够并且善于实现革命”。弗伦克尔写了《德国革命的前景》一文回答施坦普菲尔。在文章中，弗伦克尔反对“社会革命”的主张。他认为在德国战后可能形成的局面下，进行革命是很不现实的。一方面，同盟者将不会欢迎这种革命，另一方面，工人组织已被摧毁，也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弗伦克尔得出结论说，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一定会在占领国的合作与监督下制定出逐步恢复工会的方案。弗伦克尔认为，与社会机构民主化相平行的是还应该“改造国家的法律原则”。这里，应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反面经验，同时学习英国、法国、美国的管理经验，还要注意到德国的传统。弗伦克尔在文章的结尾断言，应当建立一个保障各种意见自由的法治国家。

弗伦克尔在这里强调，建立一个自由的热爱和平的德国——

---

<sup>①</sup>克洛茨巴赫：《导言》，见《流亡中的三篇文章》，第21页。



这一理想的实践者应当是德国工人运动。他写道：“我们认为，在没有垄断资本统治的欧洲，德国工人运动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我们期待着，新的德国将加入自由民族的联盟，这个联盟将会把拥有社会权利的自由人民国家同希特勒匪徒、军阀和垄断资本家惨无人道的专政区别开来。”<sup>①</sup>

从弗伦克尔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国家的思想。战后，这个思想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高度重视，把它列为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亡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核心是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及其拥护者组成。在他们这一时期起草的文件中，反映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观点，也可以看到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经验的影响。

1944年中期，他们起草了《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者战后政策》这一纲领性文件。它对于流亡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文件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制度。文件说，这个政党应当不限于工人阶级，而同时包括中间阶层。作者认为，工人统一应当是自下而上的统一，首先从企业中开始，并规定要建立统一的工会，通过生产委员会保障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在文件中特别强调要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审判战争罪犯。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在防止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必须保护德国的完整，支持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和英国参加的欧洲联邦的主张。文件强调：“作为社会党人，我们特别关注与苏联的亲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是未来德国人民和欧洲和平稳定的一个决定性的基

---

<sup>①</sup>弗伦克尔：《改良主义与多元论》，汉诺威1973年德文版，第276页。

础。”<sup>①</sup>

在文件中提出了战后德国建设的方案，规定在所有参加反法西斯反抗运动的政党基础上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要为新的“真正社会民主”创造前提条件，这个政府不要苏维埃制度，而应实行议会制。

文件中还提出了实现公有化和组织新经济的主张：没收大农业、银行、保险公司、动力、交通业，消灭垄断，把经济建立在计划原则基础上。文件指出，应当使小农对合作社思想发生兴趣，但不要采取强迫手段。文件强调要让德国工人参加管理——这是经济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文件特别强调要根本改变教育制度，据作者看来，这将为社会民主化创造前提条件。文件最后说：“我们再次强调，民主建设应当在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上成为德国人民自身的事业”。<sup>②</sup>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文件虽然是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起草的。但其中要求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所谓“社会民主”的社会。

在战争流亡年代里，英国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政治活动中心。这个中心与流亡在斯堪的纳维亚及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

以奥伦豪埃尔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小组试图把各个流亡小组对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持不同立场的见解综合在一个共同的纲领中，开辟出一条“动机多元主义”的道路。当时，各流亡小组已纷纷加入了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1942年10月14日，根据同盟临时委员会的决议，在同盟内展开了一场辩论，辩

---

<sup>①</sup>弗伦克尔：《改良主义与多元论》，第174页。

<sup>②</sup>同上，第176页。

论的题目是如何建立一个排除共产党在外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的代表维利·埃希勒在同盟扩大的工作委员会上作了关于未来德国工人运动形式与任务的报告。1942年12月6日，埃利希·奥伦豪埃尔考虑到当时辩论的情况，也作了一个报告，阐述执委会小组的观点，试图为与会的各个小组提出一个共同的原则纲领和实践政治计划。他的这个报告后来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的纲领性文件。<sup>①</sup>

奥伦豪埃尔的出发点是，只有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取得军事胜利，德国反法西斯力量发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才能粉碎希特勒专政。他强调，在粉碎希特勒制度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要再重复1918年的形势了，这一次要全面粉碎暴政。

奥伦豪埃尔声称，在建立新德国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新的政党应当消灭和根除纳粹制度的罪魁，“在革命转变阶段，新政党的实质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深深地攻击旧社会制度的内部”。<sup>②</sup>

奥伦豪埃尔在报告中提出了“新德国的民主”问题。报告指出，首先应当考虑到以往所犯的导致取消民主的那些错误，因此，“新的民主”应当是“有斗争精神的民主”。在这里，要注意保卫民主的安全，防备内部政治敌人，不允许他们以任何手段破坏民主。因此，要在暂时一段时间内不能让那些积极拥护纳粹制度的人享有民主权利。

报告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曾认为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上有

---

<sup>①</sup>奥伦豪埃尔：《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与任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柏林—波恩 狄茨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255页。

<sup>②</sup>同上，第242页。

可能长期稳步进化，但这一主张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遭破产。据此，奥伦豪埃尔作出结论说，党应当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超越1919至1933年工人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必须在“新的民主基础上”，在经济机构中实行激进变革。据作者主张，这一切结果应导致建立一个“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法治国家”。

从奥伦豪埃尔的报告中明显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接触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所发生的影响。报告注意到近二十年来所有民主国家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趋势，断言这些国家正在逐步实现“社会民主”。报告作者认为，这种演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有计划地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

奥伦豪埃尔的报告还注意规定了新政党的性质、涉及到理论在新党中的地位、党本身的特点、它的社会基础等问题。

在报告中闭口不谈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是工人阶级政党或工人政党，而是说：“以民主和自由为方向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在于它应当不断把所有新的居民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使他们相信党的观点和目标是正确的。”<sup>①</sup>他接着说：“从原则上说，新政党应当向一切感到自己与党的目标、政策息息相关并准备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政策而行动的人敞开大门”。<sup>②</sup>而实行这一原则的论据在于“在我们今天，一切有判断力有思想的人都从本质上认识到政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在这里奥伦豪埃尔发挥了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所宣布的人民党的思想。

奥伦豪埃尔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将是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他声称，如果对“决定党内每一个人

---

<sup>①</sup>奥伦豪埃尔：《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与任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50—251页。

<sup>②</sup>同上，第251页。

进步立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或其它的哲学动机持宽容态度”，那么它将成为“抛弃学理主义狭隘性”<sup>①</sup>而行动的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1933—1945年期间，继盖尔的书之后，论述社会民主党内世界观多元主义的第二次尝试。

在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人态度问题上，奥伦豪埃尔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承认，在地下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共产党员被证明是忠实于信仰，是可靠的，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参加了地下小组的活动。因此，奥伦豪埃尔认为，在这个阶段为新的关系、新的信任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他在报告中又说，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裂痕，这种分裂本身有着很深刻的原因。报告断言，这些原因不是首先起源于对争取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形式、方法的不同理解，而是在于两个党活动的组织原则上的差异。报告认为，共产党没有党内民主，德国共产党依附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是“俄国共产党的工具”。由此奥伦豪埃尔得出结论说：“统一问题，只有在国际级别上、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谈判才能解决”。因此，奥伦豪埃尔号召加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全权，要使加入国际的党必须执行它的决议。

奥伦豪埃尔的这个报告对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建有很大影响。后来，他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在“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的领导人中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威利·艾希勒。起初，他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流亡者小组，积极参加了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辩论。他们坚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述这个目标，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同时，他们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原则还有所保留，提出

---

<sup>①</sup>奥伦豪埃尔：《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与任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第251页。

代之以“社会监督”，在农业、商业和小工业企业中保持在个人自主权基础上的“自由经济成分”。后来，艾希勒小组加入了“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同盟”。艾希勒成为同盟领导人，同奥伦豪埃尔等人一起为同盟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如1943年作为提供辩论基础，公布了文件——《新德意志共和国》，1945年公布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政策》。艾希勒和奥伦豪埃尔后来在谈到这些文件时，认为是“在德国流亡者活动中最富有成果的一页”，其中所预言的许多思想，后来反映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多特蒙特、柏林和哥德斯堡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sup>①</sup>

1945年11月，“旅英社会主义组织同盟”通过了另一重要文件——《未来德国宪法草案》。在文件序言中写道：

“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德意志共和国国家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

本着这一精神，它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人道的与和平的社会制度；

实现以全体公民享有参与决定权和共同担负责任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民主；

要使经济摆脱私人垄断所有制的桎梏，实行计划经济；

防止任何一种经济剥削；

保障所有人具有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机会；

实现经济和文化发展机会均等；

本着道义上的责任感、民主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精神，促进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以及青年教育工作；

消灭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

---

<sup>①</sup>洛贝·诺伊曼：《威利·艾希勒和德国社会主义纲领》（西）柏林—波恩：1979年版，第14页。

建立各种国际机构，为了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各国的国家主权应从属于这些国际机构。”<sup>①</sup>

显然，这里已经不再提什么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了。接着在下面的经济纲领中提出要允许在“自由的自主权和经济竞赛”基础上，也就是在市场基础上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国家的职权是拟定计划，规定要在拟定国家经济计划时吸收代表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参加这一工作。草案虽然写道：“关键的经济部门归社会所有或由国家控制”，<sup>②</sup>但没有谈到具体的社会化措施。

宪法草案规定了议会制的管理形式，议会称为人民委员会。共和国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和部长，规定只有在人民委员会投票表示不信任时才可以解散内阁。这个规定显然是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力求消除引起议会和政府机构失去平衡的不稳定因素。

这个文件与奥伦豪埃尔在三年前（即1942年）关于“新的民主”、“革命性质过渡阶段”等论述相比，无疑是更加向右转了。这个变化自然是和当时整个战争的进程不无关系。1942年，战争刚刚发生转折，总的反法西斯斗争气氛使人们洋溢着不同程度的激进情绪。随着同盟国参战，战争接近结束。西方大国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愈来愈大。在流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激进情绪逐渐衰退，更右的思想占了上风。

纵观流亡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演变的过程，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流亡初期，这个党出于对希特勒专政下惨痛经验的反思，表示要吸取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宣布改良主义

---

<sup>①</sup>米勒、波特霍夫合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第189—190页。

<sup>②</sup>《从开始到1945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20页。

已经破产，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激进的经济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过了不久，就又有人提出反过头来改善魏玛模式，效法西方，建立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在经济方面，从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转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更引人注目的是，流亡期间，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有人提出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实行“世界观多元化”的口号。1942年奥伦豪埃尔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党的思想。出于对法西斯残无人道的恐怖制度的仇恨，艾希勒提出了从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来论述社会主义。另外，还有夸大工会或工人代表对私人企业“监督”作用的“经济民主”这一概念，虽然它是早在法西斯上台以前，1928年著名的工会活动家纳弗塔里在《经济民主、本质途径和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但在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具体化发展。

所有这些，都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使社会民主主义开始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转变。这个转变的终点就是彻底脱去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半个世纪以来不断为革命词句、激进口号、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装饰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变为赤裸裸的公开的改良主义。



## 附 录

### 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事年表 (1914—1945年)

**1914年8月**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法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号召党员和工会会员支持战争。

**9—10月** 德国各城市出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左派小组。这些小组有计划地进行反对战争和反对右派立场的斗争。

**12月2日** 卡·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唯一投票反对政府第二次军事拨款法案。

**1915年3月5日** 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在柏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左派自己的杂志《国际》。之后，左派被称为“国际派”。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瑞士的伯尔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英、法、意、荷、波兰、瑞士和俄国的代表25人。会议商讨了开展社会主义妇女的国际和平运动。

**4月5—7日**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保加利亚、丹麦、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典和瑞士的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新

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并决定出版《青年国际》杂志。

**5月27日** 卡·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著名传单《主要敌人是在国内！》在德国广为散发。

**9月5—8日** 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由此次会议参加者开展的反战革命运动称之为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1916年1月** 斯巴达克派组成。它是在“国际派”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全国性的左派宣传性组织。

**3月30日**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组成的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宣告成立。

**4月24—30日** 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

**1917年1月** 社会民主党中派和左派一起在柏林召开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全国代表会议。

社会民主党仲裁委员会决定开除以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和斯巴达克派为核心的反对派出党。

**4月6—8日**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哥达召开成立代表大会。斯巴达克派在保留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9月5—12日** 国际社会主义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三次代表会议（即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1918年1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领导全国性的的大罢工。全德国总共有一百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这次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工人阶级重大的争取和平行动。

**10月7日** 斯巴达克派和其它左派在柏林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准备武装起义。

- 11月** 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联合政府。
- 12月30日**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成立。
- 1919年1月5—6日** 柏林无产阶级为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赤卫队、推翻艾伯特政府而举行总罢工，五十万名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武装的工人和士兵队伍占领国家印刷所、粮管局、铁路局、电报总局等重要机关。后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而失败。
- 1月15日** 卡·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反革命雇佣兵逮捕并被秘密杀害。
- 1月19日** 德国国民议会举行选举。选举结果：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2,317,290票，22个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11,509,048票，163个议席；德意志民主党得5,499,722票，75个议席；基督教人民党（中央党）得5,709,445票，91个议席；德意志人民党得1,345,638票，19个议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得2,618,724票，44个议席；其余政党7个议席。由于革命的柏林工人1月被镇压和国民议会的选举，德国十一月革命即告结束。
- 2月3—10日** 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6个国家的97名代表。主要议程是：战争责任问题、国际联盟、领土问题、民主与专政。
- 2月11—13日** 国民议会选举弗·艾伯特为临时总统。菲·谢德曼组成由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的代表组成的魏玛联合政府第一届内阁。
- 3月2—6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成立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30个国家的51名代表。
- 6月10—15日** 社会民主党在魏玛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议程：党

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国民议会党团的报告、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委员会制度和国家宪法。

**6月14—15日** 共产党在柏林召开秘密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者：中央成员、章程委员会成员和地区书记。议程：政治形势、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章程、划分地区和选举中央。

**3月、9月、11月** 独立社会民主党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主要讨论党的任务、纲领策略和加入共产国际等问题。

**1920年3月13日—23日** 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自由职员联盟发动全国1,200万工人总罢工，鲁尔地区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粉碎了反动军国主义分子的卡普暴动。

**3月27日（—6月8日）** 米勒（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联合内阁执政。

**3月31日** 社会民主党党员1,180,208人，其中女党员207,007人，9236个地方协会，147种党报，其中91种党报订户为1,186,000份。

**6月6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441,793票，102个议席；独立社会民主党获4,896,095票，81个议席；共产党获441,793票，2个议席。

**6月25日—（1921年5月4日）** 康·费伦巴赫（中央党）为首的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联合内阁执政。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入阁。

**7月19日和23日—8月7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克里斯平、多伊米希、迪特曼、施瓦特等四人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7月31日—8月5日** 在日内瓦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

会。德国代表韦尔斯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9月1日——3日** 在柏林举行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与会200名代表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10月10日——16日** 在加赛尔举行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378名与会者中有代表283名。主要议程：住宅问题、党的纲领、农业政策。大会选举了一个党纲起草委员会。米勒、韦尔斯当选为执委会主席。

**10月12日——17日** 在哈雷举行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93名，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左右两派分裂，各立中央。

**12月4日——7日** 共产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柏林举行合并代表大会。莱维和多伊米希选为党的主席。合并后共产党约30万人。

**1921年2月22日——27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10名代表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二半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克里斯平、累德堡选入执行委员会。

**9月18日——24日** 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与会376人中有代表277名，主要议程：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党的纲领问题。米勒和韦尔斯当选为党的主席。

**10月26日（——1922年11月22日）** 约·维尔特（中央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合内阁执政。

**1922年1月8日——12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代表188名，主要议程：独立社会民主政策、纲领问题、社会党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章程、市政纲领。选举克里斯平、狄特曼、累德堡为执委会主席。

**7月3日** 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就加入政府内阁进行会谈。

- 7月14日** 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合并。
- 8月29日** 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就两党合并问题举行正式谈判。
- 9月6日** 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公布了作为合并基础的行动纲领。
- 9月17日——23日** 社会民主党奥格斯堡代表大会。与会者349人，主要议程：国际与无产阶级统一问题、争取妇女经济、社会地位的斗争、司法改革。大会特别讨论通过了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问题。
- 9月20日——23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格腊代表大会。代表192名，大会议程：经济形势与粮食税、赔款问题、无产阶级统一问题。185名代表投票支持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 9月24日** 在纽伦堡举行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代表大会，建立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
- 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 古诺（无党派）为首的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联合内阁执政。
- 1923年5月21日——25日** 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在汉堡举行合并代表大会，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 8月13日——10月3日** 古·施特雷泽曼（德意志人民党）为首的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统一社会民主党大联合内阁执政。
- 10月6日——11月23日** 古·施特雷泽曼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执政。
- 11月2日** 内阁中全体社会民主党部长辞职。
- 11月30日（——1924年12月15日）** 威·马克思（中央党）为首的中央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巴伐利亚人民党联合内阁执政。

**12月31日** 统一社会民主党有党员1,261,072名，其中女党员130,000名。

**1924年4月1日** 希法亭主编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社会》创刊。

**6月11日——14日** 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到会390人中代表285名。议事日程：组织章程、农业问题、国会选举。大会通过新的组织章程，决定恢复原来名称，选举米勒、韦尔斯、克里斯平为执委会主席。

**12月7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7,880,963票，131议席；共产党获2,708,345票，45议席。

**1925年1月15日（——12月5日）** 汉·路德（无党派）为首的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联合内阁执政。

**3月3日** 社会民主党有党员690,802人，其中女党员153,693人，8240个地方协会。

**3月29日** 总统选举。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布劳恩获7,802,497票。因各党候选人均未获绝对多数票，在4月26日举行第二次选举，社会民主党与德意志民主党、中央党组成选举联盟，但未能阻止右翼政党候选人兴登堡当选。

**8月22日——27日**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在马赛召开，德国代表克里斯平、米勒、韦尔斯任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9月13日——18日** 社会民主党海德堡代表大会。398名代表，主要议程：欧洲政治问题，党的纲领。大会通过海德堡纲领，选举韦尔斯、克里斯平为执委会主席。

**1926年1月1日** 社会民主党有654,457名男党员，151,811名女党员，7,967个地方协会。

**1月9日** 社会民主党宣布参加“无偿没收诸侯财产公民投票委员

会”。

**1月20日** 汉·路德（无党派）组成第二届大联合内阁。

**5月5日** 威·马克思（中央党）代替路德出任总理，接受内阁原班人马。

**1927年1月28日（——1928年6月12日）** 威·马克思（中央党）为首的中央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联合内阁执政。

**5月22日——27日** 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代表415名，主要议程：农业纲领、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报告。维尔斯、米勒、克里斯平当选为执委会主席。

**12月31日** 社会民主党有党员866,671人，其中女党员181,541人，8462个地方协会。

**1928年5月20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9,151,059票，153议席；共产党获3,263,354票，54议席；纳粹党获809,771票，12议席。

**8月28日（——1930年3月27日）** 海·米勒（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的大联合内阁执政。

**3月5日——11日**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克里斯平、施特林、韦尔斯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9年5月26日——31日** 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397名代表。主要议程：防卫委员会报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妇女与政治、经济问题、工人体育运动。选举韦尔斯、克里斯平任党的主席。

**10月29日** 美国交易所倒闭，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



- 1930年1月1日** 社会民主党有党员1,021,777人，其中女党员218,335人，9544个地方协会。
- 3月27日** 米勒政府垮台，布吕宁（中央党）建立总统内阁制新政府，德国议会制政府结束。
- 9月14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选票8,575,244张，143议席；共产党获4,590,160票，77议席；纳粹党获6,379,672票，107议席。
- 1931年5月31日——6月5日** 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与会者394人，主要议程：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与工人阶级、消灭法西斯主义、党与青年。韦尔斯、克里斯平、福格尔当选为主席。
- 7月25日——8月1日**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克里斯平、施特林、威尔斯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 10月4日** 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派全国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来自25个地区的88名代表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通过临时行动纲领。
- 1932年3月25日——28日** 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与会95名代表，讨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工会问题，通过了原则声明、行动纲领与组织章程。全党有党员25,000名。
- 3月13日** 总统选举。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号召选举兴登堡、共产党号召选举台尔曼，并提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
- 4月10日** 第二次总统选举。兴登堡以19,359,983票当选。
- 7月31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7,959,712票，133议席；共产党获5,369,698票，89议席；纳粹党获13,779,111票，230议席。
- 11月6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7,248,000票，121议席；共

共产党获5,980,200票, 100议席; 纳粹党获11,737,000票, 196议席。

**1933年1月30日** 兴登堡委托希特勒组阁, 魏玛共和国就此终结。

**2月27日** 国会纵火案, 纳粹分子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3月5日** 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7,181,629票, 120议席; 共产党获4,848,058票, 81议席; 纳粹党获17,277,180票, 288议席。

**4月26日** 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举行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利用残存的合法性, 坚持容忍政策。重新选举韦尔斯、福格尔为执委会主席。

**5月2日** 纳粹分子占领工会大厦和办事处, 逮捕工会领袖和地区书记, 没收工会上百万财产。

**5月4日** 新选出的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成员第一次会议决定, 将一部分成员派到国外。这些人先到萨尔布吕肯, 后又迁到布拉格。

**5月9日** 社会民主党全部财产被没收、报纸被封闭。

**5月中旬** 共产党领导人流亡国外, 在巴黎建立领导机关。

**6月21日** 克佩尼克流血周开始。在柏林的克佩尼克, 法西斯冲锋队员袭击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干部住宅, 500多人被捕, 91人(包括施特林等人)被杀害。

社会民主党12人领导委员会在柏林成立。

**7月2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一次会议。同月25日, 发布第一份文件, 号召为德国的解放而斗争。

**8月21日——25日** 在巴黎召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会议, 讨论在法西斯反动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9月21日——12月23日** 在莱比锡和柏林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 鉴于世界抗议运动, 法西斯政府被迫释放季米特洛夫等三名共

产党人。

**1934年1月28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布《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即《布拉格宣言》。

**7月2日** 萨尔地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领导签订统一战线协定。

**1935年2月11日** 德共中央向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呼吁建立统一战线，被拒绝。

**6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

**10月22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与边区书记在布拉格举行会谈。

**11月23日** 共产党领导人达勒姆、乌布利希同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代表施坦普菲尔、福格尔就统一战线问题在布拉格会谈。

**11月28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表会谈备忘录，拒绝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1936年1月30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表《为了德国——打倒希特勒》的呼吁书。

**2月2日** 在巴黎，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等组织代表与一些知识分子建立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

**6月底——8月中旬** 在汉诺威，社会民主党员与工会干部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抵抗小组数百名成员被捕。

**7月** 德共中央与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代表在布拉格、巴黎举行会谈。

**12月21日** 在巴黎的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发表《建立人民阵

线、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号召书》。这是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第一个共同签署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大量分歧，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在1937—1938年之交瓦解。

**12月底** 据盖世太保统计，1936年在德国逮捕11,687名共产党员和1,374名社会民主党员。

**1937年4月10日——11日** 在巴黎的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

**12月底** 据盖世太保统计，1937年在德国逮捕8,068名共产党员和733名社会民主党员。

**1938年1月30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表《五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控诉》，揭露希特勒法西斯。

**5月——6月**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从布拉格迁到巴黎。

**9月14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布《致德国人民呼吁书》，指出法西斯战争危险。

**1939年4月3日——5日** 德共中央建议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联合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后者拒绝这一建议。

**4月26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在巴黎开会，讨论党在未来战争中的立场。

**9月1日** 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发布《致德国人民呼吁书》，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

**1940年1月底**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就德军入侵波兰、捷克发表《向德国人民进一言，你们无罪》的呼吁书。

**4月20日**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就德军入侵丹麦、挪威发表反战声明。

**5月中旬**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就德军入侵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发表声明。

- 11月初** 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成员从巴黎逃至里斯本，决定解散执委会，分别流亡到英美等国。
- 1941年3月19日** 流亡英国的社会民主党原执委会部分成员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新开端等组织的领导人在伦敦联合建立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并发布宣言。
- 5月中旬** 在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的建议下，成立一个19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就《战后德国与欧洲》这一题目的辩论提出纲领性的意见。几个月后由于意见分歧，工作委员会解散。
- 6月22日** 希特勒德国军队入侵苏联。
- 12月底** 联盟与社会民主党旅英小组发表决议《德国社会党人、工会会员与消灭纳粹专政》。
- 1942年7月初** 驻伦敦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福格尔同德国共产党代表威·科埃南举行第一次会谈。
- 12月6日** 埃·奥伦豪埃尔在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会议上作题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和任务》的报告。
- 12月18日** 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通过谴责纳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决议。
- 1943年6月10日** 共产国际解散。
- 7月3日——4日** 在纽约召开旅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工会会员代表会议。
- 10月23日** 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通过《关于国际政策路线》的决议。
- 年底** 旅英德国社会主义组织联盟在长时间辩论之后发表了《新德意志共和国》的纲领草案。

**1944年7月20日** 德国上层反抗运动试图发动政变，施陶芬堡等青年军官组织暗杀希特勒失败，希特勒对密谋分子疯狂报复。

**7月** 在瑞典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集团，其中包括维·勃兰特等人，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战后政策》纲领性文件。

**12月2日——30日** 旅居瑞典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与会21名代表讨论了党的组织、政治路线以及未来德国和平改造等问题。

**1945年4月11日——13日**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部分政治犯人起义，起义者在美军到达后获得解放，发表《布痕瓦尔德宣言》。

**4月19日** 在盟军占领汉诺威后十天，舒马赫在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第一次集会上宣布决定重新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

**5月8日** 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sup>①</sup>

（1919年3月2—6日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

在坚持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党代表大会宣布：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工人和士兵曾夺取国家政权。但他们没有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右派社会党人的领袖与资产阶级再度同流合污，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字眼推行蛊惑人心的政策。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民主的法律形式是骗人的假象。如果在政治解放之后没有随之实现经济解放和独立，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右派社会党人推行的社会化是一个骗局。他们在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前提下，满足于某种“混合经济”式的管理，甚至仅仅满足于对那些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已成熟到可以立即实行社会化的大企业进行“公开监督”。

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他们只有靠自己进行解放斗争，不仅要依靠现有的组织，而且必须为此建立一个新的无产

---

<sup>①</sup>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讨论党的纲领与国际问题。哈阿兹和多伊米西分别提出各自的纲领草案。哈阿兹的草案反映了党内中间派观点，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任何新的策略。多伊米西的草案提出了左派的主张，表示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得不到任何完全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即工人、士兵苏维埃，其目的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社会主义。围绕纲领草案左派与中间派展开激烈争论。大会最后以全体对8票通过一个折衷纲领。该纲领承认世界革命、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也含有模棱两可的中派主义观点。如纲领接受了哈阿兹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的提法，即把国民议会与苏维埃制度结合起来的主张。

阶级战斗组织。

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的苏维埃制度就是这种组织。它把企业中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采取革命行动。它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

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苏维埃制度正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它将肩负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担。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是：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充当它的旗手。独立社会民主党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它支持苏维埃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斗争。它力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并把这个专政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消除任何阶级统治，消除任何专政，创造真正的民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它的目的不是消灭个人，而是铲除资本主义制度。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最近要求如下：

(1) 把苏维埃制度写入宪法。苏维埃在立法过程中，在国家和市镇的管理中以及在企业中起决定作用。

(2) 解散全部旧军队。立即解散由志愿军团组成的雇佣军。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一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的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实行自治，军官由全体士兵选举产生。取消军事审判权。

(3) 必须立即开始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化。必须立即在矿山和能源部门（煤矿、水力、电力），在集中的钢铁生产及其它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在银行和保险业部门，实行社会化。大地产和大森林必须立即转为社会所有。社会的任务是：通过提



供一切技术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通过加强合作社，使全部经济企业达到最大的生产能力。在城市，私有土地必须转变为公共财产，必须由市镇自己承担责任建筑足够的住宅。

(4) 行政机关和法官由人民选举。立即任命一个国家法庭，它必须追究发动世界大战和阻止及早实现和平的罪犯们的罪责。

(5) 必须全部剥夺在战争中增加的财产。所有较大的资产必须将一部分交给国家。此外，公共支出费用必须通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来获取。必须宣布战争贷款作废，但对贫困者、公益事业协会和机构及市镇政府应给予补偿。

(6) 扩大社会立法。保护和照顾母亲和儿童。必须保障战争造成的寡妇、孤儿、伤残者能无忧无虑的生活。必须把有产者多余住房交给缺房者使用。根本改革公共卫生事业。

(7) 国家和教会分离，教会和学校分离。设立世俗性质的公立单一制学校并在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每个孩子有权受到符合其能力的教育并获得为此所需的各种条件。

(8) 以公共法律规定由各市镇联合机构负责对广告和广播事业实行垄断。

(9) 同一切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立即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相信，通过它力争达到的全部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无产阶级的全面、持久胜利会更快地到来并得到保证。但是，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承认本宣言的原则和要求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前提。

(译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3月2—6日柏林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9年柏林德文版，第3—4页。  
陈玉国译 殷叙彝校。)

##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sup>①</sup>

(1919年11月30日—12月6日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

无产阶级革命有两大阶段：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保卫政权。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因为所有其它的阶级，尽管彼此利益相互矛盾，都是立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展，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愈来愈同其它国家的工人状况相依赖。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和共同斗争。基于这种认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声明自己是同所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一致的。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要用国际社会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开端。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工人阶级需要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需要承认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并应改造成进行

---

<sup>①</sup>继1919年3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非常代表大会之后，同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在莱比锡再次举行非常代表大会。鉴于形势及斗争条件的变化，大会决定重新制定纲领。阿尔杜尔·克里斯平提出了一个行动纲领草案，为执委会领导一致同意。大会成立了一个纲领草案委员会，成员有克里斯平、鲁道夫·希法亭、阿尔弗莱德·亨克、瓦尔特·施托克、恩斯特·多伊米西和库尔特·盖尔。委员会对执委会草案作了不大的修改后，草案为与会代表们一致通过。

社会革命的斗争组织的工会，也需要革命的苏维埃制度来团结工人进行革命行动。

独立社会民主党站在苏维埃制度的立场之上。它支持一切这样的努力：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建立苏维埃组织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把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团结起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训练他们。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组织将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被摧毁。政治的工人苏维埃将作为无产阶级统治组织而代替它们。政治的工人苏维埃把立法与行政集于一身。它的发挥作用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构包括乡镇机构的改造和重新组织，还意味着实现工人阶级的自主权以及他们为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团结起来。独立社会民主党用政治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治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组织，用革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抗体现资产阶级权力意志的资产阶级议会。经济苏维埃制度将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无政府主义改造成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

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要采取以下措施：

1. 解散一切反革命军队，解散一切民间的军事和警察队伍，即城乡居民武装、技术救援组织、警察部队，解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武装，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2. 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所有制。在以下范围即银行及保险业、矿山和能源——煤、水利、动力、电力等部门，集中的钢铁生产、运输和交通业以及其它高度发展的工业部门立即实行社会化。

3. 大土地所有制和大森林立即转归社会所有。对所有的农业企业通过提供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手段，通过促进合作社，使其达到最大的生产能力。开垦荒地。

4. 在城市和以工业为主的市镇把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转为公

共所有制。由市镇负责营造足够的住宅。

5. 有计划地整顿食品业。

6. 所有公共卫生保健业实行社会化。

7. 一切公共教育和培训机构实行社会化。建立公立的单一制世俗性学校。学校要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学原则，要把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8. 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宣布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私人联合组织，它们的事务由自己安排。

9. 实行社会主义的税收政策，通过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来支付一切能由税收承担的公共开支。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了一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无产者利益的其他经济政策措施。

10. 废除一切在公共和私人关系上偏袒男子、歧视妇女的法律。

11. 对宣传和广告业实行由公共法律规定的垄断并委托市镇联合机构负责。

12. 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公法机构。

13. 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劳动的义务。实行维护劳动力的保护措施。

14. 同一切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立即着手准备同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盟。

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取消任何阶级统治、获得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革命手段。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将结束，社会主义民主将充分发展。

要按照苏维埃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苏维埃制度将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发挥最大的效用。苏维埃制度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工人作为经济的支柱、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文化的推动者也必须成为对一切法律机构和政治权力负有责任的支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独立社会民主党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同革命工会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组织一起运用一切政治的、议会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斗争手段是群众行动。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个别集团和个人的暴力行动。它的目标不是毁灭生产工具，而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是赋予工人运动以内容、方向和目标，使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他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和旗手。

独立社会民主党坚信，通过它努力追求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团结，定会加速并保障无产阶级全面、持久的胜利。出于这一意图，独立社会民主党也要努力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的革命的、有行动能力的国际。

在口头和行动上承认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前提条件。

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由此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1—206页。张世鹏译 殷叙彝校。）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sup>①</sup>

### (1921年格尔利茨党代表大会通过)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资本主义经济把被现代技术极大发展了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置于相对一小撮大占有者的统治之下。它使广大工人群众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变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它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使生活富裕的极少数人同贫穷困苦的广大阶层相对立。它因此使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道德的要求。

世界战争和战争结束时强迫缔结的和平条约进一步加剧了这

---

<sup>①</sup>1920年10月10日至16日在卡塞尔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阿道夫·布劳恩的提案，选举了一个纲领委员会。成员有爱德华·伯恩施坦、阿道夫·布劳恩、亨利希·库诺、格奥尔格·格拉特瑙尔、威廉·凯尔、海尔曼·莫尔肯布尔、海尔曼·弥勒（柏林）和安东尼·鲁菲夫。委员会选举了莫尔肯布尔为主席，阿道夫·布劳恩为干事，组成了11个下属委员会。有60多人参加了以后的会议并通过了决议。1921年7月发表的纲领草案由于不够严密而受到激烈批评。在1921年9月18日至24日举行的格尔利茨党代表大会上，任命了一个28人的纲领起草委员会，其中有伯恩施坦、阿道夫·布劳恩、奥托·布劳恩、库诺、爱德华·大卫、凯尔、马利·尤卡茨、保尔·吕贝、莫尔肯布尔、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威廉·佐尔曼、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亨利希·施特吕贝和鲁道夫·维泽尔。在委员会内以24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经过修改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在对整个草案进行总表决时，除2票反对外一致通过，反对者为亨利希·施特吕贝和汉斯·马克瓦尔德。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纲领，只有5票反对。

一个过程。它加快了企业与资本的集中，加深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富与贫之间的鸿沟。在工业、银行业、商业和交通中开始了一个兼并与融合、卡特尔化与托拉斯化的新阶段。军火供应商人和投机倒把分子通过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上升为新的资产阶级。而中小所有者、工商业主、大批脑力劳动者、公务员、职员、艺术家、作家、教师、各种自由职业的生活条件的成员却下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公共生活的腐化、资产阶级报刊对势力强大的经济独裁者的日益增长的依附（后者正企图以这种方式把国家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向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发展加剧了通过帝国主义极力扩张而追求统治世界经济的努力。这一发展同现行和平条约中解决世界规模的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一样，招致新的流血冲突的危险，使人类文化面临崩溃的威胁。

与此同时，世界战争清除了腐朽的统治制度。政治变革给群众带来了他们为了社会提高所需要的民主权利。通过几代人光荣的付出重大牺牲的工作，工人运动大大加强，成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通过无产者的国际联合，通过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秩序，创立一个各民族权利平等的真正同盟，来保护人类免遭新的战争毁灭，这一意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来。

指明实现这一意志的道路，使劳动群众的必不可免的斗争形成一种自觉的统一的斗争，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决心竭尽全力保卫已经获得的自由。它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国家形式，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将是对人民生存权利的伤害。

但是社会民主党不能仅仅限于保卫共和国使之免受敌人的打击。它要为争取在自由的人民国家内组织起来的人民意志对经济

的统治、为按照社会主义集体思想的精神革新社会而斗争。它认为把大规模的集中的经济企业转为公有经济，并由此进一步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成为整体的福利而经营的企业，这是把劳动人民从资本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提高生产量、使人类向更高级形式的经济与道德共同体上升的一个必要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重申爱尔福特纲领中的如下信念：它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奋斗，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它在进行斗争时意识到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无论是在民族共同体或国际共同体内，在帝国、各州和市镇中，在工会与合作社里，在车间或家庭里都是这样。

为了这一斗争要实现以下要求：

### **经济政策**

使土地、耕地、矿藏及作为能源的自然力资源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转而为全体人民服务。以法律措施反对粗放经营或完全荒废农业耕地或为私人奢侈的目的滥用耕地。国家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首先是对利益集团即卡特尔和托拉斯实行监督。在民主体管理和避免官僚化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国家的、州的、以及公共团体的企业。鼓励目标不在于赢利的合作社。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政策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

### **社会政策**

统一的劳动法。保障结社权。有效的劳动保护：用法律规定至多八小时的劳动日，在对生命和健康为害较大的企业中缩减这个劳动时间。最大程度地限制男子夜工。禁止妇女和青年的夜



工。禁止妇女和青年在特别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以及在有特殊事故危险的机器上工作。禁止学龄儿童从事任何职业性工作。对一切工厂、企业实行监督。每周一次至少42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每年要有支付工资的休假。支持一切清除家庭手工劳动弊端的努力，并在有可能不使家庭手工业者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消除这种劳动。把社会保险改造成一种全面的社会救济。在这一基础上促进国际劳动保护。

全面的、妇女的就业权利。

保护并扩大公务员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

有计划的、符合工人阶级社会需要的人口政策。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特别救济。

## **财政**

保障并继续征收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使它们适应价值的变化和赢利资本的生产能力。国家享有远房亲等继承权，其应得份额根据继承人数目划分若干等级。对于偷税漏税和资本抽逃实行有效的追究。保护劳动力并对任何一种挥霍浪费的过度消费课以重税。公共权力参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

## **宪法与行政**

保卫民主共和国。巩固国家的统一。把国家建设成为有机划分的统一国家。市镇自治和按法律组织成更高等级自治体的市镇联盟（区、地区、省）的自治。把民主的代表机关置于按职业分等的组织之上。一切国家机关民主化。年满20岁的公民不分性别、出身、宗教，充分享受宪法规定的和事实上的平等。

## 市镇政策

为城市和农村制定统一的市镇规章以及建立统一的市镇代表机构。市镇中的动议权和公民投票。一切市镇官吏服从市镇代表机构。定期选举市长。建立并鼓励大的、具有工作效率的市政单位。限制国家对市镇机关指责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的监督权。取消行政监督机关对市镇机关的批准权。国家从法律上解除对于市镇实行社会化的约束。

## 司法

以社会法观点取消现行的私法观点。将财产权置于人身权利和社会公共权利之下。反对阶级司法。由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应在一切司法部门中起决定性协助作用。普遍的法律知识教育，通俗化的法律语言。法官阶层应由来自一切人民阶级的人组成。妇女可参与一切司法机关的工作。按照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司法教育。整个司法机关交给国家。刑事案件允许上诉。国家以法律规定判决的执行。防护性和教育性的刑法而不是报复性的刑法。废除死刑。

## 文化和教育政策

全体同胞都享有文化财富的权利，民族共同体拥有最高的教育权利。

宗教是私人的事，是内心信仰的事，不是党的事，不是国家的事，国家与教会分离。

把学校改造成世俗的统一的学校，免费就学、免费供给学习用具和学校中的膳食。

把学校改造成青年人广泛自治的生活和工作集体。由男女教师对男女学生进行共同的教育。由具有突出的教育才能的校外人

员参加教育工作，父母对学校教育负责地合作，通过家长委员会对学校进行监督。

在家庭和学校里和在自由的青年运动中要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人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中具有共和国理想、履行社会义务、拥护世界和平的自觉成员。

举办从成长的儿童开始到进入成年为止的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作为设有本身的公务员的机关的独立的、公开的工作领域）。

设立成年同胞的教育机构，作为自由的、以建设生动的人民文化为目标的工作团体。

### **国际关系与国际**

工人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国际团结是和平的最好保障。

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不把任何承认国际联盟章程的民族排除在外，在联盟中所有国家的议会都有议员代表，其人数视各党派力量而定。把国际联盟建成一个真正的工作、法律和文化共同体。通过一个国际法庭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在对所有民族同等有效的国际法的范围内实行民族自决。按照完全互惠的原则以国际法保护一切少数民族。在国际联盟的保证下实行国际裁军，在一切国家中把武装力量减少到为保证各国内部安全并通过国际联盟共同行动强制履行国际义务所需要的程度。一切殖民地和保护区服从国际联盟的最高主权。实行一切经济贸易地区门户开放的基本原则。国家外交代表机构民主化并实行精简。

按照减轻经济负担和承认民族生存权利的精神修改凡尔赛和平条约。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07—214页。张世鹏译 殷叙彝校。）

##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sup>①</sup>

(1925年9月13—18日海德堡  
代表大会通过)

### 基本原则

经济发展以其内在的规律性加强了资本主义大企业，它在工业、商业和交通中，越来越排挤小企业并使其社会意义日益减少。随着工业日益强大的发展，与农业人口相比，工业人口不断增多。资本使生产者群众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使

---

<sup>①</sup>1922年9月24日在纽伦堡举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代表大会。大会在一致通过一个简短的行动纲领之后，决定制定一个新的党纲。纲领委员会由卡尔·考茨基担任主席，此外还选举了15名成员，其中有：伯恩施坦、阿道夫·布劳恩、莫尔肯布尔、施坦普费尔、施特吕贝、克里斯平、威廉·狄特曼、亨克、希法亭、弗利茨·杰格尔和托尼·曾德尔（三年以后举行的海德堡代表大会上又增选了代表罗伯特·施密特、保尔·列维和保尔·康普麦尔）。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纲领起草工作一直停滞不前。1924年6月，阿道夫·布劳恩向柏林代表大会说明委员会之所以无所作为是由于考茨基长期患病缺席，而“我们所有应参加起草纲领的人，即委员会的成员、党的合作社、报刊负责人时间完全被党的工作占去，很难把委员会成员召集在一起，集中意志来认真制定党的纲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向1925年党代表大会提出一个新纲领以供通过”。第二年，希法亭起草了一个草案。在1925年9月举行的海德堡代表大会上，他解释说，草案实质上是在卡尔·考茨基拟就的稿子基础上写成的。代表大会在批准了两个不大重要的修改提案之后，通过了希法亭的草案，根据希法亭的请求，农业纲领暂不包括在内。1927年5月基尔党代表大会制定了农业纲领。

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很大一部分土地落入大土地所有者即大资本的天然同盟者手中。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工具为相对少数的资本家所垄断，他们借此保持着对社会的经济统治。

与此同时，随着大企业在经济上的突进，职员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作用日益增长。他们在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中行使领导、管理、组织和分配的职能，他们通过科学研究促进了生产方法。随着他们的数量的增长，他们越来越丧失上升到特权地位的机会，他们的利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其余工人的利益趋于一致。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化，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极大增长。而大资本与大土地所有者力图把社会劳动过程的成果垄断起来。不仅无产者，而且中间阶层也不能完全享受生产力的增长所造成的物质和文化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中，降低各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趋势不断发挥作用。劳动阶层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使自己不致日益沉沦，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此外还要加上生存极度缺乏保障的状态和不断威胁他们的失业。这种情况在危机期间尤其令人痛苦和残酷。这种危机是紧跟在每一次经济高涨之后到来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

资本主义的垄断欲望促使一些工业部门联合并把相互衔接的生产程序联合起来，建立了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经济组织。这个过程把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联合成金融资本。

个别资本家集团就这样成为经济的强大统治者，他们不仅使雇佣工人、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对他们经济上的依附。

金融资本随着自己的影响的增长，运用国家权力来统治国外地区，把这些地区作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资本主义投资场所。

这种帝国主义的权力追逐不断地以冲突和战争危险威胁着社会。但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压迫和威胁的增长，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加强。他们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通过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不断的工作，受到教育并联合起来。无产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在为他们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时，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垄断相对立的整个社会的利益。经过几代人作出重大牺牲的工作而大大加强的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与之对立。他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通过创立一个国际法律制度、一个各民族权利平等的真正联盟来保护人类免受战争毁灭，这一意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地表现出来。

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才能实现。把资本主义生产变成社会主义的、为了社会并且由社会进行的生产，这将促使生产力的扩展和提高成为高度福利和全面改善的一个源泉。到那时，社会才会摆脱对于经济力量的盲目屈从、摆脱全面的分裂状态，上升到在和谐团体中的自由自治。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斗争，而且必然是一个政治斗争。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不能进行他们的经济斗争，也不能充分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组织。他们把民主共和国当作这样一种国家形式，捍卫和发展这种国家形式对于他们的解放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参加的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自觉的，并且决心履行由此

带来的全部义务。各民族的持久幸福在今天只有通过它们的团结合作才能实现。

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而斗争。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不仅同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同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不管这是针对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还是一个种族的。

把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变成一个自觉的统一的斗争，为这一斗争指出必然的目标，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持续斗争中他们努力实现其最终目标。

## **行动纲领**

### **宪法**

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基地。因此，社会民主党要保卫共和国并促进它的发展。

党要求：

德国成为一个在地方分权自治基础上的统一共和国。在应当有机地、重新划分的市镇和州的下层结构之上建立强大的国家权力。它在法律和行政上拥有为了实行统一领导和维持国家团结所必需的权限。

把国家的直接管理扩大到司法领域。一切法庭成为国家法庭。应通过立法途径为公安警察制定统一的原则。应建立一支统一的国家刑事警察。

拒绝一切保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企图。把国防军改造成成为共和国的一个可靠的工具。

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出身、宗教和财产，彻底实现宪法规定：

的平等地位。

## 行政

社会民主党行政政策的目标是用一个在民主自治的基础上使人民成为行政的支柱的行政组织代替从专制国家沿袭来的警察国家执行机构。为此要求行政民主化。

根据全国性法律统一各州的行政。

行政的基本原则由国家决定。执行由自治机构负责，由于具有集中的性质而需要国家直接管理的事务除外。

在立法方面应为地方的、省的特殊性留有余地。

根据全国性州行政管理法划一规定各州行政区域和行政机构的组成和管辖权。

应根据一项全国性市镇规章为市镇和市镇联盟（乡镇、市、区、省）制定统一的法律。一切自治机构都应实行一院制。市长应定期选举。自治机构在国家和州的法律范围内独立处理本身行政方面的事务并为此承担责任。涉及全体公众利益的问题应在市镇举行人民建议和人民投票。

应由独立的、分成若干审级的行政法庭来保证法律对行政的监督、特别是保护公民反对侵犯其权利的行政行为。国家行政法庭同时承担在一切有关州的事务上的高级行政法庭的任务。

通过一个全国性地方公有化法和全国性征用私产法承认市镇和市镇联盟为了建立和扩大市政公共经济所要求的权限和权力手段。应将管理形式改造成一方面能使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摆脱官僚主义的桎梏，另一方面又保证公共机构保留不受限制的決定权利。

应为所有公共机构的公务员和职员规定一个统一的公务法，根据民主的和社会的观点对他们的选拔、任用、提升、利益代表



和保障作出规定。

## **司法**

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阶级司法和党派司法，并主张建立一种充满社会精神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并由选举产生的陪审员对所有各级司法部门起决定性协助作用。

它特别要求：

在民法中，财产权置于社会公共权利之下，简化离婚手续，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非婚生儿童与婚生儿童的平等地位。

在刑法中，扩大对人身及社会权利的保护。以教育个别人和保护社会的原则代替报复的原则。废除死刑。

在刑事诉讼中，恢复刑事陪审法庭，并将其职权特别扩大到政治和报刊案件方面。在一切刑事案件中允许上诉，取消一切损害辩护的规定。

在审理中保护被拘捕人免受官方侵犯。除当场捕获的情况外，只能根据法官的命令逮捕，在对拘留提出申诉时进行口头审理。

在刑事判决的执行中，应根据全国性法律按照人道主义精神和教育原则作出规定。

## **社会政策**

为了保护工人、职员和公务员，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

保护结社和罢工的权利。妇女在职业工作上的平等权利。禁止学龄儿童从事任何职业劳动。

以法律规定一个工作日至多8小时。对于青年和在对健康和生命具有较大威胁的企业中的工人要缩短这个时间。限制夜工。每

周至少42小时的不间断的休息。每年要有支付工资的假日。

失业救济工程完全交给工会负责安排。

同家庭手工劳动的弊病作斗争，目标是在广泛救济有关人员的条件下完全消除它。

通过工商业检查机构对一切企业、工厂进行监督，应吸收工人和职员作为这一机构的公务员和代理人而把它改造成一个国家机构。

保证劳资协定的法律效力，并通过官方调解机构帮助签定这种协定。

与普通司法权分离的独立工人法庭。

统一的劳动法。

社会保险一元化，直至把它改造成全面的人民救济事业。把丧失劳动能力和失业者包括在内。

在人民福利事业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经济救济方面采取广泛的、预防性的、救治性和准备性的措施，对福利事业根据全国性法律作出统一的规定，保证工人阶级参与它的执行。

促进国际条约和立法。

### **文化和教育政策**

社会民主党努力取消有产者的教育特权。

教育、训练、研究都是公共的事业。它的进行应由公共的资金和机构来加以保障。免费就学，免费的教学和学习用具，对学生的经济补助。

公共的教育、训练、培养和研究机构都是世俗的。应反对教会、宗教和具有固定世界观的团体对于这些机构施加任何公法性的影响。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世俗的中小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公共资金不得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

统一建设教育事业，各年级都应把劳动课和脑力劳动密切联系起来。

通过男女教师对男女学生进行共同的教育。

在高等学校统一培养师资。

### **财政与税收**

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求实行一次彻底的、全面的财政改革，它应以出处征税和按经济支付能力确定税收负担的原则为依据。

特别要：

改善所得、财产和遗产税制度。

实行平等的和统一的税金估定，并公布税收表。特别要通过强制性的帐簿检查和企业检查来有效地追究逃税漏税。

对只够社会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免税。对大众消费品最大程度地减税免税。取消营业税。

公共权力机构参与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投资和管理。

### **经济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要求：

使土地、矿藏和作为能源的自然力资源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转而为社会服务。

发展经济委员会制度，使它能在保持与工会紧密合作的条件下行使工人阶级的参与决定权。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的监督。

鼓励在工业和农业中提高生产。

鼓励移民事务。

通过长期贸易协定废除保护关税制度。以建立各民族之间的自由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合作。

在避免官僚化的条件下发展国家、各州和公共机构的企业。  
鼓励目标不在于赢利的合作社和公共福利企业。

鼓励公共福利住宅建筑。通过公共立法确定租赁权利。反对建筑方面的重利盘剥。

### **国际政策**

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同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行动中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它以全部力量反对任何加剧民族间矛盾和任何威胁和平的行动。

它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要求由强制性的仲裁法庭消除争端。

它赞成民族自决权。支持少数民族的民主和民族自治的权利。

它反对剥削殖民地民族，反对用暴力摧毁他们的经济形态和文化。

它要求国际裁军。

它赞成由于经济原因迫切需要建立的欧洲经济统一体，赞成建立欧洲联邦，以便由此实现各大洲各民族利益的团结一致。

它要求国际联盟民主化并把它改进成为和平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15—224页。张世鹏译 殷叙彝校。)

## 1934年索巴德布拉格宣言<sup>①</sup>

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

纳粹主义强加给德国和世界的专政已经一年了。德国的反革命的胜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本质和任务。在整个法西斯主义国家里人民忍受着奴役、毫无法律保障。在革命斗争中以自由的权利来消灭奴役，以社会主义制度来克服毫无法制状态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任务。

### 1 革命斗争的条件

在反对纳粹专政的斗争中是不容妥协的，丝毫没有改良主义与合法性的地位。夺取国家政权，巩固并保卫这一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唯一决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目的。这个策略就是要运用一切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去推翻专政。

革命斗争要求有革命的组织。旧的形式、旧的机构已不复存

---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于1933年秋委托弗里德里希·斯坦普费尔、库尔特·盖尔和埃利希·林耐尔起草一个新的纲领。1933年11月至12月起草的纲领草案没有得到索巴德多数的赞成。执委会把草案交给鲁道夫·希法亭和格奥尔格·德克尔进行修改。在采纳德克尔的修改和补充建议的基础上，希法亭又起草了一个草案，于1934年1月10日把它寄到布拉格。希法亭的文本对后来编辑会议上最后定稿的文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1月20日，宣言被布拉格执委会通过。没反对票的有西格弗里德·奥夫豪泽尔和卡尔·伯歇尔。1934年1月28日出版的《新前进报》和《社会主义行动报》发表了这一宣言。

在，而使之重新恢复的企图与新的斗争条件是不相适应的。由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所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必须出现。我们是被迫选择这些形式的。敌人还在凭借他们在金钱上的优势和手段的残忍来确定行动的规律。处在经济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恐怖的极其可怕的压力下的德国社会本身的形势也还在为我们确定行动的规律。组织起来了一些小组，它们必须通过代价很高的经验来学会工作的技术——这是革命者中的精华。

当法西斯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中不断激化的阶级矛盾发展起来的时候，当不满和失望动摇着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的时候，当反抗的浪潮出现、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革命优秀分子的任务就是加深群众对矛盾的认识，引导他们的发展，影响他们去确定目标，扩大联合并把革命组织发展成群众性的组织。

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领导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促进革命组织的发展并运用它的力量和经费去完成这个任务。在德国本土，恐怖压迫使地下工作十分分散。在德国本土，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领导机构的活动把这些工作联合起来。任何一个小组都受到支持和鼓励，只要它的革命精神保证它的活动在工人阶级统一的范围内服从于推翻纳粹专政的目标，都受到支持和鼓励。领导在这样做时认识到，它需要同地下小组的领导者保持经常的合作与讨论。

## **2 群众运动的目标**

组织是革命斗争的工具。革命斗争的条件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斗争的条件和目标是不能随意确定的。它是从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中，从纳粹反革命的实际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我们要问，在法西斯制度下工人阶级必须为什么进行斗争？

他们将被迫进行什么样的斗争？

纳粹主义在它的理论中否认阶级斗争，但它的实践却使阶级斗争变得极其残酷。它的统治意味着把社会矛盾提到空前的尖锐程度，就象用强力关上所有的汽阀对锅炉重新加热一样。它压迫一切工人和职员的组织，全面剥夺它们的权力，把它们交给大资本去专横处置，而专政正是使国家权力为大资本的利益效劳的。力量对比的这种片面变化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威胁着工人，而经济政策又加大了这种威胁。这种经济政策使广大群众的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在上涨，使出口工业中的就业越来越受限制。金融政策也加剧了这种威胁，使群众的负担加重，把从他们那里榨取的贡品的越来越多的部分送给某些得到政权宠爱的阶层。这就迫使群众为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存而进行斗争。但任何工资运动都被禁止，任何罢工都成了政治上的叛逆行为！

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产生恢复结社自由和重建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的社会斗争组织的要求。而工人如果没有集会自由、联合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的结社自由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工人必不可少的需要出发，产生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产生了争取他们的民主运动自由的斗争。

在失业大军中，随着失业的持续，反抗这个拒绝给他们工作权利的社会的斗争在增长，他们对于重返生产过程和建立那种经济制度的要求也加强了，这种经济制度不再使劳动者与失业者互相分离，而是要给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同等的工作机会。这些受到专政欺骗的失业者的运动直接针对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用一切力量促进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使失业者重返生产过程的斗争，扩大进行斗争的工人，使斗争者认识到这些斗争同推翻专政的目标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首要

任务。

为了重新有可能开展作为群众运动的工人运动，重新把社会主义的解放斗争作为群众本身的自觉斗争来进行，必须夺回民主权利。但任何民主权利都会成为对专政继续存在的一种威胁。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将发展成为彻底推翻纳粹国家权力的斗争。

这场斗争只是夺取整个国家权力的革命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特殊的外部灾变使暴政颠覆，那就只能用暴力战胜，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来推翻暴政。如果一个坚决的、为激进的斗争思想所鼓舞的、由一批富有经验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一个客观革命形势的条件，暴政是能够被推翻的。它只能被群众自身的行动推翻。

### 3 政权的行使

这一夺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它的行使方式。

在为了推翻专政而进行的困难的、充满牺牲的、痛苦的斗争中，工人运动本身充满了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思想。1918年的政治变革是在一个通过战争和对人民群众的强烈民族主义煽动而引起的反革命的发展时期结束时发生的。不是通过工人阶级有组织、有准备、自愿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战场上的失败消灭了君主政府。社会民主党作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未经反抗而获得国家领导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僚、甚至同改组后的军事机构分享了这个地位。它把旧的国家机构几乎毫无变动地接受下来，这是战争期间迷失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所犯的严重历史性错误。

新的形势排除了任何重蹈复辙的情况。革命群众战胜纳粹敌人后将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府，它将受到工人的革命群众政党的支持和监督。这个政府首要的和最高的任务就是保证胜利了的



革命掌握国家权力，铲除任何反抗可能性的根源，使国家机关变成人民群众的一个统治工具。

因此，革命政府必须立即实行各种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措施以持久地、全面地剥夺失败了的敌人和权力。它要求：

任命一个革命法庭。

以破坏宪法、杀人和通过否认公民权利而剥夺自由的罪名审判政治犯及其政治同谋者和帮凶、官僚和法官。

废除法官不可免职的规定。

任用革命政府所信任的人担任所有重要的司法职务。

通过加强陪审人员来根本改造司法机关。

清洗官僚队伍，立即重新安排一切领导职位。

组织一支可靠的军事和警察力量。

彻底更新军官队伍。

废除纳粹专制政府一切限制工人自由的法律和法令。

不分种族和宗教，实行充分的、公民平等权利。

教会与国家分离。

取缔任何反革命宣传。

通过革命政府立即颁布必要的社会、经济和财政法律。

必须保证粉碎旧的政治机构的行动不致受到这一机构迄今的社会基础的反抗。这要求：

立即无偿没收大地产。森林归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耕地归农业工人组成的、得到国家资金充分支持的、有生命力的农民垦殖区和合作社企业经营。

立即无偿没收重工业。

帝国银行归国家所有和管理。

由国家指定的领导机构对大银行实行社会化并予以接管。

只有在革命政权得到保障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革命

政治权力地位遭到彻底粉碎之后，才能开始通过成立一个人民代表机构来建设自由国家的事业。人民代表机构由各选区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产生。第一次选区的划分由革命政府公布。

人民代表机构以绝对多数（必要时可举行复选）选出全国家政府首脑，任命部长。直至选举结束之前，革命政府要仍行使职权。

通过在划分成地区的统一国家内部实行真正自由的自治来粉碎集中制国家绝对权力的专制制度。要在政区内为学校、福利、司法和税收事业建立自治团体，官员要对这些团体负责。

#### **4 经济革命**

工人阶级在新国家中的任务是运用已经获得的国家权力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经济。重工业、银行和大地的社会化并不是终点，而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它由此消除经济危机与失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代替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努力代替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企图。有计划的提高生产力。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发展代替通过节省劳动力来提高利润的那种无规则的合理化，代替以牺牲消费来无规则地膨胀生产机构。各个生产部门相互协调一致的发展代替它们彼此之间毁灭性的斗争。

领导这个改造的是最高层的社会主义计划制定机构。它是指导全部经济。它特别负有以下几项任务：

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制定经济计划。

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的合作下，为各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建立一个管理组织，准备继续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部门实行社

会主义化，通过控制资本投放和企业贷款来调节生产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采用。

调整已经社会化的那部分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考虑对以下经济部门实现社会化和统一领导：

信贷部门（但要维持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的自治）。

保险业。

重工业。

大的化学工业。

负责货运和客运的公共交通。

动力供应（煤气和电）。

## 5 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的剥削所有制。它保护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所有制。它意味着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并因此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产品更加容易销售。它使农村和城市的劳动所有制摆脱农业及工业大资产的压迫，摆脱银行资本的优势力量。它通过对信贷制度的控制，以必要的企业贷款为中间等级保证充足的、便宜的供应。它把老年、伤残、疾病救济扩大到农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从而加强对他们的生存的保障。农业政策摆脱了大地主的强大影响，鼓励农民经济培育和充分采用改良品种，通过国家的土壤改良来改善其土地，创办足够的教育事业，以此来使它不断地提高生产能力。

对生产的革新和监督提高了从事技术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职员劳动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也需要一个分成不同层次的合格的领导机构。这些领导机关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转变成集体的工作机构，这就使它们的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尊严。

废除教育特权。在统一的学校中，正在成长的一代不仅为未来的职业，而且为了在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履行他们的任务而受教育。升入高一级的学校仅仅根据才能和天赋，并不考虑出身。教学和学习用具在一切阶段都是免费的。

社会主义社会恢复思想自由和科学自由，保障文化工作和艺术不受官僚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干涉，把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归还给个人。

社会主义的经济革新不仅是一件物质方面的事情。它本身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和个人充分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迄今为止劳动对一些人来说是发财致富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为了维持穷苦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它现在变为一种扩大社会福利的社会服务。群众不再是为了从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者那里争取一块可怜的生活空间和随时受危机威胁的生存而工作，而是为了在更加幸福的条件下塑造社会主义的未来，实现更加崇高的目标而工作。有计划地领导技术进步将极大地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危机的消除将使社会福利不断增长。由此才有可能尽量地缩短工作时间，尤其是把人类从每天为维持生活、寻找工作的物质操劳中解放出来，这就会使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分享文化财富，学习科学知识和享受艺术。一种新的公共意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一个为了发展全部能力的新的竞赛将发展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新的社会将坚如磐石地在这一思想中确立起来。

随着社会改造接近于完善，随着专制国家机关被自治所代替，若干世纪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将会消失。依靠军队、官僚和司法对臣仆进行统治的权力国家将为社会的自治所取代，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参加共同任务的职责。意味着专横独断和无责任制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等级制度将为自由的人们履行

社会任务的责任心所取代。暴政被人民自由的自决取代，压迫将让位于所有同胞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平等。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 6 裁军和战争危险

纳粹专政使德国陷入野蛮和残暴，使德意志民族蒙受很深的耻辱。但希特勒的统治不仅是对于德国的耻辱和威胁，它还意味着对所有其它民族的自由和文明的暴力威胁。专政使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种族狂和霸权欲达到极点。它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毒害青年，它把全部精神和物质的手段投入狂热的扩军备战。它公开宣布它的战争目标：要用一种新的大区政策在东方建立新的殖民地。要把一切原属“德意志民族的地区”并入法西斯帝国。但获胜的专政对各个民族的威胁比领土损失更加严重，它要按照德意志法西斯的本性改造世界。如果说，一次具有无止境地日益完善的破坏手段的新战争意味着对于文明的一种毁灭性的威胁，那么各种法西斯专政的胜利就意味着要使它们在国内的奴役和残暴永世长存并把它扩展到世界的其余部分。

德国民主派同西方伟大的民主派结成同盟，作为组织和保障和平的手段，提出了权利平等的要求。专政歪曲这个要求，以便为它的战争意图而加以滥用。专政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在军事上已经加强的情况下力争进一步加强。它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能够作为强大的同盟伙伴而结成新的联合，以实现它的强权政策的目标。德国专政的这种对外政策意味着对和平的不断威胁并从而意味着强迫进行的军备竞赛。专政通过无耻地破坏宪法、通过导演国会纵火案夺得了政权，通过罪恶的恐怖和无耻地篡改权利和法律来维持政权，正因如此，它不能为遵守国际条约提供保证，它一旦认为撕毁条约有好处，它就会立即撕毁。

希望通过战争来推翻暴政，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不如说，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战争。因此，他们谴责对希特勒德国的一切军事妥协。他们提醒全世界的工人政党：不要低估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要民主派的权利平等，但绝对不要这个好战的专政的扩军备战！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文钱，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也必须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口号。保障和平与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并不要求军事上的妥协，而是要求再次裁军、解除武装并解散冲锋队、党卫军的队伍。

今天，在工人政党影响下的民主派的坚定和保持警惕的决心是仍旧能够阻止战争的，如果说尽管如此它仍然爆发了，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以毫无改变的势不两立的仇恨与暴政相对抗。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只有通过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民主党人将坚决反对来自外部的任何利用德国暴政在战争时崩溃的机会来肢解德国的企图。他们将不承认任何把德国引向四分五裂的和平，这种和平意味着阻碍德国自由地发展经济的可能性。

## **7 革命社会主义的统一**

随着整个国家的胜利，它的消亡问题也以毫不容情的明确性被提了出来。回答是：全面的革命，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

在这场斗争中社会民主党将力求同一切反法西斯阶层结成一个阵线。它将号召被纳粹分子的许诺所欺骗的农民、小手工业主、商人，它将号召在目前的政权下忍受过去不能想象的程度的压迫和屈辱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

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工人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已被敌人本身消除。分裂的理由已成为微不足道的了。推翻专政的斗争不能不用革命方式进行。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无数分散的小组的成员，只要是专政的敌人，由于斗争本身的条件都成了同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历史本身强加给我们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知道，它因此应当摆脱任何宗派主义的封闭性，它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把工人阶级联合在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之内。它准备支持所有进行反对专政的斗争，而不是进行反对其他党派的斗争的小组的地下工作。它同样使自己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向一切关于革命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的问题的讨论开放，这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共同的思想工作，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才能产生。但是它不允许自相残杀，不允许为了如此利用尚未获得的胜利的胜利的问题而使工人阶级的分裂永世长存，而这种分裂是对于专政的最可靠的保护。

纳粹当权者吹嘘自己已经消灭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已经根除了自由思想。他们作为胜利者向被压迫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但他们的即资本主义势力的胜利愈大，他们未来的失败就将更加惨重。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今天的凯旋就是明日的覆亡。

我们为了伟大的不朽的人类理想进行着反抗法西斯暴行的斗争。自从中世纪的束缚消灭以后，我们就成了伟大历史发展的支柱，我们是不朽的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是英国和法国革命的继承者。我们不愿意过丧失自由的生活，我们要努力争取自由，这是没有阶级统治的自由，是直至完全消灭了人对人的一切剥削和一切统治的自由！



CICIR 045961

牺牲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德国工人，你们可以失掉的只是奴役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世界！

德国工人在消灭纳粹专政的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

通过自由实现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

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万岁！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25—238页。张世鹏译殷叙彝校。）





CICIR 045961

牺牲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德国工人，你们可以失掉的只是奴役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世界！

德国工人在消灭纳粹专政的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

通过自由实现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现自由！

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万岁！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汇编》，狄茨出版社，柏林—波恩1984年德文版，第225—238页。张世鹏译殷叙彝校。）